赵世炎选集

Zhao Shiyan Xuanji









赵世炎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傅世悌

封面设计：陈世五



赵世炎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9 插页 8 字数 392千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册

书号：10118·806　定价：2.35 元



赵世炎同志1920年在法国时留影

趙世炎同志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革命家，我深信，他的名字將永遠留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心中。

陳雲

八三、一、十六



赵世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一九二六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他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商务印书馆职工中有很高的威信，在我个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我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和职工运动分子的会议上，曾多次听过他的讲话。每当大家意见分歧时，只要他来讲一下话，大家都能心服口服，很快消除分歧，取得一致。

陈云同志题词

趙世炎同志是中國革命初期的馬列主義的政治活動家。經過各種工作考驗，領導路線勝任。開路在黨內外獲得聲望。一九二七年陷敵不屈，凜然大節，表現出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可為人民楷模，崇敬，絕非偶然。他們掌握規律，支配一切，誰能違抗。趙世炎同志永遠活在人民的心目中。趙世炎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四月 陳毅題

陈毅同志题词

悼赵世炎同志

一九二七年四三以后，我和李立三同志由汉口到上海，去世炎同志住所和世炎同志作了一整夜的谈话。没有想到，那次的一夕谈，竟成为我和世炎同志的最后一别。到现在已经卅六年了。

世炎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工作中深入群众，生活上艰苦朴素，对敌斗争奋不顾身，对同志坚持原则又热情帮助，所以深得同志们的尊敬与热爱。世炎同志是一个高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崇高品德和感人的事迹，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聂荣臻 一九六三年六月书

聂荣臻同志题词

赵世炎同志领导我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卅多年来还常常鲜明的浮现在我的记忆里。他那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他那认真负责细致不苟的工作作风，他那既严肃又和蔼可亲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牺牲的气概，表现了共产党员高尚的品质。尤其是他那善于联系群众和深入群众的工作，因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敬爱。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我特向他致以衷心的纪念和敬意。

邓颖超 一九六三年四月。

邓颖超同志题词

趙世炎同志是无产阶級的第一代革命家是傑出的組織工作者和群众工作者是英雄的共產主義戰士

李維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李维汉同志题词



1923年2月17日—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赵世炎同志主持下，于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名称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此系大会全体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二人为赵世炎同志，第六人为陈乔年同志，第八人为陈延年同志，第十一人为王若飞同志。第三排左起第十人为周恩来同志。

出版说明

赵世炎（1901——1927），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四川酉阳人。1915年赴北京读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人之一。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第一批党员。曾担任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为建立和发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到莫斯科学习，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旅欧期间，世炎同志与周恩来、王若飞、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24年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李大钊等同志一起领导北方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6年5月，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和周恩来、罗亦农同志一道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和陈延年同志一道在上海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

动派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7月19日，被反动派杀害于上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

赵世炎同志光辉而短促的一生，不仅留下了许多英勇、动人、难忘的革命事迹，显示了他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而且在七、八年间，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写了大量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复论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他以施英为笔名写的著名的七论上海的罢工潮，精辟地总结了革命的斗争经验。这部选集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重要文献。

收入选集的118篇文章，绝大多数是世炎同志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后所写的，另一些则是世炎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后，为探寻救国救民之道时所写的。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世炎同志的思想发展及其战斗的历程。此外，还收入了吴玉章同志、李立三同志所写的纪念文章以及《赵世炎年谱》，以便读者对世炎同志有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陈云同志等为本书题辞，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选集是按照文章发表年月次序编排的。

世炎同志生前在我国南北诸省及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用过许多笔名在党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估计不少。我们希望通过这部选集的出版，能得到各方面同志的协助，进一步搜集到世炎同志的遗文。

赵世炎选集编辑组

一九八三年五月

忆赵世炎同志

吴玉章

赵世炎同志，四川酉阳龙潭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四年开始入私塾读书。一九一四年毕业于龙潭高级小学堂。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他被选为“附中”学生会的干事长，组织和领导了“附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在这期间，他先后创办并主编了《少年》（半月刊）、《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等进步刊物，投入了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一九一七年，我在北京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法文专修馆）。世炎同志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便来这个学校学习法文，准备出国留学。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和一些志士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这伙爱国青

年，到法国后，正迎着当时汹涌澎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到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党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驻巴黎的通讯员。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同志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被选为书记。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他是总支部领导人之一，并且是中共法国组的书记。一九二三年，他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随李大钊等同志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秋，他回到国内，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除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进行系统介绍和广泛宣传外，对于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世炎同志，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引路人。在他出国期间，我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和杨闇公等同志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因受军阀迫害离开四川，于一九二五年初来到北京。这时，原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中的童庸生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我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布尔塞维克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同时已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涨。我听了非常兴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存在

的必要，应写信回去将它解散。赵世炎同志知道了我的意见以后，十分满意，特来找我谈话，并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这位优秀的学生，这时便成了我的引路人。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风暴。赵世炎和李大钊等同志领导着北方的广大群众进行着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的斗争，成为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最活跃的人物，他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的罪恶行为以及指导革命斗争的文章。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奉系军阀打国民军，北京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赵世炎和李大钊、陈乔年等同志不仅领导了这次运动，并且亲自指挥和参加这次游行。游行队伍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卖国贼段祺瑞的残酷镇压，造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从此，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反动军阀的凶残面目，觉悟到必须用武装斗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到来。"三·一八"后，赵世炎同志代表北方区工会组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到上海后，化名施英，积极开展江浙地区的组织工作和上海市的工人运动，同时，在《响导》上写了许多指导工人斗争的文章，成为上海工人最爱戴的一位领袖。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同志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第三次起义时，他和周恩来同志担任总指挥。他们亲临前线，指挥着无比英雄的工人纠察队和成

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打败了负隅顽抗的反革命武装，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中国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后，蒋介石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世炎同志仍然坚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七月二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赵世炎同志被捕了。在被捕的时候，他利用空隙让夏之栩同志转告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迁移，避开敌人的搜捕。赵世炎同志在枫林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拘留所中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一切折磨都不能使英雄屈服。最后，在七月十九日晨，反革命把他推到枫林桥畔杀害。就在这样严重的时刻，赵世炎同志在刽子手的大刀面前，仍然昂首挺胸，高呼革命口号。

赵世炎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从他生命里放射出来的光和热，却永远温暖着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心，永远照耀着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上海的人民，尤其是工人们总爱到枫林桥凭吊。他们看着枫林桥畔如海的桃林，想起烈士英雄的事迹，无不肃然起敬。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附诗五首：

一

十月传来炮一声，
中华儿女奋雄鹰。
翱翔四海求真理，

胼胝甘为劳动人。

二

故都千载夜漫漫，
红楼灯火照沙滩。
“三一八”流多少血？
血债必须用血还。

三

上海工人志气豪，
冲锋陷阵涌如潮。
三次起义君前导，
争得红旗沪上飘。

四

雨暴风狂天地昏，
娘娘报警未闻声。①
临危毫不改颜色，
犹有从容计救人。

五

枫林桥畔表丹心，
浩气如虹铄古今。
千树桃花凝赤血，
工人万代仰施英。

原载：1962年7月19日《人民日报》第6版。
（此文收入本集时，吴老有所增改——编者）

---

① 1927年7月2日下午，敌探到家坐待赵世炎同志。世炎同志的岳母夏娘娘机警地将窗口的花盆推到马路上摔碎，为世炎同志报警，因雨倾盆，天昏地暗，未发生作用。

目 录

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 1
推论“诸君的自身问题”（致孙光策）… 6
说少年（续）……………………………… 9
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 13
随感录…………………………………… 19
学校的班长制度………………………… 20
随感录…………………………………… 25
答党家斌（诗二首）……………………… 27
论青年自杀……………………………… 29
学校不及私塾好………………………… 33
学校调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 39
致东荪、白华…………………………… 51
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 53

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 57
给周太玄的信…………………………………… 61
给凌汉等人的信………………………………… 65
给隆郅同志的信………………………………… 67
给吴明的三封信………………………………… 71
给黄仲苏的信…………………………………… 77
给罗觉的信……………………………………… 78
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 79
苏俄与美国……………………………………… 83
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 89
列宁……………………………………………… 91
万国工人救济会与中国工人…………………… 100
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者——英国……………… 104
工人与党………………………………………… 123
美国黑种工人要求加入工会…………………… 125
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 127
孙中山可以北来么？…………………………… 134
十月革命………………………………………… 138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 143
国民会议呢？军阀独裁呢？…………………… 145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 149
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 156
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 159
段祺瑞来京以前………………………………… 166
段祺瑞来京以后………………………………… 171

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之压迫……………… 175
杂感："到群众中去" ………………………… 179
杂感：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造谣………… 181
国民革命与武力……………………………… 183
三道命令……………………………………… 187
金佛郎案……………………………………… 189
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其实际………………… 191
善后会议悍然召集………………………… 200
东南再战不可免…………………………… 202
外交团受鞭笞……………………………… 203
北方最近之政情…………………………… 205
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 207
介绍《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号》…… 211
统治阶级与民众挑战……………………… 214
"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 217
"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 222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经
过与结果…………………………………… 226
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 230
善后会议不能善后了……………………… 235
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 239
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 245
中山去世之前后…………………………… 251
革命与反革命……………………………… 255
"利用"与"包办" …………………………… 259

"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263
"五一节"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 267
驳斥对于苏俄的谤言…………………… 273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
与结果……………………………… 278
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 288
奉军入京以前………………………… 292
奉系军阀压迫开滦煤矿工人………… 295
汉冶萍煤矿工人突遭压迫…………… 297
沪日纱厂又开枪杀人………………… 300
张作霖对帝国主义者之宣言………… 302
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 306
"五卅"纪念与双十节纪念………… 311
沪案解决与段祺瑞政府……………… 314
军阀战争之序幕……………………… 318
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 321
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之崛起…………… 325
怎样分别国民党的左右派…………… 328
国民军与反奉战争…………………… 332
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 334
为民众政权而战……………………… 345
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 348
从广州到满洲里……………………… 351
短言…………………………………… 353
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

破坏阴谋……………………………… 357
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 360
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 363
没有亚洲，帝国主义便会死……………… 366
京津战争与农民…………………………… 371
短言…………………………………………… 377
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 380
政治现状与新的战斗之预备……………… 384
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际…………………… 393
本报出版祝贺工友………………………… 408
一个中山主义者…………………………… 410
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 414
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 419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 425
“五卅”纪念运动之教训与上海
民众之责任…………………………… 431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436
北方政局新变化之征兆…………………… 443
上海最近的罢工潮………………………… 448
再论上海的罢工潮………………………… 456
三论上海的罢工潮………………………… 462
四论上海的罢工潮………………………… 46[illegible]
五论上海的罢工潮………………………… 477
六论上海的罢工潮………………………… 48[illegible]
七论上海的罢工潮………………………… 491

最近政治状况与工作……………………… 508
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 512
全国政治近况……………………………… 522
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 525
论汉口之罢工潮…………………………… 528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 537
“三·一八”的一周年……………………… 553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 557
上海总工会复工令………………………… 566
附录：
初次读到四十年前的一封信……………… 569
赵世炎年谱………………………………… 571

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

工与读，两事也；欲得其兼，自不能不半工而半读。然二者一劳一逸，又实绝对相反者也。使工者而能读，人咸谓之好学；今世之工而能读者，间有之矣。古时如挂角担薪之事，史不绝书。惟读而能工，殊不多觏。以此为言，人亦不信。然工者既可读，读者亦何尝不可工；此愚所以调剂并论，而有半工半读之说也。半工半读之说，人习闻之矣；非愚之创论也。特愚为崇拜是说之一人；不自揣量，而又欲履行之，故愿一申其说。且欲以质诸人，天下事不患知之不多，惟患行之不力。愚对此虽确信其有益；而处今之世，如此境地，如此社会，对于此事之实践终不能无疑。愿为说以详究之。

半工半读，人尽能为也，又何必特以今日之中学毕业学生为揭橥。愚标此题，其意有二：其一曰欲此事之实践，当自中学毕业生始；其一曰惟中学毕业后，始有半工半读之能力。兹请逐一陈说之。前者之意，愚以为应由中学毕业生提倡之。以中学毕业生正当少壮之时，对于家庭，既可脱离若干之依赖；又无若何之担负。独立生活，是时为之枢纽。吾国家庭制度，积习相沿。青年毫无独立知识，依赖父兄资给，始可读书。其甚者未成年即已完婚，一家之中，除自身用钱吃饭外，犹以为不足，反多添一人，为家庭增一项出款。此虽由于吾国习惯，以及父母之溺爱或由抱子添孙之希望；然亦吾辈少年不能立志，且无独立能力所致。早婚之弊，至于亡国弱种；吾辈孝父母之道，固不在此。为家庭计，为自身计，都不应出此下策也。是故欲免此弊，须先有自谋生活之志。有此志，便当求所以达之。然亦不得谓因欲自食其力遂不读书，即于社会上谋一职业也。吾辈学业，仍须继续求之。此愚所以言半工半读也。具此能力，惟吾青年中学毕业生一生之枢纽，欲改革吾国家庭制度，欲奋斗于此二十世纪之竞争世界，均不可不注意于此也。

后者之意，全系能力问题。以在中学修业时，尚难有此作工能力。若勉强为之，反于学业有害，毕业后，自持力稍强，自谋亦稍富。学业既经初步，自应从此自择专门学科。于此时便半读半工，即不能完全自食其力，亦可稍借家庭之资助。总之，吾辈能入学读书，便是幸福。人有幸福，岂能泰然处之。若吾辈徒挟父兄之资以入学，实未免太逸。人生幸福不当作如此解也。愚尝持此论，人多非笑。然不以为

意。总之，愚深信入学读书，是有幸福，是最快乐，最安逸，绝非苦事。愚所赞成半工半读之说，是为不宜太逸必须劳动之意。劳心劳力，应相间而行。读书是劳心。工作是劳力。至求减轻家庭资助，尚是第二层目的。吾辈每好说消遣二字。其甚者，赌博征逐，都以消遣二字了之。西哲有言曰，少年之光明字典中，无失败二字，消遣二字，固不能使字典无之，惟吾辈当切戒，不宜用以作饰词耳。

更有进者，中学毕业后，能力渐增，又每为吾辈之害。盖能力不善用，而多借以庞然自大者是也。吾辈年龄日长，勤于学者亦日增。习于恶者，其恶习又日深。尝见家庭中父兄感子弟之不肖，多慨叹而言曰：此子渐长而行渐变矣。吾辈使父兄有此感想，将何以自安。然青年对社会抵抗之能力本甚弱，环绕此身，皆是危境，欲能不染，惟能破除好逸之思想。不好逸便不思消遣。不思消遣，便能耐苦。吾辈读书，而能耐劳动之事，自可邪念屏除，远于恶俗。始有奋斗之能力。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何事，皆应奋斗。生今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

天下事托诸空言，不能见诸事实，是亦病也。愚既言，学者宜半工半读；然以吾国现时社会情状言之，何种劳工，能适于学者欤？效工人入工厂乎？金工乎？木工乎？铸铁造器，编物织布乎？抑为佣人乎？售报乎？为报馆校对员乎？鬻笔佣书乎？工之事盖甚广，劳力之途亦甚多，凡此皆吾辈所不能为也。欧西各国则或有之，吾国社会情形如此，即有志为之，势亦不能。然则愚前所言皆空言也，愚亦自知之，惟

甚幸其不为空言也。

十年以前，吾国留学美洲者，即有半工半读之事。或为洒扫之役，或为铺户标刷窗壁之事，或入工厂作半日工，以是而成学业归国者，盖尝多有。嗣后因美人排挤，今已不多见此事。回顾国内，数年以来，则惟有留法勤工俭学会之一事。其已举办者，言有留法勤工俭学会，有中法协进会，有华法教育会，进行亦速。天津有孔德中学，保定有育德中学，及初级工艺学校，成都有留法预备学校，都中亦有孔德学校，及高级各级之工业科。各会团体，沪上俱有分部。今岁学生工人团，发自沪上，赴法者已有两起。舆论颂扬，称为美事。(本月十八日京中英文导报载上月底第二批学生工人团自沪上起行之事，题曰——Second batch of self-supporting student-Labourer proceeding to France) 创办志士，最近复买轮渡海，扩充华法事业于巴黎。有志于此者，是亦良机。似此勤工俭学，躬亲操作，得适用之艺能，为国家实业发达计，为社会工艺兴起计，为个人生活远图计，皆莫善于此。试观今日之负笈言留学者，挟资飘洋，数年归来，所学不获所用，但能求售于社会，不暇计其为何途。事务所迫，不得不令其如此；其甚者入政途，挂党籍，以蠹国殃民者，又不堪道矣。

愚言至此，意未尽而词已芜，是非得失，虽自信而不敢必人信。总之，所言半工半读，是为习劳。至云自食其力，既所难能，亦非半工半读之主旨。惟吾辈力所能至而已。且愚此题，谓今日之中学毕业生，然则将全国之中学生为之乎？是亦迂论矣。惟有志者为之耳。韶华流水，时光易逝，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愚于中学毕业之期方迩，前途茫茫，不知所届。思潮所及，辄慕半工半读之事。因而握管为说欲以质诸先辈，暨同学之前，借以自勉；且愿读者有以教我也。

原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69期，

1919年5月5日。

署名：赵世炎

推论“诸君的自身问题”

——致孙光策

孙先生：

我读《平民教育》第一号，见有先生的《诸君自身的问题》一篇文章，说得好极了！我非常的佩服。但是还有点意见，想说出来请先生指教：

“诸君自身的问题”，我想替先生一句话打破，在现在说就是“解放”的问题，要说笼统一点，就是做“人”的问题。我的猜想如此，不知道是不是？

我为何这样想呢？因为我以为现在一般青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解放，脱离种种恶习——所以先生说是“诸君自身的问题”，里边又将“女子问题”特别提出来说。我以为现在我们男子还没有解放，不仅

是女子要解放。可怜现在只有“女子解放”的主张，大家只管“越俎代庖”替女子说话，不想想男子还没有解放。自己同性的解放没有做到，如何有意思去说别人？现在做文章来教训我们青年的固然很多，但是“男子解放”四个字没有拿出来，大家总觉得这些议论不过是些“圣训”，“嘉言”，“懿行”，“传志箴铭”，把他当作“古文”，读过一遍就得了！这就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他的“解放问题”，也就是不知道是他的“自身的问题”！胡适之先生举问题的例证曾说：“……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难道女子就应该先解放，男子就应该后解放吗？胡先生的意思也许是说：不特女子要解放，男子将来也要解放。所以从女子说到男子，或者是女子解放较为容易，或者有主观客观的分别。但是女子解放先从社会着手，后及家庭——因为家庭有骨肉的关系，还不贱视女子，只有社会对于女子毫无平等观念——社会与家庭都有男子的份子，男子还没有解放，女子也不能单独进行。所以先生提出一个“自身的问题”：男子要解决男子的，女子要解决女子的，各人要解决各人的。互相援助也可以，但是不能依靠人，各人不要忘了各人，不要忘了“自身的问题”——我把先生的意思这样推论，先生以为怎样？

国家问题，当然没有问题。若在国家问题中讲“自身的问题”，不幸而遇着一个糊涂虫，把“自身问题”看作“自私问题”，这个人非卖国不可！

先生所批评灵芬女士的话，我却有点不敢赞同。譬如说：“这不是他们承认自己为被锁的俘虏、被囚的罪人吗？”假

使灵芬女士果然承认也并不足耻；譬如男子中难道尽都不是“俘虏”、“罪人”吗？中国女子处于被助地位，这个趋势固然不好，但是在这“女子解放”声浪很高的时候，依互助的原则，男子当然要帮忙。并且灵芬女士还说：“……请那些新青年男子，来帮助我们已觉悟的女子，去指导那没有觉悟的女子……”是灵芬女士已有自任的表明，恐怕“俘虏”和“罪人”两个名词，他未必肯承认呢！

赵 世 炎

1919年10月13日

原载《平民教育》第3号，

1919年10月25日。

说 少 年（续）

（二）现代我国的少年：

甲（总论）

我要说“现代我国的少年”，我又先要作“现代我国的少年”的总论，岂敢！岂敢！普通一个人要论一件事，总说是问世十年或八年。可怜我自从四岁起，读了三、四年的《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又读了三年的四书、五经，到了十一岁进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又进了四年中学，现在刚脱离中学，我那里会知道世是怎样问法？我既没有问过世，读的书又很少，我的家庭愉乐，抛离的很早，我的朋友交际，又很冷淡，叫我从何下手来论“现代我国的少年”呢？莫奈何我的脑筋一定要发出这个题目，我的手一定要拿起笔来写。细想起来我只好顺着脑说我自己的话。对与不对？大家原谅。

我有一个同乡曾慕韩先生，曾做一本书叫做“国体与青年”，他所说的现代青年有三种：（一）堕落的青年；（二）迷惑的青年；（三）自杀的青年。我常常拿这三种，反省我自己：第一层堕落，我自己不能说自己，因为自己说的近于掩饰；第三层的自杀，我自己并没有这样计划，并且常由人生观上反对这事；惟有第二层的迷惑，可怜我自己实在不敢辩护！我现在要说的自己的话，就是要说迷惑的少年，与我这最幼稚观察所得的迷惑少年。我脱帽三鞠躬，向国中自命少年的深深请一个罪，因为我拿迷惑的少年来说“现代我国的少年”。

（乙）所处的家庭

不得不已！我既拿迷惑的少年来说现代我国的少年，我要说现代我国少年所处的家庭，就是迷惑少年所处的家庭。迷惑少年所处的家庭，也就是一个迷惑家庭，糊涂家庭。现在一般人所谓的“家庭教育”，要没有迷惑的家庭，何至于有迷惑的少年？给以袭产，养以丰衣美食，逞一时情感的指腹为婚，抱子添孙主义的早早娶媳，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一种。希望子孙，达官贵显，光宗耀祖，步步高升，今年读字，而明年该读五经了。托张求李，送进学堂，几年速成？越快越好，毕业后可以拿多少钱？差事好不好？将来某某先生，准可以托他提拔提拔，一家子有希望了，孩子出头了！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的第二种。“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过了几年，四书五经念完了，或者是高等小学或中学毕业了，有的是家业艰难，有的说是“世道大变”。人上托人，设法求事，东拉西扯，找点小本，作朝不保夕的糊

口生涯：张某是洋行买办，李某是钱店经理，叹惜连天，垂涎羡慕，这是迷惑家庭政策第三种。迷惑的路，千条万条，层出不穷，实在是描写不尽！还有张百忍的五世同堂，人人说是佳话，孰知道一般的家庭，只要时机成熟了，就举行“瓜分”：有的由父母主动，大批爱甲儿，恶乙儿；有的由兄弟争闹，或说父母偏爱，或因行为不合；有的是父子之间，发生问题，父说子不肖，子怨父固守，作儿子的，以为这财产是应得分的，有丝毫不平均也不行，作父母的，以为财产是应该给子孙的，若不然子孙何从生活。一般自命少年的，因此一天一天想，产业何时可以分？自己将来得了分产，如何的妻子、奴婢，享受快乐，这都是迷惑家庭所产出迷惑少年的行径，并且是一般自命少年所互相标榜，互相竞争的。大家由这种迷惑家庭钻出来，由各张旗鼓，创造自己的迷惑家庭，传之子孙，迷惑无穷。

（丙）所处的学校

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学校就是舞台了！由迷惑家庭培养的子弟，受迷惑家庭产出来的教师教育，与一般迷惑朋友“日居月诸”实行迷惑的生活。学校是一个进身之阶，学问是一种手段，时髦不可不趋，面子不可不讲，八十分是甲等，七十分是乙等，军国民教育，养成效命“国内沙场”的志士，慨慷悲歌，做几篇“元元之民，陷于涂炭”的文章，马褂尚黑，长袍尚白，自来水笔，亮光皮鞋，运动短裤，卫生毛衣，处处要挂学生的招牌，总怕人不知道我是学生！这都是时髦少年所受的教育与行为，是好是坏，我岂敢批评，不过我以为迷惑两个字，终不能免。至于

在学业与操行各方面，我们迷惑少年实受赐不少；惩戒，记过，革除，我们知所警戒了；给赏，记分，褒奖，我们知所荣辱了；考试、发榜、甄别，我们知所发愤了。“黑者，黑也”“读书人应受绳墨”，这都是至言至里，小事不敏，静而听之。象这样的教训，是非得失？我又岂敢批评，不过我觉得都是造成迷惑的根源，还得研究才好，要公开，不要秘密，要进取，不要保守。可怕杜威博士真利害！他说“教育即是生活”。我以为中国的学校是些衙门，四班八房，典吏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级，森威谨严。我们在学校作了囚犯，出了学校，也就不免一个土匪！可怜！可怜！官僚式的教育！贵族式的学生！迷惑的少年！”

（仍未完）

原载《少年》第3期，

1919年11月1日。

署名：赵世炎

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原来是什么意思，请先说说：（一）很多的人说："忙得很，忙得很！"或是说："没有功夫这样，没有工夫那样，……"；（二）有很多人又说："没有事！没有事！"或是说："不要紧，很可以慢慢的！"或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总觉得没有事。这两种是极端反对的，然而都是实在情形。

两种所生的现象：第一种好象个"无事忙"，因为忙不出个所以然；第二种是自己知道有事，却不承认有事，但是这种人总归有点事，只要张着两只眼，就有"眸子不正"的事；就是闭着眼，也有"梦邯郸"，"梦周公"的事。所以这种人没有事还是有事，唱戏，喝酒，冶游，打牌，赌钱，抽大烟！

有这以上两种极端相反，动机不同的事实，却又是同归于

无用；所以到底要怎样才好？我们现在是在读书，别的什么这界那界的“奥妙生活”，我们且不必管，我们先讨论自己。并且我恐怕……恐怕……我……你……他……我们：不属于第一类，就……就属于第二类！

人是不是当然很忙，是不是当然没有事？忙的人是不是真忙？没有事的是不是真没有事？这些问题都不必讨论，只简单答复就行了。简单两句话：“人的事很多，但是不必忙”。

所以我们读书的事很多，但是也不必忙。读书的事，对于我们，一点也不忙，我们觉得忙，是我们错了！至于说是没有事，当然根本上不能成立。读书又要去赌博，冶游，就不必挂读书的招牌：要说“逢场作戏”，就不必瞒着父兄；要说“偶而为之”，就不要再干第二回。打不了“读书”的招牌，也就要打“人”的招牌；难道真在鬼门关喝了迷魂汤？不然我们不要忘是个“人”。

读书既是不必忙，忙是由时间上生出问题，所以我想讨论这个时间分配的问题，我们少年学会有讨论一项，我就把他提了出来；几天以后，接到弘毅、综两位会友的起稿，已经录在前面了。

弘毅君一篇，虽是理论，却也切实。他说的书的性质，人的精力，与环境关系等等，都很扼要；不过他把我的题目有点误解：他说的是我们如何分配读书时间，我说的是我们读书的人的时间分配的问题。

综君的“十分之几”分配法，很有道理，决不是随便的，我们细看看细想想就会明白。要注意的，就是他第四项的作工时间，特别占十分之三，这又要拿“工读主义”来说

明；只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实行的办法。依我意思，只要属于“同时不用脑力”的事就行，譬如关于私人或公众的亲手“操作”的事，就算劳力；再退一步说：我们往返道途，譬如入校及归家，以步代车，也是一种：又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青年的工具”：家庭中，书房中，有些器具，真干起来，也好极了。

综君的第五项尤要特别注意，我们学生界在这“五四”以后，群众运动渐收束了，但是中华民国已经给了我们一种担负；所以如综君第五项的说明中，我们总要择一项，若能力不够，也要出脑力预备，拿出时间去试；他这“十分之几”分配法，最为平允，大家都作得到，我认为这分配法是共同的，不过我个人现状与他的微有不同，我且写出来与他作个比较的参考：

（一）校课占全时间（上课不计）十分之一。

（二）看参考书等占十分之二。

（三）看新书报、新杂志占十分之一。

（四）劳力工作占十分之二。

（五）劳心的事占十分之三或四。

（六）运动占十分之一或无。

这都是以我现状说的，我的工作的事，说个笑话：小而言之，自己照料饮食，洗衣洗裤，补衣补裤，我都认为是劳力，我也常常作，总之我认为实行“操作的”，就算劳力工作。我自己觉得不对的，就是第五项占的太多，应该减去一分，增入第二项或第六项：我自己明知应该改良，无奈乎不能实行，并且第六项几乎没有，我自己知道很不对。

我个人的“十分之几”分配法，不足计较；我觉得综君的很对，很可实行。惟“十分之几”的方法，用时间的单位限度计算起来，是怎样？若不说明，好象是一个“对于已过的观察”，不是“对于此后的规划”了，那岂不近于“造册子”、“画表”的事，岂不糟糕的？

我们要拿钟点来做单位，决不行；因为以上六项不能每人每日件件都作。若以一日为单位也不对，因为不能说今天作某项，明天作某项。以周以月更不行。所以不能有绝对的单位，只有一个时间单位的限度；这限度用钟点用日全不行，三日五日，又不好计算；最好就是一周。简单说：“把一周的时间（除授课、休息、睡眠不计）分为十分，照着前六项分配实行；如第（一）（五）（六）三项可以全天全有；（二）（三）（四）不必每天都有；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周之内六项全要做到，全要按照所分配的分数。

以上的大致如此，详细的我们一面想，一面实行，自然觉得很明白，并且一定觉得有趣，不过这些时间，我们都把授课、休息、睡眠时间除开，这三种也是我们的时间，并且占去了大半分，我们不可不研究。

（甲）授课：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要用心听讲，不过也有不可听的；对于这一层，我就主张不听，不特不听，直到可以听时才去听；我匀出这时间，还可做“十分之几”之内的事，不过不要做“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事才对，至于甚么“旷课”“缺席”那是学校造册子的事，与我们无关。

（乙）休息：这一种时间分几种：（1）下课以后的最短时间；（2）饮食以后的最短时间；（3）“十分之几”中

各项内最短的时间，大概不外三种，长一点的就是睡眠，或是卧病，这是不在预算内的，或是有特原因的长期休息，这三种都是一定有的，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不过这些休息都要真的，要是适当休息也拿着书看，这叫做“自苦”。

（丙）睡眠：前两种的时间，不能人人都同，这一种依理可以划一。有很多人主张每日睡八点钟。我以为春、秋二季，应该睡七点钟，冬、夏二季应七点半钟，春秋二季的时间，比冬夏贵半点；理由也不是因为什么“春光明媚”，“秋朗气清”，不过这两季比较上可以少睡半点钟，并且还有地域变迁不同，不可概论；退一步说，四季都是七点钟也好。我们总要睡得够，别的分配的时间才能准，所以不能不有一个允当的限度；至于睡后半夜的两三点钟或是“明天以后前半天”，那是“逢场作戏”，“偶而为之”的结果，他的时间就没有分配，也不必管他了。还有“昼寝”一件事，也不应当，这是算在七点钟之内，也觉得零碎，顶可以不必，孔夫子骂宰予，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以上的三种说完了，再将我们一天时间总算一算：（一）授课普通八点或九点，且以九点计算；（二）零碎的休息，二点钟；（三）睡眠七点钟；这三种就算占去十八点了。除下的六点钟就是“十分之几”的分配所占的时间了。倘若只有八点钟的课，或是只以五点钟分配“十分之几”的事，以这一点钟流入休息内也可；又若没有八点钟的课，就可以多出的钟头，加入“十分之几”内。

这“十分之几”的分配时间，用一周为单位限度，到现在就可以用钟点计算，如上所说，平均每日六点钟，七日就

四十二点钟，再加入星期日没有课的八点钟，就共有五十点钟了。把当分作十分，每分就是五点，所以我们每周有：（按照综君所分配）

（一）十点钟温习校课（平均每日一点以上）。

（二）十点钟看参考书（可以五日分配之）。

（三）五点钟看杂志（可以四日或日分配）。

（四）十五点钟作劳力事（可以五日以上分配）。

（五）五点钟作劳心的事（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六）五点钟运动（平均每日几十分钟）。

我的"我们读书时间分配的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完了。题目是妄拟的，这样分配法，综君提出来，与我意思同，我就把他说明，是不是对呢？不知大家意思怎样？不过我觉得很可以实行，我自己的是实行了，并且我想几十年最时髦的"壁上贴的功课表"，差不多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是不是造册子的作用？也不知道；贴在壁上，能实行不能实行？是一个问题；天天如此，是不厌烦？又是一个问题；并且有几天又换了一张贴着的；有把几点几十分都定出来的；这些事我都干过——我想与其这样死，不如改个活法子。大家的意思怎样？我们可以从细商量；我们"少年学会"研究问题，是很欢迎人指教的。

原载《少年》半月刊第2期，第二至四版，

1919年10月16日。

署名：琴荪

随　感　录

以钱易学——我某天要赴学校考试，偶然见着朋友罗汉，他问我干什么？我说："今天考"，一句话把他的牢骚勾出来了！他说："学校里面，我最反对两件事：第一是考试，第二是收学费"。我说："还有保证金、实验费、体育费……种类多着了！你反对，你没有钱就不能入学，以后每次不交，就停止上课！"他又说："很多的人，因为没有钱就废学"。我说："但是学校决不会因不收学费、保证金……就关门；他尽管照样收，你尽管废你的学，某老先生说的好：'中国幸而是认得字的人少，不然都象北京大学学生去干政'。对呀！幸而收学费，不然认得字的更多了！"

原载《少年》第3期第四版《随感录》栏内，
1919年11月1日。
署名：琴

学校的班长制度

（编者按：赵君这篇文章，曾经投稿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但不知载出没有？合并声明，以免与本刊启事有冲突。）

劈头一句话，学校的班长制度，是因为想在每班里边抓出一两个学生，养成他的奴隶性质！

但是这话一说出，大家总以为我说的太过了。不然！我有种种的理由：

第一，班长是学校要学生举出的，不是学生自动要举出的；譬如学校不要学生举，学生就是自动的推出一二个作事，绝不请他作“长”。什么叫做“长”？谁应作谁的“长”？要是这一二个人的学识高，这一班的同学，自然应该由研究学术上受他的益处；要是这一二个人的办事能力好，同学自然可以委托他，请求他去办事；所以在学问上，办事上，都只有相互的精神得益处；为什么还有一个“长”？学校里边，有了校长，还有监学？又有兼管理的教师；有了这些还不够，硬要把学生看作奴隶，还要添上几个“巡阅使式”的指导员！然而班长未必指导同学，不过养成他的作“长”

性，这种性又未养成，只是养成他供趋使的人格！

第二，考查班长实际上的职务，不过发讲义，拿粉笔，替学校传话，替学校作种种奔走的事，班长对于学校，只是"供差"；对于同学又不能算是尽义务，因为义务是由个人自动的意思去作，绝不是由他方面命令而选举的去作。并且这些事，何必要班长作？为什么不说在学生中选举"听差"，却又叫他作长？至于一班对于功课上，意志上……的事，应当用班长去交涉，但是没有班长，这一件事也一样的交涉。既然是同学自动的意思，就应该由自动推举的人去办，不能借用他方命令选举的人。所以班长对于发表学生自动意思，决不适用；换过来说：班长只适用于学校趋使；再追进一步说：班长是学校不费钱雇的"听差"！

第三，一桩最堪痛哭的事，就是因为班长制度，学生被一种"潜力"压服了，由"被动奴隶性"变为"自动奴隶性"！这一种可分两层说：

（甲）班长方面：因为可以离开同学这一群，同时又没有别的同学可与我一样，我就可以单独自作别的行动。明明白白的说，就是"逢迎"的事，详细情形，大家都见过，丑得很！用不着细说！所以班长任期愈多的，除开自有觉悟的外，这一种性情，只有愈养愈深！可怜呀！他是未受教育啊！

（乙）同学方面：一班有了"长"了，一个还不算，有正有副，都是"长"。本来不是自动的意思选举的，在形势上却由被动变为自动；于是承认他是个"长"。觉得我们意思还没有发表，他就可以代我去作。有了信任的心，渐渐就

变为盲从的心。班长有什么意思，我们也是他的意思。古文是读过的，“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响而已”一句话，很可以适用。班长作逢迎的事有了利益，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他得八十分、九十分，我们纵然比不上，也可得六十、七十；但是六十七十总不如八十九十好，我们如何可得八九十，自然要适用“班长式”的态度与行为。这样的“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响”经过几年的修业，自然是“风靡全班”！“风俗之厚薄奚自乎”！不用说很有效果了！

第四，谈起来更肉麻了！我常听说，有几种学校内，学生的班长，是由校长或监学指派的！这还不足奇，这班长是考第一的，或是考前几名的，这一种制度，在官费的学校，或毕业后可以拿钱的学校尤甚；并且总是连作，从入学校到毕业，渐渐老练，“办事熟手，以资造就”！然而这一种制度并不能固定，“后生可畏”，方法多得很！一句话包括就是“争班长”。争的手续当然是要运动，联络，于是分党了，争的结果若由选举解决，若是班长由指派，就要用“逢迎”，“关说”，“说项”——的手段。不用说要运动投票！啊呀！这种习惯已经在学校里养出来了！出了学校，真正是“学以致用”！可怜！我们成天骂作官，我们在修学时代，已经成了惯技，已经练熟俱乐部式、政党式的生涯！说什么“监督选举”？简直是吹牛！

以上随手写了四个理由，并没有详尽，不过是一个“我的班长制度弊观”罢了。但是我既主张破坏，也应该想一个建设方法，我的意思是：

（一）一班同学大家都一样，断不能有长。

（二）一班里自动的选举一人或二人：限期有定；职务只是传达或执行同学大多数的意见。

（三）发讲义……等事，并不是学生不应该作，可以由值日生作；大家轮流，可以共同养成为公众尽义务的心，本来是很好的，没有仅看作“小子当洒扫应对”讲，那就大悖本旨。

大致有这三条就行了，还有别的，我一时想不周到，总而言之，我所主张的是：凡同学在校于思想上，学识上，很可以不一致，才有真理；但是不宜于逞意气，因为恨这个，不高兴那个，就分立党派。我对于班长制度所以反对的理由是：（一）由学校主动选举，所以有种种弊端。（二）权限不清，一班内不能有绝对的首领。（三）班长的长字太无道理。

我这篇话一气写到这里，因为别事，就丢下了。过了一天，忽然听着一个朋友说：“北京大学自民国九年一月起，实行取消班长制度；并且在学生会上评议都添一条，大致的意思是：受理同学质问及要求——（原文未详），又听说这件事是由胡适之先生诸位提倡的，现在已经决定了，好极了！这件事要实行了，本来早就该实行，现在由大学提倡尤好；但是各校都要实行才好。并且这一件事，根本上固然由学生不承认一班有长，在学校一方面，也应该取消原来的制度，因为这事与学校并无损失，设要看做甚么“势力消涨”，“不可收拾”，那就糟了！

我因为听说这个消息，又得了一个补助的意见，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建设计划：现在各校都有了学生会，北京已经都

有，外省亦多半有，学生会有个评议部，评议部是各班都有一人或二人。所以关于全校同学的事，应该受纳同学意见，由评议部议决去办理；大小的事，都是全体的事，自然养成“休戚相关”的心。但是这一种的性质要认清，我并不是主张一校内就要溶成一气，如象旧式的校友会一样——校友会是某国货，我们不可不抵制；评议部的宗旨与范围都很大，原来由被动选出的班长所作的自动的事，很可以拿到这里，纯纯粹粹自动去作；这是我第一个意思。原来班长只做“供差”的事，现在可以联合多作些有益的事。这是我第二个意思。至于一校内同学，于思想上，学识上，当然可以不一致，很可以有许多会，许多的出版物。

我的意思大概如此了！这篇话也要结束了；但是我绝不敢自认为我意见可以绝对成立。并且这件事，现在除北京大学将要实行外，别的学校，还没有动机；我希望大家把这件事，看做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原载《少年》第4期，
1919年11月16日。
署名：赵世炎

随　感　录

男女同校——“北京大学并不是北京男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并没有说是北京男子高等师范；他如工业、农业、医学……等等，上面都没有男子两个字，何以见得男女不可同校？譬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他有女子两个字，当然男子不能入。所以要说开禁，只有说北京女子师范开禁，不能说北京大学开禁！”以上说这段话，是我朋友惟一说的。我还有一段话，也与大家介绍。天津某女士说：“……譬如今年南开大学招考，我是自己觉得还不能入大学，不然我要去考，他凭什么理由不让我去考？……所以我们现在只是预备入大学，无所谓开放不开放”。以上这两段话，大家说对不对？

听说——我听说某校学生开会，学校要派人监视；又听说同校某会，辩明与学生干事会无关系，监学才承认该会宗旨正大，因为与学生干事会无关系！我听说某女校开运动会，学生预备室内，把门窗关得很紧的，又有黑布遮着，因为怕来宾看见；又听说后来背面的窗户开了一两个，大家才得了一点新鲜空气！我听说我们学校——附属中学——每天早晚的人力车，渐渐多了；又听说清早尤多，近来已经是"络绎不绝！"

乞丐骂我——北京大街小巷，三步一跪，五步一拜的老老幼幼，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乞丐，我一出门就见着。我没有钱给，本来对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总要骂我"升官发财！"

原载《少年》第4期，1919年11月16日。

署名：炎

答党家斌（诗二首）

我们两的发狂问题！
我不懂得；
在别人说我们是狂，
我们却不可承认
我们只要作"人"那管那些？

*　　*　　*

惟一走了，
你可以同我谭，
弘毅的座位空了，
我的座位有我；
你不过暂时找不到惟一谈，

看不见有弘毅的座位。
痛快！痛快！
我在天津河岸送他们，
汽笛一声，
他们走了！
我不得不已！垂头丧气，
又回到这“北京首善之区”！

原载《少年》第4期，
1919年11月16日。
署名：赵世炎

论青年自杀

是“教育上生死关头的大问题。

教育上有转变，青年才自杀。

社会不杀青年，青年必不自杀。

教育不死，青年必不自杀”。

这四个标题的意思，都是在罗志希君与蒋梦麟先生两篇论文中——论北大学生林德杨君的自杀，见十一月、十九、二十一两日北京晨报——已经说过的，我以为都对，应该融合起来说。

志希君的意见，大致以为社会杀青年，蒋先生的意思以为，社会固然有罪，但是青年应该抵抗他，不应该悲观，就自戕生命。

再有一层就是：志希君以为是中国自杀之风稀少，正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一种表现；又以为世界上没有自杀决心的人，什么事就办不到。蒋先生却以为自杀是自示其弱，不能做成功的条件；又以为自杀是一个大罪恶。

我仔细一想，这两种说法都对，在事实上也都各自能成立；然而这青年的人生观，断不能不有一个确定的说法。照蒋先生所说，绝对不可自杀；但是社会上终有自杀的人。照志希君所说，自杀之风稀少，正是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但是不自杀终可以成功，其能力还是靠着奋斗，其心气还不至于薄弱。我一想再想，究竟不能解决！我忽然又想到一个人实际上的问题，愈觉得心中惶恐！

到最后来我觉得志希君的话，是替青年呼吁，并加上些建设的意思；蒋先生的话，是教育家的话，是指导我们青年的话；都是必定得如此说。但是志希君还有三个补救方法：（一）美术的生活；（二）朋友交际的生活（并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确立新人生观。——其结果还是归宿于不宜自杀，只要无环境的障碍。青年同志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如此随从！

自杀两个字，就应该由“自”字着想，人除了疯子而外，若是自杀的，总有自杀的原因；因为“自”，就是自己意志上所发动的，这意志就属于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限度不同，他若觉得这时候可以死，纵然别人说他奋斗力量未尽，但是他自己以为已到极点；纵然我们说他是懦夫，其实他并不懦，也曾奋斗；象这样的情形，没有别的说法，只归罪于教育！

他既以为到了极点，这时候还使他发生自杀的动机，必是环境的关系，所以就归罪于社会！

诸君啊！自杀固然是别人所不能防范，但也不是自己所能防范！为什么啊？我以为非疯子的自杀，绝非自杀，实是被杀！蒋先生说，自杀绝非成功的条件；如果把自杀当作成功的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自杀，也等于疯子式的自杀。实被杀而自杀的人，他决不认为自杀可成功。

蒋先生啊！"我们天天应该象王侯的快乐，设若突然来了一个刺客，他的目的固然是来杀我，这时候我自然是有一分钟力量就与他斗一分钟；但是我的力量尽了！给他杀也是杀，不如自己杀！虽然是我自杀，这个刺客若不来，我决不自杀！"

我决不自杀！但是我却不敢自料没有"被杀式的自杀"，那一天我很佩服杜威夫人的话，他说："我不自杀，若是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起。"青年同志啊！我们从今天起，不可不预备"物色"一两个该死的人！

我们最可快乐的是"这世界里有那么多的事物"，又应该提防的是：这周围有许多敌人许多刺客。

十月二十一晚

这篇稿已经写完，我终觉得怕有人误会我是主张自杀的。因为这件事，不能下一种绝对的断语，全要看所发生的事实各自如何。总之"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的自杀，不足计较；为环境关系的自杀，并非懦夫；自杀的事，不必提倡，荆轲聂政，意在必死；自杀的事，不必反对，不然恐国人终至心气薄弱。

今天读上海时事新报，见志希君与张东荪先生的信说："……北大学生林德杨君自杀了！实在是很好的现象，因为中华民国的学生到这现在才知道自杀！……"志希君已有这种感想。我又见东荪先生一篇论文——均见十一月念五日时事新报……重要的就是说"生命自由权"的问题，并说"……必定自己认自己的生命是不要了（即无生存的价值），力能抛弃；若是认社会不良国事不救便去自死，这不是自杀的真正理由。"生命固然是绝对自由，可是自认无生存价值时，也必有环境的关系（抄录者注：此处有一段英文，意思是："当我不能活时要争取活，但我活着时更要活"一段话）。人只要自认有生存价值时，就应该活着！

（二十七晚世炎再志）

原载《少年》第5期，

1919年12月1日。

署名：赵世炎

学校不及私塾好

“学校不及私塾好！”我底理想是如此。我可以这样想，便愿意这样说，说得不对我不管。反对我的，请暂时平心静气，听我胡说……

说起来也得有个范围，不然就会生误会；我所理想的是：

现在的学校，不及我理想的私塾好。

并不是：

现在的学校，不及旧式的私塾好。

我曾经读过五年的私塾，从读《三字经》起，一直到入高等小学止。五年里面，读的书倒不少：《龙文鞭影》、《百家姓》、《千字文》……等不算，《论语》呀、《孟子》呀、

《诗》呀、《书》呀、《礼》呀都读过，还读过《东莱博议》。又读过几首《千家诗》，又拿过笔，学过平仄，翻过“一东二冬”底诗韵，做过“四书题”底小古文。现在都忘了。只觉得这五年内不过认得几个字，白字还占了一半。旧式私塾底无用，大家都承认底，不用我废话。

进了高等小学以后，知道有算术，有理科。可是三年以内，每种读了六本；我现在只记得的某次得过五十分不满意，某次八十分总欢喜。这三年里面，还是继续作小古文，后来公然又要谈谈“桐城正宗”。

最近四年中学，情形差不多，我的脾气也差不多。只可怜临考不肯睡觉。身体受了大损失！功课有十几门。有的半年学完一本，有的一年一本；有的明白，有的不明白；有时候觉得越看越不懂，有时候觉得教习越讲越糊涂。国文呀，“桐城正宗”又谈不上了，两礼拜作一篇，希图可以交卷。归根结果，A、B、C、D，加、减、乘、除，声、光、热、电，氢、氧、氮、氯，花、蕊、叶、身，水成石、火成石，……糊糊涂涂地，略略记得一点。

我还承认，小学中学我算是得了些益处。只要教育底方法肯改良，在适合幼年人智识发展底期间内，这两级学校算是应当有，也算是比旧式的私塾好。

中学以上底学校，我还没有充分的经验，不敢乱说，可是一本书一星期在讲堂讲几点钟，两年讲完一本，这种方法与在中学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和种种制度，只有较大的，没有小的；只有较繁的，没有简的。还有什么“考查操行”，“胪列甲乙”，……一切等等。学堂越大，越麻烦！

我知道现在的教育界正在严格的取缔私塾，我当然承认旧式私塾该禁止，不过同时我脑子底理想，又有不满意于学校制度底地方。因此只好找条路，以为旧式的私塾该取消，现在的学校制度也可以不存在，再找一个理想的。实现与否且不管，先胡说一阵——

说到这里，应该有申明：并不是说要废除学校，能够将现行制度改良就行，所以我只说，现在的学校，不及我理想的私塾好。

如若说：现在的学校不及理想的学校好也可以。本来意思一样，就是原来所说的理想的私塾，称为学校也可以。并且学校多有公办的，当然不能都说是私塾。我理想要求实现这种私塾，就是要求实现这种学校。

现式的学校里面，不好的制度，研究底人很多，说起来也很烦，大家既然承认，就可以不废话。譬如什么“训练学生”、“教育国家人材”、“孝子顺孙”、“贤妻良母”……种种“立国之本”底格言，都用不着讨论了。

我觉得我以前在学校所学底各种科学，除开自己看底参考书不算外，都是教科书：有的分为一册、二册；有的分为上卷、中卷、下卷；有的一星期五六点钟，有的三四点钟，有的一二点钟，学校教员都要按照“部令”，限定几学期定得读完几本，平时慢慢地讲，到毕业时候却拚命来赶。老实说：我现在脑子里所存在底这些糊糊涂涂东西，都是临考时候几宵不睡拚来底；平时听讲也难得去听，也无法去听。一本书一气看完，反容易明白；就不明白，一问也就容易了解。所以我个人底经验，觉得学校“分配钟点教授”这种制

度，得不了益处，旁人若不承认，可以说这是我傻底缘故，不知道这种制度好底缘故，不过不能说我这经验是假的。

譬如历史一门，我若去看教科书，从头至尾，越看越有趣：因为里面底事，是连贯的，有了前面就想着后面。倘若叫我一星期去听讲，一点钟听两页，我越听越糊涂。

数学，理科……，性质虽不同，有时候听起来很明白，有时候也不免糊涂。也有今天明白，明天就忘却底；也有听底时候不明白，过后反明白底。大部分底东西，经教员拼命注入，脑子好便能保存，否则也就不知不觉的排泄出去了。

总之，我们一天在学校里，要学好几种东西，脑子实在换不及。所以我们常觉得在学校里面有偏重的功课，这就因为我们脑力不够分配，只好专注于一种或二种。想考第一底人要八面玲珑，所以很少能专注底。老实说：学校里凑凑合合，功课表底分配，要顺着教员底关系和时间底冲突，就不能适合于调剂作用，使每日所受底功课，能 调和 学生 底脑筋。

一句话断定，现在的学校，不敢说是好。

理想的私塾里面，能够消除这些毛病，就算比现在学校好。不过没有文凭。文凭也未尝不可设备，不过不能予文官考试。所以我一时使气，就拟了一个题目说："学校不及私塾好！"

理想的学校里面能够消除这些毛病，自然就比现在的学校好。可是我觉得现在要理想一个学校，不如先理想一个私塾。我又想：倘若在理想的私塾成立以后，理想的学校未成立以前，我这"学校不如私塾好！"一句话，就绝对的成立

了。

除我以外，不知道还有人这样想没有？如若还有，并且很多，便是社会上有这种需要。不知道那一位教育家肯来应这种需要！我很盼望！

诸位！莫说我真是胡说！我所以必如此说，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这一种原因是由几个理由推出来底：

（一）人生不能仅知读书；

（二）读书以外，应当工作；

（三）因现在的学校，还不敢说适合于读书；

（四）故现在的学校，绝不适合于“工读”！

最后的一个，就是我发生这个意思底重大原因。依我推测起来，已经实行工读底人和旁观实行工读而又十分明了底人，恐怕都与我表同情。可是我尽说理想，到底怎样理想？理想私塾是怎样？理想的学校是怎样？

一，理想的私塾，就是能免除现在学校不好的制度底一个研究学问底地方。因为经费是私的，所以性质是私塾（名称是什么我不管，并不是主张名为私塾。）可是这个地方并不是只有一人掌教，教洙泗之风，教员还是有许多，学科还是分门类；学生于没有工作的时候来读书，自动的看，看不懂教员就讲。至于时间底分配，应有适合的调剂，不必好看不必多。我们能够以经济的时间，得较多的知识。譬如说：一部历史有几大册，在学校里可以支持三四年，我自己有几天就够了！

二，理想的学校，简单说，就是“能免除现在学校一切不好制度底学校”就够了！意思也尽了！不必我详说，我也

没有这种力量来说。（前一种所说私塾也是学校，旁人可以不必拿名称和我争论。）

前一种理想的私塾，在北京一方面，已听说有人提倡了。他们已结合几十个同志，第一步办法，先将各人所有的书，编成目录，（这些人所有书若凑起来，又多又适用，中国现在怕没有这样好的图书馆。）以备学生阅览。这些学生一方面作工，一方面来读书，经过他们指点，又没有学校内种种无味的拘束。好得很！好得很！真正是妙不可言！

我觉得这是工读主义前途底无限光明！

若说到理想的学校，范围起来说，要把现在的学校改良，这不过是一种希望。实现不实现，“我不敢说，你也莫管！”听他们闹去。

1920年2月11日夜

原载《工读》第5期，

1920年2月16日。

署名：赵世炎

学校调查：
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

一 引 言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的调查，邵君已经说得很详细，他的附属中学，的确是已经知道高等师范的所不可不知道的，并且就是不知道高等师范也应该知道的。在天津，知道中学的，没有不知道南开；（南开大学是去年才成立的。）在北京，知道中学的，没有不知道附属中学。虚名虚誉虽然没有引证的价值，但是他在社会上的信仰既然深，就有调查的价值；所以我想把我所知的拿来供献给少年世界。我约了邵君作高师的，他稿成寄给我，我看篇幅很多，因此我这篇不得不从简。我同时觉得：少年世界所调查的学校，将来有一番更新，就可以再披露一次。我现在很希望：我调查附属中学所略的地方，就是将来再行披露的地方。我们对于某学校常

常羡慕，进去以后，又觉得有许多缺憾。我们常常有这种感想。我们以某校的学生来批评本校，怕有持论太苛的毛病；可是我以为非经过不能知道真象。说错许比不说好，因为终有点是非；批评的地位在第三者，话还是照着我的说。

二 史 略

民国元年以前的附属中学，名叫五城中学，这一年过继与高等师范，才换了名字。他从过继以后，也着实受了很多的益处。现在才过去九年，还算是在幼稚时代；可是他的推进力还猛，很能够随着潮流前进。当初成立才两三年，在北京有“最好的中学”的名誉；这话本来可以不提，只是他这种有名誉的原因，是一件很可研究的事情，是他本身的一个警告，也是中学教育者的一个好教训。这件事先不说。我承认他的历史，在现在是幼稚时代，也就是过渡时代，很可注意的。他的过去的事，我觉得如要知道他的现在和希望他的将来，记年记月的说出来也无用，所以我以为很可从略。

三 校址及学级编制

校址在北京玻璃厂厂甸，就是清朝时候的玻璃窑地方；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在他的西边；高等师范，又在附属小学的西边，中间隔着一条因风水未开城门直抵城墙的大马路，

三个学校，算是都紧靠着。它的校址的面积，连年都有扩充因为经济受高等师范的支配，不能事事都如意。

附属中学的学生，总在三百人以上，每年毕业学生在六十人以上，入学的在一百以上。学级的编制；共有四年级，每级有两班，共八班，这是固定的；还有一班补习班，一年毕业，升入一年级，有时不招补习班，则四年级中，有一级有两班；总之每年都有九班人。考试制度虽没有消除，可是很注重平时成绩；暑假前学年考试，学生毕业或升级；暑假后开学，就招新生。

四 课 程

附属中学的课程，不必我说，因为他是按照部令的，大家去考察北京的教育部的部令就知道。因为他是教育部直辖的唯一中学，因为高等师范是教育部直辖的；教育部的部令，附属中学算是个实验的地方。所以课程没有什么可说。可是北京学务局所辖各中学的课程，没有附属中学完备，这句话是可说的。所有的科目是：修身、国文、英文、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物理及化学）、历史（本国史及外国史）、地理（本国地理及外国地理）、博物（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及生理卫生学）、法制、经制、簿记图画、手工、体操、乐歌等（由一年起，按次增添）。

五　训　育

附属中学的教育，有很好的历史。民国六年主任韩振华先生，取消记过的制度，得教育部的许可，算是一种进步。此后方法屡有变迁；在现在，有一个训育会。训育的情形如下：

（一）学级主任　每年级设学级主任，对本级各班关于训育、体育、课程都负责。

（二）分课　校内有教务课、庶务课、会计课，都辅助训育。

（三）学生自治　由各级主任提倡，组织各级或各班自治会。

（四）家庭通信　学校常与学生家庭通信。学校若遇有某事发生，既一律发信通知学生家庭；若关于某生之个人事件，亦发信通知其家庭。学生每学期填写家长及保证人之通信处一次。每学期学校以学生之学业及操行两种成绩，通知家庭。

（五）缺席及迟到　缺席须有家长或保证人之书信证明，才准请假。教务课每周宣布学生缺席一次，以便学生自己看见；若有错误，可以声明。家长或保证人的请假证明书，一周内不交的，缺席的钟点，就算旷课。不请假而无故缺席的，也算旷课。旷课在一次以上，操行成绩不得列甲等；三次以上，不得列乙等；七次以上，不得列丙等。请假

每四十小时，于学业成绩总平均扣除一分；二十小时以上扣半分；不及二十小时就免扣。迟到在五分钟以上者，算作旷课半小时；在十五分钟以上者，算旷课一小时。

（六）值周生　这是取消班长制度后设的。附属中学取消班长制度，算是一件先锋事，也是它在学校制度之下，一种良好趋向的表现。原来每班有班长二人，每日有值日生一人；今年新代理主任程伯庐先生到校后，召集班长谈话会，讨论废除班长制度的办法；结果是："各班设值周生两人，执行原定的班长及值日生职务；遇重要事得另举代表。"这是由学生方面提出的，结果按照试办一学期。这件事已实行很久；在学校方面，常召集值周生谈话会，由主任讲演训育上种种问题。

六　体　育

附属中学的体育，在民国六七两年，在北京大出风头，现在也积极注重，大概可述的有几件事：

（一）体育会　是由职教员所组织的体育研究部所附设的。全校学生，都是会员。各班选举体育代表二人，为干事部职员。运动种类有七种：一、田径赛组；二、足球组；三、篮球组；四、网球组；五、拳术组；六、体操组；七、徒步组。

（二）二十分钟课间体操　每天上午第二时下课后，全体集合，举行二十分钟的徒手体操。

（三）各班组织　各班同学，自由组织关于各项的运动或游戏，常互相比赛，以增兴趣。

七　组　　织

（甲）职教员的组织

职教员的组织，最近有一个很新的计划；除开教务会，庶务会，训育会不算，最近有个很大的规模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一个中等教育研究会，我可以摘要抄出二条简章如下：

第二条　本会以研究关于中等教育事项，并谋施行于实际为宗旨。

第五条　本会研究事项，分各部如下：学校研究部；公民科研究部；体育研究部；国文研究部；英文研究部；数学研究部；理化研究部；博物研究部；历史地理研究部；手工图画研究部；音乐研究部。

各部还有各部的简章；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历史、地理等，各部附设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现在都积极进行。这一种组织，能够混合职教员与学生在一个组织内，比较旧式的校友会，有较高的趋向，也有实际的精神。

（乙）学生的组织

学生的组织，附属中学的学生，很能表现几分能力。除开各班的自治会不算，其它混合的组织，很有几个：

（一）学生会　这是全校学生的总组织，由“五四”以后的学生干事会变出来的。分评议，干事，纠察三部，还分设五团。一，德育团；二，学艺团；三，体育团；四，社育服务团；五，出版团。会员每年纳会费银一元。各部每月开常会二次。学生会所包括的事很多，这里面可以分出许多小组织；譬如平民学校等事，不能详说。

（二）协进学会　这是附属中学里很老的学会，也是很旧的学会。他的宗旨是：交换知识，协进学术道德。里面分德育、研究、讲演、杂志、庶务、会计六部。每学期出了一本杂志，名叫心声。

（三）音乐会　这也是在附属中学有历史的一个会。他的会务是：一，练习中西乐器；二，练习中西唱歌；三，研究音乐知识；四，编译音乐稿件。会里分军笛、步号、军乐、雅乐、琴乐、歌咏六队。办事分总务、器乐、声乐、编译四部。聚会分常会、特别会、职员会三种。这个会在最近两三年，都有很好的成绩；在校中对于美感的实现，只有这个团体。入会的人也很多。

（四）励学旬刊社　这是附属中学新有的团体。出了一个十日刊，名叫励学旬刊。“很难得！”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是他的方针还不明了：也有新潮，也有国故。

（五）国货制造社　宗旨是：本互助精神，以杜绝漏卮，振兴国货，促进实业，实行工读，为共同目的。成立没有好久；社内制造用品分日用、学用、莱用、化装、游艺五组。

（六）国货售品所　一个集股营业，提倡国货的团体，学校里一个消费公社。凡同学及职教员皆可入股。

附属中学的团体本来很多，因为组织的变迁，有许多无形消灭的：譬如英文励进会、品学砥砺会、游艺会、足球会等。还有些同乡会，更没有什么可说的。附属中学有中等教育研究会里面各部所附设的各学会，是第一个大组织；学生会，是第二个大组织；两个都包含许多小组织，因此消灭了许多自由的部分小组织，这个理由是很可以看出的。

在叙述附属中学学生的组织以后，不能不再说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少年学会。因为少年学会不必是附属中学的少年学会，所以我不能把他叙在附属中学学生团体里面；可是少年学会产生在二十世纪，是附属中学几个学生发起的，所以我也可以说说。少年学会原来只在附属中学学生团体内，后来为他本身着想，觉得断不能只在附属中学求少年，因此扩大了，甚至于没有范围了。他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知能，研究真实学术，以进取精神，养成健全少年。"他的会员现在还不到二十人。会里出了一种半月刊，名叫少年。

八　入学及用费

附属中学生长了八九年，我对于他并没什么苛责的地方；我所不满意于他的，只觉得他有几分贵族气概。我深知这个原因，是前几年办事的所种的毒。他们每每爱把别人作模范，爱把北京的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作模范，我想许是从此生出错误。我现在要说附属中学的入学和用费，我不免把我这意思提提。我赞成人入附属中学，我赞成在北京入中学的

附属中学，我现在说入学和用费两件事；或者应该特别郑重。

入附属中学，在暑假，年假后都可以；但暑假时招新班，也招插班，年假时只招插班。暑假考新班，资格是高等小学毕业和有同等学力的，考上的入一年级，程度稍差的入补习班。插班要考验同等年级的修业文凭，按照该年级科目程度受考。入学后要填写志愿书，并找一个在北京有职业的做保证人，填写保证书。其余缴相片填履历等事，他的招考广告都会载明。

用费这件事项难说，我听说有人每年用四五百的，我真难猜度这个人是谁。附属中学的学生不寄宿，多在家里住或自租房住，因此很难有个预算案。只有学校规定的几件可以说得出：①学费，每年二十元；②制服费，夏季全套三元，冬季全套（连外套）约二十元；每套可用两年，不定；③纸张费，每年约五元；④膳费，在校早餐及午餐的，每月三元，只在校午餐的每月二元五角；⑤体育费及各种会费约数元。大概可以指得出的是这几种，此外无从核算。实在说：在家里住的，生活费就可以减少；若按着不在家住，自己租房独住，或与朋友营共同生活，北京这样的生活程度，一个中学生，每年大洋两百元，无论如何应该够。

九 结 论

我做附属中学调查稿子，早就有这个念头，搁了许久没

有做；因为邵君做的高师的调查脱了稿，替少年世界收稿的朋友，又催着要发稿寄往南京，我赶着一个晚上几点钟工夫来做，觉得有许多“吞吞吐吐”的地方。我这个稿子，少年世界要不要还是问题，可是我能说的不过如此。我来做这个调查的结论，可以不必只有自己的意见。我是附属中学的一个毕业生；几天以前，去会了一次他的新代理主任程伯庐先生，谈了很久的话，我觉得很满意，我承认附属中学前途有无限的光明。当时的谈话，过后我没有记录，可是他与我所谈的大意，与他初到校在教职员会受欢迎的答词相同。这篇答词曾载在北京高等师范的周刊上，我愿意把他抄在后面：

“（前略）中学教育，关系国家社会中坚人物的养成，至为切要。我们所负的责任，也至重大。自应适合时代思潮的趋向，与青年心里的现象，施行那种适当的教育。兄弟对于此种教育，媿无具体的主张；不过略陈意见供大家讨论。

中学校的学生，正值青年时期。身体精神，均增急剧的变化；尤以一种自然的性欲，发动最盛，身心双方，均感受不安似的状态；这是人类第三的危期。他的精神方面，发出一种纯爱他的新感情，真意义的道德心与宗教心等。Holl博士，叫这时期为Adolescence，又名为人类第二的生日 Secondary Birth，这可见青年时代，是个最有希望的，然而最危险的。我们大家指导青年的人，应如何施行这种适当的青年教育。兄弟以为最须注意的约有四事：

第一：是奖励体育。这个奖励的必要，是不用说的。不但使青年的心身，调和发展，保持健康，增进国民的实力，并可施行各种锻炼，以为训育的基础。例如：巩固道德的信

念，养成坚忍力行的意志等，都是从体育方面得来的：这是实践伦理上一种动力。所以青年教育，体力是最注重的。

第二：是注重科学。青年心身，发育太骤，每每不能调和，身体方面则筋肉与骨胳，成长既欠平衡；精神方面则欲望与意思，现实与理想，时相冲突。所以青年心理，易生摇动，常有人生怀疑，及宗教烦闷的事。应注重科学知识，与以正确判断，高尚思想，使知亲近自然，信仰真理，以养成正大的人生观。此外如注重理科实验，以养成创作发明的精神；授与职业知能，增进青年生产的能率，研究文学美术，高尚人生的趣味与价值；这都是青年教育所最注重的。

第三：是提倡自动。青年心里，往往要依着自己的意思，去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是人类最高尚的意志作用。我们教导青年，正好利用他的长处。如对于教授方面，奖励他们自学；对于训练方面，提倡他们自治，以发挥其天赋的责任心，与那独立自尊的好习惯。并须尊重个性，使他们对于学科，有相当选择的自由。

第四：是完成公民生活。刚才说：中学教育，系养成国家社会的中坚人物，公民教育，自然是最重要的。如爱国心的涵养，国民的态度确立，提倡社会服务，尊重共同作业，养成经济思想，增进政治知识；这都是完成公民生活中最关切要的。

以上四事，不过是对于普通中学教育一种简单的意见。至于我们本校，既是个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自然就是个中学教育的实验场。我们应该要适合本校的特性，去实验那种种中学教育的问题。例如文实分科，增加职业科目，学校系

统上，编制上，设备上，以及各项实际问题上，均须有具体的研究，以为师范生及办学者种种之参考。这样看来，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希望同人，此后对于教授学科，具有研究的精神与兴味。对于训练学生，与以人格上的信仰，及至诚恳的感化。对于各项职务，具有牺牲的热心，与愉快的尽职。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本校自教职员学生，以至园丁校仆，因为都是个共同生活团体的分工者。——对于校务一切，要大家发挥互助的精神，各尽同等的责任，时时刻刻向那发展前途去努力猛进！这是我们在座同人的一种劳工神圣！”

程先生还说有几件要办的事情：（一）兴办图书馆；（二）建筑大礼堂；（三）改建校门，使学校能与社会接近。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特别的眼光，并且深信都能实行。我们可以对附属中学有许多希望。

去年我在武昌中华大学，会着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先生和学监余家菊先生，谈了很久的话；我记得余先生曾说：“我们的理想，要一个Democratic School”。我希望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能成一个 Democratic School。

1920年3月12日夜

原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学校调查栏。
署名：赵世炎

致东荪、白华

东荪、白华两位先生：

现在有件事情：北京警察厅大施虎威，查禁各种新出版物。前日将一个《工读》半月刊查禁，还要没收印版和印本；印版是铅字的，印本说是没有存余，故没有收去。这是杨以德、李文干的事。《工读》本来没有查禁的价值，并没有查禁的必要。他们这般野蛮东西，大概是先找弱的办，以后慢慢的来。不慢了！上海有好几种杂志，北京已经收不到了！北京寄出的东西，或者外省也难收到；武昌、长沙都寄不进去了。最近《新青年》七卷四号，听说也被扣留！哼！

好笑！我们这些读浅书的穷学生，竟要拿我们来出出风头！《工读》是很和平的东西，不过灵通点"工读"的消

息，那里值得查禁？小题大做，我怕他们真要大干起来了！

《工读》本身的问题很小，但是他们未必肯“收回成命”，何况正要从此大干特干呀！

别的话再谈。祝两位健康！

赵世炎

原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四张2版。1920年4月8日。

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

华法教育会第十二次赴法学生，已经于五月九日由上海法国Armand-Behic号船起程航海。当日在上海杨树浦送行的人都见着轮船上那一种情形，或者有几分不满意，或者国内的报纸上已经有什么言论了。我们身处这种景况，现在虽觉得才有三日的经过，但从开船以后，兴趣便来抢去我们的时间，凡是看着很觉痛苦的都反照成了兴趣，深怕我们在这里不快乐，别人却替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这里有一百多人，国内便有一百多人的亲戚朋友，所以不可不把我们有兴趣的消息报告出来，省得他们担忧。

一个约六七丈宽四五丈长，半明半暗的舱，通共两旁只有六个窗孔。铺位分作八栏，都是两台，每台分两格，每格

睡四人或三人。舱口在中央，经过两极的木梯才到下面，这便是这次赴法学生航海所处的地方。人既然多地方又狭，舱内空气的拙劣再加以饮食的不好，种种关系遂产生出一种组织，起初由几个人的发起，对于各事略加考虑，列出条目。后来开会提议，才几点钟以内，便组织告成，井然可观，直把一团愁闷的空气变为十分兴趣了。现在且将组织所产出的规约对大家贴出的通告抄点在下面，看起来不仅是一种组织，真是一个小社会啊：

（一）赴法航海自治团通告一　兹将今日所推出各代表姓名宣布如下：张怀、陈绍休（湖南）、张烊、罗成鎔、（四川）、陈泽孚、庐章耀（浙江）、何旦、朱葆儒（江苏）、谭庆兰（陕西）、傅见贤、骆诵庄（江西）、熊锐（广东）、习文德、张天翼（湖北）、田济洪、张源泽（韩国）。

（二）通告二　兹将议决事项宣布如下：（A）关于交涉方面的，担任交涉者汤松、谢少山、陈绍林、郭名忠、赵士炎。交涉事项：一、饮食改良；二、寝室添加电灯；三、开通窗户；四、清洁厕所；五、准以洗澡；六、饮厅改在三等；七、觅人洗衣；八、在舱上、楼上自由作娱乐的事。（B）关于饮食方面的：一、吃饭照编号，轮流由服务者通知，不得逾越；二、每日服务者六人。服务事项：甲、摆碗筷、桌子、取菜饭；乙、洗碗筷及收拾一切；丙、扫地。三、吃饭前后不在舱面停留。（C）关于寝室方面的：一、戒约：甲不吸烟；乙不唾涕；丙不点烛；丁早六点以前，晚十点以后不得高声谈笑；二、须各整理铺被行李；三、每日寝室服务者六人，服务事项：甲扫寝室；乙照料病人；丙停泊

时看守舱内，免闲人杂入；丁摆设脸盆及收回；戊预备公共茶水。（D）自由的组织部名及担任组织者：一、学术谈话部（汤松）；二、法语练习部（谢少山）；三、体操练习部（周维箴）；四、注音字母部（陈绍林）；五、音乐部（朱葆儒）；六、新闻部（王独清）。

由这以上两种的宣布就可以推见组织的大概。现在关于交涉方面的已经很有完满的解决。食餐及寝室内的服务者都已实行，这一百多人离开了熙熙攘攘的社会，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实是顶有兴趣的。

当着会餐以后，轮流服务者洗碗、洗筷、擦桌子、扫地那一种实行劳动的状态，把公共的困难用秩序的解决；劳动中含着优美的兴趣实是组织的能力。傍晚的时候，都在舱顶上游玩，徐徐的海风吹着海水成种种的绉纹，再听着乐器的音调，谈笑的声音都活泼泼地自然有趣。回想上船时看见舱位太劣所生出不满意的感触都化归乌有了。并且觉得这样景况是不可多得了。国人听着这种消息应该很放心，以后要来的同志们听说了也应该很高兴的。

这次同舟里面有湖南汤松先生赴欧留学并考查教育；又有钱维骐先生亦赴欧考查教育，组织上很得赞助，逐日同聚增进许多利益。又此次有王、吴、胡三女士（均四川人）赴欧洲留学亦在同舟中；又有韩国人五位亦同处，廉价舱内，经组织的联络，彼此谈话及共同操作都异常融洽。在赴法勤工及俭学派送去的此是第十一次，但人数之多，此为第三次。我们不但不感寂寞，并且因为组织变换的结果，精神上得着许多愉快，虽舱位不佳也不觉得苦痛，这种消息是可以乐告

国人的。现在船行将到香港了，大家正计议组织分队上岸游览，并采办药品及公共卫生所需物件，真有乐趣啊！

1920、5、12

原载《北京晨报》，

1920年5月21日。

署名：琴荪

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

修甫、康农、伯明、骧尘、友松、锡侯、嘉裴、家瑞……诸友：

……唉！我一些亲爱的老朋友们呀！在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只要在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固然属于物质上的，我们虽挤在这灿烂而又混沌的空间内，也有些慰藉可言，但我们所经度的搏战生涯，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还未达到相当程度，我们的精神那能就说畅快，而且含含糊糊地过日子，又不是我们所当做，所忍做的。

我在这半年来差堪自慰的事情便是能够来实验地做劳力的工作，从直觉的感触中，也得些片断的安慰。但知识的恐慌，既迫促了我反动的着急，一般的现状，又刺激了我刚愎

的嫉视。

我“穷极则变”，几月以来为迴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筹搏乱的方法。事实上别无他法，我只有忙！忙个不了。以前的复杂的幻想，都用锁钥闭起，直到了现在，最近来因为8小时的权利失去，生活上始稍稍有些变迁（近来欧洲工业市场，大形变动，法国尤甚，工人失业者多至百万。我于一星期前也暂时停止没工作）。这也是我所以能够比较的详细一点来和你们写这封信的原因，我在暂时8小时的努力虽然停止，然而精神生活仍继续不断的无所变易，你们乐闻此说么？

大致你们也很想从我得知一些在法作工的消息：在我的责任上，早就应该详告你们一番。不过我个人之见，绝不能得事实上的真理，在11月间我与你们的信中，曾预先和你们商量出《勤工俭学研究号》于《少年》的事。我并且曾与你们的稿子在1921年1月底可寄到，不料这件事我现在很歉意的于时期上对你们失了信！这也是我匆忙中一种热烈的错！现在，这工作我们正在做，不过时期没有那样快了，但也只缓期一月。因为这件事决不仅作文章发表直觉的意见，我们还需有切实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日，于不远的几个地方作工而很相了解的朋友们，我们聚会了几次，都做严重的辨论，切实的谈话。前个星期日才商决，我们姑无论效果如何，只当做自己于良心上不可隐忍的事，前途上应该不糊涂的事，无论是直觉的，反动的，我们总要披肝沥胆，尽情一吐！现在又因为时间上不可太缓，约定1921年1月以前汇齐大宗的稿子，寄到国内来。寄的事是我担任的，我敢于担任的把

握是在你们。现在《少年》是不是仍出我不知道（你们也真做得出，总不寄一份来）。《少年》若还在，就借出一个勤工俭学研究号大概是可能的事。否则，这工作是很希望可以做起的，如若《少年》不能借光，只好另出小册子。但也是要恳托你们的。在一月底或二月初可以由法国付邮，二月底或三月初可以寄到，请你们就照这日子预算罢。

……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积极便会发现弱点。我常听朋友说，国内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实际，是现在的最大恐慌，这话实在中肯。比如《少年》于我没出国以前，曾主张停刊的，现在我们大家既感受到学业与责任的观感，又承一些很难得的师友们的催促与赞助，仍在范围以内做点工作，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不过，凡做起的一件事，在我们现在至少不可不保持的，就是不能懈怠。……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一个时髦青年的制造所，尤以北大和高师为甚，我恐怕结果之坏，将有甚于五花八门之上海，这都是受“五四”思潮太蹈空之毒！我诚恳地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你们的实诚的　**赵世炎**

附：给陆惟一的信

惟一吾友：……我现在时间“穷”得很，因此连写信都受了影响。

因为我要给会友写信，要说的话很多，非三、四小时不可，但是我现在还有办不到——因为我每天工作8小时，睡觉的时间又在8小时以上，按定例所应当有的读书8时，现在经一星期实验逐渐增加的结果，只得3小时，因此时间“穷”得很！……

……我现在这个厂是个铁工厂，我所做的工是杂工，就是见什么做什么，大致初来工人除非是技师，都是如此。我们同伴几个人现已有在机器上作工，我不久也可以去作机器。现在还没有一定位置，有一定位置总在好久以后，我们有时锯铁，有时锤铁，有时撤车，情形大致如此……。

世　炎

原载《少年》杂志第15期，

1921年3月1日

给周太玄的信

太玄兄：

又有两件事告诉你，并且希望你赐复：

1.此地工界朋友对我们感情太好，然而他们不自由的身体实在令人痛心，我们为想建筑一切事的根基，亦为想感情上建筑信用起见，打算使这里边几个——大约五、六人——优秀份子脱离陆军部的合同使他们身体得自由。

脱离合同没有别的，就是要钱。陆军部的六百法郎固然不可免，领事馆的一千法郎太无道理。他们绝不愿出（也并不是没办），他们连向领事馆说好话都不愿。最近领事又加成一千五百法郎，不知为什么，更是岂有此理。有某君已寄一千法郎去，而得回信要再找五个有职业的保人，否则还要五百法郎，真是荒谬绝伦。

隆郅向我提议，要我写信问你看可不可以想法子，就是想求你并再找几个——如郑毓秀、李阐邦、李光汉、齐云卿等——公共作保人，向领事馆具保这五六个人，使他们不花钱以脱合同。因为领馆李骏曾对李光汉说：只要有人保是可以的。李光汉亦曾说：保几个人是可以的，不过多了不行。我们想求你得便问问郑，看她能不能，她若肯为力便好办。李、齐等我们再写信去求。

我们对被保人负责，一方面对于保人也绝对负责。这几个人我们敢断言是绝对无问题的。

这种事实在关系太大，能做比什么还有益。

这事如何请你赐复。

2.袁子贞来说工会将改组。最后他们在这里又议决等到七月大会再说。袁子贞及此地办工会之孟杰亭、董国铨等对我们都极好。袁、董等屡次要我们对工会提出意见，并要我们组织一个工会来代替（因为我们新认识有许多是他们向来所不能联络的），我们却婉辞谢绝。只声明实实地做小事，尽力不谈谈组织（我们实在苦于还站在勤工俭学界中）。

但有一事隆郅告我，袁子贞曾对他说，捐钱之分配方法，并提及《华工旬刊》，蔡每月捐350，郑捐300，又说前请人编辑月薪400，后无钱又请你编辑。现在他又想请别人，这话是他这样说。袁在工会是不是什么都管，对于《华工旬刊》他亦未必有许多成见。他们写两句信到两篇文章，都带一点“萧子升”味，热心则有之，而且极可佩服，作事与思想各都极幼稚。

旬刊现状如何？你前说你走后交鲁之，在现时言论机关

非常重要，看印刷与发行方面如何，宜竭力整顿，使复原状。你既决去门百里柳，可向他们——工会——介绍鲁之。稿子方面，我们现在与华工有密切关系，定能常供给。且近日薛世伦来信极力讨论出版事务——我们曾向他们提议合办一种出版物——他们确很读书定多材料，可要他们也供给些，这是一个联络方法。

以上两事说完，再还有些事也拉杂说：

1.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弟兄（合起来说就是华林无政府派）等大发言，各派都加攻击，尽说刁钻话，说的都似是而非，很足以动人。稿子是一个姓冯的做的，他在此地作工，我们也很好。我们决定这星期日约谈话并质问他。他们中间如李合林曾通信，意见并不象宣言所说。还有一位陈宝孚上星期向我们道歉，说不赞成那宣言及以前的通告。但写信去阻已来不及了。这宣言或者你得见并攻击有《旅欧周刊》。

2.吴明决定让他来克，临办亦移克，勤会决定支持。支持的标准就是小组织——其实真正的勤工俭学者本来只少数人。假使一千六百人现在来成个会，这个会才不是勤工俭学会。监督会听说成立，陈籙大过其瘾，可谓宿志已偿，但要考试看大家怎么办。真滑稽极。我们从今决不再有所表示了（或老等勤会成立以后），因为妨害太大。

3.对华工事完全因为所谓的"同学"方面的关系，渐渐生出问题，故从此决不大做，只从小处入手，并从感情方面建筑信用，消弗协社亦尚在进行。学校已将开班名为"工余读书会"。

4.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

会成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象熊自难已经算是“弱了一个”。

5.勤会入会的现象太好，来索志愿书者绝是真诚的。我还发现有“华工”来入会，因为通信处是中国人组合，但这只有欢迎，此地许多初来时便已殷殷相问“我们能不能入你们的会？”

6.周刊仍望竭力支持不变，态度非常要紧。

7.一月或两月以后我想慕韩兄可到此地来住。不过怕他不愿住长久，但此地熟人极多，他的令侄又在此地，他又很热心华工的事，我极望他能来替我们指导一切，所以要一两月以后因我想我工资必很不错很可共同支持。我这话说来太唐突，但我说来确是真实并无虚伪。慕韩兄之生活也似乎以“热心奔走”的生活为最宜，可以调剂他的脑病。

8.家里好象硬要给我寄钱来，只这一次我也不拒绝了。前回承你替我转的那封信便是这回事。三哥与二哥，西安与顺庆来往打了好几个电报（因为“二八”事陈打回的电的影响）说要给我汇钱，或者不久会到。信是由你转，如有由北京来的挂号信，求你代签字收下，并无防打开。因若有钱也须在巴黎取，钱若到也存在巴黎，我除还债外别无用处。二哥任道君署秘书而且咨议抢人的钱我只好不拒。太乱说了，夜亦深，我这几日很苦，遂致爱乱说以自娱！敬祝你好！

弟炎 24

（此信是世炎同志1921年在法国克鲁梭作工时写给朋友周太玄的信——编者）

给凌汉等人的信

凌汉　介繁　志清　诸兄：

人不能不死，但是死的方法不是这样，我便是觉得这样方法不应当，而现在犹且偷生的。照魂① 实在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大家。我悲伤欲裂！……我没回国对不起百多人，我不死对不起照魂！

照魂的后事，你们那么多人，当然可办清楚，××说将葬，我来亦赶不上了。我注意的是请你们搜查他身边有无什么遗言，或者最后时间你们那个见着他的！从他那猛勇而又可怜的齿缝中间曾听得渗透出了些什么话，在埋葬时请你们带着

① 湍照魂，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争取里昂中法大学事件失败而自杀。——编者注

我的意思向着他的木匣告诉一句话：“世炎还在努力，但是也没有多大希望！”

他目击里昂之役，是致死的最大原因。刚回三沙亩便与我来一封信，已经是最后的一封信！信的最末几句说：“……我病了！但是你告诉我你怎么样？你的消息可以安慰我的灵魂”。唉！这是他的预言？或是无意中的谶语？我把这信重读，简直肝肠欲断！最后一句话更不得了，我怎样答复？

“亲爱的照魂呵！我配使你这样对我说话”

你们又有什么意见？对于我！朋友！

赵世炎

1921年11月2日巴黎

原载留法中华学生青年会《星期报》，

1921年11月5日。

给隆郅[1]同志的信

隆郅：

昨天才收到你回国后的第一封信，读阅之下，颇是欢喜。但只要看你的信，就可以知道你的情景：你还是那乱七八糟的样子，毛茸茸的象一条小“大虫”；你走路一定还常“绊斤斗”！我很是为你耽心，你能不能稍稍改良，以慰朋友。

我现在还在北方，状况比以前较好，或者不久便有变动，仍然到南方去。因为我和瘦石感于同志在欧之无基础事业，决计重振旗鼓干起来，这事现在不能详说，事成以后再告诉

---

[1] 隆郅即李立三同志——编者注

你们。我只希望你们不必代我忧虑说我没有再蹶再起的精神，但常常为我供给忠告，使我不致起而又蹶。

我留在欧洲虽然苦些，但也有用处，你们当能承认。你们若能承认，便请不必催我回国。固然你们的意思我当感激，但我自己的意思现在回国算是走了曲绕的路，还有我个人在国内的关系也极不相宜，请你们不必再催促。仲甫先生之催促，我明知道是无名和你的主动；你们为我计，我回国自有相当理由，但与我现在的情况不合，亦与我现在的意思不合，所以我不能从命。申府兄来信屡次亦促我回国，他现在仍坚持（他自己于三月内便将回来），我至今几乎穷于答复。你若再到上海会到仲甫先生时，请你替说我的意思；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我现在毫没有含养性，我看见国内的情况异常烦闷；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不回来。

申府兄的四周的安排对于他太不适当，所以他觉得非回国不可。他写信给我说："对于欧洲恶感太深，恨不得立刻去之！"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我想他也许真的不久便回国来，在他回国后，关于欧洲方面同志之团结与事业，一定有一翻详的报告；对于国内关系之希望，亦从此逐时讨论起来——请你们暂等着。寿康与伯简去俄事，及我们公荐寿康为第四次代表事，申府兄已有几次信与国内了。我很盼望国内能答应，即时委命，寿康兄的个人，你和无名当都能代向国内说明，自无容我多说，又寿康兄近又提出，如果去成，但他以为一个太孤单（其实披素、子暲、伯简都同去），要添

一人帮助，他并提伯简，此事申府兄想亦有信回国来，我意亦无不可，因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

去俄的重要任务是希望能运送大批同志——勤工同学及工人入俄，这事能不能成自不可定，但他们能去一趟，或者去了又回来。旅欧同志方面的事业与精神都当有若干的效果，况且现在欧洲情形实在可以乐观，财政大会的结果，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实在是弓在弦上。这次巴度在忍诺真不要脸，（米勒兰到亚拉伯去了，因此保安加勒不能亲自出马，真不愧一个法国有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的代表）这两天因为俄德条约，忍诺会议中的大多数资本帝国的代表都惊惶失色，纷纷抗议，看着将要下不了台。

德国最有希望，我们可以说是德国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现在德国的宣传运动等也自由得多，拿法国去比真有天渊之别了。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c p 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即Front unique 运动），他们去了好几处，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法国实在该死，这样不要脸，还成天成夜的鼓吹仇德，我在北方看着舆论与民气尤其比南方利害，真正叫人肉麻而又痛心。我以前曾和你说笑，拿勤工俭学问题与法国妇女问题相比，现在法国的政治问题也就如我们当初所谈的法国的妇女问题的困难了。

别的话我将在与无名的信中另说，我这次给你的信且只写这一点，也因为实在没功夫。我希望你此后常不断的给我

信；更希望你对于你粗暴夸大的性情加以改良，差不多朋友中间只有你我最不放心，你的行动尤望常常告诉我。

你还是要找机会设法读书。

世　炎

1922、4、25、在法国北方

给吴明的三封信

无名：

约两星期前有一信给你是否收到？我们通信总要勤些，民国日报地址若不甚妥，请你从速设法另找一个地方较固定且转交很快的，因为我们从此通信等事愈繁又愈重要。

在这封信里只能有下列的话告诉你，但有若干的问你的事件：

1.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因为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

2.青年团的开始仍取极端严格手续，将来是否作公开的运动，可由成立开会时决定之，决定后再报告国内。现在人数因系严格，大约法国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现在工学世界社维汉、世伦诸人务要强迫全社加入，在该

社以去就力争。我本只请求他们出以个人行动，但他们务要如此，因此人数殊不可予定，一切将来自有报告。

3.支部暂时决不提及，况现已有代表团（申府等在德发起的，我亦承认），有事以此与人接洽便是；况青年团不久亦告成。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

4.寿康、伯简、子暲、披素四人去俄。我们荐寿康为第四次出席代表。此事务望你在国内亟力建白，速加委命。简、暲、素将来去时都用青年团代表名义。

以下是问你的话，并请记的事：

a.青年团有否总机关，并除章程外尚有其它规约或印刷品否？如有请即转告速寄来（暂时先寄我）。

b.凡关于cp之重要印件，亦请你随时寄我。

c.青年团对cp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义务与责任？应与何机关接洽？国内青年团是以地域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或还有其它详情，都望一一见告。

d.在欧组织后，大家都是靠作工生活的，故公共经费必不充足，然将来向国内购书报为第一要事，绝无疑义，而且不能迟延。我以为此事既属有益，你能否先向出版机关（或发行机关或总部）代为要求，即开始将书报等陆续寄来（暂时亦可直寄我）？

这几件事等你从速答复。

我因为昨日接到隆郅的信，将复了他一信，由你转交，因他来信未说地址，我想他亦是常乱跳乱跑的，请你将我信

速寄给他去。在他信里有些话已经说过了，故给你这信无容再说。但仍有二事：

1.侨民教育经费十万元，李石曾求得寄法欲与勤工生设传习所，其实勤工生得不着半文，因被陈箓把持住了，且隐瞒不承认。但现又有问题，即工界之愤怒是也。昨日我见瘦石有一信来与李石曾，未免太激烈；其实此事亦极难忍，望你于见李时或与之信时亦代诉说法国工界之现状——陆军已脱离关系，大多数人已送回，剩下的只少数有希望之自由工人——善为其辞。

2.李合林事后，安那其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着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惜我与二陈均无接洽，你可否速来一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因安那其中颇有人。近来最爱刻薄骂人，将来如生冲突，亦麻烦可厌事也。

余再谈。

世　炎

1922年4月26日法国北方

我在欧的行动，你在国内于认识我的朋友面前务暂时绝对的秘密，我们来往的信如无用时最好烧去。

吴明：

接到你三月十七的信。

我日前复有隆郅一信并你一信想已收到。

我今天正在忙迫，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尼、

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青年团事前信已略告，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依我所计人数约三四十，然我不知者尚多，尚待各友之总汇名单于我。我现在持意两点：（1）初步极端严格；（2）又务求没有遗漏，因此至今没成立。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法国方面来不及（因工学世界社世伦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我被迫不得已，故决定于明日丢了工作出去跑一趟，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告成，下一次的信定可告诉你详情。今次因结束在此诸事，百忙之中接到你的信，因先发这封信。

关于青年团的事，尚有下列诸件，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

1.速寄关于青年团一切的书报印件等来；

2.关于cp的；

3.请转告青年团总部指示应有的方略等等；

4.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①]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

5.请你转告存统希望他与我通信。

下面的话是答复你来信中还有的事件：

a.申府现在德，应该常有信来，他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

① 二陈即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当时还信仰无政府主义。——编注者

他不能没有信来的；

b.我回国实在是不可能，四川问题到底现在详情是怎样？宝琪他们难道毫不能进行？北高川生中同志颇多，请问他们这般将来要回乡当教育家的注意？我对于四川是毫无关系的，请千万不要再想到我！

c.刘深山处你的书容设法寄，但必很迟。你若决定久顿上海，应当告诉一个妥的住址，说不定有人回国来，我才有地址可介绍。

d.罗承鼎的钱你应该写信向他说。你的一百方我经济有余可代你还。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而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

e.你要买书只有钱的问题，没有别的；但一半年一次约百方上下之书报我在不失工的时期还可对付，多了则只好请你寄钱，如果你能够。

匆复　并愿

弟“Le feu”

4月30日下午

这信写的太匆忙只许你一人看。

吴明：

兹转来伯简自柏林信两封，前一封在北方时收到，后一封昨日在巴收到。他既没另给你们信我亦无暇重述，故最好如他所说将他给我的信寄来。

力子处转信是否很妥？你能否速找一个不致遭注意的地

址？譬如这样信若遭检查很是问题，请留意！

巴黎都不自由，何况中国？庆云住巴很久，我的信都寄他处，因为信太多，遭警厅盘问；昨日伯简来的这封信，简直不客气，拆开了！另外加封寄了来！自然从李合林事件以后，在巴勤工老爷价值较高也是原因，但此次信所以被拆，因伯简不该盖火漆，太遭注意。此次信已停搁一日才交来，如果检查找人翻译便是问题，我此刻劝庆云搬家。

通信处最是问题，关于此层请从此千万注意，并速设法答复（指国内通信处说，如青年团之总通讯处等……）。

江亢虎今日在巴演说大批评苏俄，而自称中国社会党，他回国后很可注意（今晚已由巴动身赴马赛）。

我明日去蒙达尼。这几日很疲；北方半年奇趣之生活，现在走回都市异常不惯。

匆书余再详

大家健康

世　炎

5月5晚巴黎

给黄仲苏的信

仲苏兄，请你恕我现在不能给你写长信，纵然我是十分想给你写信，你前回给我信我没收到。这不该当是你心痛，只是我的不幸。

你对我的观察未免太过份些，我现在的我只有我自己知道，自然我不当说没有朋友知道我，我自觉得朋友所知道的我都太过份些。

你们南下我猜的三事既然都说对了，你们又不从详告诉我，只说了一句“非面谈不可”，真弄得我心痛难禁！……如何解决？

半月以内，我准来一趟罢。

附来四张小片，聊以答谢你所写我的，这都是我的时景，上面所题的的话请兄不要见笑。

我真想念你……

弟　**世炎**敬复

4月28日

给罗觉的信

罗觉同志：

前复信被打回又由柏林寄出，未知收到否？后又有一信亦由柏林寄出。罗同志所开来地址，照样书写而不能寄到未知何故。兹以此次信同样写成三封分三个地址发出，想必总有一封可以收到（若某一封收到，请即示知，以便以后照样直寄）。

兹开来西欧同志愿来俄者十五人之名单，其简略履历如经过学校等项恐无用处故未开出。此十五同志已经此间执行委员会之认可，合于当初所规定之条件与情形。望同志们于接此信后即向东方大学交涉，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驻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发电时恐未必能将名字一一开列，但请指定十五人之数目，我们在柏林便可交涉。

西欧青年团于本月十七、八、九三日在巴黎开大会，会闭后十五同志便动身，故月底以前均在柏林，因经济上关系不能久停，故务求交涉速发电为盼。

书　记

赵 世 炎

1923、2、14巴黎

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

——投机，改良与革命

一

越是被压迫的人，其阶级觉悟革命之观念发达越速，这是一定不易的。但若遇有无产阶级之叛徒，其反动的行为不见于无产阶级壁垒森严之外，而反发生在群众的队伍以内，矫其性情，昧其良心，染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变为投机者、改良者，这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对于这种事实是要随时随地能够加以辩别的！

在旅法的中国青年中，形成为无产阶级的队伍的，自然要算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了。最近有两件事实令我证明：一个是在勤工俭学中宣传革命所起之反动；一个是华工因教育运动而团结一致。对于前者，我们已可以从事实上指出这些反动者之无意识，可怜，可悲；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察看华

工在现在情况之下，其阶级觉悟之观念尚未发达，故惟教育运动是重要的工作，而惟有这一种工作，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固然，不用得说，华工的本身已是一个阶级了，至于勤工俭学生，我们亦已认为形成为无产阶级中之队伍的。在过去的历史上，现在的情势下，以及将来的命运之中，勤工俭学生所处的地位，都是一种被支配的地位，除了瞎子疯子以外，这是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勤工俭学生欲求明了这种地位之观念而且谋所以解脱，便没有职业上的差别，而正与青年的工人和农民一样，必须先为自己的生活条件而奋斗。在这个生活条件奋斗的过程之中，勤工俭学生所当觉悟的是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没有妥协可言，没有正义人道可言。小资产阶级空想家所供给我们的协调的概念，完全是我们生活中的麻醉药剂，至于糊涂暧昧专门制造日本帝国明治维新时代之毒恶空气，而发为言论以向我们宣传的，那更是要为我们所排斥屏除，不留余地了。

二

我们的同志世炎曾经屡次在勤工俭学生会评议部中说明：我们一般朋友在学生会中之努力是一致的，始终不懈的。我们努力的着眼点是在全体的利益，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一个人说作事完全是为人而不为自己，那是自欺且欺人的。我们青年革命主义者的奋斗，为人，同时亦为自己——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正是勤工俭学生；我们以勤工俭

学生的资格而来过问勤工俭学生本身的事务，这是必然的。我们所过问的事务，处处本共产主义的见地，这又是一定不易的。这个，在群众中间当然无所用其奇异；在反动的分子的客观的事实上，亦犯不着叫他们神经过敏，而致于大惊小怪。因此，我们的态度是始终光明坦然，我们对于反动者之无聊的举动在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至于在形势上成为对敌——实则毫无所谓——的所谓的无政府"党"人之随便乱说，我们站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的青年同志，只有在学理上愿与无政府主义者辩驳讨论，若是出之以嬉笑谩骂的态度，完全不具有主义信仰的青年的精神，则我们绝不至认为有作相对的回报之价值，而但与对待无聊的反动者一样，虽然是太宽泛了，但其意义本是相等的——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

同志世炎这种说明是相合的——合于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态度的。然而事实又教训我们，在无产阶级队伍里面，这种态度竟不免是消极了！我们还是必须审定我们的积极的工作，而所谓积极的工作之标准，仍不外乎如本志第三号所发表的"我们的职务"一文中里面所申言的。也正如同志世炎所说，我们的努力是要始终不懈。我们之所以见到如此，乃因我们看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革命之宣传尚未普及，而反动者竟乘势而起。一般毫无所知者竟可以自称为改良，投机派，占据在一种混沌的群众观念上而利用其弱点以为其宣传了。在另一方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知高唱自由，忽视了现代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群众意识，专门占据在抽象的观念上，发些空论，以迷惑群众。我们见到这种事实，自然不能

忽视了我们当前的工作：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能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

三

为了一个“十万元”的津贴的问题，我们勤工俭学同学曾作一次最后的团结了，然而七八个月的努力，现在怎么样？我们同学曾经能够跳出被支配的地位以外么？为了一部分的同学被宗教的诱惑，许多人曾经大声疾呼的攻击了，然而至于今日怎么样？在“天主”的魔旗下面，反跑去一百多个我们的旧伴侣了！为了团结的要求，欲表现勤工俭学之真正声音，同学们踊跃募捐把学生周刊组织成，然而时间不久，为着供给少数人投机改良之把持的牺牲，充分的暴露了一些丑态，至今又几乎不能存在!!一千多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大家都到那里去了？这样清显的事实，明白，深刻的教训，大家还不应该觉醒过来么？！！！

原载《少年》第7号，

1923年3月1日。

署名：列父

（《少年》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世炎同志负责主编。“列父”即Lefeu，是世炎同志当时常用的笔名。——编者）

苏俄与美国

一 承认问题最近怎样在美国活动起来？

社会主义苏维埃俄罗斯建立已有六年之久，至今欧美亚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犹保持有所谓“不承认”的问题。然而细考起来，表面上虽有所谓协约国的协同行动，实际却各自有各自的问题。顽固的法兰西在现状当然是要除外的。至少也要等待今年五月选举竞争激进党的首领里昂市长爱友先生拿得政权之后。在英格兰，贵族的劳动党已得选举的胜利而马克多纳得登台之时，其对苏俄态度必一反保守党的政策是必然之事。便是远东的日本，他又何尝真要顾忌协约国的不可靠的协同态度，为了太平洋的问题，从去年起，对苏俄态度就已变更了。苏俄革命后六年来根基日固，这本令各帝国主义者单只害怕也不是，积极联合也不是，而毕竟要让国际政治经

济情形之变动，把这种关系推进起来。

我们现在单说明美国。美国与苏俄之关系问题虽然有如连年来顽固反动派的宣传与攻击，乃至于哈丁·休士等屡次正式或非正式的宣言，但到现在，承认苏俄的讨论，已在美国成为议事日程了。一些参议员各地代表人物从苏俄考查回去，已经看见了什么是苏维埃俄罗斯。政界、银行界的人物都乘时而起，纷纷发表意见。在不列登（Britien）会议，公然有与苏俄亲密联络之正式提出，更有一部分进而运动政府须正式承认的要求。

几月以来，关于本问题讨论之中心，都由参议波拉（Borah）所领导的结合发布出来。波拉在美国现在竟是承认苏俄问题之有力者，他公然得了许多工业家与财政家之同意。一般政客、实业大王、银行老板都挟带着他们各自的实际问题来加入这个为承认苏俄之结合。

二　他的重要原因

怎样得到这些工业家、财政家之同意。什么是他们的实际问题呢？原来美国现在的钢产过剩了，自欧战以后美国的钢产就不断的增加，国内各工业不能胜任这样浩大的产额之销路；近一年来所召起的经济的重大矛盾现象使钢产业的资本家不能支持，不能活动。大钢业托辣斯名叫（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的，在当初最高额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产额，现在只有百分之八十。别的

独之额产业只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近来美国生产的现象，便是满溢了铁与钢。

当欧战时及欧战后将近十年以来，合众国的大部分利润都得之于由南美洲所得利润之增加。然而南美洲本不完全依靠北美的工业，他还有自己的很多原料向欧洲输出，只因穷的欧洲并不能作海对面的永远大主顾，于是南美洲的对外商业，渐形萧条，而同时能供给合众国为其市场之力量也就有限了。因此而合众国的钢铁大王不得不转瞬于苏维埃俄罗斯来。

从俄罗斯归去的美国的"大胆冒险旅行者"，由他们所发表的记载中，证明了美国工业之恢复可向苏俄取偿这个预想，并侦探出苏俄之工业与农业虽然进步，但不十分坚固；而"如要坚固，这正是美国工业的出路。"他们又说，苏俄的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他们又说，在俄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复兴是确切而可乐观的。他们十分相信，并且要美国的资本家都相信：大家努力往苏俄从新培植一个健全的商业基础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

鲁尔的占据及使亚尔萨斯罗尔南列与鲁尔煤炭之衔接，便宜了法兰西在世界钢铁市场上的地位，成为美国的劲敌，美国对于与法兰西之竞争是决不轻视的。法兰西，在他自己一方面，——在这里应该除去表面上的法国政府，只说工业与商业的资产阶级——从早就注意于法俄间之商务问题了；在去年(一九二三)有好几个委员团曾往拜访俄罗斯，便是未来的国务总理爱友先生，他自己也曾亲身到过俄国一趟。还有英国也有许多到过苏俄的委员团，从他们的报告中，他们宣布许多与苏俄通商所建立的"有希望的基础"与"可爱的关

系”。这真是急死人呢，美国还站在旁边；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生产竞争的地位！）只这一件已经大丢其脸，何况还有确切的“生产过剩要找出路”的实际问题！

于是这就成为今日美国舆论要求承认苏俄问题之真因。

三 苏俄的麦子与美国的农人

美国的农人现在也是在一个严重的状态之中。市场上的麦子价大涨了：一九二二年有二万万斗（Bushels）的收成，一九二三年只有一万六千万斗，这样百分之二十的农产额之减缩，不能不算一个重大的现象。美国农民于此想不出别的方法，他们只知道要求铁路运输费之减价以为唯一的救济。

然而在铁路局于一九二二年关于麦面之运输费是货价之百分十三，至一九二三年反涨到百分之四十七。有力的铁路公司竟坚决的拒绝农民的要求。于是这个问题又转到关系德国的事件来。自从鲁尔占据以后，德国之苦痛是不待言的，当代理大总统柯利基先生宣布对德国举行一万五千万元信用债时，美国农民热情地庆祝柯利基先生的功德，大声喝彩，极力赞成。然而不久这项债款消息就消灭了，原来合众国的金子虽多，现在正式参加德国问题的时期却尚未到。

嗣后美国农民听到俄国麦面输入的消息非常惊骇。我们知道苏俄的麦子早已满满的送到世界市场上，并且快要会合德国的机器而造成世界革命在北欧与中欧的巩固经济基础

了。美国的农民在出产减而运输费不减之状况中，自然说不上与苏俄的麦子竞争。于是他们要求政府与苏俄的农民订定条约，要使苏俄的麦子在世界市场上有一个定准的价额。要找俄国农民订条约，当然要找俄国农民的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合众国的下届选举已经动手预备了，六百万选举票的农民是不可轻视的，柯利基先生当然知道，于是农民之要求承认苏俄更加有力。

我们再观察一点以外的关系。日本在大地震之前的强大之发展对于合众国在远东之利益是极相冲突的。纵然近来所谓帝国之重造与复兴，由东京政府竭力宣传仿佛极易，且会更好，但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局面之满带伤痕，终于不可讳言。倘若远东的情形不因地震而改变，合众国迟早总要以他自己心目中的揣度而将照应到如何邀请苏俄以对付这个远东的敌人，——虽然苏俄不致照样的受这种邀请，虽然日本也竭力想先拉拢苏俄，而这个关系之局面总是这样。现在呢。乘日本大伤之后，合众国要早接连与东方邻居的苏俄以为日本多添外方的牵掣，已成为美俄关连中在美国一方面之"舆论"了。

复次，国务卿休士现在还反对俄国，他宣言"断难承认"，他目前仍与去年春天之宣言一样："堂堂德莫克拉西大美国绝不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有任何和解可言"。最近华盛顿内阁席上他仍然坚持，事实上他也必定到底不变。为甚么呢？这是很明显的，休士是下届选举中共和党的候选总统。倘若柯利基要与激进派和解，休士必然更超于激进。柯利基要做正式总统，休士也要由国务卿做总统，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目下正是这一幕戏粉墨登场。

至于劳动群众的叛徒刚伯斯更是苏俄永远的敌人。在最近一次所谓美国劳动协会大会上，公然有大多数的表决反对承认俄国的提议。其实刚伯斯并没有真正的工会的群众随其后。他与所谓劳动协会在政治问题上于美国劳动群众并无影响，不足轻重，连柯利基都知道这个，他对刚伯斯简直不采。而事实上广大的真正劳动群众于最近数月来，并没有所谓“为苏俄之煽动者”的宣传，已自动的为与苏俄之亲密联络起而运动示威了。

1924·1·18

原载《响导周刊》第53、54期，
1924年2月13、20日。
署名：世炎

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

在列宁未埋葬以前，苏联政府就纷纷接到各国工农或平民团体底吊唁电报。甚至第二国际底首领也拍电与第三国际底中央，对列宁之死致唁。这个电报且说：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底政策虽不同，且成仇对，但列宁始终为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伟大指导者，其死亡实是最大的损失。在全世界，自本月二十二日起列宁死耗公布后，一星期来，全球各处都有一个名字的震动，这个名字便是：列宁。

列宁底事业是不必说了，他底著作也极丰富。去年出版的列宁全集共有三十四册，现在苏联政府决定将重要的译成各种文字（特别是东方文字）传播，最近一星期中，在列宁未葬埋以前，著作家波波夫（popoff）和亚哥列夫（yakolf）两人于两日内编成“列宁底生活与列宁主义”一书，于一日内由印刷局印成出版，现在正译成各种文字不久就可陆续出

版，俄国民众之爱戴列宁，于此可见一斑。然而列宁与马克思一样，他底著作固然非常丰富，他底事迹更浩如烟海，列宁死后，代替他的便是虽无躯壳而却有无穷生命的列宁主义。研究列宁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容易的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本是不可分的，不过列宁主义底骨髓在实际的事迹，在争斗的战略。最近波波夫和亚哥列夫两人所著成的书可以做我们研究列宁的草创的纲目，因为列宁既死，而列宁主义底研究，全待现在与将来人类底编纂与阐发！

"列宁底生活与列宁主义"底目次，附录如下：

第一部——列宁底生活与其事迹：（一）一八九〇年代的列宁；（二）火星报与经济主义底消灭；（三）社会民主工党底第二次会议；（四）一九〇五年与一九〇七年的革命；（五）反动底胜利，党底危机；（六）党底重造；（七）世界大战与二月革命；（八）十月革命与新经济政策。

第二部——列宁主义：（一）列宁主义底根本成分；（二）国际工人运动底开始；（三）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四）列宁与民族革命；（五）依里奇——党底建设者和创造者；（六）列宁底政策与战略；（七）列宁底政治替身；（八）没有依里奇的党。

"依里依其"，系列宁底名字；列宁原名依里奇，姓乌里扬诺夫，列宁乃是他底假名。

录自《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1924年3月3日。

署名：士炎

列　宁

一

当一八八三年马克思死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便十分困难繁重，但一九二四年列宁的死，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就是列宁主义者，其责任更是如何加重！在理论之境域以内于行动上努力，这是马克思死后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责任。而列宁死后，便是如何承继列宁的行动，以达到行动的最后成功——世界革命的实现。一八八三年三月四日，马克思没去之日，恩格斯曾写有这样几句话：

"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依着路线前进。然而在这样一个紧急时代，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德意志等地的同志所仰望的中心，指导的总枢，常常可领受的清晰而决断的教导

者，一个唯一的天才，完备的群众导师，现在是没有了……”

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即列宁主义者责任之所以繁重，一方面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起了，并且得了第一次胜利于世界最大国之一俄罗斯；而另一方面，革命还在战斗中，国际无产阶级奋斗的困难，还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现在还把毒药往工人群众中注射。列强的争攘又明显暴露，帝国主义的再战终不可幸免。所以由列宁手创的第三国际之工作是日益加多，同时由列宁所发现的这一条人类发展的红色之路也就愈更森严。

列宁把历史武装了，这一副武装不是别的，就是历史的最高文化和武器，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死而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就成为列宁主义，替代列宁活于人世，如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替代躯壳已腐的马克思一样。所以列宁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其骨髓充满了战略，也充满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之理论。我们还应该说，列宁的工作，既预备了革命，又保卫了革命，且努力做成环绕革命四围的未来胜利，实是马克思主义凯旋。

二

在变动与扰乱不息的时代里生长，同时由这个时代必须渡到革命——世界革命。列宁成为时代的结晶，引导了千百万人走入向自由的奋斗之路。所以世界和历史有列宁，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列宁是劳动阶级的天才，然而天才不是玄学

式的神秘，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的变动与革命的必然。人类社会产生天才，是用了很昂贵的历史价值换来的。

我们一面也可以说，俄国的历史换了一个列宁。俄国的历史重价是什么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有两条战线。一面要解脱亚洲式的君主的专制，一面要防卫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侵略；这两条战线同时就是两种担负，其来源是世界问题的总汇，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在俄罗斯会合的现象。结果，有了列宁，便有了十月革命的指导者；有了十月革命的完成，便有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列宁又变为世界的。所以欧美工业的无产阶级运动与亚洲的中国、印度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事势是否必然，先昭示在欧亚接境快变为殖民地而经革命挽救的俄罗斯疆域内。这个昭示是已经被列宁及其所创造的党证实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联邦已经建成。这个联邦跨于欧亚两洲之间，只待欧美无产阶级与中国印度的农民如何先联接起来。

然而列宁怎样地做成这种伟大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战术，他的战术的主要成分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阶级争斗，而平列于此的有工农联盟的政策。在十月革命中，在十月革命前，以及十月革命后五年内从列宁所写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出他的战术的应用与解释。

站在阶级争斗的出发点上，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阶级争斗必须划分阶级界限，决定社会战线。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建立在无产阶级科学的理论上，而政策在于指明争斗的形式和群众应战的方略。敌人势力的估量，与自己势力的比较，都用极精细的方法，而方略变动

全以社会动的势力为转移。势力的集中在战斗上比什么还重要，姑息一部分的反革命的势力便是增长多部分的反动，行动上失掉勇气，同时便是理论的失败。对于机会主义与改良派应当痛击，与对资产阶级一样，因为在阶级内的敌人其危险百倍于在阶级以外。在相当的时期转变行动的方向，必求不失其目标，口号深入群众时，便是行动，且有更进一步口号的必要。无产阶级由组织而革命，由革命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为指挥革命的进程，防止反革命的骚动，运用国家的机能，渡过到社会主义之路。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列宁是这样想的，他为这个而生存，为这个而工作，以至于死！

三

读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但见列宁的先觉智慧表出一根直线贯穿在那上面。无论是革命前或革命后，在几个重要的关键上，俄罗斯共产党历史的光荣，都是列宁的功绩。

在俄罗斯必然的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固然不是列宁一人单独见到的，然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他被放逐于西伯利亚时的著作，且相信与资本主义同时发展的有无产阶级，更是"不合法"的马克思派——列宁派的先见。列宁自一八九五年入狱，继被放逐，到一九〇〇年才放回，在这中间仍做了许多宣传和指导的工作，西伯利亚放回以后，列宁便往国外，但列宁自已常说，去外国的生活是与入监狱相等，因为他不忘俄国革命，不忘投身群众。火星报于

日内瓦组织以后，列宁的工作愈趋积极，继以资本主义之必然的发展与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增高，事实上使经济派失败，而革命的火星派战胜了。一九〇三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大会中关于章程问题之争，召起多数党与少数党的分裂原流，乃俄罗斯共产党史中头一个关键；列宁当时所持的争点，就在主张除承认纲领，缴纳党费外，必须参加党中某机关一种实际工作者才能算为党员。这个有名的争点，是列宁分析社会阶级界限的结果，无产阶级森严组织必备的条件，否则照少数派马尔多夫的主张，当时一般偶然同情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与知识阶级如大学教授等，都会跑到党里来。

当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时，多数党与少数党对于革命势力之估计是歧异的。少数党以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扶助他，而多数党以为资产阶级虽革命而结果是妥协的、改良的，无产阶级另外有真实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大多数的贫农阶级。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列宁与"取消派"及"召还派"的错误趋向搏战，主张保存秘密的组织以继续革命事业的进行。从此以后，少数党愈自离于群众，愈趋于反革命，而多数党愈密接于群众，仍保持"民主共和"，"八小时工作"及"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大战爆发，列宁向工人阶级发出的口号是：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的阶级争斗。二月革命是大战在俄国开的第一朵花，而二月革命后，列宁向工农兵士发出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列宁的搏战，一直到十月革命的成功。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几个大关键。头

一个便是与德国单独讲和的问题，列宁独排众议而订成条约，虽条约十分苛刻亦所不惜，因为革命后的俄国人民，没有继续战争的义务，而德国的革命，事实上必然爆发。第二个便是由军事共产主义移变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个有名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的特见，也就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就是无政府党吧？）与反革命派联合对于苏俄讥诮的焦点。第三个关键是职工会问题，即革命后职工会之机能与职务的规定，这个争论比较小，而结果是列宁的意见为决定。但自一九一八年列宁就被刺，更积以三四十年的劳瘁，以后便至于病。

去年年底俄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与“工人德谟克拉西”两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个重大关键，然而列宁已不能参加了。

四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屠杀，全世界人所聚讼不息的战争责任问题，终究弄不清楚。有的说是塞尔维亚的人不该杀了奥皇太子，有的说是德国不应进兵侵占比利时。轰动一时讲正义人道厚脸的威尔逊，只把大战的责任轻轻推到德国及其同盟国少数的贵族武人身上。大战的真因便是这样么？第一个把大战之真因告诉我们的，不是别人，就是列宁。

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书中，为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上的一段形相：其时资本垄断与财政资本的统治已经形成了；资本的输出已占极重要的地位了，国际大托拉斯瓜分世界局势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瓜分地球上领土的局势已完成了”。

我们先懂得了帝国主义是什么，再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报上说：

“这回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换言之就是资本主义最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结果时期的战争，……战争不是偶然，也不是如基督教徒所想的那样“罪过”；战争只是资本主义不可免的阶段，也同和平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生活的规律形式。”

这个真相只有列宁告诉了我们。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权，实际上没有不操于其资本家之手；财政资本为要输出资本，寻找市场，汲取原料，当然要继以武力的后备。一九〇八年各国军备的消费占岁入的半数，与三十年前国家支出比较且超出一倍有奇，一九一七年八月大战的爆发岂是偶然的？

列宁见到这个了，同时他就见到国际工人阶级的责任。劳动者在大战中不自卫而反助资产阶级作战是没有比这再蠢的事情。所以有名的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内乱的口号经列宁发出，而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反炫迷于工人本来就没有的“祖国”，赞助资产阶级作战。列宁目击这种事实，所以断定地说“第二国际是死了！”世界革命今后响导的责任是由列宁所手创的第三国际担负着。

五

列宁又深知道中国，且评论中国的时事，十分中肯要的。日俄之战是俄国第一次革命之远因：甲午中日之役也是辛亥革命远的民众反响之一部。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在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之后，列宁曾在多数党报纸上屡次发表批评中国时事的论文。他于一九一二年十月《正义报》上发表《改革后的中国》一篇短文中，他说“中国人的沉睡已醒了”：他批评当时法国还不承认中华民国是欧洲资产阶级只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而这一块肥肉，自从被俄国亲热地拥抱一下之后，现在要被日本美国等撕碎。嗣后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亚洲的觉醒》论文中，他说革命的运动已及于亚洲，如土耳其、波斯、中国、甚至英属的印度。本篇论文开头一句就问的是：“中国是否永远以沉睡不醒的国家之代表而著名？”他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国的变迁表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沸腾。当时袁世凯正大借款以压迫第二次革命，列宁于另一篇《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文中攻击欧洲资产阶级的侵略“帮助预备实行军事专政的袁世凯，掠夺中国，欧洲资产阶级帮助的是中国德模克拉西的仇人，中国自由的仇人。”接着便说：

“但是假使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债呢？中国是共和国，假使国会大多数也不承认呢？啊！那时候‘先进的欧洲’就要大声疾呼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国’了！

那时候欧洲就要装大炮与野心家黑暗势力的好友袁世凯联合去压迫这'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国了！"

列宁对于欧洲于亚洲的见解，特别是列宁与中国这个问题，我们还值得评论；列宁所说关于中国的话也很多，此处不能多述，便是平时列宁也是爱谈中国的。尤其于谈俄国时事时他爱以中国为例证；他对于辩论者之反驳中常爱用：你看看中国，你看中国还如此如此等等几句话。俄国民粹派是不相信俄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断定俄国是所谓农业立国的，列宁在《改革后的中国》那篇文中分析中国的政党时说到国民党。他说，这一党在中国第一次国会内占多数，其首领就是著名的孙逸仙博士，现在他正筹备扩张中国的铁路。接着便在这一段话后面用括弧注一句说："俄国的民粹派须知：孙逸仙所以有此计划就是要叫中国经过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是列宁爱引用中国事的例证之一。

列宁对于中国——亚洲之一部——解放的意见，可引用《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最末一段来说明：

"不过整个幼稚的亚洲，换言之，即亚洲几万万的劳动者，也有最可靠的帮手，这就是一切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世界上没有一种势力能抑止他的胜利，这胜利把欧洲与亚洲的人民都要解放出来。"

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4年6月8日——12日。

署名：士炎

万国工人救济会与中国工人

工人本来是没有国界的，自从劳动运动勃兴，他的基础就建筑在国际的联合上。因为，劳动问题是普遍的，决不只是某一地或某一国的现象。各国资产阶级在相互间虽是攘夺竞争，而对于劳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却是一致的进攻。因此，劳动者的团结也不能不成为国际的。他们一方面要用这种团结抵抗敌人阶级，一方面要用以谋相互的扶助，特别在急难时，作相互的救济。万国工人救济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Relief 或简称I.W.R.）就是专门为后一种目的之国际工人的组织。

这个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由第三国际及红色职工国际发起于莫斯科，不久就广设支部于各国。同年八

月，在柏林又组织俄国灾荒工人救济会，发起的人是有名的蔡提金（Clara Zetkin 德国老社会党）、哥尔基（Maxim Gorki 俄国文学家）、巴比士（Henri Barbusse 法国文学家）等，嗣后便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并不属于共产党的，都纷纷加入，如法郎士（Anatole France）、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萧伯纳（Bernard shaw）、孙克勒（Upton Sinclair）等等……。嗣后组织愈更扩大，欧美工人阶级同情心愈增，都起来参加。一九二一年八月间第一次对万国无产阶级的檄文发出，立刻在各地就组织了各种专为救济俄国饥荒的事务，汇集捐款，购买米麦、衣服、药品等，送往俄国。几月以内，经万国工人救济会代表护送到俄国的粮食至三十三万多布特，分配区域及于十三个大省份之广。这次的伟举，成就既快，范围又广，参加施助的各国工人与慈善家，既不全属于第三国际或职工国际，完全是为对于俄国革命的一种真实的无产阶级的同情。俄国灾荒之救济，要算万国工人救济会第一次伟大的工作，同时也就是他的组织信用在国际无产阶级间的增加。

嗣后万国工人救济会又专门组织为孩童的救济。据一九二三年一月柏林开扩大委员会时的报告，在五个月内就成立了六十个孩童院，收容了五千二百余男女孩童，完全给以供养，另于各种休息院，公共食堂等处，又收容了五千六百余男女孩童。此外在美国、德国、荷兰等地，都设有许多孩童院，办理非常完善，几万儿童都得了新生命。这是仅就孩童之救济一项说，万国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其机关分部已是遍于世界各大都会的。一九二二年六月柏林委员会会议又决定，因

俄国灾荒事务的结束，经第三国际的代表提议，改变救济灾荒的工作，以后成为对苏俄经济重造的万国无产阶级协助的组织。两年余以来，成立各种企业、公司、无产阶级银行，得苏俄政府的信用，成绩十分良好。

自从法国军队进占鲁尔，引起德意志资产阶级的破产，并引起遍于普鲁士全境的剧烈阶级争斗。德国无产阶级失业者至于十余万人，马克的跌价，物价的昂贵，饥馑大灾日甚一日，目下困苦达于极点。于此而万国工人救济会的责任又到了。现在万国工人救济的各国委员会都在德国设立食堂，供给饭食，每日至少要供养一万五千余人，而且日有增加。各国支部在各本国更竭力活动，苏俄的少年共产团男女孩童组织队伍在大都会街市募捐，此外如美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支部都与当初救济俄国灾荒时一样，非常努力。各国的工人阶级也都肯慷慨相助，凑集捐款，表现无产阶级的同情。在各国由万国工人救济会发出的口号是："一百元可以供养一日救活一千个德国工人"；"捐款捐的快，便等于捐两倍"。

万国工人救济会的意义和他的过去工作成绩，已如上面所略述了。他的目前紧急工作便是对于德国饥荒的救济。万国工人救济会在欧美各处支部极多，东方于日本东京也有支部，惟中国尚没有。这并不是由于该会不到中国来设支部，只是由于中国工人还不知道，还没有自己起来参加。我们历来看见中国凡关于这类救济事业，都只由几个慈善家提倡，才能成为运动，而由工人平民自己起来发起，特别是对于外国平民无产阶级的援助，在中国还没有看见过。工人是没有

国界的，灾荒救济的事业，尤其是人所同情，中国工人阶级于近几年来常常表示他的力量，团体组织也很多，对于这个表现万国劳动者互助的组织，我们应当早早参加，特别是目下对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救济，中国工人更当刻不容缓，急起直追。

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4年6月27日。
署名：炎

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者——英国

——它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之研究——

一　中国人所当认识的英格兰

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成为大多数的认识国际帝国主义，直言之即是中国人还不知道真正统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到底是什么。不用说以买空卖空专干无耻勾当的政客、议员、官僚、外交家等懂不得什么是政治，便是要在中国干"文艺复兴"事业的一般人，也就一方面还没有充分能力与旧宗法社会思想作战，一方面又还够不上检拾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唾余，而能把他说得清楚乃至懂得清楚以努力做成"时代的人物"——世界资产阶级的走卒。华盛顿会议，到现在还有人懂不得，"华会利益"四字由一群流氓政府人员的传播，各报纸也就公然照样的述出来，令不知羞的中国人天天看见。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做的宣传真是无微不至，

而中国人民所能认识的国际帝国主义恰好成反比例，这就是说，连最大最明显的事情都看不清。我们于此有两件急切的工作：第一，指出每日的事变真相所包含的外国帝国主义作用；第二，把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形分析出来，告诉于中国的民众。

英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头一名，也是最老的一个。所谓日光下到处都有英国国旗这句话就是这样表证的。他拥有世界最广的殖民地，特别在一世纪来不断地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所有的海洋中，他的航权势力都达到，且布满了舰队，向海里丢下了铁链子把全世界锁着。我们知道近代欧洲历史是很自然而容易分成三个阶段的——起首是商业资本时代，其次是民族主义时代，最近便是帝国主义时代。英格兰不仅在欧洲近世史中为主要者之一，而且他的历史便是模型，在地位上便是首座。拿欧洲现时政局说，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仿佛为现在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领袖，然而英格兰却是将来欧洲资本主义临终时的最后刑场。

鲁意乔治曾对克里满梭这样请求：“我把欧洲给你，请你把世界给我”，这是代表英国帝国主义方略很具体很公开的话。伦敦是“世界政治经济之中心”，所有世界重要政治经济事件，国际问题，没有不问问“唐宁街”，汇聚在大不列颠帝国政府。帝国政府之所以能有这个地位不是偶然的，所谓老资格必须老历史，而英帝国却正是这样；所谓有限公司的君主专制，皇族封建的立宪政体，庄严深厚的国度，成为世界最反动最保守的中心局。帝国政府希望统一全世界非只一日，他在小岛上筹划世界的事；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

殖民地政策，都是一部近世史的底稿。所谓“帝国商业利益”这句话是中国人常常听到的，这就是帝国主义骨髓之所在，因为商业利益的背面站着的就是帝国主义，而由商业利益所达到的目的便是殖民地。帝国保守党重要首领之一张伯伦是中国人常听说的，他曾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指国会）最重要的责任便是对于各大农工商企业之发展与维持。……所有的国家各大机关都当注意商业事务，……外交部与殖民局应当为首的负寻找新市场与保护旧市场之责，陆海军部应该为防御这些市场及保护商业而时时预备，……就是教育部也应当把他的目的建筑到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商业竞争场中得胜的普通需要上。……商业为各种普通利益中之最大利益，政府必须把力量注重于增加贸易及使贸易有坚固之基础”。(见Woolf所著的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这真是青天白日之下强盗打劫的事实，便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他也是毫不抵赖隐讳的，然而中国人却梦着一点也不知道。

四万万的中国人民和三万万一千九百万的印度人民，构成亚洲疆域之伟大数目，将及世界人口之一半，而印度人民有二万万四千七百万（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八）已是英皇统治下的正式百姓；其余百分之二十二的少数人口号称自治邦，经一八五七年之暴动后组织，实际亦无多大差异，而且如一九一八年事件，死了六百万人也换不出什么自治出来。中国的人口之多是大家爱以自夸的；中国人又不相信什么帝国主义，“瓜分”之说嚣腾了数十年，而每一次说起就每一

次自宽自解。但使中国人自己没有防卫，真的列强就不会瓜分中国吗？谁还有本事说“中国现时之患还不在列强”吗？中国人无论怎样糊涂总应该承认中国是列强的商场，商场就是殖民地先声，认识商场就可以认识帝国主义。近邻印度三万万民众所忍受的不过时间上比四万万的中国民众较早罢了。我们试若分析国际主义在中国之发展，我们从鸦片之战（一八四〇）算起，直到临城案（一九二三）为止，这最初与最近的两桩劫案都是英国帝国主义为其先锋，而这八十余年中更有许多事实，我们得以知道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便是最大，最老，最有资格，最凶猛毒恶的。中国人所当认识的英格兰便是如此。

二　大战以前的英国帝国主义

大不列颠对外国及殖民地之投资在一八八三到一八九三年间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四的比例率。一八九九年对外投资的利息总额是九千万磅至一万万磅；一九〇九年达一万万四千万磅，一九一五年达二万万磅，即等于当时国家岁入总额之十二分之一，亦即等于国家对中下层阶级岁入之四分之一，因为国家岁入总额中之赋税就是九万万磅。大不列颠资本这样可惊的输出，在大战前已是如此。我们为分析大战前的英国帝国主义，除从资本输出观察外，更可一一指出政治的事实。

一八八二年英国之对于埃及，压迫埃及的民族运动（The

rising of Arabi pasha），开始所谓“暂时”的军事占领，卒变埃及为保护国；一八九五——六年南美洲之边界争端（The Venezuelan Boundary Dispute）结果取得金矿，攫获农业生产；一八九六年对于波斯之大借款，开始置波斯于半殖民地地位，波斯的军队是须用英国人教练的；由一八九五到一九〇二年间在南非洲之侵略的屠杀；接着便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联盟，为对付旧俄罗斯帝国而与日本均衡在中国的侵略；再如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四年之所谓英法关系，决定了“尊重两国商业之相互利益”；一九〇五年与一九〇六年马洛哥（Morocco）问题，英国是“为钢与铁”，为助法国而备战的，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间，与法兰西合对沙皇的俄罗斯由借款财政关系而变为政治关系，密定了关于波斯、西藏、阿富汗斯坦条约，一九〇七年由英俄关系变为英法俄三角同盟，展开数年后英国对马洛哥、波斯、巴尔干之侵略局面，一九一一年中国之所谓五国银行团借款，英国帝国主义便是主人翁，袁世凯得了这二千五百万磅用以压迫二次革命。

最后到大屠杀快要开始就有所谓英德的和平。一九一二年德皇凯撒请了一位大不列颠的阁员到柏林去讨论关于英德关系的一切问题得出“美满的结果”，所谓“英德关系在大战将爆发前之亲密是两国在本世纪中任何时所未曾有的”（见Boudin的Socialism and war P.22），然而他们的条约与协定都不过是两个强盗在晚上十一点钟时的忏悔，实际上“习惯的时间”看看快到了，战争之铃已鸣了，他们当然照旧到屠杀场去。仅仅在大战爆发前几天，一九一四年六月十

日，葛雷（Edward Grey）在下议院演说帝国主义的新政策而表示他对于这种政策之祝祷。

“我认此种政策为我们的责任，必如此而大不列颠资本在将来可遍布全球，采用于租借地而无政治的影响。我们将尽我们之所能以援助保障，并图取信于有关系的外国政府，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一样，肯给与如铁路等之租借。于此，帝国政府必能公正办理，用最善方法处置。”

三　英格兰与其殖民地

英格兰的殖民地可以分为两种：头一种是盎格尔萨克逊种的移民殖民地，原有的土人是已被驱逐或歼灭的。这种殖民地之重要者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联邦等；这些地方很久便获得自治，各有其国会与军队等，加拿大且有自己的钱币制。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都是英国人，所以从社会及经济地位观察起来，与其宗主国是平等的。第二种是本地人种的殖民地，换言之既征服的殖民地，本地人在政治权利上受限制，受英国军队与官吏的管辖，如印度、埃及，非洲中部，亚洲西南之一部。这些殖民地在政治形式上虽有种种不同，然而经济上是一律完全征服的。

英国帝国主义之重心在经济组织，换言之即由各大工业中心所支配的大不列颠全体人民生活形式为其骨髓。他与殖民地的关系，可由下列几项把他简单说明：

1.从殖民地榨取原料——埃及与印度的棉花，澳大利亚

的羊毛，印度的麻（jute），以及所有各殖民地的食料——而供给殖民地以奢侈品，大机器，特别是各种炼成的金属工具。

2.英格兰是殖民地资本的主人，自大战前所有资本之新组合大半都是用在殖民地上，而所有的利润却全部偿还于宗主国。

3.英格兰是各殖民地的“船主”，同时又是租船者。欧洲与各殖民地之间及各殖民地相互之间的航业，大半操在英国人所组织的大公司手中，英国海盗资本用在航业上有特殊势力。

4.英格兰是各殖民地的银行主人翁，几百年以来英国的钱币适用于世界被认为是最有信用最好的；大不列颠帝国的银行钞票在世界的商场上与金子一样。

5.帝国的强大舰队为各殖民地之保护者，如神灵一般，特别是在别一位帝国主义者侵入或本殖民地有反抗运动时，尤为出力。

由以上五项的说明在经济观点上看来是如此，下列两个小表把所谓在殖民地“帝国商业之利益”更具体表明：

（一）**输入表**（以千磅为单位）

	1913	1920	1921
印度……………	48,420	95,721	44,268
澳大利亚………	38,065	112,288	67,858
加拿大…………	30,488	92,999	62,287
再加其他各殖民地之总额……	197,576	559,937	303,097

（二）**输出表**（以千镑为单位）

	1913	1920	1921
南非洲	23,324	50,485	30,945
印度	70,273	781,240	709,022
埃及	9,406	43,644	78,830
澳大利亚	3,471	62,574	45,645
加拿大	23,795	42,693	19,433
再加其他各殖民地之总额	195,311	501,470	298,771

不过这样输入与输出之差的资本也不尽拿回来在"祖国"使用，他是精米糰子似的就在各殖民地的肥土上打滚：国债、实业债、船业借款、交通借款……都由此而出。而帝国的官员、军队、行政费用还不在其内，这些费用须另由殖民地直接供给，"就地筹办"。事实上，帝国的支配阶级又必需与殖民地的资本阶级联合作共同榨取的行动，特别是在逐日侵略的半殖民地中，他必须勾结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军阀官僚与其政府——而在背面作鬼作怪，并且用种种特殊方式，铁路要警察权，关税要会计权，借款要优先权，军队要教练权，政府重大事件要同意权。

我们试一翻阅英帝国关于经济的报纸与杂志，莫不充满了关于商业利益的辩护，而在殖民地经济与美日资本之竞争为其中心问题。有名的经济杂志（The Economist）曾对于加拿大之自由发展抱充分忧虑，曼彻斯特报的星期增刊常常大批登载着日本资本在中国发展迅速的"惊人消息"与详细的统计。

四　大屠杀以后英国之经济状况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之大屠杀以后，英帝国之经济状况是胜利的。这个断案虽然不为英国舆论所承认，却只因为还有更胜利者（美国）的原故，而帝国的政治家与资产阶级固未尝不以大不列颠之政治经济权力在大战后达于高峰自愉。在大战初，他让别人将战端开始，他在战中是审慎考虑而徐徐增加他的兵力；直到战事将毕，各交战国都力穷气竭了，英帝国才混入了生力军以助成最后的胜利，以表示英帝国的强有力的国际地位。大战初之两年，他"集力量于生产事业上作贡献以替代对于前敌之调遣"，另一方面，他的美妙的战时财政组织"减轻了国际经济的恐慌"。政府的统计表里虽不说明，而所谓三万万磅的"非常收入"便是战时商品之利润。这样一来，大不列颠的预算案所以是有剩余的。

这种事实往后又证明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将帝国经济统治世界之发展事业，暗地里怎样还不必问，表面上便早已号召"继续一九一四年八月所停顿的"了。他们老早就预备如何做"和平的结论"，所以大批的原料不绝的从殖民地输入。沿海的重要的英国通商港埠都尽力于如何使各协约国都能得到原料的问题。这些事实所证明的都是，自从停战之明日，各交战国什么都缺乏，而大不列颠的工商业却是很易的恢复旧观了。

五 欧罗巴驱逐主顾与英国经济之恐慌

英帝国工商业之恢复固是事实，然而是暂时的。欧罗巴洲四万万人口于大战之后最缺乏的是燃料，所以一时很能容纳些货物，但在欧洲大陆的市场上没有交易的商品，换言之即没有可以回赠英国工业的物件。所以在“和平结局”之后，英国资本家想把这种难关由两途解决：一方面，他们大购买其股票与收罗欧洲之大小企业而以商品付其值；另一方面，他们对欧洲新建的诸国，特别是对英国将来可靠之近东诸国，容借以债款，而这些债款实际便是用商品付给。不幸中欧与近东各国都是战后之损伤者，他们纵然能够立刻消费了所接受的商品而绝没有再继续的能力；到后来，他们接受的力竭了，而英帝国的金融也日日高升，主顾的地位愈更站不稳了。

于此而英帝国之经济恐慌便开始澎涨。这种事实是很明显的，生产品销不出，货物屯积日增，而各工厂作坊却不停的仍在制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危机自然就马上暴露。这时候紧接的事实就是工人的失业痛苦。一九二〇年之末英国最大钢铁厂之一谢非尔得（Sheffield）工业辛迪加之最大者，就开始辞退整千万的工人。是年十月二日的《经济杂志》大叫唤：“帝国工业前途之黑暗呵！售买问题太困难了”，而《泰晤士报》也号呼：“现在，公然在我们面前发生可怕的生产品跌价悲剧了”。《曼彻斯特指导报》对于当

时状况述论更详：

“最近这种人造的危机毫无疑义是由战争之直接结果产生：物价乱涨，信用低落，纸币滥发以及军费之浪费都使社会生活遭极大的损失，非有数年的长期忍耐与工作绝不能恢复。

“在商业恐慌的各种原因之中，其最要的是：外国主顾的贫穷，银价的昂贵，信托的禁止，以及工人的轻举妄动，陷各厂主于困难之境不能使各种合同之展期实现，结果扩大货物的屯积，连利润的大税率也包含在内。

“各种大工业的定货停止，于是制造不得不停止，以至于最后，制造厂不得不闭门。……”

我们对于这样现象当认为两种事实环境的结果：一方面是生产额在资本家尚不满足而在社会上已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这种恐慌既是生产过剩便当如何使所屯积的货品能达到一个社会的价额，而将这些货品送到市场上去照公共的价额卖得出，不过这绝办不到，资本家也不肯这样办。资本的势力仍然勉强把各企业维持着，物价很滑稽的或跌或涨，货品之屯积如故，而生产有时停顿，有时不过限制一下。

于此，我们当要研究的，象这样情形，在社会一点上是这样呢？这个问题给我们的解答便是：惟有工人是恐慌的牺牲品。所谓的“生产平衡”在资本社会中的一套方程式，是方程式的一方，那一方所写的便是工人失业四个大字。各工业家乘此时期采用所谓“短时间工作制”，也是同样方程式之活的应用。当一九二〇矿工大罢工之役，矿主正兴逢时会，深得停工之赐。而一九二〇年英国许多公司付给年利之

事尤可看出，各股东所得一九一九年之利息竟多于正在战时一九一八年所得。英国有组织的资本势力很轻松的把恐慌的重担负在工人身上，而一面能安然付股东的利息，这真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下面两个简表，一个表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工人失业的数目；另一个表明所谓的失业保险法颁布以后（一九二一年），在各工业中之失业工人数目，这都足以证明大战后英帝国之经济恐慌所召起的工人痛苦：

第 一 表

时 期	失业人数
1919年10月	564,136
20年10月	337,334
21年1月	977,296
4月	1,799,242
7月	1,803,696
10月	1,564,973
22年1月	1,925,450

这以上虽是较远的情形，而实际近状上终于没有多少差异。失业的人数在最近的统计仍然是一星期比一星期加多。自鲁尔占领以来有所谓英国经济情形之便利问题，现在当然可以证明是帝国主义者间相互倾轧的话了。目前英国经济界的想象仍然是：怎样才能将英国工业生产品输出，怎样才能得着外来的廉价原料等等的问题，而工人之痛苦如何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矛盾之下自掘坟墓当然无法过问。

一部分的企业家又自己不知所从了，有的想“提高英国的农业”，有的要组织移民队往殖民地去!

第二表

工业区别	失业人数
建筑	196,007
造船	129,381
机械制造厂	310,984
铜铁厂	212,700
交通	153,169
煤矿	136,348
木绵厂	93,965
羊毛厂	35,996
丝业	62,314
衣业	80,861
其他	527,307
总数	1,944,032

大不列颠老的遗传的经济政策到现在成为问题，于是一些庞杂的空气就应运而生，如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的要求，便是一种。十月（一九二三）间的"帝国会议"竟拟定了所谓使大不列颠帝国为一个单纯的国家经济组织，但求自给而税则关系对世界独立的滑稽议论。

鲍尔温首相在开会词中说："倘使我们举目一望欧洲而与我们在四年前庆祝之希望比较，真叫我们有些寒心！"他又说明现在各国为战争之预备，较一九一四年尤甚。又如英美间的债帐问题是牵引英美成为纠纷的唯一线索：英国资产阶级要想生存，必须先设法怎样摆脱大金子国的羁绊。于是《泰晤士报》曾指明的说："帝国会议对于星加坡建筑军港问题毫无疑义必深加注意！"这个表明的头一件是，华盛顿会议限制军备是鬼话，第二件是太平洋上大金子国的势力范围要平衡平衡，未来的借东亚为战场的事从早就当预备起

来。

在帝国会议中之讨论又曾指出：英国各殖民地之经济情形是十分歧异而不能以同一方式实施的。现在的加拿大之工业发展，美国资本力竟将过于英国自己；一九一四年时美国资本侵入加拿大是六万万二千万元，现在已是二十五万万元，而英国资本现在额与大战前一样，不过二十七万万元，加拿大已几乎是纽约诸大资本家的“殖民地”了。在其余殖民地如印度，工业之发达又完全建设于帝国的资本。故在另一方面，帝国重要工商业界都极力反对大不列颠帝国可以自足于经济之孤单组织。这些事实都表明英帝国资本主义之恐慌、冲突、矛盾、混乱，不能支持

六　英国的政党

英帝国之经济之分析既如上述，我们便紧接分析他的政治。英帝国政府之形式为所谓有限专制，完全建筑于贵族及资产阶级利益之上是不用说明的。国会在宪政上有最高权利，而实际上依照历史的事实——以政党的起落为内阁总理的更换——看来，国家的大权却轮替的操在背面站有大托拉斯资本家的内阁阁员之手。选举权限于男子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已嫁女子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换言之即在二千六百万成年人中，二千二百万人有选举权。英帝国的政党，在过去的不说，现在的分割是这样：

（1）保守党（Conservatives），其中包含：

A.顽固派（Die-hards）——代表封建遗迹的军阀阶级，爱尔兰的大地主，及英印的官僚主义；

B.混合主义派（Unionists of coalition）——代表地主与农民群众，教会，保守的资本家及兑换所等；

C.自由保守派（Liberal Conservatives）——代表最小一部分之拥护地主利益者，要求工业立法（Industrial Legisiation），在保守党内部号称自由政治的党徒。

（2）自由党（Liberals），其中包含：

A.独立自由派（Free whigs）——由Asquith与Grey所创，代表丝业，各大企业，及各自由工业；

B.反对国教派（Non-Conformists）——代表反对派宗教（Dissidentreligion，不从英国国教之宗教），合作主义者的一大部分，及各银行与各财政企业之利益；

C.混合主义民族自由派（Coalitionist national liberals）——鲁易乔治，丘吉尔等为其首领，代表战时工业，新兴的富豪，威尔斯（Wales）工业，犹太人之大商业与财政资本。

（3）劳动党（Labour Party）——代表官僚主义的工会，近来复联合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急进党；以议会行动为中心，常与自由党联合战胜保守党；其中又分数派，详见下段说明。

（4）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第三国际英国

部，现况尚弱小。

七　非共产主义的各劳动党历史

英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工业化的，换言之即是最无产阶级化的，然而共产主义的运动至今尚是微弱。在外形上看来好象英国工人运动之势力颇强，而实际在无产阶级政治见地上观察，这些运动不是改良，便是反动。数年来固然有工联，劳动党，及一般社会主义者之结合，曾给劳动党以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之基础；然而直到现在，竟不过仍保守着一些资产阶级的观念，官僚主义的习惯。本来，自从资本主义在英国发达以至于登峰造极，英国的劳动运动在初便迟缓的于工联（Trade union）形式之下发展，而以所谓的经济问题为其目的，以官僚主义为工会之指导机关，直到最近，才勉强有些工人自身的真正政治活动。我们更当知道的是，拥有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之英国，他从世界的无产阶级（特别是殖民地的）榨取中把英国无产阶级放到了一个特殊地位上去，——这个地位便是“工人贵族”。

因此，英国劳动运动与各劳动党之历史是最值得我们检查的，最近所有的英国非共产党主义的各劳动党之史略如下：

1.劳动党（Labour Party）——自一八七四年，英国工联便有议员于议会；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之末，好多工联议员都由资产阶级党派选出。一八八九年劳动代表委员会由一部分工联及社会主义者创始，才预备了十五个候补议员，但

在一九〇〇年普通选举，结果只产出两人；至一九〇六年普通选举出二十六人，而此委员会遂采名为劳动党。从此到大战时，劳动党都在独立劳动党影响之下，其议员常与自由党联接，而大多数是工联的职员或自由派工人之代表。自一九〇八年矿工协会加入后，议会部份子竟有十五人加入自由党。在大战时，劳动党竟完全赞助政府，参加混合内阁，他的首领如汉得森（Henderson）克里时（Clynes）等都做阁员。大战后劳动党脱离混合内阁，一九一八年时普通选举得六十一个议会席，同年采用了新党章。一九一九与一九二〇年间之六十二个补选额，劳动党又得了十个议席。

劳动党常常接近自由党于政治舞台，而嗣后以群众的监督，有时才不得不采用为工人利益之政争。一九二〇年八月自下而起的各工业区之工人代表所组织的行动委员会，反对对于苏维埃俄罗斯之新的战争恐骇。自从补选以后，资本家方面即有反对劳动党的口号，而劳动党只在议会席上卖弄，怯于阶级斗争。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党而将大群众的无产阶级统治着，他拒绝共产党之联合会议，他的领袖即第二国际中的几个有名人物。

2.独立劳动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一八九三年时由各工业区独立劳动党代表，社会民主协会一部分之代表及法宾（Fabian）党员之联席会议所组成。他们在工联中组织，而主张一种独立活动的政治，工联中之职员及一部分有力的工人都渐渐依附于他，在两年之内就有二百个党员被举于各市议会及各城市的机关中。自此以后，他们也在原理上采取了一点社会主义基础，在劳动运动中主张集产

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几年于英国劳动运动中确是唯一的社会组织而密切接近于群众。在大战时，他操劳动党政治主张的指导地位，大理论家麦克唐纳尔（Ramsay Mac Donald）老早就是议会部的领袖；采用与自由党混合政策他是最有力的主张者。大战开始后，独立劳动党采的温和态度，于是他在当时劳动党中便是中央派反对战争的势力卒被资本阶级混和政策所战胜。大战以后，极左派以共产党之影响而渐变有力，强烈反对官僚首领的运动时起，直至一九二〇年的会议，经五百二十九票对一百四十四票之多数，退出第二国际。又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俄罗斯，想加入第三国际，而同时麦克唐纳尔尚站在第二国际的书记职务上，一九二〇与一九二一年两次加入共产国际之动议都被否决，最后左翼遂分出组织了共产党，第三国际之英国支部。独立劳动党到后来卒参加了维也纳会议，现在是所谓的第二半国际之有力分子。

3.法宾社（Fabian society）——于一八八四年创始，为一般知识阶级与中等社会阶级之结合，这里面颇有些大著作家，社会学家，如萧伯纳（Bernard Shaw）、魏卜（S-idney Webb）、威尔士（H.G.Wells）、莫勒（Leo Ch-iozza Money）等。这些大学问家所建立的社会改良主义颇有影响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立法事业。在大战以前，他们在劳动党政治中站一部分地位为独立劳动党的间接介绍者，而现在他们却是直接参加劳动党的政治问题，但其效力已是微小极了。

4.社会民主协会（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这是俄国普列哈诺夫（Plekhanov）的马克思主义在英

国所形成的政党，一八八一年由海得满（S.H.M. Hyndman）所创立，一九一六年曾召起分裂，改国家社会主义党，不久又复原名，他的势力，在海得满死后是极微小的。

5.社会主义劳动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一九〇三年自社会民主协会左派创立，当初以Daniel de Leon为首领，为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之一部；在大战时多数党员参加于工厂委员会之活动，而其纲领近于空泛，对英国帝国主义竟不能切实认识，他们只在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行动上建设理论，而于一九一七、一八两年中行动上表现最烈。在英国共产党组织之初他们便有一部分是参加的，现在大多数已是共产党员，而其余的也正在分化之中。

原载《响导周报》第75、76期，
1924年7月23、30日。
署名：赵世炎

工人与党

什么是党？就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觉悟份子所组成本阶级的先锋队。工业资产阶级有它的政党，农业地主阶级有它的政党，军阀与官僚阶级也有它的政党。因此，社会上占大多数的生产者——工人与农民——也应该有一个政党，是同样的道理，一点没什么稀奇。

并且世界上最可靠的，只有工人、农人的党。因为工农阶级是一个最后的阶级，工农的党担负世界未来政治改造、经济建设的最后责任。在现在呢，工人、农人赶早就要组织起党来，训练自己的战士，做目前日常的争斗，做将来革命的争斗。这是事势的必然，这一点没有什么客气。他们——军阀与官僚——要组织“宪政党”捧曹锟，组织“头发党”

捣阁，组织“研究系”捧军阀，组织“外交系”卖国。我们——工人与农人——当然也要组织我们的党，为打倒军阀与官僚，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革命！

来了！他们军阀官僚现在利用站在统治的地位，公然“下命令”干涉我们加入党了！北京交通部对各铁路局下了一个昏蛋的训令，“严禁工人入党”，又发出一种什么“职工永不入乱党之誓书”，强迫各处无论新旧工人，一律填写签名。可是这件事，我们也并不以为奇怪，他们怕我们入党，与我们痛恨他们组织“宪政党”“头发党”“研究系”“外交系”是一个样。我们将来革命成功时，也可以照样严禁他们。所以，我们交通工人现在“誓书”上填写签名的意义是：我们起一个誓，我们入党成功后，就禁止他们组党！

原载《中国工人》第1期，
1924年10月。
署名：士炎

美国黑种工人要求加入工会

最近美国“有色种人进步协会”写了一封公函给美国“劳动协会”，要求许可黑种工人加入他们白种工人的工会，结果如何，还不知道。

原来美国的工会有许多派别：头一种由刚伯斯领导的贵族工会，会员尽是技艺工人，入会基金甚至于要几百块美金，这种工会黑人是不能希望加入也不必加入；其次工团主义的工会，他们只讲工业联合，对于种族问题非常轻视，向来不管；第三种革命的工党（即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黑人却是一律平等，早已加入，且有民族组织，不成问题。现在成问题的是：因美国工党势力不大，黑人的团结还不好，所以现在黑人进步协会向美国劳动阶级提出正式的同情要求了。

我们对于此事的观察是：（一）这个要求是阶级的要求。工人只有阶级，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界。但资本家的统治阶级，却利用国界种族界以间离工人，所以黑人协会的公函中沉痛的说："如上次钢业大罢工；以黑种工人之补充而破坏，循此以往，将来任何罢工，黑种工人苟能以补充工作，而取得经济上之利益者，将皆破坏之，此岂白种工人之利乎？"（原函见各报译文）这种沉痛的话，是出于阶级觉悟的同情心，美国工人阶级是应当了解的。（二）黑人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换言之是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个宗主国中的移民、奴隶劳动，仅是本问题的一部分。所以革命的赤色职工国际本年第三次大会中，曾有决议案训令各国革命工会尽力扶助黑人的组织，而共产国际也早有训令各国共产党从事引导黑人的民族革命运动。

原载《中国工人》第1期，

1924年10月。

署名：士炎

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

一

自从二七惨变以后，这年余以来中国劳动运动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的原因，在表面上由于军阀的摧残，实际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进攻。换言之即我们劳动运动退步状况的经济背景，是紧靠在支配半殖民地之中国劳动生活全部的帝国主义侵略关系上面。

原来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发生浩大的恐慌。我们深知道资本主义崩坏的内容，与宗主国发生工业恐慌时亟亟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寻找出路的必然趋势。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欧美的资本，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在东方的活动趋向愈更增加，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愈更暴厉。我们在中国政治上已经看出，美国帝国主义在北方扶助

军阀反动，英国帝国主义以香港为大本营从南方进攻，日本于满洲地位已十分稳固，在北京时谋领袖帝国主义使团以支配中国，法国金佛郎案虽不得逞，而对中东路的野心未已，所有这些状况，从骨髓里观察其经济侵略的背景，都很明显地摆在我们劳动阶级面前。

在这个宗主国的恐慌现象与对殖民地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出本国幼稚的工业主义，其资本、技术与组织的薄弱，都不能够支持对于欧美日本大工业的竞争而且即使有竞争，结果都失败。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大部分的本国工业资产阶级都投降于洋大人，接近外国的资本，联合向幼稚的无产阶级进攻，使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愈更变坏。同时又借政治的权力，压迫得我们丝毫动弹不得。这是我们劳动运动退步的最明显的原由，这种现象在东方以印度与中国表现最甚，而中国又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判定了命运，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屠杀场，比印度专压在英皇御座下的情形更为复杂。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我们又可以看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势力十分弱小。他们偷安苟活于外国势力之下，不肯革命，并且时时与帝国主义妥协。印度的民族运动自从去年九月会议右派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自治党完全与英国的统治妥协，无产阶级一年以来受尽痛苦，屡次罢工，屡次流血。中国的民族运动也是这样，不争气的中国国民党自改组以后，大多数的分子不懂得什么是群众，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教育群众，除少数左派分子努力工作外，其余占据各级机关里与做官僚一样，只计划如何推翻党纲宣言，恢

复旧时与军阀官僚相同的国民党军事政策。所以自从今年五一运动时，在国民党地盘的广州城内就暴露阶级斗争的痕迹，法西斯蒂的商团（香港帝国主义与广州商业资产阶级的雇用卫队）杀了工人，而号称革命政府的只以“兹后不再滋扰”了事。在虚名号召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席上，我们的工友痛切指明革命政府并不能为工人谋利益，算不得革命政府，而国民党的右派与所谓中派都充耳不闻。广州的商业资产买办阶级是料定政府不敢与他们为难的。我们当初说，国民党要想“肃清东江”，要想打倒反革命的陈炯明，应该先宣传组织工农群众，给工农群众以政治的利益，而右派却说先倒陈后讲别的，殊不知惟其如此，绝不能倒陈，而实际他们又并不倒陈，所以为时不久，以无政府党而兼国民党右派资格的吴敬恒就去求和去了。商团军械事件爆发，这正是工人阶级取得武装，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抗争，与买办阶级战斗的惟一机会，而右派包围与小军阀“武装调停”结果，给孙中山送一笔路费，逼中山下“罪己诏”，而实现传统政策，公然“北伐”了。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堕落，形势虽与印度不同，而屈服于帝国主义，投降于买办阶级，受制于军阀官僚，在东方则别开生面，集中华民族耻辱之大观！政治上的现象既如此，中国劳动阶级的痛苦更不言可喻。

帝国主义者本不许殖民地有什么民族运动，对于以工农为主体而左倾的民族运动当然更加忌刻。我们拿东方问题全部看起来，在资产阶级曾经少许得些政治胜利的各国（如土耳其、埃及以及印度之一部分）乃至帝国主义至今犹完全统

治的各国（如荷属爪哇，中国与朝鲜），无产阶级的势力与组织都受极剧烈的压迫，这是客观环境事实极明显的解释。无产阶级一方面既受残暴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因经济生活之变动与失业之众多，所以从欧洲大战教训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而发展不甚强壮的劳动组织，现在受不住两重的打击，自然很容易衰败了。

二

二七事变的正确解释，一方面是取媚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的反动必然现象，另一方面是中国幼稚无产阶级勇于一战而转入黑暗新时期得了更进一步的觉悟。在此后黑暗的新时期里，无产阶级含垢忍辱，一方面于忍受不堪时仍爆发阶级斗争（二七后到现在全国大小罢工不下百余次），一方面参加极左派的民族运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劳动阶级做生力军参加民族运动是不可免的工作，现在中国国民党虽然右倾，而中国劳动阶级仍然可以代表真正的民族革命。

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壮大成正比例的。我们知道俄国工业化速度的历史很与现代中国相象。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史，正是工业化速度催促的结果，自从一九〇二年以后，罢工、暴乱、巷战、流血屡见不鲜。中国自二七后到现在百余次罢工之不可免，亦正如俄国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彼得堡大屠杀后，继续八九年中屡起或大或小之罢工与暴动一样。阶级斗争之发展与资本之进攻及军阀宪兵之压迫又是成

正比例的。在这历史的必然性中，无产阶级总是竭尽使命，以至最后的胜利。

二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在欧洲大战时及大战后几年里很有些增进的现象——因此在几个大都市里及几种产业里工人渐渐增多起来。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之集中与资本之集中是同进的。半殖民地中国资本集中的趋向还不明了，乃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之故。因此而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紧急问题，仍有含带民族运动性的要求，外而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内而打倒军阀的横暴。所以本届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对东方问题的议决案说：

东方各国目下劳动运动的当前责任仍与当初一样，

（A）与各国的真正民族革命派分子联合对帝国主义奋斗；（B）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奋斗。

“因为在数量上是很弱小的，东方各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联合最无产阶级化的、有觉悟的、有革命性的农人与手工业者分子做联合的战斗，以求做到上面所说的两种基础事业。”

三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各重要产业的内容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之进攻直接衔接的。矿山、铁道、造船、河海运输、金属业，以及丝纱纺织……等几种中国重要产业里，那一件不是与帝国主义直接有关系的？惟其如此，在这些产业中的工人，正是反抗外国资本势力，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坚势力。在将来反

抗帝国主义斗争里，这些产业工人的战斗力是决定胜负的生力军。

目前在高压下的中国劳动运动，工人阶级组织的方法与表现活动的形式都十分困难。但是我们常常看见不时爆发的罢工运动，以及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抗表示，很自然的由工人群众中或小组织中发生出来。我们深信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是愈涨的。坚强的工会组织与群众的权力表现，往往从事变里产生出来。工人阶级的生活，原是在不断的压迫之下寻找事变的。事变变，群众的力量亦变。工人阶级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对准着资本之进攻而反抗的。半殖民地落后经济的工人在遗传习惯上或者有保守性，惟有对于切身利害之资本进攻决不保守。摆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的目下问题只是：怎样从事变中产生权力与怎样运用方法提起组织坚固组织。

进步无产阶级坚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其初步的形式是：在工厂、作坊、手工业厂、矿山及海船上组织小组，于可能时举行代表会议，组织工厂委员会，为组织较大的群众，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都是可能的方法。在西欧，工厂委员会是工人对准资本进攻的经济组织，而工厂小组织纯为党的或政治的组织。受资产阶级压迫活动时，一切协作社、夜校、技术班，以其他教育形式的组织，都能作为组织运动的中心。依照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还有一个组织的原则告诉我们：对于黄色的、非革命的，乃至挂假招牌的旧有工会，我们决不另起炉灶组织反抗的工会，以分散群众的势力，淆乱群众的注意力；我们的惟一方法是在能够加入到里面去，宣

传煽动群众，以改造其组织。因为，我们的观点是一个阶级的群众观点，我们处处不离群众，而且要能深入群众。这是工人运动的第一原则。

在现在的中国，劳动阶级团结的权利，集会与言论的自由，罢工的权利与劳动立法等易懂的口号都应作为在相当时机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实际运用。凡是口号，都要具体，要易懂，才能深入群众。公开与不公开的工作要有连接，这都是中国劳动运动之基础问题。

无产阶级有一件武器，这件武器就是团结的权力，而我们在未能运用这个权力之先，就要求如何达到这个权力。在这里，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方法就是，站在阶级的观点上，把四周的环境分析清楚。我们要了解一种社会的势力，以及这个势力与本阶级之关系。我们必须懂得资本之进攻，才能知这劳动运动的进程。尤其刻刻不可忘记的就是：在每日的环境中工人阶级的政治关系以及较近一步的乃至最后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问题。

原载《中国工人》第1期，

1924年10月。

署名：士炎

孙中山可以北来么？

据人说：基督教将军冯玉祥曾向人表示，他崇拜中山先生远甚于崇拜段祺瑞，故甚望中山先生北上。受北京政变朦哄而观察时局的人，见各处军阀伟人对于段祺瑞之“尊崇”；以为中山受基督将军的推重既在段氏之上，中山的地位当然是更高了。特别是国民党中为官为宦或想为官为宦的右派，对于这一层尤其玄想。

由日法与美英两派帝国主义造成的国内战争，东南方面虽告结束，而华北方面，却因日法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之胜利，使吴佩孚军事失利，使基督将军兴起了十字军，造成十月底北京之政变。这个政变之结局，只要吴佩孚问题解决以后，不管向各省要来的响应是全部的或是局部的，马上便有

一个与去年侦探何东所奔走及今年伦敦之中国协定遥遥相应的和平会议出现。在这个和平会议开幕之前的现在，英国，甚至于向来尽力扶助吴佩孚的美国已开始与日法帝国主义妥协。在将来和平会议席上，因为已经解决了一个“单独由美国帝国主义扶助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问题，于是真正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就可以做到，于是铁路共管，新银行团种种计划都可以实现，中国民族将愈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这是最近时局的明显解释，我们从这里实在找不出甚么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地方，反言之正是在国民革命前途上，增加了一层荆棘。再易言之，我们实在不知道：中山的地位高在那里？

但是除开国民革命的左派分子以外，现在还有两种人对于时局与国民党之关系有些意见。一种是向来同情于国民革命却又昧于国民党实力与内部状况的人，以为此次政变实在是一个好机会，国民党正可以乘此在北方扩张，依据政纲与宣言，在北方猛力宣传，并且在一定限度内，无妨参加实际政治问题之设施。第二种却是国民党的右派与中央派，他们的想法却不堪了，他们以为现在是三角同盟的胜利，国民党当然要预备参加和平会议，参加联立政府了。但无论怎样，这两种意见虽各不同，却共同迫起了一个目前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山先生是否到北京？

对于前一种意见，在主张原则上我们不仅是赞成而且以为是必然的。我们虽然感觉国民党实力不足，但这正是能接近群众而增加实力的一种方法。我们只怕抱前一种意见的人，单纯蹈入所谓参加实际政治实施，而致使国民革命妥

协，生出错误。对于后者，那般要为官为宦的人，说了一大半年还不懂，现在还说什么？基督将军十字军前五分钟进了北京的九门，后五分钟他们就想出元老会议与委员制了。北京国民党右派党员与上海打死黄仁的反革命右派凶徒一样，只要有人在会场上提起“帝国主义”四个字，就瞪着眼要吃人，他们那里懂得，他们只预备赶回电迎总理北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并不重视中山个人到北京与否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国民革命的工作应该继续是没有疑问，只要有利于宣传事业，增加革命实力，什么事都可以做；另一方面，国民党现在有右倾之险，西南团结是骗人的，北伐更是说鬼话，民众之宣传几乎全部停顿，国民党能依照时局变动而定新策略也是不可不有的工作。

中山先生是可以到北京的，但要站在：（一）继续革命事业绝对不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二）提出国民党的政纲，保护工农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山先生是不可以到北京的，倘若没有坚持第一次大会宣言与政纲的决心，倘若完全受右派为官为宦的包围，到北京只做元老、只做三角同盟事业。

中山先生到北京后唯一正当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但是我们读十一月一日北京各报所载中山先生给基督将军等的电报，只简单说要北上，而代表国民党的政见，甚至于自己个人的政见却一字不提，这不能不令企图革命的群众十分惑疑。我们尤其惑疑的是：

中山先生这个电报是答复冯等的通电么？为什么不以自

已的建国大纲答复，而只以简单要“北上”答复？

冯等曾有迎中山北上的电报么？为什么南北的民众毫无所闻，不是报纸之公布？十一月一日北京各报所发表的元老会议人物资格，那只是徐世昌、段祺瑞，……才有资格，中山先生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袖而无所变易，那就与他们所定的元老资格一条也不合。

我们所恐怕的是：中山先生这个电报只是因国民党右派之主张催促，或竟因有人欢迎而发。

我们尤其恐怖的是：倘若中山先生完全为妥协而来，抛弃了宣言与政纲，致于中国民族运动之堕落！

原载《政治生活》第20期，

1924年11月7日。

署名：士炎

十月革命

一 列宁的纲领与历史的教训

当十月革命之前不久，列宁曾起草一篇预备暴动举行革命的纲领，题目叫做“革命之目的”。这篇有名的历史稿件，与列宁致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及彼得堡与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几次专门讨论暴动问题的信是同样可贵的，成为十月革命发动时战术的底稿。在这篇稿件里面，我们细读一遍，便可知十月革命的发动与结果，皆在列宁先知之中，而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志愿作列宁主义者的，要深刻学习，因以得出十月革命的教训。

在这篇稿件中开始分析当时的时局，俄国经济政治状况与当时各政党，各种舆论的呼声，农民反对战争的激烈，以及四周环境与革命运动之关系。嗣后分条的列出七个大纲，

决定革命之原则与目的。这七条大纲是当时革命行动的指针，同时又是十分清显的民众之口号：

（一）宣告与资本主义妥协政策的死刑（即对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继续参加欧战及其它种种政策）；

（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三）给人民以和平；

（四）还土地与农人；

（五）建立工人自己的生产与消费管理，救济灾荒；

（六）武装无产阶级，攻打大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七）发展革命的势力，建立革命的政治。

我们知道紧接十月革命产生了三个结果：工厂给了工人；土地还了农人；组织了红军，保护革命。但十月革命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十月革命的总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是革命后一切政治设施的总枢纽。俄罗斯无产阶级于现在已有七个周年的成绩中，又有两个大结果：一是领导世界的革命运动：第三国际的组织包有全世界过半数的工人与被压迫民族；一是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弱小民族都闻风兴起，各资本主义国亦不得不予以承认，根基日益巩固。

二　暴动是一种艺术

在十月革命快要暴发以前，有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质

和原则问题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暴动？历来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对于暴动是根本否认的：他们痛恨暴动，屡次控告马克思的暴动学说，常常宣言“没有暴动也可以革命！”这个革命时机的根本命脉问题，往往被一般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所侮辱，惟有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甚至在芬兰未归俄境之前，屡次写信与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局，说暴动是必须的，而且暴动是一种艺术。

当时中央局惑疑大多数的人民还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之下，以为在宪法会议或者有贯彻主张的可能，又以为反对的空气十分紧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社会革命党左派，新生活报纸派，都反对有一个暴动。而列宁却明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坚决地说：没有暴动，就没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在九月（俄旧历）底列宁写与中央局的信中，早就肯定地说：

“等一等这句话简直是一种罪恶。等一等的结果证明是对于四周环境愿意放弃，换言之就是背叛革命。

倘若要夺取政权，暴动就是不可免的，那吗，就应该马上动手。……政权到手了，银行、工厂都收回了，苏维埃机关就要站稳脚步做广大的煽动，我们马上提出：明天就要和平，土地给农民，铁道给工人，面包给灾民。……我们的胜利是占十分之九的。……”

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倘若我们把暴动合于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把暴动当作一种艺术，同时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要失去，马上组织暴动工作的大本营。集中我们一切的力量，汇合一切重要

问题在几个明显的口号上。……对武装的无产阶级下动员令，号召起最激烈的争斗，占据电话电报各机关，设立暴动大本营的交通总站，与各工厂，各区域，以及所有巷战或有武装的地方联接。……

“所有这些，诚然，一时还说不尽，但是我坚决证明：在现在这个时机，我们将至于不忠于马克思主义，不忠于革命，倘若我们不把暴动看作一种艺术。”

三　七年来我们的中国

俄罗斯无产阶级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占世界面积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广大民众，已经庆祝十月革命的完成，唱七周年纪念的凯歌了。“我们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固然时时在中国革命党，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心中。但是大家亦曾知道，在十月革命时列宁于千头万绪中还说到中国么？在列宁的生平，本来常爱谈中国的时事，便是对于谈俄国问题时，也爱引举中国的时局作例证。而在“革命之目的”一篇纲领中，因说明需要和平，遂剖析帝国主义战争之内容与其必然结果，在最后提起亚洲又特别提起中国时，竟是七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宰割之预言：

“……说到结果当然是很明显的，我们敢于假设，法国人和意大利，首先，将军力与德国联结以宣告对俄国的攻击。因为俄国公然倡和平之故。至于英国、美国与日本呢，我们也明知道他们将是同样的态度。然而我们知道，在不久

的将来，在他们之间也有十分困难产生而免不掉又要战争啊！这期就是他们将瓜分亚洲，特别是先要抢劫中国，其利益将冲突不已。……”

七年来我们的中国不是这样？较为觉醒的中国民众在近两年来已经知道中国的病根只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这般国际帝国主义者就是当初造成四年多的欧战大屠杀而结果引出十月革命的原动力。中国鸦片之战到临城案件乃至最近之指挥两派军阀的屠杀，帝国主义的侵略、侮辱、抢劫，岂不够使中国民众急起直追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功，而图谋一次真正解放中国民族的革命运动么？

原载《政治生活》第20期，
1924年11月7日。
署名：士炎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

基督教将军带领了十字军入北京以后，外国报纸称之为北京之救主。这个，在住居中国图谋利益的外国人心理上有此颂扬，毫不足怪。同时北京中国自己的报纸，在紧接事变后几天以内，于社论或新闻中（在这里，顺天时报还要除外，因为那是日本人的），都一致说冯玉祥这次举动是一种革命的行为。北京没有赞成革命的报纸，那般新闻记者先生根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大家同声附合，随便说说，看惯了中国现象的人，也不觉得什么希奇。

但是基督将军自己，却不敢承受这个，于是向人宣言了一个“革军权万能之命”的怪名词，从此以后，大家不大敢作声了。

不幸我们从一个号称革命党人的口头，又曾听着承认冯玉祥这次举动是革命的话，这实在不可以不辩。

什么是革命？一个革命是社会经济变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矛盾，发生新阶级与旧阶级的冲突，经过激烈的阶级争斗，产生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及新的政治制度之统治。不懂得这个的人，还谈什么革命？冯玉祥与吴佩孚是站在两个不同的阶级之上么？这次北京政变后，列强对于中国之侵略，中国全境军阀之横行，有丝毫变易么？人民的经济生活，除开愈困愈苦外，有丝毫进步么？即使不说这些，冯玉祥现在是以拥段助张且为自己而打吴呢？还是能以革命军资格，外而抵抗列强内而扫除人民受压迫之一切障碍呢？我们尤其要问的是，假使说这话的人自己还承认是一个国民党员，那吗，当年陈炯明炮击广州，赶走中山，也算是革命么？

这次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明明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得胜利，又运用外交手腕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将来，真正是“后患无穷”。大家被这个局面朦哄了，更被“国民军”一个名词朦哄了，好可怜呵！

原载《政治生活》第20期，

1924年11月7日。

署名：士炎

国民会议呢？军阀独裁呢？

一

我们早已说过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实际是日法与英美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斗争之开始。我们又曾经说过：此次战争若是直系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做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若是直系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皖段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政变以后，我们又曾说过：这是日法派帝国主义外交手腕之胜利，能够运用直系的内讧做成这次政变，使冯玉祥屈服于段祺瑞之下，而建立日法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指挥的军阀之独裁政治。

二

现在的时局是怎样呢？国人不要以为政象纷纭，难以分清，其实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与军阀依靠列强造成大乱的事实，很清晰的摆在我们面前。现在的时局是这样：第一，直系在北方之势力虽倒，然而长江一带的余威未除，目下已组织所谓的护宪军政府，形势十分紧张；美国帝国主义者犹竭力扶助吴佩孚，吴佩孚逃亡时美国用军舰护送，吴佩孚到长江后北京东交民巷美国公使馆用无线电传报军情，直系将依据财源富饶的长江流域，继续作乱。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此处原稿缺漏数字——编者）订中日军事协定。段祺瑞已被认为所谓收拾时局之目前唯一人物，建立军事的独裁政治；张作霖的军队已长驱入关，占有直隶全省及三特别区，又秉承日本人意旨，进窥日人历来欲得而未遂的山东，一面以军力保护段祺瑞入北京实行独裁政治，一面又支配皖系军阀及直系投降的军阀，对长江作战。第三，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要集中它的胜利之局，要求国民革命派的妥协，所以段张都肯表面欢迎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北上，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宣传尤力；日人这种用意，为的是对付它的死敌——美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同派的法国帝国主义现在已起而呼应，提倡保护各国在华的利益，以完成日法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以上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是很清楚的。这种现象所指示我

们的是：日美两派的冲突未已，军阀的斗争未已，中国之大乱未已。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斗冲突虽换了个局面，军阀的屠杀人民虽得了一次胜负，但在我们实是换汤不换药，倘若大家不起来抗争，必愈致于受辱受苦。

三

我们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历来认定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呢？这就是国民革命。但是目前被认为代表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为什么受帝国主义之顾盼，被军阀之邀请参加政权呢？这个，一方面是因为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要集中势力以与美国抗争，另一方面是国民革命运动近来已有不可侮的势力为他们所顾忌；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一争海关，再击商团，能表现中国民族革命的精神。所以现在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民运动的妥协，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宣传机关，一面鼓励段张速建立专政，一面又恭维孙中山，希望其和缓，以达到破坏国民革命，使之中断破产之毒计。然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绝不应因此而妥协的。中山离粤宣言，就为的是号召反抗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止军阀专政，要求中央与地方分权，并倡议全国国民会议，得以对抗军阀秉承帝国主义意旨之所谓元老会议，巨头会议，和平会议。中山抵上海时，责言领事团不许入租界之无理，并倡议废止租界，又通电主张取消外国在中国之治外法权。是的！国民革命的运动正要乘此帝国主义分派别在中国冲突仇对的时机，前进发

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中国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压迫之真正解放。

四

被压迫的中国同胞们！你们要的是国民会议呢？还是肯忍受日本帝国主义扶助的段祺瑞之军事独裁政治呢？

你们愿意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在中国之横行，每两年造成一次屠杀，弄得大家生活恐慌，奔逃离散呢？还是愿意于帝国主义者冲突与军阀敌对之时，急起直追，为自由而战呢？

身为主人的大多数中国人民既被专制政体统治了数千年，又被帝国主义与军阀残害了数十年。现在我们的幸运生死关头又到了。我们目下唯一的出路只有大家起来，由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学生会……促成国民会议，以对抗军阀之和平会议与武力专政，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军阀，力谋扫除大多数人民一切受侵略压迫的障碍。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才能得着真正的民治，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爱国的国民啊！

起，起，起来为自由而战！

原载《政治生活》第22期，
1924年11月23日。

署名：士炎

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

一 资产阶级左派的“社会民主”和平主义是失败了

中国人还不大懂得什么是“社会民主»和平主义，并且受资产阶级宣传机关的朦哄，有时竟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所谓“过敏”主义一样。

麦克唐纳当初在英国握取政权之时，因为他所代表的党公然叫做工党，他的主张又曾说了些保护劳工亲近苏俄的话，竟被人恭维认为布尔什维克。其实英国工党是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自大战后即获得政权，背叛工人阶级，弄得德国现在已变成列强经济共管的殖民地。英国工党于这次选举后，已被保守党打败，麦克唐纳已滚蛋了。这都是欺骗劳工与维持帝国主义侵略之“社会民主”和平主义之失败。

原来资产阶级在近世假面具的德谟克拉西招牌之下，包含有左右两翼：左翼就是社会民主党，而右翼就是专门残杀工人替资产阶级作武装保卫的法西斯蒂。社会民主党是以和平主义号召的，限制兵备是他们的招牌，国际联盟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在资产阶级队伍中是激进派，所以有时竟能号召一切，骗得工人的信仰。然而他们这个骗局不能持久，资产阶级大多数不容许他们这种激进的政治，所以终于要倒塌下来。

资产阶级的协约国，现在已完全占有德国，实行经济的共管，并开始进行对于苏维埃联邦的重新包围了。他们起草出剥削德国剥削全欧洲工人阶级的计划；他们开了许多会议，弄了许多条约。但是这些计划和条约都是难于实现的，因为：（一）在协约国自身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绝不能调和；（二）一切计划和条约都含有武力作后盾，而觉悟的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已进步发展，工人农人不愿意再去替资产阶级打战。因此在去年与今年之交的国际资产阶级政治是这样：从一种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变为秘密的帝国主义政策——把普思资与克松，换赫里欧与麦克唐纳。这都是和平主义与德谟克拉西的来源，也就是社会民主和平主义的一时现象。

资产阶级因为和平主义是很时髦的东西，单只靠法西斯蒂的武力不行。必须法西斯蒂在内而和平主义在外，或者能够支持大战后六七年之残局，所以和平主义就被采用作假面具了。然而正是在这个假面具里面，埋伏下很大的危险。秘密的帝国主义政策已渐为欧洲革命工人阶级所揭破，道威斯

计划的内幕已经尽人皆知，和平主义的死果反引狼入室，大金子国的美利坚合众邦已成为欧洲经济的主人翁，于是乎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不能不急起进攻，先赶走领袖群伦的麦克唐纳，重建帝国主义政治的新局面，而和平主义宣告破产。

二　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

我们已经知道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美英与日法帝国主义者已分成两派明争暗斗，并且造成了最近一次的战争，而且此后就继续争斗不已。但是我们只认为这是在中国的特殊现象么？日美两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成为死敌，在日本方面说，固然是所谓“与远东利益有特殊关系”，然而日英之间，法美之间，又特别是英法之间，那一个是真能融洽的？

道威斯计划所表现的国际意义，一方面固是美国参加而且占主要地位的参加宰制德国并且宰制欧洲，另一方面则是由英国主倡弄成了列强对德国之共管，以代替法国榨压德国的独占，当伦敦会议之前，所谓赔款问题只算法国单独指挥的，因为赔款委员会中法国是占大多数的表决权。伦敦会议以后形势却变了，美国固然是出马得胜，而英国则借尊重道威斯计划之名，实际达到打倒法国对于德国垄断之目的。英法这种争斗的真实原因是：自从鲁尔占据后法国得了德国的煤与炭，其结果使德国金属工业之发展，成为英国金属工业之死敌。这个争斗的结局是英国胜了。

便是在这个伦敦会议中，英美之亲密站在一方也刻骨的

表现出来。八万万马克借款的担负者是英国银行家，特别是美国银行家。向日所称为英法之和协者，而今是英美之和协；由此，法国不仅敌视英'亦且敌视美。从伦敦会议以后，许多事实又告诉我们：美国竟在英法之间，竭力挑拨，引起英法的冲突，以扩张他的金子市场；同时，英国又竭力挑拨法德间的冲突，对于欧洲大陆虎视耽耽。总而言之，现在世界情势所可以说明的，值得说明的，就是这些冲突，矛盾和斗争；惟有这个才是事实，美国国务卿休士先生和法国昔日里昂市长，今日激进总理赫里欧先生之或长或短的和平主义的演说，不是大炮，就是鬼话，丝毫信不得。

三　冲突之在远东

在远东，这就是幼稚的日本帝国主义与雄厚的英美帝国主义冲突之广场了。在中国，日本的经济势力虽据有满洲作根据地，然而在南部与长江流域则与英国之发展冲突，在北部号称政治中心的区域则与美国是死敌。日美之仇，在中国问题上，以及两国间许多事实（如移民问题等）之关系上，越结越深；几年以来曾经有好几次的显露冲突。常引起世人所谓太平洋上之大战的幻想。其实，太平洋上并不另外有战争，日美两派的帝国主义者只在中国的领土内，驱使中国的军阀，杀死中国自己的人民。日本与中国的劳动阶级及远东被压迫民族之全体应该知道：太平洋之战就是在中国之战，并没有别的，因为太平洋的主要问题即中国问题——日美两

方帝国主义为争殖民地争市场而必须在中国打战的问题。最近一次的中国内乱，就是这个战争的开始，拿现状说，不仅没有终了，亦且将加倍严厉。吴佩孚逃亡到富饶的长江流域继续作乱，而北京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正在逐日把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北方军事情形，用无线电去通知。这不是日美之战是什么？日美两方帝国主义者战术之高明，竟能各自一兵不用，一人不出，坐而以待胜负。中国军阀所驱使兵士之在前敌，也公然象“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另一方面在表面上，日本外务省高唱不干涉之论调，美国国务院亦声言希望中国之和平——这些，都把麻木的中国民众骗够了。更加以他们各自有报纸与通信社在中国作宣传，他们怎样说，中国人的一切新闻报纸就怎样转载，没有丝毫的观察，没有一语的抗议，全体都帖服了。

中国之内乱——太平洋上日美战争之借刀杀人——已经是第一幕了。中国人民已经在这一幕里死了十余万人了！我们应当紧记着这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制下之牺牲！

四　这种冲突的前途与中国人民之出路

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冲突虽然继续，但同时其侵略是进展的。当国内战争开始之后，大多数人民慑于军阀之淫威，戒严法与警备法的锁闭，只觉得时局沉闷，只觉得没有了局，而不知帝国主义者固逐日逐时的进攻，北京东交民巷是战时财政的大本营，军事的参谋部；遍全国的“洋大人”都十分

活跃，政治家在顾问战内各为其主，新闻记者专门造谣，实业商业家以其利益为要素，与中国人民的现象，恰成一个反比例。帝国主义者这样兴高彩烈的活动。纵然他们之间互有冲突，但在对付中国人民之侮辱与残踏，则是一致的。

于此而这种冲突之前途是可以预测了。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欧洲资产阶级之和平主义是已经失败。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帝国主义者间之冲突不能调和，一是欧洲劳动阶级革命反抗运动之兴起。在中国，帝国主义者间的利益也是不能调和的：日美既是死敌，而目前美国扶助吴佩孚继续作乱于长江，虽英美向来是站在一边，而长江流域之经济利益英国是占优势，故英国为避免美国在长江之侵入起见，目前倾向与日本之妥协成分较多。段祺瑞入主北京之局，英国帝国主义者是默认的。然而日本人所需要的是段祺瑞的狄克推多，而英国人则倡导和平会议，倡导道威斯计划之采用于中国。他们的冲突是继续不已，即使找出一个暂时的公同方式来，无论是和平会议，无论是道威斯计划，无论是铁路共管或新银行团（这两者都只算是道威斯计划之一部分），无论是北方承认段祺瑞之统治中部许可吴佩孚的对立，他们表面有调和，而内幕实逐日逐时冲突不已。同时这种冲突不仅在中国表现，且有国际的意义，在世界政治局面上，也暴露同样的痕迹。国人们不要忘记：帝国主义是自掘坟墓而崩坏之势既不可遏，由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峰的帝国主义必然发现矛盾和冲突，罪孽深重，除歼灭外没有第二途径。

中国人民于此时应该走的是什么路呢？两年以来，大多数人民已察觉中国之病根而高呼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

阀赞助民族革命了。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之冲突暴露明显，军阀战争之一起一伏又表示明显，大家反会忘却革命之目的么？解决目前的时局：是日本帝国主义扶助而由军阀推戴的段祺瑞之所谓“总执政”呢？是等待道威斯计划之采行使中国受国际共管呢？还是继续能求得中国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呢？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应是肯定的，我们应当知道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革命或死！

原载《政治生活》第22期，
1924年11月23日。
署名：士炎

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

中山先生北来了。我们崇仰中山先生的为人，尤其崇仰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觉，是现代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北方的广大民众之闻中山先生的名望，而不亲聆中山先生之言论；再加以列强帝国主义与军阀及其走卒之造谣中伤因而引起一部分民众之惑疑与隔阂，现在中山先生亲自来加解释了。

我们早就说过，在这次政变之后，胜利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既顾忌国民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肯邀请国民革命的领袖北上，则中山先生之北来是可以的，只要站在继续图谋国民革命之完成而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之立场上。我们当初虽不免生疑惧之心，疑惧国民革命之妥协；然而我们一读中山先

生离粤时对政局之宣言，细按宣言中最小纲领的意义，再读中山先生抵沪后及登轮北上时之谈话，了解于中山先生最近的态度，我们的疑惧不仅可释，而且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热诚的表示欢迎，并愿谆切报告于大众以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

一个革命党的领袖，他所代表的是党的集体的意志，而党的集体意志之结合是汇聚在根据政治与经济状况而建立革命目标之政策与战略上。

中国国民党不与其他不成形而附属于军阀或聚集少数官僚之政党一样，他是有党纲有政纲有革命目标有建国方略的政党，代表的是大多数人民之利益，这些党纲政纲革命目标与建国方略之产生乃是准对着违反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两重压迫阶级——列强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而革命的一批国民行动纲领之文件。这些文件虽早已传播于全国各地，但民众的拥护力尚不雄厚，尤其是久压迫在北洋军阀势力下之北方民众尚不知齐起响应，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上至少是速度的损失。

中山先生自离粤后，已沿途告诉民众以中国现在祸乱的真实根源与国民党革命之目的及此次北行的用意。中山先生到北方后尤要把十三年来民众受苦之真因何在，现在中国之大患何在，中国人民的出路是什么，——很明显的向我们说明。北方的农人群众应该追溯战争损失之牺牲与军阀压迫等苛税重捐的痛苦；工人应该纪念失业的流离，劳动之无保护，集会结社之不自由，乃至罢工的牺牲与遭惨杀的悲痛；革命的知识界应该回忆十三年来一切的变乱而穷究其根源——所

有这些问题与回忆，在中山先生北来之后，都应找出答案出来，因为中山先生正是解决这些答案之现时领导者。

军阀历来虽是巧辞装饰，但没有半件事不拂人民的意志。人民因军阀之循环屠杀长久压迫急需反抗，又见列强帝国主义站在军阀后面的诡计百出尤思急图扫除。然而经十三年之久，群众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号不应，几陷于絶境。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军阀之相互冲突屡次造成战争而屠杀吾民，同时军阀自身也表现势力的崩溃与涣散；由战争所产出之胜利的军阀将赐予吾民之痛苦是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大多数人民是非有一次搏斗不可的，而我们搏斗之在战场上，需要有一个大本营，需要我们的指导者。

开中国革命之局是中山先生；三十年来继续革命事业而不衰的是中山先生；号召现时全国革命运动的，舍中山先生外更没有第二人。中山先生此次北来的意义，展开了中国民族的生机。全国人民也必须起来用行动解答中山先生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提出之种种救国方案，以达到和平独立，自由而光荣的中国之建立。

原载《政治生活》第23期，

1924年11月30日。

署名：士炎

国民党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使命

环顾国内除国民党外没有成形的群众的政党。依照中国的经济状况，群众的党，若非建筑于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之上，即发生于初长成的工业劳动阶级。海禁开后，所谓欧化的输入，渗合旧的士大夫与新的知识者而形成之所谓知识阶级，并不能独立而有政党；有些分子多附属于封建军阀阶级而成为一种临时有争权夺利之结合。这些结合很少的才有政党之名，而全体都没有政党之实。这种状况在我们看来是易于分析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基础的观点上，军阀与其附属的官僚同在一个立场，不过因为军阀间的利益有冲突遂有派别，而在他们的卵翼之下的一般官僚也就奴颜婢膝的各自有所依附。这便因为这个原故，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除军阀的

北洋系外并没有可与国民党对迭而对抗的政党。这便因为这个原故，国民党在中国代表复杂的各阶级经济利益而始终是群众的党。

但是这个群众的党，自最初的同盟会以至于现在，三十年来只有两次曾经有真实的群众力量：一次是一九一一（即辛亥）年革命之时；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

现在我们可以来仔细剖论一番。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时，主要的群众还是农民阶级，不过老的国民党员看不清这种势力，也摸不懂这种势力。当时在革命中任奔走的是一般新的知识者而得助于海内外之商人与华侨财力的援助。但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农业的破产者。遍满全国之农业社会的秘密结社分子，及投身行伍的失业农民。不幸当时的革命只用在"推倒满清"的一个简单的口号上，在政治上由革命党把政权授予封建阶级的专制魔王袁世凯，开十三年来军阀政治之局面；在经济上毫无改革和建设，农民的经济毫不能进展，因此而继续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因此更使中国入于半殖民地地位之域。一个革命本是社会经济变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力冲突而生出之激变。辛亥革命原因并不止于推倒满清而已，这里面的主要原因还是由农业经济之变动，假使没有帝国主义之侵略，则农民不致于参加而革命不致于产生。革命以后，假使有经济上的建设，假使肯针对帝国主义之侵略而从事于真正民治及独立的中国之建立。假使肯以民族的革命而兼任一个农业社会经济之革命，假使不妥协，不授政权与反革命的封建阶级，假使不承认革命军起而革命党亡之胡说，如中山先生原来所痛斥的，由革

命党撑住政权以党治国以革命军转战南北，则辛亥革命成功之局不是不可能的，至少，辛亥革命的历史的意义也不致于那样的狭隘。

然而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失败了。

这个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反革命而求妥协的右派，完全看不出专制政体留下的封建阶级之可恐怖，完全放弃了革命之用意与目的，完全抛弃了党，抛弃了中山先生当初造党的主张，完全不懂得一个革命党在革命中之使命。

十三年来，固然事实上有所谓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的经过，又有所谓护法政府军政府西南团结等等的革命流产后的结合，然而所有的经过与结合都忘却了一件事，这就是：党。国民党中的同志有少数也未尝不知道要党，中山先生尤屡次更迭党的名称、组织与纪律，图谋党的建立。但在事实上竟被耽误了，这个耽误的主要阻碍力而且含带矛盾与冲突的阻碍力就是专门的军事行动。由这个阻碍力所产生的一切错误，现在国民党中只有中山先生和少数同志及新起的一般革命青年知道。同时，在国民党外有三种社会阶层的革命群众也知道，这三种社会阶层就是：工人、农人与一部分的富于革命性之知识界。辛亥以后，革命流产之事实已十分鲜明，革命方法之错误尤不可讳言，十三年来，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愈已低下，军阀残暴屠杀人民之循环政治愈演愈剧，国民党实在不能再躲藏在军事行动旗帜之下了。国民党应当把党旗竖在军旗之上，把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做为革命的第一个单位之工作，把针对中国政治与经济现状之中国地位放在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估量单位上，把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军阀

之罪恶完全暴露于群众之前，积极的号召并领导广大的群众作革命运动。

根据这个，所以国民党必须改组了。

根据这个而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重新改组，所以国民党重新一次又有真实的群众势力。

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创始者，同时亦是中国革命的先觉。在每一个革命时机的步骤上，在每一个政治变动的转机上，中山先生能够依据革命的立场，以求进展。许多崇仰中山先生的人，只知道三十年来革命不衰，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为中山先生之特长，而不知在革命的观点上明于事实，明于中国祸乱之根源，而肯勇于承认，勇于抵抗，为中山先生代表中国革命运动领袖群众的唯一可贵之点。便是在这个可贵之点上，无论帝国主义者怎样恐吓，无论各地军阀怎样压迫，无论国民党内部的右派怎样勾结反革命，无论一部分的奴婢式的中国报纸怎样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效力时时造谣中伤，而千百万是受压迫图谋解放的民众，总是为革命求进展，追随于中山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之后而无所变更。

这都是国民党在过去所有的经验中从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可得出的概括结论。除反对者的言论外，我们曾见过的所谓第三者（中国民族对外国侵略与军阀压迫之解放公然还有第三者！）的言论，乃至国民党内部少数右派党员所发表的言论，尽都是离开理论与事实在数千里以外，或用骈文，或发时论，全部是模糊其辞，隔靴乱搔，丝毫与事实无关。他们之可以饶恕的是并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实际状况，除开少数人学得一点欧美资产阶级之所谓政治学或经济学依照资

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只是该变为殖民地而无须乎革命)外，大多数都是依照自己的经济生活应依附于现社会军阀及官僚阶级即为该阶级作宣传而盲从。至于国民党自己的党员之一般右派的分子则有一个不可饶恕之点，这就是：他们连中山先生的演讲录，特别是国民党改组以后的中山先生的各次演说辞，他们都不肯听或细读。

国民党过去的经验是很明显了。摆在中山先生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面前的目下紧要问题是：国民党今后怎样担负中国革命之使命。

数十年来的国民党，只有两次有真实的群众势力，表现出群众的党，成为中华民族的党。这两次时期的前一次是辛亥革命时，而第二次则是自国民党改组后，特别是中国又经过一次帝国主义指挥军阀相互屠杀而冲突而崩坏的现在时候。

辛亥革命时群众之所以聚集在推翻满清的旗帜之下；现在时候群众之所以归向是归向在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国内军阀的两个口号之下。离开当初推翻满清的旗帜没有辛亥革命；离开现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号召没有国民党之地位。中山先生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今后在中国革命之使命，就在完成这两个口号的切实革命工作，以达到独立与自由的中国之建立。

一个革命党倘若没有把四周环境看清楚，便不会懂得自己的革命工作之估计。但是在审查环境时，又每每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两种立场之不同：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其所得结论是正面的；而站在非革命而可妥协的观点上，则其所得结论

必是反面的。所以我们历来所见国民党内部之争，其实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这是根本的异点。因为有这个异点，所以引起种种事实论断与政策或战略之不同，因此而反面论者为逃避革命又枝节别出以求达到其目的，因此而一般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又得以乘机造谣中伤遂其私愿。在现在，我们于认清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之使命以后，明知道这种争持的继续与不可免避，我们遂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竭诚的指出这是国民党担负中国民族革命之先决问题。

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十分明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与军阀压迫人民之祸患，只可战斗，不可和解；应该懂得最近一次国内战争之原因与其结果；应该了解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与军阀势力之崩坏及胜利的帝国主义与军阀目前在中国所要赶紧造成的反动政治；而且更要知道，胜利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十分顾忌于中国民众的势力，要求可以代表民众势力者之妥协，以集中其胜利的局面，而建立完全的反动，黑暗，恐怖之政治。

国民党的同志现在应该排斥一切军阀之老政客与新闻记者妄用革命的名词，否认他们一切欺骗民众的口调；应该放弃对于小军阀的希望，放弃不经宣传与组织民众就可革命之期图；应该学习中山先生前次离粤以后所做的公开的宣言，或在公共的集会时或在与少数人的谈话时，抱定国民党之党纲政纲与口号，随时随地揭破帝国主义者之行为，痛击军阀之罪恶；应该找出反证以驳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对于国民党赤化、过激化、实行共产等等口调的造谣中伤。又应该根据中山先生的宣言，说明最小纲领的意义并指出中山先生所号

召的国民会议与军阀官僚预备实行专政而假定步骤的国民会议之不同点。国民党最近之目的，是要乘帝国主义者冲突与军阀内讧时，把真实的民众势力建筑起来，把未来的要重新创造的独立与自由之中国，从现在胜利的日法派帝国主义者与皖奉两系军阀手里夺了回来。

倘使国民党能担负这个使命，则是国民党自身可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可以不负民众之望而成为本身的历史的光荣，与土耳其的国民党一样。反之，若照少数人承认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变之冯玉祥行动为革命，又承认功在军阀而罪在国家的段祺瑞所谓："辛亥革命之延长"为对，则是国民党自己放弃其使命，且无异于对民众说：国民党已不是革命党！

身为国民党员而是真实的中国民族革命分子，请你们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认清方向努力起来！

原载《**政治生活**》第23期，
1924年11月30日。
署名：士炎

段祺瑞来京以前

（十一月十九日北京通信）

在最近一星期中，北方的现象是这样：

一、日本帝国主义胜利事实下之张作霖长驱入关，抢夺地盘，大赏三军，表面拥戴段祺瑞以俟时机之成熟，并同时预备武装和平会议，以对付中山之北上。

二、日本帝国主义外交胜利事实下所利用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现在已陷于可怜的状态，在天津无异于受软禁，自己的地盘还没有，一手造成的摄阁又被否认，结果只有跪在段祺瑞的膝下以保朝夕；然而，狡兔死，走狗烹，前途实不可预料。

三、英国帝国主义维持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之计划业已证实，而干涉论调在伦敦、华盛顿、巴黎之间又渐复活。伦

敦十二日中美电所谓“日本对于中国现在时局所持之态度，与列强对华必要之一致行动，有莫大之关系。”我们把他的真意翻译出来，就是：日本现在中国之胜利.列强应要注意，应有一致的行动。接着又说：“英国唯一之职务在遇必要时首先提倡列强应采一致之行动，借以保障在华之权利，此种义务英国不能规避者也。”这几句的真意很明显，用不着重译，质言之，这就是：当初在日本帝国主义胜利事实下不能不妥协，现在却要领袖群强，根据大英国历来在华之地位，应“首先提倡列强采一致之行动”了。

张作霖这次的胜利是不用说的，所以长驱入关以后的计划，便是竭力扩充地盘；这个扩充地盘的最小限度，正如北京顺天时报所代为宣布的“至少占得黄河以北”。镇威军原先的目的是要一面占领京津，一面借道灭虢，由津浦路南下以取鲁。后者见阻于段祺瑞与郑士琦，只得全力向前者发展；于是大军集中于沧州，沿沧石路连营以达长辛店，更令骑炮兵由杨村进驻以达通州。此种展布明明为对北京采取大包围之形势，而令冯玉祥国民军傀然不可以终日。他方面亦可说这是胡帅等候孙中山北上特意展陈于善后会议席前之武装的和平！李景林既已取得直隶；张宗昌或督直或督鲁；许兰州都统热河；此外各将领之要求地盘“其骄矜之气，需索之急，殊苦无法应付。”奉军既完全占有天津，前此捷足先登之冯胡国民军只得忍痛退去以避冲突。奉军在天津已是唯一的主人，京奉路完全在握。北京奉军司令部已打扫旧门庭，张宗昌迟早便来北京。冯玉祥既软禁在津，北京所谓国民军总司令部已是蛇无头不能行，摄政内阁中的几个主角 见 大 事 已

去，亟欲舍冯而就段，然段固豢有安福新旧交通系之全付班子，岂容冯派之人插足乎？

当张作霖的大军还未到天津，冯玉祥还未去迎段的时候，北京情形与现在成为两样。质言之，那时候的北京情形不免令段祺瑞烦恼并使帝国主义者焦躁。所以十一月九日顺天时报中有个标题叫做“二次政潮渐在酝酿中”，内容是说：“据某方面消息云，冯玉祥刻因维持北京治安及其他关系上，已决定凡其他军队，无论何人统率，一律不使之入京，亟拟先促合肥来京，敬聆其收拾时局之政见，以便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但合肥方面，刻对于张作霖侧，较诸冯玉祥侧尤为注重，以故冯氏及现阁对于段氏之态度渐变，且与行将来京之孙中山氏力求接近，并拟从而拥戴之。是以今后北京政局，恐将发生二大潮流，其一即孙文冯玉祥胡景翼并附和之民党等，此团体颇带有过激派的色彩，其一即段祺瑞张作霖并附和之研究系等政党，此团体较诸前者其主张迥异，盖拟以保守的主义从事收拾时局云”。顺天时报之所言当然不为无因，冯孙结合以抗段张的形势若果成功，于中国目前政治情形未始不能开一别种局面。然而这种趋势自奉张率大军莅津对冯玉祥王承斌大肆其下马威之后业已大受打击，冯派势力是否完全被排出京，在识者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冯去津后对于委员制及尊重孙中山等主张已一字不敢再提；而段祺瑞之所谓俟中山北上者，闻骨子里不过单就所谓“统一西南”问题有所商榷。据知内幕者言，段张皆不愿中山此时北上；最近张学良代表乃父对路透记者谈话云：“孙文来时只希望对统一问题有所供献；但家父之意自以拥段为主，盖信惟段可以完成统

一之业也”。这些都足以显明他们（段张）将来与中山的关系，及他们企图以北洋派统一中国的野心仍然继续存在，与曹吴没有两样。

奉张既在京津之间展布优势，段祺瑞在长江方面的暗算又有了几分成就，而日本帝国主义目下在中国简单明了的政策，就是扶助段张趁快成功。故闻段祺瑞进京之期业已内定至迟也不会延过本月二十四日；见机而作，不仅段祺瑞有此聪明，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更有此聪明。日本满腹希望段张统治中国之局面早日完成，免得别个帝国主义倡言干涉，又参加进来，这是业已表明的事实，现在请看东京十四日电之朝日新闻的社论："对于最近列强对华态度，所谓不干涉主义者，以后是否长久继续，颇属疑问。动乱如仍然继续（即段张统治之局面如不早成）则列国贸易，将受影响，干涉论之发生自有相当之根据。故目下立于势力圈内之中国政治家，宜宽量以就大同，先行树立巩固政府，夫然后彼等热望阻止列国之干涉者，自不期然而然云”。这几句话在目下可以说是对于段祺瑞张作霖指示的方略，同时也是为的要堵阻路透电所谓“英国将引导列强为先锋之干涉”；因为坐令英美的干涉政策实现，那末日本在这次战争与政变中的经营无异是替他人作嫁衣裳。

然则段祺瑞来京以后将成何种局面呢？段在津深不满意于黄阁之举动，质言之即深不满意于对待清室之处置及王正廷修订不平等条约之声明，那末，他（段）来京以后一定大反黄阁之所为，——对外声明遵守条约，对内首先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复次便是一天一天地暴露北洋正统狄克推多的真面

目。所以最近将来的段政府不仅不是进步的，必然是更反动的，不仅是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是适合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的工具。谓余不信，请看他来京以后的举动。

原载《响导周报》第93期，
1924年12月3日。
署名：罗敬

段祺瑞来京以后

（十二月四日北京通信）

段祺瑞来京已十日了。在此十日中，北京政象之变幻不可谓不丰富，兹综其大要言之：第一，冯派摄阁完全被摈而消灭，冯玉祥辞职赴西山；第二，段祺瑞专政之形式是以一身兼总统总理之职权，滥窃革命二字组织安福系交通系的私人政府；第三，推翻摄阁对待清室之处置，纵容溥仪逃赴日使馆；第四，张作霖不满意于段对付齐吴之态度，突然出京。第一与第四是表现胜利军阀之间的冲突；第二与第三是表现这次牺牲若干万生命财产的反直战争，结果不过为段祺瑞个人建立一种反动自私的狄克推多！

段祺瑞一面实行狄克推多，别面对于直系余孽及各色各派又很鬼巧的行其拉拢联络的政策，而以对外为更甚，如将

来京之时表示彼非为亲日派，彼对外交一律平等（对外报记者谈话），来京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条约，以博英美之好感，即对于美国提出的无线电案虽明知其与他的后台老板日本利益绝不相容（这次江浙战争的真正起源便是由于日美争在上海建设无线电台，故美拚命助齐而日拚命助卢），亦不予以拒绝。说者以为段氏这种对外对内的态度系近年反省之觉悟，其实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巩固这次胜利的觉悟。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胜利以后，他所觉到的：第一是安福系过去的声名太坏，此次段氏上台必须拉拢各色各派以敷衍门面；第二是长江流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若对齐吴用兵势必惹起英日的严厉冲突，结果于日反为不利；第三是张作霖过去的声名太坏，此时宜令其善保战胜结果，以拥段为职志。日本这种态度，吾人于北京顺天时报（日本机关报）每日的社论中都可发见。顺天时报忠告段氏勿蹈从前之失，纵用安福系，及忠告安福此次勿滥攫权位以累段氏之议论，日不绝书。执政内阁成立后，顺天时报竟以不能完全网罗各派人材组织联立政府为遗憾（见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对于政敌曹吴等应持和平宽大态度议论，顺天时报真不愧为“蔼然仁者之言”；至其对于张作霖入京时的忠告：“……倘张氏表示态度而与普通军阀无所异者即为国民之怨府，万一结果有如此者则张氏开战理由不独为之没却，亦且非为援助段氏，反而有累于段氏矣”。又说：“今幸此次战役之中途有冯玉祥之运动段祺瑞之出山，奉直战之形式为之破坏，张氏宜利用此情势致力收束此役结果……张氏据战胜之余威而善处此之时局，其困难可想而知……此际吾人之于张氏希望彼为大勇大

义大仁之人杰，苟非有彻底最后之觉悟殊难打破此难关，吾人前曾主张，不可重视兵力，然吾人之为此说，非在忌夫兵力，亦非在不重视兵权，惟在深戒乎妄念，而依兵力成就任何不公正之横暴耳”。这更不啻是日本老板对于翳大帅的耳提面命。请再引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京报所揭载之消息，观此则对于日本现在政策之索隐可以思过半矣：

“就我国全局言之，某甲国（记者按系指日本）乃有一种具体的理想者，其内容为打倒目前暂已失败之某氏（吴佩孚），拥出目前业已得意之某氏（段祺瑞）；然对某某疆吏（指张作霖）则但愿其居原有之地盘，勿再扩张至于中部，以保与某丙国（指英国）在长江方面之协调焉。今次山东之金瓯无缺，长江之暂获和平，乃预防某丙国之出而说话者。至于某乙国（指美国）与某丙国之对吴佩孚，劝其退却，送之南行，吴佩孚在某军舰上，虽以无线电谢绝彼等之护送，但某乙国武官则谓我乃奉政府命令者，其在烟台之以陆战队登陆，为吴尽力预备煤面等等需要之物，送至南行之中途，又有某丙国之军舰亦从而加入焉，亦可见其针锋相对，不欲吴佩孚之完全失败，亦即不欲某甲国之太出风头，免致各国在华之失其协调耳。是故执政政府成立以后各国之态度，非对段祺瑞之好恶问题，亦非纯对我国政府之好恶问题尚有各国间在华地位之相互关系焉，……段氏所以轻车简从，飘然入都，一面表示外交平等，一面表示尊重条约，其殆已觉得此种空气，乃出此提前启程适合身分之行动乎，然此不过表面文章而已”。

欲拉拢各色各派为段祺瑞统一中国之资，则其鬼计之所施不得不及声势日大之革命领袖孙中山。段张于胜利之初虽

有摒孙之趋向，但最近又不得不用拉拢之策。此策之作用一面在破孙冯之联合；一面在使孙弃其对外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之主张。顺天报著论，比孙段为中国之双璧，希望二人合作同负改造中国之重任，但以孙抛弃其“过激主义”为条件，——所谓过激主义便是指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种种主张；顺天时报再三再四的忠告孙中山曰：“中国之忧患在内而不在于外，若果能竭力于内治，则国力充实，外侮外患自然消灭于无形”（见十一月二十九日社论），其用意可谓良妙矣！

中山北来，东交民巷帝国主义者疑惧汹汹，此其故由于年来国民革命之声势增加者半，由于卖党贼右派首领冯自由等之告密宣传者亦半，现在东交民巷中居然盛传中山左右为什么俄人鲍罗庭等所包围，与右派平日在报纸上之所宣传若合符节。少数不识大义的份子，盲从右派首领冯自由等或明或暗反对在北京为反帝国主义之宣传，反对广散中山离粤宣言，他们不知不觉中为外人尽了走卒的作用做了中山宣言的叛徒，反而诬构忠于中山宣言的左派为什么共产派破坏孙段合作的阴谋，不亦可笑而大可哀乎？！现在国民党右派首领如冯自由完全为帝国主义的侦探，徐清和完全为军阀的走狗，他最近有个通电反对张继彭养光等主持的国会非常会议便是明证。我希望自爱的青年党员千万不要再上他们的当，遗国人之羞笑也！

原载《响导周报》第94期，

1924年12月10日。

署名：罗敬

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之压迫

国内革命的民众，社会各团体的分子，国民党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于中山先生的人，现在拥护中山先生的唯一方法，不仅在欢迎的表示，也不仅在疾病的慰问，而在怎样准对中山先生现时所受压迫与威吓之主动力帝国主义者下总攻击。

中山先生此次离粤北上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国民会议为号召，已博得全国民众之广大的同情。但是我国祸乱之主人翁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凡是全国民众所要求的，同时正是这些帝国主义者所坚持拒绝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痛恨中山先生代表民众有所要求，害怕历来持以奴役管理中国人民之条约一旦取消，因此对于中山先生实行压迫。他们压迫的表示明

明准对着民众的意向而故意发露。他们看轻了我国数万万的民众，随意用租界上兵士手中的手枪，外海内河的兵舰，以及机关报纸上的言论，施行威吓与镇压。

中山先生未离粤前，上海与北京的外国领事与公使团即讨论是否允许中山入上海租界。英国帝国主义的字林西报说："上海无需乎孙，应阻止其登岸，此非挟有私意，实因孙氏毕生精力，皆专注于引起中国骚乱之目的，故为我人绝对不欲意之人。"中山先生离粤以后，这般外国帝国主义者一面在中山所发表的宣言之下发抖，一面利用"赤化"、"过激化"、"倾向共产"等等口词造谣中伤，希图减少民众对于中山与国民党之信仰，南至香港，北至京津，中在上海，数十种外国报纸励行了一阵反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宣传。

中山先生到上海后，一般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对于中山的欢迎，并且含带嬉笑怒骂，大放厥词。美国帝国主义的大陆说："留他在上海过冬无论如何将是我们的错误"，"他的态度竟敢说中国现在已不是殖民地"，"他的宣言是为给中国下层阶级一种印象"。而且又已经正式表示出对于中国人的侮辱说："关于要求废除租界和条约这一层，所困难的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政治的统一，四万万的中国人住在亚洲之广大的地面上现在还不能组织起来在内部自己管理。"

中山先生到天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更甚了。中国自己土地的天津码头上之欢迎，还比不上日本境土神户码头上中日民众欢送之盛。天津的欢迎群众在租界上游行不得自由；国民党发传单的同志，被法捕房拘捕；国民饭店的宴会，中山被法捕房禁止出席，以后出席者还只准有欢迎词与

答辞，不准有演说，大舞台的演讲未得举行；国民党的直隶省党部与天津市党部被法捕房查抄。所有这种种事实，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山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之压迫与威吓。法国帝国主义者这种威吓之目的与中山在粤时英国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态度一样，他们十分恐惧中国民众对于其革命领袖之拥护，所以直接施行压迫而无所顾忌。

国民记着：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待我们国民革命领袖的态度。国民更要认清：中山先生这次离粤北上，大招帝国主义者之忌刻，英美固不"谅解"，日法亦极尽恐吓之手段。中山先生原定六日由广州起程而直至十四日才能起程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阻碍。中山先生到沪到津的压迫是由法国帝国主义者执行。法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在国内提起拥护段政府，鼓吹"道威斯计划"，一方面在中国高唱维持各国条约以为承认段政府之交换条件。日本驻华公使是极尽外交手段巧妙之能事的，当初极力表示各国对段政府不要态度强硬，直到各国间的意见酝酿成熟以后，才公同显然提出承认的交换条件。这个交换条件是准对着中山先生之宣言与国民党之主张而进攻的。国民记着：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革命领袖的言论行动是针锋相对而加恐吓，对于我们民众的表示与运动则直接施行压迫。

国民党的同志此时更要觉悟：我们的领袖此次北上的重大使命用在召集国民会议，而目前紧急的工作尤在民众的宣传，党的组织之扩张。但现在因受帝国主义之压迫，这种工作亦感受困难了。中山先生北来消息传布后，北方民众仰望若渴，然而现在竟不得见中山先生之面。中山先生自己是习惯

于与群众之接近的，但目下北方的群众引首仰望于外，而中山先生深居于天津日租界以内。国民党的同志此时绝不当畏缩不前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软化。北京欢迎中山先生的民众与各团体，应该速促中山先生到北京，以与首都之民众相见。北京是中国的京都，是中山先生手创革命后共和政体政府之所在地，中山先生是主人之一。中山先生应该速到北京，登高一呼而全国可以响应。中山先生现在是全国尊重的革命领袖，而不是在租界亡命时期的人物。国民党同志与全中国革命民众现在绝不要躲避对于帝国主义者之战斗。希图免避这个战斗或只注意于军阀间的问题算是国民党政策的错误。因为我们相信国民党之复兴是建筑于民众中之宣传与组织的广大的效果，国民党在北方绝不能走在南方的旧路。起来，国民党的同志，拥护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众，我们高呼：

打倒压迫中山的外国帝国主义者！

原载《政治生活》第24期，

1924年12月7日。

署名：士炎

杂感："到群众中去"

摆在目前的政治问题明明只有两个方向：（一）倒转来希望军阀的统治有一个较好的局面，倒转来走向封建社会制度的旧路；（二）急起直追以要求民族主义的实现，要求一个外而抵抗列强内而扑灭一切封建余孽之独立自由的中国。因此，我们曾经大声疾呼：人民们现在要的是国民会议呢？还是军阀的独裁政治？我们相信除最少数的官僚阶级外，大多数的人民是走的第二个方向。大多数的人民没有走第一个方向之机会，因为实际政治教训给与民众对军阀武人官僚绝望。而军阀之本身，确已到崩溃的时代，也绝没有所谓较好的局面建立之可能。因此，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主张要怎样才实现，谁能够代表这种趋向而奋斗呢？

肯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惟有民众在社会各阶层中团结组织起而自行战斗才能实现，而代表这种趋向的适宜人物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直到现在还没有广大的群众明显的聚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虽然现在占有较多数的同情民众在社会上有种种表现，但是国民党自己并不有许多工作可以吸收且增加人民的同情。

时势给与国民党的机会本不少，而国民党常常自己躲避接近民众的工作。因此，下面的口号在国民党现在是最切用的：

到群中去！

原载《政治生活》第25期，

1924年12月14日。

署名：乐

杂感：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造谣

最近造谣的事很多，最可注意的谣言之一有如说孙中山主张共产，在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的机关报纸上，每天都登载一段或数段。其中最有趣味的还是，有人曾说（尚未见于报纸）：段祺瑞派人带了许多所谓“共产党的传单”送与张作霖阅看，除另有主要用意外，实际也引起所谓的戒备。。这件有趣味的事之本身或者并不是一种谣言而是事实，但这是因谣言而引起的狡猾手段的一种事实则十分明显。没有好久以前，有一般无政府党人发了一些什么“歌”，在报纸上登载时也说这是共产党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正报》还在该报上大惊失措的叫嚣了一番。据我们所知，中国共产党除于《响导周报》第九十二期有鲜明之主张，对时局有明显之

分析，为人民有具体的要求之提出外，并没有什么传单。中国共产党发表这次主张，郑重署名，与历来发表宣言或主张时一样，因为它已引导中国革命运动数年，与群众接触很久，无所用其隐讳，而这次主张之内容正是现在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字字句句都合乎实际，且全部主张中，并不曾见有共产字样。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既有心奴隶中国的大多数人民呢，什么事都可以作，何只造谣？

"过激"两个字的幸运很好，当初曾有一个时期加在胡适博士身上的，到近来则更是广义的运用。帝国主义者训令军阀官僚与糊涂的新闻记者说：孙逸仙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布尔塞维克"！于是大家都一呼百诺的回应而由日本人主笔翻译说：这是过激主义。既然如此，中国平民的大多数（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都是过激派，也用不着辩了。我们深知道将来的事实是：占大多数人口之中国平民（他们所谓的过激派）从此后正要叫你们——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他种种口号之下发起抖来！

原载《政治生活》第25期，
1924年12月14日。

署名：乐

国民革命与武力

谁也没胆量敢于说：革命不需要武力。

是真实的革命战略家，都必然主张：革命需要暴动，需要武装的暴动。革命的本质在物的方面是生产力的变动，新生产关系与旧生产关系之冲突；在人的方面是新阶级与旧阶级之冲突。生产关系之突变与阶级间之争斗，免不掉有一番激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革命。为革命的效力及成功起见，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暴动，武装的暴动，而且这个暴动的本身是一种艺术。

武装的暴动自然算得一种武力。然而这个武力并不是另外一件东西，并不是在革命群众之外的一件东西；这个武力的本身，就是革命的群众。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是准对着宗主国的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及本国统治阶级之压迫而施行的民众暴动。这个暴动自然要武装，成为武力。惟武力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觉悟的民众组织而成。

因为阶级争斗中的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之反抗，绝不能散漫的，无组织的，就可以得胜利；胜利之所以由战斗产生出来，正因为这个战斗是出自革命群众之本身。因此，在同一理由上我们可以明了：武力并不是另外一件东西；武力的本身就是革命群众行动之一。

使武力站在民众以外，这是许多流产的革命在历史上曾经昭示我们的经验。中国的国民党历来也有这种错误。孙中山先生年来所屡次痛斥的“革命军兴而革命党消”之说，便是指责当初一般只知有武力不知有群众的错误倾向。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与以后，中山先生自己以及国民党中的左派所痛戒的纯粹军事行动政策，便是鉴于武力与民众之分歧而力求矫正。“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之观念打倒”——这都是中山先生诰诫党员之名言。所谓党员战胜的意义就是：党是群众的党；党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有势力；党员是群众奋斗的先驱；党员领导群众；党获得群众。

依这样方法而形成的党，才是真正的战斗的党；从这样的党所组织之群众的武力，才是胜利的武力。

我们甚表同情于中山先生这次离粤北上的宣言；我们尤其表同情的是中山先生所号召之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同时，我们也很细心的读宣言中之一段：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

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从这一段里，国民党目前对于武力之态度是很明显了。然而我们盼望读者不应误会，把原意误加解释。我们以为愿意听说的武力，最初本于两种事实之分析：（一）纯粹的武力在目前已表现崩溃，便是帝国主义所结合的武力亦因帝国主义者间与军阀间之各自的冲突，已表现不能支持；（二）革命群众自身的武力尚未产生，过去的革命武力都是雇用或借用的，不特不能图谋革命，捍卫革命，且时至于倒戈而成反革命。这两种事实使中山先生受了好几次的教训，使国民党受了好几次打击，耽误了民众中的工作至于数年。到现在，国民革命固然有一个新时代；但这种新时代的产生乃基于客观环境条件之事实。

根据这种事实而划分一个新时代是可以的；根据这种事实而反走旧路，则是不可以的。因此而上面所引的宣言中之一段，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

在本意的主要点，武力与国民之结合是方法不是目的；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要看客观事实条件所给与之机会，而国民革命之真实武力仍然是革命群众经过教育受过训练后之本身武力。革命需要这样的武力，所以与帝国主义结合之武力当首

先扑灭。在现状下，依照帝国主义者间与军阀间各自因冲突而崩溃之过程，扑灭这种武力并不是不可能。目前主要的与中心的问题是：怎样使武力出自觉悟的群众，不使武力成为临时利益之结合，或为雇用，或为利用。

革命军的产生是产生于急起战斗的革命群众之中，而组织于敌人枪炮火光之下。胜利是在每一个革命军掌握之中，只看这个革命军是不是觉悟的组织。忠实的革命者，绝不当忽略这个问题。

原载《政治生活》第25期，
1924年12月14日。
署名：士炎

三道命令

在我们的意见，从袁世凯时代算起直到现在，任何的命令都成问题，何争于一道两道或三道？然而在最近一周内关于所谓三道命令者反闹了一阵笑话，末了是并没有命令，其原因有的说是由于议员反对之影响，有的说是外交上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不表示意见所以不敢妄发。一般人的批评呢，大多数都对于（一）解散国会；（二）宪法无效两件表示同情，惟有对（三）约法无效，则引起疑问。关于这个，在我们认为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不讨论之立场是：现在事事都一样，只有“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先生的话）一件事为可念。我们以为把这件问题看得太真的，多半站错了立场；他们不是承认段祺瑞所说的这次政变为所谓“辛亥革命之延

长”，就是附和章行严口口声声所自夸的“革命行为”，“革命手段”，咳！真正的革命党人，倘若把这次北京的小小政变认为革命，把现在统治阶级“完全改革”“与民更始”种种欺骗民众的口调拿来传说，那真是自己宣布革命的死刑，从此后就贴服听受胜利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指挥，什么话也不用谈，什么事也不用作。倘若象这样是不愿意的，那便对于什么法统也没有争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现在革命党的策略，与其和统治阶级讲法统，不如和民众谈革命，与其和当局争约法，不如和当局争国民会议。

原载《政治生活》第26期，
1924年12月21日。
署名：乐生

金佛郎案

谈金佛郎案之最近情形者，往往容易陷于下列诸种的错误：（一）以为金佛郎案是现在应该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的；（二）不仔细考虑这次提起本案之主动者；（三）不懂得法国的激进派内阁仍然是帝国主义派。关于头一点，本来很明了；金佛郎案历来是所谓反直系攻击直系之武器，现在公然谈解决，明明是宣布要自倒，这是执政府应有的"自知之明"；至于民众呢，绝不要以为现在的时机有配代表人民解决此案之政府，且当知在此日法帝国主义胜利事实下解决此案便是等于愿意屈服。其次，此案提出于此时机之主动者，现在已甚明显；这正是胜利的帝国主义者解决悬案的机会，我们决不能自投罗网。最后，我们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界之心理推测起来，很耽心有人以为法国激进派的赫里欧内阁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有急于求解决的倾向。如内阁所谓提交国际法庭之议，或竟为大家所赞许。我们愿警告大众：法国现内阁的对殖民地政策仍是帝国主义派的，赫里欧正是法国商业资产阶级之首领，并不是社会党，至于国际法庭，那更是西欧资产阶级的御用机关，对于半殖民地中国之待遇，绝对没有好结果的。

原载《政治生活》第26期，
1924年12月21日
署名：乐生

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其实际

一

中国人现在需要一个德谟克拉西的人民会议。这个德谟克拉西会议必须由人民的团体自己组织而成，经过领导民众运动者之号召。会议的目的是在解决目前之时局，建立一种摆脱帝国主义者羁绊与军阀的操纵之独立中国的政治。这个会议为我国历史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亦找不出相同的形式来，其原因是我国现在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所形成之半殖民地地位，非历史上任何事实所可比拟。而且这种会议的运动，在现时尤有两种特质：第一，这是革命的；我国民众现在两重压迫之下，绝离不开革命之立场；其次，这是给与大多数人民做合法的公开的政治运动之机会。

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会议，自然就指的是目下

所说的国民会议，而在我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实际状况上，现在需要社会各阶级的合作政治运动，所以国民会议之内容与其目的应是德谟克拉西的，无容讳言。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明明看出大多数的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倒向军阀与帝国主义听其统治，易言之即倒向军阀仍维持封建制度之现状；（二）或是看清了现状而急起直追以顺应民主主义的潮流，企图独立与民治的中国之建立。我们一方面固然痛恨军阀之统治竭力遏止人民的政治运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告诉民众以什么是民众的权力：民众的运动进了一步，统治者的嚣张就会退一步。在现时的政局状况下，很明显的是民众政治奋斗之机会，广大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必须依照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而在这个时局中战斗。

二

国民会议之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当认定国民会议之本身仍然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实际的政治状况中，同时又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民众政治运动，其目的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广大的觉响；而口号的本身民众化之结果，成为民众自己的呼声，民众自己的政治势力。我国大多数人民消极顺守于封建循环政治之下，到现在亟需有民众自己的政治要求，而国民会议是解答这个要求的目前适宜方案。

把国民会议当做国民革命之口号，是由于目下国民革命

运动有一个发展可能的新局面，而号召革命运动者必须提出民众发展之具体的方法。这个新局面是客观的，其发展可能性是建筑于两种客观事实上：（一）帝国主义者由协同而至于冲突，由冲突而至于分立；（二）军阀之势力由对抗而至于争斗，由争斗而至于分化，由分化而至于崩溃。但这个新局面固有引导国民革命运动进展以致成功的可能，同时也有因基础民众势力不备，战斗不力，统治阶级压迫或反革命与妥协倾向发展而致失败的危险。因此而我们向民众提出政治之具体方案，使民众由历来躲避在两重压迫下的地位而勇于站在起而过问政治的地位，是把国民会议当作口号之最近目的。这个目的惟有革命党才配采用，靠武力掌握政权者为要借招牌撑门面而以制造拥戴机关为最后手续的，不仅不配采用，且与国民会议之真义正站在反对方面。因此而在现时以国民会议为对民众下动员令之时机中，倘若不辨析国民会议之真义而只笼统以解决时局问题作宣传者，其结果是只替统治阶级制造民意，陷于战略上的错误。

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是综合许多事实所表现的国际之痕迹。这些痕迹本没有一定的形式，特别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宰杀场里，极尽变动之能事，由帝国主义者自己依照时机，随意运用。但在行动上的表现，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不是属于进攻之方略的，只因进攻有迟缓之不同而外表遂有客观的积极或消极之异。列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现在已经过三种形式，同时也就是经过三个时期，而现在是在第三个时期中。这三个时期就是：瓜分、共管、分立。分立形式之所以成就便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间自身之冲突，而在连续的三个时

期中之所可以分划的是由于帝国主义者政策之表现，实际上他们——帝国主义者——无一日不冲突，无一时不相互矛盾，而造成最后的目下之形势。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必须有冲突呢？为什么有最后的目下之形势呢？客观的物象事实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发达与资本主义之发达一样，而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峰之结果；按照资本主义之必然的程序是由发达而致于矛盾，而致于崩溃，而自掘其坟墓；帝国主义亦因发达（强暴侵略殖民地）而致于冲突，由冲突而致于分立，因分立而继续冲突，以致于死！谁能叫它死，把它扑灭呢？这就是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众之革命。

中国的农业经济养成了封建军阀阶级之循环统治，并且使这个阶级逐渐壮大，同时亦逐表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之复杂。这种复杂状况在现世界上是无可比拟，从完全奴役的非洲美洲黑种民族之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式到帝国主义用进步方法统治的印度和菲律滨，都没有与中国相同的。近东诸国虽有较为近似的国情，但其内国状况亦不如中国之复杂。然而便是在这里，帝国主义之侵略发现了它的矛盾点。这个矛盾点由两方面看出，我们若以辩证的形式说起来就是：农业经济之破产是必然的，但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是矛盾的；另一方面，扶助军阀以建立统治是必然的，但扶助之利益本身因有冲突而是矛盾的。现代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即建筑在这种客观的矛盾物象与人为事实上。

我们之所谓国民革命的新局面与适合于此新局面的具体方案，便是从上面所说的客观矛盾事实辩证出来。在资产阶

级的学者或小资产阶级的玄想家，也许要否认此论，以为我们没有附和他们的“内政不修，不足言御外侮”之主张，以为我们“太看重物象经济”或“妄用哲学”，其实这都是他们的恐怖之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社会政治见解，没有一件不从客观的事实辩证出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革命战略，从没有站在抽象的毫无事势基础之空论上。

三

以国民会议作解决时局之方案而最早向中国民众提出的是谁呢？这就是当去年北京政变(曹锟使冯玉祥赶走黎元洪)而贿选成功后曾发表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时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屡次向全国被压迫民众提出政治奋斗之方法与出路，而这次复响应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号召，并提出了十三条具体的方案（见《响导》第九十二期及本报第二十四期）来，这些条之中所包含的，除开帝国主义者与其走卒军阀官僚外，没有人应该能够反对一个字。我们以为：国民会议此后之实际问题，就是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九种社会阶层之人民团体（尚应加妇女界与新闻界）怎样按照这十三条要一字不让而作奋斗的问题。

国民会议既是各阶级合作的解决国是之一种形式，所以各阶级都有其利益之实际。我们把这些实际正确地指示出来是必要的。离开了这些实际问题，各阶级便会走错参加国民会议的希望之路。

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本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生力军，按照它的最后目的，一个国民会议固然不足以满其要求。然而中国工人受压迫的原动力是出自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力量的薄弱与阶级势力之不雄厚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历来被阻碍发展而工人之经济生活形式尚不集中。其次工人失业的团结自由现在所以没有，是由现政治之不容许，许多实例很足以证明，而现在实有积极的参加各阶级民主主义奋斗之必要。因此而国民会议能给与工人阶级的：第一是政治发展之机会；第二是经济的奋斗与团结罢工自由及劳动保护与教育等的明显的要求之取得，使工人阶级有公开的战斗地位，摆脱半殖民地被压迫在最低层之痛苦。

在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中，农业经济破产之根本原因是帝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现在生活困苦灾荒频仍之现象乃由于中国混乱的政局所赐与。农民在中国各社会阶层所占的地位是远于政治而忍于压迫，但现在时局所给与农民之机会，正是可以发展的关键。在农民中，有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如：赋税及一切杂税，土地与佃租，农业品价格，兵灾匪乱，农民的教育，自卫的组织……等，都是很迫切的要求。现在国民会议口号下，以占大多数人口之农民，正有一个可以进展接近于政治要求之良好机会。

在工农阶级之外，于社会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要算工商业阶级了。依中国近数十年的工商业发达史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说：惟有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才能得真正的工商业之发达。目前为国民会议口号之一的收回海关，便是工商业阶级切身利害之所在。工商业阶级此时如有觉悟进而作政治的要

求，其结果是占在最有利益的地位。本来在民权中市民阶级之受剥削，是由于封建政治及其依托的帝国主义之压迫所造成，反抗这个压迫的主要原动力，在工商业阶级本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工商业阶级本已有团结及合法的社会地位，惟在政治下受压迫与各阶级同，而现在正是解除这些困难，且力求进展之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必是与各阶级提携的，工商业阶级单独也得不到。

除此以外，在社会经济上没有形成为整个阶级的，还有知识界、兵士的队伍，以及非社会职业结合而为政治性之普遍集合，或地方集合的团体等，处于目前政局中，各有其政治利益之必须的要求。知识界之主要的失业问题与青年求学问题，依照过去的事实证明，没有人不承认与政治现象切肤相关。广义的说起来，社会各阶层中知识界之内容异常复杂；但依职业论，则各自有其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特别是教育界，历来被认为有重要作用之分子，其在目前的责任是不可放弃的。半殖民地的知识界，依照经济状况所产生之文化程度，还应该是革命性较重之社会成分，更按中国过去现象引证起来，也合于事实。所以在国民会议之途径上知识界占了三种的集合。同样的情势在社会其他各阶层中，莫不有密接于国民会议之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之需要。从游民土匪的问题到遍满全国的职业兵士之生计问题，都共同追起国是解决中之一部分或几部分的需要。

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未来国民会议的希望路途上，都各自有其实际的立场。国民会议之所以为各阶级之合作形式，是产生于这些实际立场之上的。然而民众不自动，不自要求，

不自认国民会议为根据经济与政治现状解决时局之适当方式，其结果不仅是各社会阶层所受之压迫是继续的，且将至于国家沦灭，民族堕亡！

四

我们始终所不当忘记的是，国民会议之本身是一种革命的口号。因为：（一）在未成功以前也可以说，姑无论成功与否，这是号召民众之真切的标语；（二）这个标语用于民众，也发生于民众之号召者，绝不是御制的会议；即使统治阶级有意弄成欺骗民众之工具，而民众应当从早鉴别，以实力为后面。因此而关于国民会议组织问题之为引起疑问或纠纷者，全隔于一种自缚的错误。

按照中山先生所号召的国民会议之组织法，其可能性是摆在民众面前的，只看民众能否使用这种可能性。中山先生与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固然可有一个建国的程序提在民众之前，然而民众不自动，任何的程序都归于无用。关于国民会议组织问题，现在似乎已有几种观念：头一种是思想一些片面的事实，或根据一些抄袭欧美资产阶级之法理观念，来胡乱猜疑评论的；第二种则是发源于一种懒惰的心理（这种情形在国民党内部也有），或者也可以说并不懂得，因而要想免避纠纷，不肯讨论。实际上则是：组织上之纠纷从何而来？大多数人民还没有组织，又何从说到纠纷？国民会议是今日或明日就可以成功的么？中山的宣言明明说国民会议必有其预备会议，而且这个预备会议须赶快召集。中国共产党更

主张由此预备会议产生临时国民政府，号召全国的唯一政府，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重招而成立，并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势力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赞成国民会议者目下所应先赞成的就是这个预备会议；要讨论国民会议组织问题者，请先讨论预备会议之组织并怎样赶快召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山的宣言已有其原则与具体方案。这些原则与方案已得民众之谅解与接受，而此后落到实际问题上，只是如何去补充与定成。

同时在民众方面的谅解与接受已有一个极明显的反证，这个反证就是大家对于所谓善后会议之不谅解与不接受。但善后会议毕竟因此而不能成功么？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上固可以反对善后会议，也可以说必须反对善后会议才能有主张预备会议之立场。但我们应该真实努力的是预备会议之正面宣传与其预备。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可以判断善后会议之能否成功，与判断国内军阀在目前是否有完好统一政治局面之可能一样。大多数的被压迫民众应该不要怀疑；从袁世凯到吴佩孚，所有的军阀政治都没有统一和平之可能；从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帝国主义者之内部时时实现冲突，瓜分不行共管不成而现在分裂中国之形式亦尚未完全成就；逼到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之目前的问题，只是如何组织民众队伍，如何发展民众势力，如何战斗。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在不怀疑之后所应记识的标语是：胜利产生在我们战斗以后！

原载《政治生活》第26期，

1924年12月21日。

署名：士炎

善后会议悍然召集

谁能够说军阀是能顺从民意的？谁能够敢于相信：军阀一朝权在手，还不把令来行？当国民会议怒潮澎湃之时，当全国民众反对军阀召集任何会议之时，而善后会议偏悍然召集了。统治阶级要与民众宣战，谁不知道这是不免的事？但我们从此到要看一看，二月一日是否可以开会？那四张戏报（四项参加会议人物的名单）是否能一齐粉墨登场，同歌执政之德，永颂太平之年？我们深相信：许世英到天津去了几趟，一定在中山先生病榻之前捣了许多鬼。所以现在弄得国民党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又相信：善后会议能否成功之可以预判，也正如对胜利的军阀能否有完好统治局面之可以预判一样。但是我们主张可以领导民众的国民党，在此时绝不要

隐藏面目，躲避引导民众的工作。民众的趋向到了那里，国民党的政策就要做到那里。中山秘书处之事业很小，国民党的党的工作责任甚大。国民党此时亦不必以自己的参加与否为讨论的前提而反引出迟疑之困难，国民党的主要政策应该是一步一步地紧紧密接于民众，多做自己的工作，多作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预备，一直到相当的时机，假使国民党必须到善后会议席上才有利于民众，则国民党代表民众在会场中有伟大的势力，假使不必参加而有利，则国民党领导民众在会场四围下总攻击。

原载《政治生活》第27期，

1925年1月11日。

署名：乐生

东南再战不可免

东南形势之紧张已是事实了。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可免的东南再战有两条路线：（一）胜利军阀势力与非反势力之战；（二）反动势力与反革命联合骚扰南部之战。前者是很明显的，孙传芳要赶走张允明，管你是不是北京政府所维持的，非反攻不可。后者则是孙传芳与陈炯明之联合，将来又要展开一种南方形势之新局面，也是可能的事。在现在，人民应该可以明白了：卢永祥南下是宣抚呢，还是干别的？宣抚使和巡阅使或讨伐使有分别没有？现在的政府是要善后的，我们的意思却以为现政府早已揭破不能善后之假面具，用不着自己讳言。民众对于这些循环变局，鬼怪把戏，一律明白就是了，将来再说吧！

原载《政治生活》第27期，

1925年1月11日。

署名：乐生

外交团受鞭笞

湖南人反对基督教之结果，引起一般基督教宣传者之主人的恐慌，代表这些主人的帝国主义机关报纸——上海《字林西报》——于是疾声厉色的鞭笞了一阵外交团。他们“质问外交团所司何事，现时抢掠劫军及种种违约之事，已足表明中国政治之趋向，再不理会，势必庚子乱事，突再爆发”。他们又说：“华人排外运动，即在进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又说：“此种排外行为，实为中国当局将自身应受之怨，极力转移于外人之结果”。这几句话里包含：（一）受雇用于帝国主义者的外国官僚，对于主人没有事事尽心应该挨骂；（二）中国的当局没有尽心也应该挨骂，而且他们明明说这也是“中国当局自身应受之怨”。外国帝国主义者

现在是不免恐慌的，一恐慌就着急了，于是情态毕露，责奴骂婢不听驱使。民众在此时紧紧工作罢，他们因盗财受惊而打狗，我们就觉醒捉拿打狗的贼人！

原载《政治生活》第27期，

1925年1月11日。

署名：乐生

北方最近之政情

（一月二日北京通信）

目下国民军中之胡景翼既已取得河南并将拚命攻鄂，冯玉祥则尽量扩充势力到察绥，孙岳则逗留保定拟与李景林争直隶地盘。国民军形势之发展大有贯通京绥京汉三路之势。奉军忽言南下，忽又言中止，其实奉张断不肯放弃江浙，即不肯放弃武力统一主张，故奉军终南下的。但孙岳亦占着保定，冯玉祥部尚有一师两旅占住京畿，故一时不敢南下，恐国民军蹑其后耳。且国民军极力与三特别区之王怀庆米振标等联络，故关外之兵又不敢率尔入关，奉张处此形势，颇觉为难，然彼之野心仍不死，故第二次军阀战争之导火线，即为直隶问题及三特别区问题，演角即为国民军与奉军，其时期将甚近，比之由前次奉直之争至此次政变，其时期或将

较短。

至于段祺瑞则仍系利用诸方冲突而自己操纵于其间。故他近日的政策是：（一）利用鄂萧制胡不准胡攻鄂；（二）暗中嗾使苏人反对奉军南下；（三）对赣利用方本仁以抵制北伐军，向中山示威；（四）坚持善后会议，抵制预备会议。

国民党诸右派个人奋斗之政策已全归失败，故各人之热度直由百度沸点以上忽降至冰点以下，其一种懊丧之状，殊觉可怜，即诸位自己亦觉难过。目下张继孙科等业已南下矣。

近闻中山左右在同志间宣布两大原则即：(1) 绝对不妥协；(2) 又不决裂。但目下善后会议与预备会议的争执问题，已摆在目前，在事实上已无妥协之可能。若谓"又不决裂"则又何说。照我们解说：不妥协就要决裂，不决裂就是妥协，二者间不容发？这种矛盾的原则如演之于实际，便是"不与段妥协亦不与段作露骨的反对，将来结果只有悄悄地使中山离开京津或假一个什么好的名义，作海外游客"果真如此，那便真是很大的错误，并是很大的损失。中山到京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奋斗而失败，就可向人民宣布军阀的罪状而声讨之。故今日中山若不如此干，国民党政治的生命，恐怕会受十分的摇动和危险！

原载《响导周报》第98期，

1925年1月9日。

署名：罗敬

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

在最近混乱的时局中，社会上颇表现一种奇异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之恐怖。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宣传是十分巧妙的，他们能够用种种手段以恐骇中国人民，达到使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政策之服从。他们死口咬定孙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就算是过激派，又利用俄国反革命的白党在中国流离生活的事实，做出反对的宣传而使中国小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发生恐怖。在中国的各种外国报纸，每一天都要捏造一点新闻，或在论说里放出一点腔调，鼓动并挑拨人民对于民族解放运动者、爱国运动者的同情心之减少。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自己的言论机关也握在外国人手中或其影响之下，稍微可独立的，

除最少数外，也因为党派的关系，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其言论当然与帝国主义者所指示的符合，彼此心照心印，因为这个原故，关于共产主义之谣言在最近时期内乃愈出愈多。特别是在北京，在这个官僚与小资产阶级构成占主要势力之社会里，共产主义之宣传不见影响，而反共产主义的糊涂空气，却一天一天的更加增高了。

我们愿意严重警告一般反革命人物，共产主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绝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样简单。你们的口调所谓“共产”，毫无脑筋的把“共产”二字作字面的解释是极无聊而可笑的。你们这样无聊并不能伤害共产主义，亦不能防止劳动阶级所必然走向的共产主义之路，更不能防害目前共产主义者所赞助的国民革命运动。你们这样行为只是暴露了反革命的证据，而静候革命群众之裁判。

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不是在此地所能解释的，我们很愿意有机会供给读者以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知识之材料。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先说明几个最关重要之点：

（一）共产主义是国际的，世界的，而不单独是中国的。

（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部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党派。

（三）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对于政治之主张，是根据于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的实际，而要求外倒帝国主义内倒军阀之民族解放的人民政治，这种主张丝毫没有什么奇异，更不是如反革命党那样传说的无聊与可笑，有所谓要马上实行共产。

关于第一点，共产主义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其发生原因与内容在这里无容详说，但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作战的，现在已有过半数的世界劳动阶级与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其次，关于第二点，同为世界上有这样占多数的劳动阶级与广大的被压迫民众，当然有其国际的与民族的组织，在同一旗帜下奋斗，中国之劳动阶级与被压迫民众绝不会是例外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有其组织与革命战略也无容疑问。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现在各处都一样，都一致应用共产党（在中国有时依照日本人的意旨称过激派）一个名词作陷害人的罪名，在民众中利用其统治优势把共产主义说得与洪水猛兽一般，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革命阶级发生恐怖，而实际上则是：世界上的革命潮流一天一天增高，苏维埃联邦已有坚固不拔的基础，欧洲无产阶级之革命风潮日急，近东与远东及美洲非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如怒潮澎湃了。

最后关于第三点是我们要解答一般人恐怖之所在。在中国对于共产主义恐怖的人，至少应先把中国共产党之主张明了，再判定是否值得堕入恐怖。目下全国沸腾一致呼号的国民会议，我们早已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两年以前直皖之战以后所曾提出的主张。当去年东南战争发生时，中国共产党曾发表对时局之宣言，在今日看来其分析与判断都成预言，这种明晰的判断是别的反革命党派所能见到的么？这种明白指示出人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为什么反值得大众恐怖？更切实的解释起来，自从最近国民会议的呼声提起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曾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地分析现代中国之政治状

况，具体地提出了十三条对于国议之意见（见向导周报第九十二期及本报第二十四期）。这十三条除开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外，我们要问问大多数的民众，哪一条是可以反对的？而且这十三条中，哪一条是提出共产主义的？一般人不明了于共产党（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以劳动阶级为主要分子之革命结合）之主张，甚至并不细考其主张是什么，只一味盲目的反对或糊涂的恐怖，真算是中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奸计，其结果毫无损于共产党，只耽误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自身工作。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之恐怖没有什么婉惜，惟有大众不明了于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则认为有解释的必要。而且以为无常识的造谣中伤是帝国主义者与其走卒愚弄中国人民的重要政策，这种政策值得我们严重攻击。在小资产阶级的本身，他们全阶级是否革命的，还要靠最近事实来判断，他们中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分子，在最近必有反革命而拥护统治阶级的行动出现，或者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事实。这种事实姑且预言，留待革命群众之审判与应付。

原载《政治生活》第27期，
1925年1月11日。
署名：罗敬

介绍《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号》

《新青年》杂志历来是国内第一位的杂志，特别是这种杂志所经过的历程，代表中国的革命思潮由浪漫的文学运动逐渐入于科学的实际道路。到了现在，《新青年》杂志代表社会科学的最高之理论，无产阶级最进步的科学及无产阶级革命之战术。最近一期的《国民革命号》（季刊第四期，去年十二月底出版）更供给了许多革命之实际理论，历来读此杂志的人固然不可不读，而这一期的内容，尤其特别需要在目前革命潮流澎湃中与许多革命实行家有深刻的接触。

国民革命之呼声在国内已经喧嚷很久。但是国民革命之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只怕太少数的人才能解答得出来。这一期《国民革命》便是用种种材料来解答这个问题的。读者若

全读了本期的论文，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之正确观念便可得到。特别是能够了解民族问题的原理，得悉最进步的革命战术与其基础之所在。现代的革命问题是世界的，民族问题亦是世界的，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不过是世界民族问题的一部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之民族问题，在世界上的关系如何，位置如何，特别是革命的关系与位置如何，这一期的"新青年"已明晰的供给了我们一切有关材料与概念。

尤其可喜的是在这期中使我们得了些关于列宁主义之认识。列宁主义之内容本来包含甚多，不易解释，今后列宁主义者对于列宁主义研究发扬之责任，也正如当初马克思主义（列宁自己是其中的第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扬之责任一样。我们东方的革命党人，要研究列宁主义，最要紧先研究列宁对于民族问题之理论。这一期中《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一篇论文非常阐明，因为这篇论文的作者斯大林（现时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秘书）自身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的专家，而且现在也可以说是最懂得列宁主义的一人。其次《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一篇演讲词是列宁自己的，与《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议案》（列宁起草的）一篇到现在同成为历史不朽的著作，而且是数年来近东远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方针之底稿。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共产党所以援助国民革命的政策，及各工业区的共产党与工党所采取的民族问题之方略，都是根据这两篇底稿之原则而出发。本期中所载列宁论中国问题的四篇文字都是新近寻译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不曾得见。这四篇文字中有许多

关于中国时事的预言，读了可以看出列宁之智慧，使我们相信列宁真不愧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革命之领导者。

《新青年》杂志已感化了许多的新青年，兹后《新青年》杂志的任务是要使中国革命青年入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正确之路。

原载《政治生活》第27期，
1925年1月11日。
署名：乐生

统治阶级与民众挑战

胜利军阀统治政局的地位到现在是日趋稳固了。本报曾屡次警告民众：军阀是绝不顾民意的；军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绝无所顾忌的。胜利的军阀站在统治的地位上，简直是为所欲为；人民所反对的事，正是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可以利用优越的政治地位，运用政府机关，运用国家财政，运用军事武力，运用卑污政客官僚，运用社会团体，运用学者，运用流氓——一齐在指挥之下，做“冠冕堂皇”的“黄袍加身”的工作！

月余以来，反对善后会议之呼声，不是已遍于全国么？但是统治阶级能够充耳不闻，悍然自为其所欲为，置民众意见于无足轻重之列。同时对于可以代表民意之孙中山先生的

意见，又极尽敷衍之能事。执政府答复中山先生篠电之主张，简直所答非所问；支吾敷衍之情态，了然显露。他们只顾竭力完成自己的统治，所以不惜与民众宣战。围在胜利军阀四周的各色卑污党系谋臣策士之韬略百出，我们认为：行动尚不集中，组织尚不讲究，活动尚无系统之国民党，又当他的领袖在病中，很缺乏力量应付这个局面。

但民众已渐有组织，民意之表现更多，现在统治者公然与民意挑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本报曾经说过：善后会议之能否成功是我们应当预判的，因为这个预判与对胜利军阀能否有完好统治局面之可以预判一样。本报又曾说过：民众应该真实努力的是自己的工作，即国民会议预备的正面工作。对于善后会议，民众是应该舍去消极否认的态度而积极干涉，而且力求切实的干涉监督。我们认为当局敷衍中山与国民党的办法，固然是侮辱中山与国民党，同时也侮辱民众。所谓善后会议中专门委员会容纳各人民团体，结果只是容纳可以御用的法团，这些法团中之好者（如一部分的教育会）还未必肯理会。而另外的：社会人民团体，如工会、实业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妇女团体等，全被摒于门外；在军阀官僚的意思，这些分子并不是人民。这能够忍受么？这些被容纳的分子到了会场，每月用六百元养活，结果只是被利用。这能够忍受么？

民众到现在应该明白了：第一要明白的是自己的地位；第二要明白的是此后的战略。我们人民现在的地位是：被摒斥于政治局面之外，只等候反动的政治。人民现时地位的危险，与未来所受的压迫，将有更甚于前几次几派军阀胜利之

后的局面。我们人民到此时，应该起来有积极的行动，这种积极行动的可能性即建筑在最近人民之种种团结与行动上。各种社会团体是主要的基础，而由各团体联合所作促成国民会议之集合尤是切实的形式。遍全国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此时应该起来计划两个严重的问题：

（一）促成国民会议不只于空言，不仅需要电报，应需要行动；到现在应该联合计划怎样才是促成的行动。

（二）善后会议既不是人民所要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则人民当自有其预备会议，这个预备会议从此无可等待；善后会议既与人民挑战，人民也应有应战的会议！

原载《政治生活》第29期，
1925年2月1日。
署名：乐生

“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纪念“二七”的时候，必须记起列宁。列宁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唯一不朽的领袖，他领导欧洲的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战，又领导俄国工人举行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筹备世界革命。全世界工人阶级自从有了列宁，才握紧了胜利的局面。中国工人于二七京汉罢工之役，遭压迫而失败，但若记起列宁，便增加我们的勇气，可以预判我们将来的胜利。

列宁虽已于去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但全世界工人都说：列宁仍永远活于人世。这话怎样讲呢？这就因为，列宁虽没而列宁主义永远生存。列宁主义确实生存在每一个工人、农人及被压迫民族的脑中，革命的工人农人与被压迫民族，都将

承继列宁的意志，进行阶级争斗，图谋世界革命之实现。列宁主义之基本是甚么呢？这就是工人、农人与被压迫民族怎样举行革命的一些战斗策略，并且是实验过的，可以得到必然胜利的战斗策略。因此，列宁虽没有而列宁主义之存在可以指导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与列宁生时一样。我们纪念列宁，便是记忆列宁主义，表示愿意遵守列宁主义之教训。我们在二七纪念时记忆列宁主义，便是在悲痛之中转而兴奋，得到前途光明与胜利的慰借。

列宁主义特别指示了我们工人以什么？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为说明这个，我们最好引用列宁自己说的话，这些话是列宁运用无产阶级科学之理论与俄国革命的经验战略综合而成，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于列宁主义应有之基础观念。列宁曾将这些理论一点一滴的，一面实验，一面教训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这些理论综合起来就是列宁主义。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阶级，应该自认为列宁门徒，好好学习列宁主义以便自己应用。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惟一的责任，而且在中国只有劳动阶级才能担负这个责任。

列宁第一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政权”问题，列宁告诉我们以“政权”之要义是：

一切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不取得政权就等于失败。到现在，资产阶级德模克拉西的议会主义时代已经告终了，但新的世界历史已经肇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运动共有的问题。工人阶级不懂得这个问题，无异于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专政，才能治服资产阶级；

没有专政，就没有胜利。在政权问题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此外没有第三种形式。专政的最重要形式是什么？就是苏维埃。什么叫做苏维埃呢？这就是工人农人与兵士的代表机关。这个机关打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统治，收回土地给农民；收回工厂，作坊、矿山与交通机关给工人，把权力紧握在劳动阶级与被压迫群众之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列宁第二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国家”问题，列宁告诉我们以“国家”之性质与其作用是：

国家只不过是一副机器，资产阶级利用这副机器来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暂时利用这副机器去治服反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只是暂时需要他。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当然需要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因此也并不能狭义的爱国，只有阶级的界限，而并没有国界。国家是必须消灭的，但要到真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也就是人人都能劳动的时候。阶级不消灭，国家是不会消灭的。担任消灭国家责任的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后的阶级。

列宁第三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党”，列宁告诉我们以“党”与工人的关系及“党”的使命：

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指导革命的总参谋部。党是觉悟的工人分子组织而成，他团结工人中一部分的分子，但同时领导的是全工人阶级，并且教育一切的群众：贫穷的农人、被压迫的民族，一齐聚集在

革命旗帜之下，图谋被压迫阶级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革命是可以成功的，倘若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如船没有舵一样；共产党是工人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也须要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来行使职权。什么叫做共产党呢？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政党。什么又是共产主义呢？这就是，一切公有：土地、工厂、作坊、矿山、交通机关都归公有。工人阶级绝不怕党，而且组党便会十分坚强。工人与农民合组的政党——共产党——将是世界上最后的政党。

列宁第四件对于工人的教训就是“工会”，列宁告诉我们以“工会”的作用与其责任：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工人，必需要组织工会一致团结起来。无产阶级要团结成一个阶级，才有力量，有了力量就有行动。工人在当初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明白自己的地位，误认了工厂的厂主真是自己的主人，错看了资本家是劳动贫民的救星。直到后来，这些主人与救星压迫太厉害了，才逼起工人的觉悟，开始了团结、发现自己的力量。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一件工具。工人的阶级觉悟愈发展，工会的作用愈强大。在阶级争斗过程中，工会是工人的营寨；他的责任是保护工人利益的集合，离开工人的利益，没有其它的利益。所有的工人运动，绝没有离开政治的运动。工人阶级每一个经济的争斗，同时就是政治的。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列宁给与工人的教训还多。列宁的著作即十分渊博丰富，他的言论记载尤种类繁多，我们要一

一叙述起来是不易的，更非简单说明所能办到。我们做列宁门徒的责任，一面是力求学习领会，另一方面最要紧的还是遵守实行。中国工人阶级越是被压迫得痛苦，列宁主义运用之范围越更切实。

"二七"就是我们受压迫痛苦最烈的一次。我们纪念"二七"，因以纪念列宁；我们愿意以学习列宁主义纪念列宁。因为我们深信：

中国工人阶级要得解放与自由，只有实行列宁主义，与继续"二七"的奋斗！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1925年2月7日。

署名：士炎

“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纪念就是“二七”纪念。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的第一个位置就是“二七”的争斗。“二七”的争斗的纪念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初步运动的劲敌，就是封建式的军阀；这一次惨杀事件，是中国军阀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最猛烈的进攻，而工人亦最猛烈的反抗，以致成为血染中国工人阶级争斗史的第一次。

第二，中国军阀的主人翁靠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次直接向工人进攻的是军阀，而间接主使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那般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或半殖民劳动阶级，用的是最残酷的手段——他们必如此才能达到对于中国之经济与政

治的侵略，他们压迫中国民族必首先对付劳动阶级，所以这次争斗的实质，确是中国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直接对于军阀而间接对于帝国主义者之鲜红的阶级争斗。

这种阶级争斗的实质既然是如此，他的最严重的意义就是表现中国工人的猛勇的阶级战斗力，而他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工友必需知道：与我们对立的仇敌阶级是资本阶级；而中国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者正是站在我们仇敌阶级的地位。军阀称兵割据，把交通机关占为私有，事实上就是军阀与我们立在敌对的地位；外国人占有矿山、制造厂，雇用我们的劳力，剥削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就是外国资本家与我们立在敌对的地位。我们每次的斗争，必然的都成为阶级之斗争。我们要谋我们的利益——集会，结社的自由，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履行罢工的条件；他们也要谋他们的利益——禁止集会、结社、增加工时，减少工资，压迫罢工，以求扩大他们的利润，集中他们的权力。这两种的利益既站在极端相反的地位，自然易冲突而易生争斗；但武器是在敌人方面的，统治地位是敌人占有的，所以工人阶级的血，越染满了敌人的武器，越表现出争斗的激烈，而最后的形式是：劳动阶级在血花中愈更团结起来，仇敌阶级在血花中愈更恐怖！

“二七”流血之结果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工会被封闭了，大家不能活动，我们的同志被惨杀了，许多妻子穷苦流离；我们的工友失业了，好多人的生活一时陷于无法救济的地位。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同阶级的战士，在当时举行同情罢工的是遍于全国；同时就表现我们战斗的种

子，撒遍了全中国工人阶级，总集起来，大家的奋斗力，在一年之内，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一年之后，又举行了太平洋运输工人的国际集合。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建筑在全中国铁路工人合力之上的，这就是铁路工友们多数努力的效果，也就是由"二七"事件直接产生出来的一朵鲜花。太平洋运输工人的会议是为远东各国运输工人，特别也为中国交通工人之前途，谋永远的结合，建立国际的基础。因此，"二七"的历史就表现出：一方面是中国工人阶级勇于战斗因高压结果而产出新的觉悟；另一方面则是开始了中国工人在"二七"事件之旁更加团结，更加发愤。

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怎样纪念"二七"呢？怎样纪念"二七"才算是我们的最好表示呢？我们当谨谨记着：纪念"二七"的最好办法是莫过于把我们的责任用行动表示出来。"二七"纪念并不只是铁路工人的，实是全国工人阶级的，同时亦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战斗之目的是在举行世界革命，推翻资本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是在领导各阶级的群众以打倒封建式的军阀，并推翻帝国主义。世界工人革命的最近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者执政的国家；中国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是在打倒军阀官僚的政府，而较远的目的亦与世界工人相同。领导全世界工人作这种奋斗的，是万国觉悟工人自己组织的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而领导中国工人加入这个长远争斗的，也就是中国工人自己的唯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我们纪念"二七"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光荣的二七历史"之旁更加努力起来，听受我们自己政党之领导，与世界工人阶

级取一致的行动，以达到我们上面所说的目的之实现。

“二七”的纪念若要更有意义，必须我们的行动继续，继续团结，继续战斗。并且把我们的战斗力，从散漫的行动联合成集中的势力。全国的铁路工人，要更紧密的团结于全国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各种产业工人，要各自团结于产业组合旗帜之下，并联合成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总团结。“二七”事件是指示我们团结与战斗之历史的标记，把“二七”奋斗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责任，同时也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与取得自由之鲜明道路。

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1925年2月7日。

署名：士炎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二月十二日郑州通信）

中国铁路总工会是“二七”的产儿，是目前中国工人阶级已形成的唯一的产业战斗组织。在“二七”以前，铁路工友的全国组织虽有拟议但无成就。“二七”后的第一周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产生，十余路工人领袖开始作全国的秘密的集会。虽遭曹吴数次的明显压迫，逮捕工人领袖至数十人之多，毕竟一年内的工作，完成了全国组织的雏形，尤证实了此次大会之良好结果。

大会开会前后共计四日，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余件。其议题可概括为三部分：（甲）总会报告与各路分会报告；（乙）政治报告，战略报告“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次国际会议之报告；（丙）会务——如

组织、宣传、救济、消费合作等问题。议事日程之详目如下：

（一）“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二）总会报告；（三）各路代表报告；（四）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报告；（五）进行方针报告；（六）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七）汉堡万国交通工人会议报告；（八）本会与赤色万国职工会之关系报告；（九）组织问题；（十）宣传及教育问题；（十一）消费合作社问题；（十二）审查抚恤款项问题；（十三）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十四）各路代表提案；（十五）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十六）宣言；（十七）改选；（十八）闭会。

从议程之秩序与各种报告之内容观察，真表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力之进步与阶级力量之发展。大会前后四日中，各路代表精神十分振作，每日开会多至十二小时以上，超过平时劳动之时间，但秩序整严从容，充分表现“二七”的遗留精神，由各路工人群众交付各代表带到这会议席上来。

在“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议题中，大会指明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责任及其未来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之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之冲突与军阀势力之消长，是中国工人阶级采取战略之客观条件。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工会的组织是由资本制度社会中孵化而出的工人阶级之武器；所以大会规定工会的责任，着重于统一的阶级性的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在目前实担负了两重的工作：一方面是本会的基础组织之建立与群众化；另一方面则是开始担负引导本国各种产业工人阶级的劳动运动。

在简短的历史之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实况中，本身的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大会有下列的进行方针之决议：（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三）力谋工会之统一；（四）确立经济基础；（五）救济失业；（六）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七）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八）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九）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十）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大会对于宣传与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有计划的决议案；除于条文中列举方法外，其说明宣传与教育之重要是很确切的，原议决文说：

“当工人阶级漫无组织的时候，宣传的工作是占最重要的。工人有了团结以后，宣传的工作就是教育的工作。我们全国铁路总工会现在虽有组织的形式，但缺乏组织的实质，尤缺乏下部的基础工作。我们应当知道：这种下部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由组织着手，另一方面也要由宣传教育下手。

在“二七”以前，我们的组织是空虚的，宣传更缺乏，所以一被军阀压迫，马上就瓦解了。如果我们有群众的宣传与教育，使工友群众明白工人与工会的关系，我们有时虽受摧残，工会虽被封闭，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是封闭不了的；这样，我们工会的基础是永远存在的。”

在后两日会议中，三个“国际会议”的报告，大会中接受美满的同情，尤以汉堡万国交通工人会议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战斗事实，指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防制工贼之方略。当工人的多数群众团结一致时，暴露叛阶级的工贼之罪状便可

使工贼的诈骗行为完全失败；这个事实在欧洲已有先例，在中国劳动界开始团结时尤要严防。因此，近数月来与全国铁路工人为敌——欺骗同阶级而投降于官僚的交通系之张德惠，已被大会宣布为工贼，通告全国工人并暴露其罪状了。

此外，审查抚恤款项问题，大会组织委员会仔细审查之结果，证明过去事实的真相，尤证明因卷款潜逃而造谣中伤之工贼的行为，大会认为满意，并议决交新执行委员会编辑帐目宣布全国。

总括起来，此次大会的结果，可得五项：

（一）提出统一铁路工会的口号，号召阶级性的团结。

（二）确定工会的基础组织，并力谋工会实力之群众化。

（三）关于教育宣传救济失业及死伤等问题（工会内部建设工作），都有了计划。

（四）对于中国之现状认清了，对于国际组织之联络也议定了。

（五）合全国铁路工人领袖聚议数日，互相结识，共谋自身利益，阶级团结之力，将从此愈见发展，愈见光大！

原载《响导周报》第104期，
1925年2月28日。
署名：乐生

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

（二月三十日北京通信）

从表面上看，这三月以来安福派在四面八方用了种种纵横捭阖的政策和欺骗人民的诡计，以图稳固其地位，但实际军阀间之暗斗甚烈，酝酿的问题甚多，迟早终必爆发成为公然的争斗。今请依次序言之：

第一　是段张之间的问题。段祺瑞虽是北京城的主人，但目前的张作霖决不止于做关外王。“不问中央政治”的话完全是张胡子骗人的。我们用两件事来证明：头一件是东南的现状，目下虽谓已告结束，但这只是段派的单独胜利呢，还是张胡也有份？奉军对于东南的行动，与立刻急待解决的张宗昌地盘问题，都明白告诉我们人民以段张之争的痕迹。段派要地盘，张派也要地盘，你拿浙江我要江苏，你保山东

我得直隶，这都是明显的。最近新闻界盛传张作霖要再到北京；张学良过天津时，北京传闻段召令入京，执政府秘书厅声明否认，这都是有趣味的事。

其次是善后会议，这虽是段祺瑞的御前会议，内幕亦有困难。溥仪的臣子赵尔巽之所以为善后会议议长，便是老奸巨滑的段祺瑞对付张胡子的手段。当初要使奉派代表早出席，现在要使奉派代表肯服从。原来"赵大人"是张胡子当初的上司，受招安的恩官；去年张来北京，即登门拜谒行三跪九叩礼。故现时善后会议在奉张虽觉纯粹成为段氏的御前会议，但也只好暂忍着。这话人言凿凿，虽觉偏僻，但善后会议之不能满张意是不可讳言的，将来更有事实去证明。

第二　是段冯之间的问题。基督将军冯玉祥现在还表示不满意，所以一方面以西北计划做示威运动，一方面又屡上辞呈，开玩笑，再一方面又指挥等在善后会议中努力。善后会议中冯派之势力是有一部分的，从黄郛的议长与副议长票就可以看出来。

最近溥仪出走，即段所许；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亦实有人授意。闻冯对此甚为注意，已告其出席善后会议诸代表说："如有人提出恢复优待条件，你等即请求复辟；他们如不允，你等可说明恢复优待即系复辟；如他们必欲恢复优待，你等即可推翻桌子退出会场"。此事如安福系不见风转舵，将为促起破裂之一因。

现在善后会议中，段冯两派的分化愈来愈显，报纸所载急进缓进者，实则冯段之争耳。黄郛确能得国民军派之拥护而形成对抗，然段有多数，莫可如何。最近几件议案必拖延

甚久，而西南代表到后，变化生矣。

第三 是西南代表的把戏。西南代表到后将生之变化是，他们是平分政权，要把独裁执政改成多数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最近他们提有一个政府组织草案，尚在秘密讨论中，其大要是：执政三十三人（善会选七人，二十二省军事长官二十二人，青海、西藏……五人，）组织国务院，全体军阀到北京做总统，解除所谓兵权，国务院只议事，另设各部总长执行，从此天下太平，过渡以至国民会议。这是一般联治派的梦想。此种提议如果提出来，在善会不过是一声大炮。段得西南代表来，如获珍宝，大炮放后，必将失望。此最近数日之情形也。

第四 是保定问题与河南战争。河南战事之所以爆发，其机括全操在安福系与奉张的阴谋之中，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河南战事或许牵动全局亦未可知。奉方现在练兵场装置电灯，昼夜不停的操练。李景林对人言："上海、天津两个大海口都入了我们手中，不久有大批大炮机关枪和弹药输入，看谁还敢怎样？"言下大骂胡景翼不止。孙岳在这种情势的威胁之下，表面上提出让步条件（如京沪各报所载）来和缓保定问题，实际保定问题还是未能解决。目下情形，胡氏似甚危险，因为安福系奉系的阴谋是：刘懋攻于西，奉军集中徐州方面而西下，鄂萧助攻于南，则胡处于四面楚歌之中；胡败则孙冯无能为也。冯军战斗力自较奉弱，军械亦远劣于奉，若现时全部决裂，当然敌不过奉张。闻胡氏作战计划拟以全力先破陕军去后顾之忧，然后才向中原作战。如胡氏开首能打几个胜仗，或可暂时挽回张冯全部爆裂之危机，然亦

不过暂时耳。

此外还有四事最堪注意：（一）据可靠消息，安福政府已内定俟孙中山死后即大捕国民党员并解散其在京之一切机关，以为根绝中国革命运动之计，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算“完了”。近日外传法部严办共产党的消息，章行严虽以不负责之新闻否认，记者多方调查确有此事，内幕还是出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之所请。语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便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安福政府，准备在孙中山死后根绝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反动之前征！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决不可视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人人都须预备看呵！（二）冯玉祥派军阀，虽然处在四面危机之中，但自从得着西北地盘之后，仍然继续北洋军阀传统的反动政策：如惨屠数百变兵、封闭京绥路工会，严酷管理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国民党在他们地盘之内的活动与宣传须极有限制，组织党部还是不行的……冯部军官对西北诸地的行政态度都是如此。（三）这次上海各日本纱厂四万多中国工人的大罢工，最能给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感情以剧烈之兴奋，据个中人云在北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惶急万分，生怕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发布援助罢工的宣言，重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外人在华设工厂……等主张；据记者访问，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业已决定发布此种宣言，但记者草此通信时，上海长期的罢工已有被迫终止的消息，而国民党援助宣言尚未发出，延误时机，殊为可惜耳！（四）国民党右派几个不齿于人口的坏蛋（如冯自由等），在中山病危中，破坏国民党的无耻行为无所不至，据闻他们并不是个人复仇的举动，乃切实与安

福系及西南军阀勾搭来破坏国民党；近惟张君溥泉大有觉悟，他在会议上大骂冯自由刘成禺等不是东西，他说："主张尽可不同，然此辈的行动实太出范围了"，他又说："国民党向来在安乐时有内争，在危急时则内争平息，此时正是内争平息之时"，又说："造党工作尚未成功，大家应注意于如何使旧同志与新同志融和在一块儿"。据个中人言，张君这种觉悟不是偶然的，他北来后重新感受许多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痛苦，始觉前此误入歧途。至如冯自由、刘成禺、马素等恶棍，乃自觉的甘为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的走狗耳！

原载《响导周报》第105期，

1925年3月7日。

署名：罗敬

善后会议不能善后了

段祺瑞花了许多钱，挨了许多骂，甘冒违反民意的大不韪，拚死命去召集的善后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的会了。遗老，遗少，复辟党，帝制派，卖国的安福系，惯用阴谋的研究系，头脑简单的武人，滑头滑脑的官僚，以及大言不惭的“官僚社会主义家”，堕落的“新文化运动巨子”都聚处一堂，雍容揖让，台上伛偻而立的主席是一位耳聋目聩的龙钟老翁。这种光怪陆离的活剧真可谓尽古今怪象之奇观，集中国腐败之大成。我们对于段大执政造成这出滑稽剧给我们看的盛意自是非常感谢，但我们对于这一月来善后的成绩却也禁不住要问一问。

段大执政召集这不能善后的善后会议之本意一般国民早

已知道。这个会既不许人民代表参加，所谓有“特殊资望学术”的御用学者还要限制着不得过三十人，虽经中山先生的力争，也不过摆几个仰承政府鼻息的法团首长在专门委员会中，既不能出席正式会议，又没有否决原案的权，只不过替善后会议作装饰品。这个会和人民没有丝毫关系是不用说的；不过段祺瑞以军阀推戴而成立个人独裁制的临时政府，他的基础还不稳固，他虽届暮年还有永久把持大权的野心，这个会议就是用来确定他的政权，扩张他的势力，制定可细为他包办的国民会议组织法，使操纵国民会议之权在他手中，好改变他的临时独裁政府作永久的专制机关。并且他虽和张作霖同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而他两人的利害关系究竟不能一致；所以他对于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能赞同的，他对于直系残势力表示维持。对于吴佩孚也不过为已甚正是他用来维持均势的苦衷。因此，他召集善后会议的第二种重要的意思就是使各军阀平均分赃，受他操纵，作他独裁政府的基础。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希望善后会议能议决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件简直是与虎谋皮的思想，说他能善人民之后也不过是一种鬼话。我们现在并不用这种眼光去看善后会议的成绩，我们只看它能不能造出可以哄得住人民的国民会议组织法，和能不能骗得到军阀安安静静的坐地分赃。所以我们考察这一月来善后会议的成绩并不是着眼在它为人民的成绩，而是着眼在它替段大执政所做的成绩。

就第一点而论，产生国民会议组织法为段祺瑞对于善后会议唯一的希望，也就是一般“沐圣恩”而得参加该会的先

生们所应慎重讨论，使一面对段大执政有利，一面又要哄住人民不起反感，才算足以答谢执政每人每月恩赏六百元的天恩。但他们在会议中只不过草草讨论一过便算大体成立，这是表现他们敷衍潦草，连逢人之恶的能力都不充足。

法制院所起草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已经算替段大执政想得周到了。会议的职权仅限于议决宪法，并且只限于"议决"，连起草权都吝不给与；仅注重选举议员法的地方选举，对于职业选举加了许多限制；各省区选举以行政长官为监督，职业区以实业厅长，教育厅长，铁路局长等为监督以便包办操纵。这个条例只能为段大执政产出御用会议，而不能产出国民会议。在段大执政方面自是有利，而在人民方面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善后会议诸公如果忠于段大执政便应苦心经营，设法修改，使表面上哄得过人民。但除了多数人随例举手，莫明其妙外，竟有一位高尔登反对学生为国民代表，并且他自己承认连实业区与商业区的分别都不知道。这样看来，善后会议不过产出一个全体国民一致反对，绝对不能适用的御用会议组织法，完全失去段祺瑞愚弄全国人民的苦心。

就第二点而论。善后会议既是段祺瑞想聚全国杀人的军阀，和平分赃，就应该有权力使各方停止军事行动。然而在善后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东南战事又起，南京上海一带重罹兵灾，方本仁在江西也在积极用兵。到现在善后会议正在北京开会之日，却也正是胡憨在河南大战之时。一面在善后，一面乱事又起；人民之后自然不能善，我们也不敢希望它来善，甚至于连军阀之后也不能善；在人民方面，固然用不着这种善后会议，在段祺瑞本身，也用不着这种善后会议了。

段祺瑞召集这个会满望它能替他装点门面，想一点办法，分一点责任，谁知道这批蠢蠢（衮衮）诸公真不会逢迎上司，对于冠冕堂皇的“移民计划消纳裁兵”案竟至以“有理由无办法”退回去了，“收束及安插军队”案，“编制警备队”案都想不出办法而退回，“禁烟”案也因牵涉外交而不敢讨论。诸公想不出办法，段祺瑞更想不出办法了；诸公怕外国人，声明“外崇国信”的段祺瑞更是看见外人就打战，他还敢想办法吗？段祺瑞就是要你们想办法，负责任，你们又给他退回去；退来退去还是一个“没办法”。这样看来，善后会议连装点门面的资格都不够，反而丧尽段祺瑞的脸，真不知是善的什么后？

到最近善后会议看看要破裂了，熊克武因为没有好地盘，竟自愤愤地退出，褚辅成提出完全推翻段政府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结果还不知闹到什么田地。段祺瑞本想些鬼方法来骗人民，谁知召来的鬼除了糊涂鬼而外，还有些捣乱鬼；他招了鬼来打自己的头，真是冤透了。

总之，我们看清善后会议不惟不能有利于人民，并且不能有利于段祺瑞；不惟不能善后，连现在当前的事都应付不了；不惟不能有效果，而且连装点门面的资格都不够。最后我们敢于大呼“善后会议破产”。

原载《政治生活》第32期，

1925年3月8日。

署名：识因

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唯一可贵的存在就是孙中山主义。中国革命的民众，特别是国民党的同志，从今以后，应把孙中山主义当作行动的口号，民族革命信仰的中心，在他的旗帜之下奋斗，在他的标帜四围，为民族革命而工作 。

孙中山主义这个名词是我们现在要郑重提出的。我们以为孙中山主义有其明显的涵义，在现在已经确定。相信孙中山主义的人此后的责任，便是如何把他发扬光大， 期于实行。中山先生与许多的革命先觉或有名的学者一样，在他逝世以后，他的生平不朽功业与学说就成为他的主义，应为人所信仰与奉行。在现在，应该信仰并奉行孙中山主义的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便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双重压迫下欲谋

民族自由独立的一切爱国份子，革命的战士。

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同时这个革命导师的职务，就构成他的三四十年的生活。

在这三四十年之中，把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放在革命目的的第一单位上，始终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便是孙中山主义的第一个成份，而且是最重要的成份，我们应该首先认定，并当永远记忆，不可遗忘。我们当知孙中山主义之精义在此，孙中山主义唯一不朽之点也在于此。自中山逝世，表面尊崇中山而实际系反中山主义的人，往往做反宣传的批评，有所谓“理想高而实行错”，或“主义正而手段误”，都算是敌人故意发表的恶劣口调，事实上正可以反证这种故意的批评，确是孙中山主义真实价值之所在。

我们以为孙中山主义可以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不朽之理论与原则。我们以为中山先生的本身，是一个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行家。中山先生的一生，并不曾离开他的理论而作工，亦不曾因实行而放弃他的信仰。本来任何种的理论不能实行而存在：一种革命的理论之来源，更是从实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产生而出。中山先生一生的事迹，就是估量革命实际的环境，而成为他的信仰之运用。他的实际运用有挫折，他的革命计划常有失败，但他的革命理论因此愈以丰富。他为他的革命理论而工作，常致于失败，又因失败而工作，以致建成他的活动的理论，始终辛苦奋斗，而最后以致于死！

谈孙中山主义的人，粗略的解答起来，多以为孙中山主义就是三民主义。我们以为这种解答过于简略且将引出片面

观察的错误。孙中山主义之内容固然包涵三民主义，而且三民主义为中山先生生时所自建立之学说，在解释其革命原则与建国主张时，是一般涵义的要点，惟尚不能包括其理论与实际之全部。孙中山主义之最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中山先生所自倡的三民主义与其应用。这个解释的要点，即在包括三民主义在中山先生生时所曾应用，与崇奉孙中山主义者所当应用。必须使三民主义入于行动，不能仅置之于空虚理论之域。

以民族革命为职志而崇仰孙中山主义的人，既须了解孙中山主义之内容在三民主义与其应用，更进一步而必须作正确解释的，就是三民主义本身的真义了。我们一读“孙文学说”再读中山先生自己所作关于三民主义之“讲演集”，复综观前后中山先生历次自作之解释，都可以了然知其内容。但是最后综合的定论，当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大会所发表之宣言与政纲所诠释者为准。这一次的解释，一方面是中山先生于革命工作忙碌中，自己的理论建设之一次的总归宿，另一方面则是民族革命运动已普遍于全国，在革命目的之指导计划上，已入于健全时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的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绝对自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铲除目前障碍民主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用人民的国家的力量，开发实业，发展农业以厚利民生。我们离开以上的解释

得不出第二种关于三民主义之答案。这种答案曾散见于中山先生自己的各种著作与演讲之中，凡是真实革命而崇仰中山主义的份子，到现在都应该把这种观念确定起来。中山主义确可以引导中国民族革命至于成功，虽然中山的逝世足以影响成功的速度，但是中山主义的存在可以教导中国民族革命至于永久。

我们悲悼中山先生，为的是不得再见中山亲身之指导，不复能在中山之旁，为民族革命的工作。但是历史给与中国民族以中山的功业又给与我们以可贵的现世，仍当在中山所开辟的革命大道上努力。我们这种努力之标准，又含带有中山的遗命，这种遗命是值得我们特别遵守的。我们除领受中山主义的理论与其原则外，又从遗命中得出中山主义之方略与其实施目的。

我们严重的问：中山先生的遗命到底什么呢？

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自中山逝世，其遗嘱立刻传播于全国，我们看出在遗嘱中除提明他的主义之最要内容外，更谆谆于切近时局的主张，而以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事严重申明。这两条重大主张的内容是：

国民会议——反军阀的人民自用的工具；

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的切实工作。

这就是中山对于全国革命民众的遗命。这种遗命之来源，也不仅是中山临终时的偶然主张，而是他自投身革命以至于死的一贯信念，但这次遗嘱把他的信念更切实指明，提出了目前的实施方略。

我们从中山先生个人的历史里，可以指出他生平的事迹

与其遗命是一贯的。中山先生自投身革命之初，即是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甲午之失败，中国民族开始受帝国主义之欺辱．中山先生于此时就发轫兴中会的组织。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帝国主义协同的侵略行动表现，而中山先生的同盟组织，因以兴起。这两次重大的中华民族受压迫的历史，迫成了革命先觉提倡反抗运动之有名的历史的革命之秘密组织。辛亥革命是中山反抗专制政体封建制度之成功，同时亦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初步的革命工作。然而辛亥革命的结局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即表现中山反封建制度之一次的挫折。当民国元年南京会议时，中山反对国民党中当时之右派（宋教仁，黄兴），欲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不得，同时又反对与满清政府勾结之妥协派，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之君主立宪派，孤身独战，卒至弃政权以图彻底再举。自是以后，中山的革命主张愈以自振，事业虽屡起屡挫，而主张愈坚。近数年的事迹，更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屡次为中国民族之自由而战。一九二三年的海关问题与一九二四年之商团事件，中山对帝国主义者的明白宣战，更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运动最光荣的历史。从一九二三年起，直至今年离奥经上海与日本至天津之演说，几于无次不有反帝国主义的言论。因此，在中山先生遗命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号召，是中山先生临终时向中国国民提出的反帝国主义的最切实之方案。

反对军阀亦是中山先生始终如一的观念。在中山先生最近五六年的讲演中，反帝国主义的讲演占其半，反军阀的讲演亦占其半，这是我们可以仔细寻究的。把军阀的罪恶暴露，把中国的乱源分析，我们只觉得惟有中山先生所做的工

作最多。把国民党当作政敌或肆意攻击中山先生的少数人，常指摘中山先生于某一时期与某一派势力之结合为勾结军阀，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当时的革命策略正确与否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忘却中山先生始终是反军阀的号召者。最近废除军阀的宣言更是最确切的证例。因为要铲除军阀政治，故以国民会议为号召，国民会议的真实作用，正是反对军阀而建立人民政府之关键，这是最近中山先生所拟自行完成之工作，不幸他不及亲身工作，所以在临终时特别提出，以国民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两件严重遗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这两个遗命固然是当遵守的，同时全国革命的民众，也当接受这遗命，力图其实现。

孙中山主义之存在，替代中山引导民族革命至于不朽。中山的遗命又给与民众以奋斗的切实方针。凡是革命的战士此后最沉重的工作就是求中山遗命之定成，与孙中山主义在民族运动中之胜利。

中山是不朽的，因为有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之存在。全国的革命份子应在孙中山主义旗帜之下立刻团结起来！

原载《政治生活》第33期，

1925年3月15日。

署名：士炎

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日九时三十分离开了他所创造的民国，他所领导的群众，和他誓死拥护以求实现的主义而安静的长卧了。这个可悲的消息传到民众中间，我们只听见民众的哀号与悲泣，共同伤悼革命指导者之去世。在受军阀蹂躏，帝国主义侵略，而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突然失去坚苦卓绝，百折不回，领导民众打倒军阀的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对于革命的前途自然有不少的影响。但中山虽死，中山的主义仍存，中山虽死，却给我们留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中山虽死，却遗留下“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最后的惨痛呼声，民众只要本着孙先

生的遗命，抱着他的主义，努力奋斗以求达到孙先生刻刻不忘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中国的革命仍然可以成功，民众仍然得救，孙先生之死也就无损于中国的革命，而孙先生也就真可“瞑目于地下”了。所以民众一面悲悼孙先生，一面更要在孙先生所遗留的革命的鲜明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以求革命之成功不要因孙先生之死而馁气。

然而在举国民众同声哀悼的声中，在国民党更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候，在民众更应团结的时候，却有极少数甘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当走狗的反革命堕落分子，诬诋孙先生的行为，制造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的空气，以实行欺骗人民，引导人民趋向反革命的阴谋。我们为革命的前途，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对于在哀悼声中发现的谬论，不得不“辞而辟之”。

谬论中较为普遍的是预言国民党的分裂。但这件事是不值得重大的注意的。因为国民党是个有主义的政党，凡是信崇这个主义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旗帜下面奋斗。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凡是要革命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工作。国民党是以打倒军阀的、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为目的的，凡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党内集中。所以国民党员只是要愿为孙中山主义奋斗，愿意作革命工作，愿意努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无论何时都是国民党员，必定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决不因孙中山之死去而分裂。

反过来看，假使国民党中的分子并不真实信仰孙中山的

主义，并不真要革命，并不是来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业，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有害无利的，也是国民党所应该排斥的，孙中山死了，他没有招摇的招牌自然要脱离，就是孙先生不死，也是要驱逐他们的。这投机而不革命的分子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使国民党成为真正革命的党，这与国民党丝毫没有损失，正是国民党革新的好机会。

从这样看来，无论国民党不能分裂，即使分裂，也不过是不革命的分子，国民党的败类，这种分裂不惟不能影响国民党，反转足以坚实国民党。关心国民党的人不必忧虑，破坏国民党的人也不必高兴。

还有些人说国民党要分成共产党与非共产党，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话。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党，何必要来分裂国民党。国民党要分裂也不过是分作信崇孙中山主义实行革命的党，和不革命而想接近军阀的堕落分子的集合。

除此以外，还有最足迷乱民众而我们不能不痛驳的是在孙先生逝世之翌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所发表的谬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悼孙文氏》，但除了在首段用了“悼惜”末段用了“悲悼”四个字而外，全编都是痛骂，找不出丝毫“悼”的意思，并且在“悼惜”之上还加了“相当”两个字，在“悲悼”之下，连忙接上一个“责备”。这样何苦要说“悼孙文氏”，干脆就说“骂孙文氏”岂不痛快。在哀悼文中骂人，简直是“失礼”与“侮辱”，表示自己手段卑鄙，人格低下。

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该报偏偏说“社会秉公平之心，因此彻底（？）

之革命，仍不惜奉孙以为首功，而孙遂亦居之不疑”，好象还要否认。试问人民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孙先生灌输的，屡次革命的运动是不是孙先生党人造成的。那时他们的首领梁启超正在大倡保皇，难道创造民国的功劳还数得到他们研究系吗？他们对于投机成功的段祺瑞都要恭维他“再造民国”，对于孙先生的创造民国还不肯完全承认，可见该报智识比三岁小孩不如，而险毒却在军阀之上。

孙先生是以彻底革命为唯一目的，该报认为“彻底”的辛亥革命实是不“彻底”的。在研究系进步党助袁世凯为虐的时候，孙先生看清了袁氏帝制自为野心，所以要二次三次革命，这正是要根本铲除旧势力，达到彻底的革命。后来几次北伐都是为达到同样的目的，何尝是“党同伐异”，又何尝仅以“袁一人为目标”？孙先生屡次要用武力实行彻底革命正是要打倒袁之背影”，即是军阀，官僚……和阴谋派的滥政客——研究系。

孙先生是无私怨无私仇一秉大公的；与他的主义表同情就引为朋友，违反他的主义就是仇敌。段祺瑞听他的话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赞成，召集不要人民的善后会议，他就不赞成。他是以主义为标准而利用人，不象研究系做官骗钱为利用的标准。他不肯卖国，不肯借外债，不得已使广东人民增加了一点担负，即使广东人有“余恨”，总不至象北政府尽量借外债，尽量把主权送给帝国主义者，使中国人永永不能翻身，使全中国人子子孙孙都“有余恨”。

孙先生把中国现状细密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大害是帝国主义者操纵军阀，这正是给与民众以“缜密之理智”，民众

根据这种缜密的理智所分析的结果，就有“判断政治之能力”；看清了中国的病根就有“参加政治的兴趣”，知道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的军阀在中国根深蒂固，就有“奋斗的精神”。所以在孙中山主义下的人没有不积极作政治斗争的。该报说孙先生仅以“极简单”之言论，“日灌输于空洞而毫无成见者之前”，这句话是不错的，正是要坦白而“无成见”的人才能接受这种恰中中国病根的“简单”言论，如果有了做官、发财、捧军阀的“成见”的人当然不能接受。

孙中山何尝提倡过共产党主义，他的国民党是作民族革命的，民族革命是要全民族来作的，共产党是代表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工人也是民族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国民党共同来做国民革命的事业。孙中山即未“提倡”共产主义，也未“利用”共产主义。

该报这篇谬论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孙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试问择手段以什么为标准？孙先生是最会择手段的，他是以效果为择手段的标准。他知道完成中国的革命要根本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在可以结合民众的时候就用和平，在和平无效的时候，就用代表民众的武力。他不一面借口妇人之仁来反对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军阀。

总之，孙先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的，民众懂得了他所分析的事实就应当在他的主义之下，努力革命。这些反革命者的论调绝不足以使清白的民众受欺，正是表示他违反民众，暗助军阀。使民众看穿他的黑幕。

民众应当记着孙中山的主义，应当记着他留下的“打倒

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记着他最后喊出的“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惨痛呼声，振作精神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扫除反革命的恶势力。

附注：这篇文后半多引用北京晨报原文，读者请与三月十三日该报对看。

原载《政治生活》第33期，
1925年3月15出版。
署名：识因

中山去世之前后

（三月二十日北京通信）

不幸中山先生竟于本月十二早死了！

中山在病中虽沉默不谈政治，而对于最重要的政治消息仍有时询及汪君精卫；精卫亦常择其可告者以对，惟不敢以善后会议事闻于中山，因为中山每闻善后会议四字必起盛怒，盖以此为安福系阻碍真正国民会议的实现之恶谋也。中山病到垂死，而其政治观察仍异常清楚，其反对帝国主义和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的信念持之益坚。有一日病势正在沉昏的时候，精卫入视，中山忽启目问他外间有何大事？精卫答以无何大事。中山问苏俄政局平稳如常否？托洛斯基问题如何解决？精卫略举以告。中山又问此消息汝从何处听来？精卫告以由鲍罗庭处听来。是日又问孙科广东局

面如何？孙亦遵医者命不敢多告。临终之前一旬，精卫等入室，中山似欲有所嘱告。汪等问先生有何嘱告党员的话？中山说："我如好了，自有许多话要说，若是死了……"，汪等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不过总要经长时期的休养，在此长时期中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党员定即遵行"。中山说："好，汝等先出去，等我休息一二个钟头，汝等再进来和我谈话。"汪等退出后不及五分钟，中山唤汪等入室，命汪笔记其政治遗嘱，记毕再命汪读一遍；汪读完，中山面呈笑容，精神颇振奋；旋又沉默深思一会儿对汪等说："我的遗嘱好是好，不过于你们有危险。"众问何以故？中山说："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汪等说："吾等愿继续先生的志而奋斗，谁复怕危险者？"中山说："好！我极赞成！"随又命精卫笔记其家族遗嘱，记毕亦再令其读一遍，此时中山则泪涔涔下矣；而宋夫人在外面的哭声亦已闻于室中，中山不忍夫人伤心，遂说："改日再签名罢，此时我还不死"。直到临终之前一日，始索遗嘱签名；致苏俄函也于是日始签名；并嘱仿列宁永远保存遗体，葬于南京紫金山。是日中山对左右言："我今晚怕要去了！"翌晨遂与世长辞矣！

在中山未死以前，早被中山亲自宣布开除党籍的冯自由与安福系，南与联治派的军阀政客勾结力谋破坏国民党；他一面宣传举唐继尧、唐绍仪、章太炎为继任总理，——其实这些东西，或系老官僚（如唐绍仪），或系早已叛党的叛徒，与国民党全无若何关系；一面公然组织什么国民党同志俱乐

部，起草党章选举理事。冯自由派开会的那天，张君溥泉跑去瞧，见是彭养光在那里主席，拍桌大骂道："出席善后会议者来主席，什么国民党员，不要脸！"骂罢扬长而去。从此北京城里莫不知道冯自由派便是安福派的走狗，并不相信国民党此时有什么分裂，因为一则冯自由派的罪恶昭彰在人耳目，一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登报申明这个安福派的俱乐部绝不属于国民党，与国民党丝毫无关；并闻一部分误入冯贼骗局的青年已知懊悔。但是卑劣险恶的冯自由派诡计百出，却不少休；他们为段张作侦探，在新闻上造谣言，嗾令军阀杀戮真实信奉中山主义的同志，离间挑剔革命的份子；甚至在某处密谋决定暗杀的名单有二三十人之多。

段祺瑞除资助冯自由派破坏国民党外，本拟乘中山之丧捕杀一切革命份子，作一网打尽之计，不过近来段政府的地位因不满于张作霖大大地动摇，加以河南广东战胜的影响，不无顾忌，所以还只动手封禁北京民国日报。闻安福系在中山未死前所定的阴谋是教冯自由派冒着"国民党"的招牌另立组织，段政府即认为所谓国民党稳健派而与之以禄位（如彭养光等之参加善后会议便是这勾当的第一步），而对于真正的国民党则加以诬蔑和高压，使其不能在北京存在；这个阴谋成熟的时候，段政府即将号于众曰："吾现在已与真正的国民党携手矣，其余都是过激派，乱党。"你看安福系破坏国民党的计划毒不毒？当然安福派这个毒计现在还未成功；并且他自己的地位异常薄弱异常动摇。旬日来奉张入关的威胁已骇得段祺瑞无头无脑。据闻奉张入关的目的有三：（一）压迫段祺瑞放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因山东为段派地

盘，不愿与张，故张愤甚，宣传将拥黎驱段；（二）要段仍然维持刘镇华地位，使国民军不得乘胜扩张地盘；（三）严重的压迫国民党使其不能在北方存在，对于安福政府现在的压迫程度还不满意，因为他认国民党与国民军有关系，于他是一个绝大的危险。而其压迫的口实，与安福派及一切帝国主义者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即借口于所谓国民党的“赤化”。当于右任去奉天的时候，张为以上种种对于大骂段祺瑞什么“妈那巴子”……骂了个不亦乐乎。张送于出去的时候，言下表示非铲除共产党不可。于答：“你是想根本不要共产党，我们是想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用意和你一样。”张默然不好作声。当于到奉时，冯自由派有密电到奉，说于与共产党有关系，将谋不利于奉，望即拘捕之或暗杀之。此事于回家时始知之。记者又闻冯自由派不仅为段张收买而且为陈炯明收买，冯自由公然向报馆访员声言彼辈与陈炯明之亲密。国人于此可以透悉冯自由派的背景了。最可恶的，冯贼绝不隐讳这种背景，反而公然以段张陈之势自炫于众。然而只要是稍知自爱的人，谁肯跟着他去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狗！

原载《响导周报》第108期，

1925年3月28日。

署名：罗敬

革命与反革命

（四月四日北京通信）

近日北方时局又甚紧张。冯张破裂之谣不仅风传，日本在北京之顺天时报且公然言之。记者多方调查，这种谣传并非无因，河南胡军胜利后，奉张确有趁先动手之势。最显著的事实：第一是李景林之进袭保大；第二是张宗昌南下奉军集中徐州；第三是浙奉之暂时的了解；第四是段祺瑞袒护刘憨，不仅不免刘憨之职，而且显然电斥冯胡保孙岳督陕；第五便是金佛郎案之急于解决。段政府为什么要在此时解决金佛郎案？一言以蔽之，是替奉张筹备打国民军的战费。红胡子之所以屡欲与冯决裂而不决裂者，便因为还缺少这一笔战费。

在段张祸国卖国的紧张情形之下，同时其走狗冯自由派

破坏国民党之进行亦随着紧张。现在冯自由派反革命的纲要：第一是反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是反对广东政府；第三是反对共产派。前二者是冯派反革命的骨子，以此为投降段张的贽礼，所谓反共产不过是这种贽礼之外封罢了。据深知国民党历史者说："这完全是该党反革命派与革命派之争：一派要作官；一派要革命，乃是国民党历年纠纷之原。试看每次北洋军阀之一派崛兴的时候，便有一批所谓国民党分子卖党求荣，此盖历验而不爽。此次安福复活，奉张势焰甚盛，又值中山去世，岂有不大批投降之理。年来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之革命性越强固，便于他们投降作官运动越有妨碍，他们如何不排斥共产派，兼以此买得权阀之欢心？其实此时即使没有共产派在内，反革命者与革命者还不是一样的纷争"。此诚深知底蕴之言。不过以记者所知，现在这些反革命恶棍都早已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如彭养光、焦易堂等于该党改组后并未登记入党，刘揆一则为民元首先声明脱离国民党投降袁世凯之叛徒，冯自由在上年已被中山开除党籍，至其遥相勾结之陈炯明、唐继尧、章太炎、唐绍仪等叛贼与老官僚，更与国民党风马牛不相及矣。

以上这些恶棍，现在要达到破坏国民党的目的，在上述三个纲领之下，他们一面投降段张，一面号召所谓联治大团结与从同盟会以来所谓各派"民党"大团结。表面上似甚矛盾，实际不过是一种下贱勾当的两面，因为主要目的不过是要破坏国民党与广州政府以为投降段张之贽礼。听说他们已经备了一个否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排斥共产派的宣言，上月念九日邀集所谓各派"老民党"大宴于西车站，要某君领衔签名

发表；某君毅然拒绝曰："先生在世我虽曾主张与共产派分家，但是如今先生刚去世，我可不忍这样主张了。回想先生生前的主意有时与我们的主意不相同，固亦偶然有他错我们对了的时候，但大半是他对我们错。他主张新弟兄们来合伙，而我们不愿意，或许是他对我们错了，亦未可定。现在决定和新弟兄们分家，我可很是怀疑"。这些鼠辈自知猥蕤臭恶不能号召，故屡诱某君为"龙头"，某君良知不昧卒脱圈套，亦云险矣！

冯自由派于上述诡计之外，还有一着便是主张第二次全国大会应开于北京，而以现在在京之所谓各省老民党为代表。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应与段张合作，段张并不会不许我们在北京开会"。殊知这个诡计亦着实与段张有所协定。当西站之宴，一些正派分子拂袖去了的时候，奉张代表杨大实、王秉谦相继发言，大致说中山死后，他们（杨王）曾写信给王用江等说，以后民党事总望大帅等帮忙；王用江以此信给大帅看，大帅即命王回他们的信道："你们可去宣传，余甚愿维持与中山在时的友谊，只有共产派一定要铲除。"……可见冯自由派分裂国民党的运动完全是勾结段张而行的。

现在的争斗非常之明显：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寨横在一切国民党分子之前。我希望一切国民党分子急于有个选择，尤其是中坚分子不能有犹豫徘徊的态度。同时各阶级的人民不应以为这种争斗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的事，须知这个争斗的结果关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生死。

资本帝国主义、段张和联治派军阀、买办阶级和大地

主，以及一切反动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会直接间接站在反革命派方面；我们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也应一齐起来站在革命派方面呵！

原载《响导周报》第110期，
1925年4月12日。
署名：罗敬

“利用”与“包办”

近来在北京学生中，尤其在学生团体中，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话：“这是共产党的利用”，“谨防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又把某团体包办了”……。这些话的形式虽然有种种不同，归纳起来，只不过两个简单的名词：“利用”与“包办”。

这种简单感情话宣传的结果：一方面使许多有活动能力，愿作社会活动的有志青年骇得不敢做事，把有用的光阴完全用到无用的书本去；一方面反革命的分子借此以遂其阴谋，实行其迷误青年，增加反动势力的计划。我们虽然相信头脑清醒的青年绝不至趋向反革命的邪道，但事实上的确有许多青年因为怕利用怕包办而不敢做事。我们对于反动派的

阴谋不值得去费唇舌，而对于青年的无谓恐怖却不得不有相当的解释。

无论那一种组织总有一种主张，一种宗旨；只要这种主张是正当的，他的宗旨是光明的，我们都应当赞成，都应当集中在这个组织里面，共同谋这个主张的实现。在社会里，一般分子要有这种精神才可以谋社会的进化，社会上的事才做得成功。如果看见一种主张从旁人口里说出来，不管这种主张是否正当，是否合于现在的需要，我们都一概反对，都怕受利用而不敢去赞成，去帮助，我们可以断定社会上一切事都是不能成功的。假使满清时代，一般人都怕受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利用而不敢做事，中国现在一定还是宣统十七年；假使洪宪时代，一般人怕受蔡锷的利用而不敢声讨袁世凯，现在中国一定还是洪宪的天下。凡是一种主张起初总出于少数之口渐渐才成为普遍的主张，我们只应对于这种主张详加审查，不应因为这种主张出于异己者之口便不敢赞成，更不应因为怕利用而不敢去参加。只要我们承认这种主张是正当以后，这种主张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便是自动的参加，何尝是被人“用”，更说不上“利用”。

我们参加一种团体就变作这个团体中的分子，和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一样。只要这个细胞不是衰弱无用，虽然很小，在这个机体中也一定要显出他的功用；只要我们对于这个团体非常忠实，诚心在这个团体内作事，我们个人的势力虽小，对于这个团体也是有影响的，决不会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而被人“包办”。我们在会场中诚恳地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有理由，只要是为的团体，别人没有不容纳的，

决不会排斥你的充分理由而无理的强行“包办”。我们参加一个团体是为的实地做事，为的共同谋某种主张之实现，并不是想在这里面出风头，并不是借这个团体作个人活动，我们偶而未当选职员，未当选干事，未占着上层位置，这是很不重要的事，决不能因自己没占着位置就说这个团体被人包办，更不能因自己没当职员而减少热度，甚至于以后便不到会了。假使存了这种心根本上就不是实地作事，完全为的个人出风头，对于团体是不忠实的，无怪乎别人不信任他，不举他当职员了。这不是别人“要办”，而是你不能“办”；这不是别人要“包”，而是防止你“包”。总之，只要我们忠实为团体，只要实地作事，一定能得人信仰，不要出不到风头就说被人“包办”，更不能怕“包办”而不敢做事。

以上对于“利用”与“包办”作了个普遍的解释，现在再来分析共产党的“利用”与“包办”。

共产党是现世界最纯洁的党，最后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明白的主张，有鲜明的旗帜，决不隐秘自己的政见；它是诚实地为被压迫者谋利益，随时替社会作事，谋社会的上进。东方的共产党，更以实际的客观环境参加；扶助与领导民族革命运动。我们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很可以绝对地无条件地相信，用不着丝毫怀疑；对于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团体，应当无条件的踊跃参加，用不着丝毫踌躇。因为它的主张是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是适合现时的需要，可以引导青年走上正当的道路。

共产党是以取得群众为目的的，它时时刻刻要接近群众的，它对于别人的正当主张没有不容纳的，它决不在任何团

体中“包办”。它有时为防止反动势力，贯彻正当主张，仿佛非求贯彻不可，这是应该原谅的。因为反动势力不防止，是与团体有损害的，是要破坏正当的主张的。我们可以说共产党攻击敌人是很勇猛的，但同时尽量容纳朋友的意见，共产党绝不“包办”任何团体，只要团体中没有反动势力；我们也不要怕共产党“包办”，只要我们自己不是反动分子。

现在一般反革命的反动派宣传共产党利用，是要使青年不走上革命的正当道路，减少革命的势力，使他们的黑暗势力得以增长。我们要是信了他们的宣传，就堕入反革命的邪道；我们怕受共产党的利用，实际上已受了反动派的利用；我们怕利用而不敢做事，谁知你不做事就是受了利用，反正都是受利用，我们与其受反动派利用来反革命，不如受革命派利用来做正当的事业；何况革命派（共产党）决不利用人呢。我们不愿意别人“包办”，就应当自己出来做事，你不做事，别人更要包办。反正别人都是“包办”，与其自己丝毫不办而让人“包办”，何不自己也出来办一办，何况共产党决不包办呢。

起来起来！图书馆实验室中的青年们！你们怕受“利用”，就应当出来实地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受反动派利用来减少革命势力；你们厌人“包办”，就应当自己出来办，不要让共产党“包办”了中国的革命，不要让共产党单独“包办”了中国最近将来的光荣灿烂的历史。

原载《政治生活》第37期，

1925年4月19日。

署名：识因

“五一节”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五一节是什么日子呢？五一节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实行斗争的纪念日，是工人因团结而得到胜利的纪念日，是无产阶级表现自己的能力使资本家屈服的纪念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人们为什么要在每年的今天集成武装的队伍作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呢？他们这种示威运动不仅是纪念美国工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成功，而是为的继续斗争使各国工人得到同样的胜利；不仅是对于已往的庆祝，而是要召集自己的军队严密整齐地作将来革命的训练；不仅是回忆过去的陈迹，而是预备要勇猛积极地参加更进一步的斗争。

因此，在每年的今天，工人们和资产阶级的走狗总要发生许多的冲突，无产阶级的武士总要流许多鲜血；同时，世

界革命的潮流在今天要特别的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的途程在今天要特别猛进，许多使资产阶级发抖的大运动要在今天爆发。历史上最有名的例：一九一六年的今天德国的工人们因反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国家——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威廉——役使无产阶级的大屠杀，联合作罢战的运动；一九二〇年的今天德国的工人又联合作承认苏俄的大运动。在我们中国，一九二二年的今天便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日期。在今年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工人们应当同声庆祝，一般平民都值得去注意的便是正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一个全国劳动者的大结合正当最可纪念的五一节，一般民众对于他的历史和意义无论如何都应有充分的了解。

第二次劳动大会是继承着第一次劳动大会来的。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者受着本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的共同掠夺，工作时间特别的加长，劳动力特别的低贱，又受着帝国主义者操纵的军阀的武力压制，团结比较困难，组织不容易成功，各国都有轰轰烈烈的劳动运动，中国劳动者仍然是一盘散沙。经过许多奋斗，经过百折不回的进行，才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集全国劳动者的代表开了一个空前的大会。这就是中国第一次的全国劳动大会。

第一次的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无产阶级团结的开始，讨论了劳动者本身的许多重大问题，决定对敌人作战的方针，是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纪元，是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在这次大会里以决定每年应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一次；决定第二年在汉口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

为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召集的责任仍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执行。

劳动者的团结刚才开始，反动势力的压迫突然降临。震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二七”惨变就于第二年发生了。英美帝国主义支配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用极残暴，极凶恶，外国资产阶级所不敢用的恶毒手段把各铁路的工会完全封禁，肆力摧残。武汉的工团被萧耀南打得落花流水。全国的工人组织不是封禁，也是在严重压迫之下。第二次劳动大会无法召集，方才萌芽的工人运动受了这一个重大的打击表面上消沉了两年。

但是这个消沉的形势仅仅是表面的，各地劳动者仍旧暗中进行，暗中组织，百折不回，再接再厉，两年之中有了不少的成绩。他们经了从前的失败，得了不少的经验，由散漫的群众进而为最新式的工会组织。

去年直系军阀倒台，工人乘机谋公开的合法运动，各铁路工会和总工会都次第恢复。全国工人都感觉大团结的必要，特由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广东工人代表会等团体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地点定在广州。全国各工团人数在一百以上一千以下的都可派代表一人，千人以上的加派一人，于四月二十七日以前赶到广州，五月一日正式开会。这次参加大会的工团比较第一次要多数倍，代表将超过五百人。这次大会的结果将要产生全国总工会，并要和广东农民团体联络，结成劳农的联合战线。

依据上面的消息，我们看出这次全国劳动大会有几点特别的意义。

（一）由几个重要的总工会联合发起，自行召集，自行筹备，表示中国劳动者已有充分的阶级觉悟，知道要同资本家宣战，先要有本阶级的大团结。

（二）从前工人是散漫的，现在各地工会都采用新式严密的组织，这次的正式代表预计有五百人，代表数十万劳动者，并且要组织全国总工会。这是对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一个大示威，是对于资本主义下总攻击的开始。

（三）贫农与工人本有密切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未得政权的时候，他是援助工人的生力军，在取得政权以后也是共同支撑危局的中坚份子。工农应当同盟，不仅在俄国如此，在世界各国都应如此。在半殖民的中国，农民受军阀、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的压迫，感觉的痛苦和工人相差不远，尤其有联合的必要。广东农民组织特别发达，有五十几处，在今天，他们也要开大会纪念劳动者的节日。这次大会要和他们结成亲密的关系，这是中国劳农实行联合的开始，增加革命军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期愈见接近。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平民们，在今天我们应当同声欢呼：

工农联合万岁！

全国总工会万岁！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原载《京报副刊》第135号“五一”特刊，

1925年5月1日。

署名：识因

“五一节”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

五一节是工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胜利纪念日。三十九年前的今天全美工人执行两年前在芝加哥大会里的议决案，实行大罢工，集着无产阶级的队伍，游行街市，唱着慷慨的悲歌。这个大运动的结果，得到空前的胜利。在最短期间，有二十万的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的成功。一八八九年巴黎万国社会党大会共同议决以这一天为八小时工作运动的纪念日。每年的今天各国的工人都继续不断地作这个示威运动。一面庆祝已往的成功，一面训练自己的队伍，预备参加将来的革命。这一个节日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节日。

在今天，在这个胜利纪念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工作时间多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有许多

受了经济的压迫为洋资本家作工，他们低首下心战战兢兢的工作还要受外人牛马般的虐待，他们的工资还要受戴着慈善的假面具的资本家借着储金等等的美名来剥削来克扣。在这个资本家发抖的日子，我们中国受着重重压迫的苦工人应当集合起来对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作一个严重的示威，同时应当表示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作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在今天，在这个胜利纪念的今天，我们中国青年工人尤其有更重大的意义。我们中国的青年工人从来很少有人注意，很少有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数目，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痛苦；他们自己因为年龄太小，知识低下，没有争斗的勇气，没有团结的能力，没有自己组织起来的本领，虽然受了许多非人所能堪十百倍于成年工人的痛苦仍然说不出口，不能有坚固的组织，用有效力的方法，实行为自身利益的争斗。在这个神圣的五一节日，我们对于最痛苦的青年工人（童工）的痛苦与要求值得作一个重大的注意。

中国无产阶级生育的能力没有限制的方法，一个工人总不免有几个小孩，中国工人的工资都是极低下的，夫妇两人的收入仅仅够自己的生活。维持小孩的生命已是十分的困难，更说不上什么教育。到了八九岁叫他作小生意又没有本钱，并且收入是很难一定的，只有把他送入工厂当学徒，作苦工、替厂主与包头人作小奴隶。这是童工的一种来源。还有一种童工是由万恶的包工头从乡村里雇来的。他们的父母是贫苦的农人，或者是替地主作苦役的长年苦工，他们终岁劳苦，除了自己吃饭以外，至多只得十来块钱的工资，甚至没

有工资。他们的小孩当然不能养活。到了七八岁就送去当“放牛娃”，只有粗糙的食物维持生活，多半是没有一个钱的。这一批凶恶而戴着慈善假善假面的“包头人”，用甜言蜜语引诱小孩的父母，只说替小孩在城里谋事，每月给他们的父母以一二元的代价。本来一个钱不能挣的小孩骤然每月可得一二块雪白的大洋，他们的受经济压迫的穷苦父母那有不欢喜的，向着这些包藏祸心的“包头人”千恳万求，说许多好话，求他们把活泼天真的小孩一个个送入地狱。这些外受美名，心怀残忍的“包头人”把七八岁筋骨未充的幼童带到城里，送入工厂，“包头人”每月可向厂主领四五元，拿一二元给他们的父母，剩下的一半就入了自己的私囊。这些可怜的童工身体精神受许多损伤，仅仅替“包头人”作了牛马。这是童工的另一种来源。

这些可怜的青年工人作工的情形是怎样呢？他们都是作的最苦最零碎的工，或者还要替厂主，包头人作个人的服务。每天工作的时间至少也要到十二个钟头，甚至于到十五个钟头或十八个钟头。他们身躯矮小，只能站着作工。那种苦况，简直无法形容。还有当学徒的简直没有工钱，即有也不过每天得两角钱。他们的住处总是许多人挤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什么卫生根本就说不上。伙食要是由厂内供给也就同喂猪一样。饭倒在石槽里，围着乱抢，早餐大概只有白饭，连菜都没有，晚餐算是资本家开恩，特赏清水白菜汤一大碗。有些工厂不供饭，只给伙食钱，每顿也不过几个铜子，可以买几个粗糙的窝窝头把小肚皮塞满。他们多半没有钱买衣裤，赤身露体的站着替资本家作服役的小奴隶。

这是普遍的情形，现在我们专来注意最近发生的关于上海童工的大问题。

上海的工厂比较别处为多，雇佣童工的也不少，但从来无法作详细的调查，就去调查也无法得其真相。最近洋资本家的上海工部局把上海市分为十区，用洋大人的权威才调查出雇佣童工的工厂大大小小共有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共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里面含有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在上海一隅就有了这样大的数目是很可惊人的一件事。假仁假义的洋资本家调查出真相，不惟不想方法解决，反拟了一个欺骗童工实行更多的侵略的所谓“保护童工条例”，在四月十五日上海外人纳税会讨论了就公布。

这个条例除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而外，几个要点大概如下：

（一）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仍照惯例每天作十二小时的工；

（二）每两周才有二十四小时的休息；

（三）不禁止童工作夜工。

成年工人每天只能作八小时的工，每天都要有八小时的休息，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还要作十二小时的工，每两周才能休息一天，这不是笑话吗？不禁止童工做夜工，对于童工身体大有戕贼，不是要置中国可怜的小同胞于死地吗？这个条例何尝是保护童工，简直是保护资本家，使资本家的残

酷行为经过法律的承认，变作确定的条例，使资本家更明目张胆的来掠夺我们的青年同胞们。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地代表中国无产阶级青年反对这个欺骗童工的条例，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由工部局或厂主出钱开办平民学校，并供给童工的教养费用。

（二）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至多工作八小时，绝对禁止使用童工做夜工。

（三）不得使用童工做一切笨重和危险的工作。

（四）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星期至少须有继续三十六小时以上的休息，不得克扣工钱。

（五）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做同等工作者，须得同样报酬。

（六）厂主应出钱开办平民学校，准童工入校读书。

（七）由厂主和工会代表或童工代表，合组“监察委员会”，督促各工厂施行上例各项保护童工条件。

无产阶级的青年们！关心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大多数平民，在今天，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对于上面代表无产青年利益的最低限度要求一致赞助，促工部局承认，使上海十七万的童工脱离苦海。

同时全国无产阶级的青年应当团结起来，实行争斗，提出下列的口号。

（一）青年工人工作六小时。

（二）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享受同等待遇，同等工资。

（三）废除幼年童工。

（四）工厂厂主应出资办平民学校，许青年工人受义务教育。

（五）缩短学徒期限，学徒不为师傅个人服务。

最后，无产阶级的青年联合高呼五一节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原载《京报副刊》第135号“五一”特刊，1925年5月1日。

署名：识因

驳斥对于苏俄的谤言

帝国主义者的各国机关报纸，平时很爱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制造种种的谣言。他们造谣还以为未足，有时把苏俄的消息，故意牵强附会的乱说，加以诽谤。本来是苏俄的好消息，拿到帝国主义者的咀里说出，便变成坏的。本来是平常的，拿到他们咀里说出，便变成奇异的。这种伎俩，与他们在电影营业里，故意把装成鬼怪一般人唤作"布尔什维克"，以欺骗小孩子，是同一用意。

不仅帝国主义者如此，帝国主义的机关报纸与通信社不过是最高的指挥机关罢了。附属于这些机关的，还有最多小资产阶级的喉舌，也同样造谣或牵强附会的，对于苏俄的政治或经济消息，加以诽谤。

小资产阶级肯如此为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努力，特别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之小资产阶级肯如此努力，自然是国际帝国主义者所欢喜嘉赏的。

最近有两件关于这种事实，本是由苏俄自己传出来的消息，而结果在中国被人利用，牵强附会的作了一阵反宣传。这两条事就是：（一）苏维埃联邦此次选举结果，无党派的工农当选者比去年加多；（二）经济委员长宣言政府现正进行对于商工及实业家大行减税的计划，并说苏联的建设，希望私人资本的参与。对于前者，反对派的巧妙宣传说："共产党的选举失败了！"对于后者，反对派的宣传更是神奇，他们说："苏俄公认资本制度！"

我们对于前一问题，觉得无容置辩。因为这不过是中国人学习英美日法帝国主义机关报的新闻伎俩，鹦鹉学舌似的讨帝国主义的欢心，无关于实际、因为他们并不懂得：（一）此次选举使无党派的工人农民当选者加多，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预定的政策；（二）这个政策的主要意义是，使较多的无党派的工农参加政治，巩固无产阶级性的政府之政权，扩大多数工农受政治训练的机会；（三）这次选举在各乡乃至各城市，提出被选名单时便有意提出多数无党派的工农，并没有所谓各党各派的自由竞争；（四）这个政策运用的结果胜利了：无党的工农当选之比例成分增多，明明表示工农阶级听信共产党的政策，踊跃参加政治，拥护政府；明明表示"共产党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外，没有其它利益！"

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派人物！你们这样努力攻击苏俄，诽谤苏俄，已经有了七年多的历

史；这七年多的历史，完全证明你们是失败了。各资本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七年来一天一天的继俄罗斯十月革命而兴起发展，紧跟着你们。攻击与诽谤苏俄的谣言而逐日长成。你们的言论可以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但是欺骗不了劳动者！你们又以为落后国家的幼稚无产阶级为可欺么？但是事实上愈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在遍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上，劳动者不但不会为你们所欺，只有反怜悯你们受帝国主义者之引诱，在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行列里，常常至于落伍。

你们一般的夸张的言论，多半是关于经济问题。当你们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愈能强辞夺理，便愈觉得高妙中肯了。因此，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这一句话很得意的在最近一致宣传起来。本报热诚的读者，曾多数来函催促，希望本报对于此种宣传有所驳斥。本报记者虽以为为应读者之要求，这是应有的工作，但在客观事实上分析起来，我们以为：第一，对于帝国主义自身及其鹰犬所有的言论（如国内各种外字报纸），是值不得费力辩论的；第二，对于纯粹反动——反革命的言论，也值不得辩；惟有第三，于某种似是而非的论调，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或急进派的论调，不能不稍稍加以纠正，一方面为的是杜绝谰言之传播，另一方面则是必须考验这般自由急进的人物，其论调的立足点，是站在反革命的营寨以内呢，还是散在营寨以外作游缉队或“便衣侦探”？

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的一句创造语，是根据苏俄商务委员薛因曼最近一次的演说。但商务委员薛因曼，是怎

样说的呢？他说："政府愿意容认私人资本，但希望资本家安于通常的利润而不贪图暴利。同时，对于私营商亦当设法减少课税轻其负担"。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实在找不出什么奇异之点，而能得到所谓"苏俄公认资本制度"的结论。我们当知道容认私人资本这件事实，在苏俄并不是新奇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下，早就有这种主张。从新经济政策的本身以观察私人资本的地位，便可以明了在无产阶级执政与国家管理生产的过渡期中，私人资本并不是社会经济的上层组织如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样。苏俄生产的管理，完全在国家权力之下；列国的资本家并不能借投资而有侵略的企图，如对于殖民地之侵略企图一样。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法国式的急进主义者，甚至于北美合众国的共和派，为了太忠心于资本主义的缘故，虽对于苏俄有种种的企图，但震于苏俄劳农政治组织之严密，都自觉其企图是不可能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你们更何所为而何所企图？

资本制度的护士不是别人，最有力的便是这般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他们得到了"公认资本制度"这个名词，就得意忘形。但是无产阶级听到这个名词，也哈哈大笑。无产阶级并不消极的否认资本制度之存在；现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不是否认可以了结的。惟有无产阶级才勇于承认一切，又勇于破坏一切，所以无产阶级担负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使命。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如果说：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原不过是吸收外资开发富源的老政策；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就会回答说：请你们把这个老政策拿到道威斯计划管理的德国，列强共同侵略外国银行团操纵的中国，同样采用。假

使不能采用呢，那便这个经济政策仍然是新的，惟有在劳农阶级掌政之下才能办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拥护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想在革命后二十四小时内就完成。共产主义并不是怎样可恐怖的东西，土地、矿山、工厂、作坊……一切归生产者所有，现在苏维埃联邦的工农，并没有违背这个原则。十月革命以后，土地归还农民，这并不是“公然允许农人私有土地”，更无所谓“收拾农人阶级的欢心”。一九二一年以后采用新经济政策，这并不是“抛弃了共产主义”，更无所谓“以利权让与为取得外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交换条件。”近数年来，苏俄的工农生产日益进步，农产的麦粮，满溢于世界市场之上，这是事实，所谓“生产减少，经济组织陷于绝境”者，请拿出证据来！

原载《政治生活》第38期，

1925年5月。

署名：乐生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

一　全国民众代表之集合

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前后一月有余，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些促成会旗帜之下集合的是：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到会各代表虽不能将各地团体人数作确切的报告，但所代表的民众，当在数十万以上。这个民众性的大集合在北京开会一月有余，而全国知者尚少，其原因是：在安福派政府高压之下，该会于开会时常不能自保安危；该会所寄出的会报，多被政府劫留；该会所发表的新闻，在北京占大多数的反动报纸，多不予以登载，

而对于安福系政学系研究系联治派及军阀代表所组的善后会议消息，则逐日连篇累幅的予以登载。

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从会议之经过与结果看来，是颇良好的。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本报代表民众利益，并曾屡次勉勖此会之成功，对于此次会议，实有不惜篇幅介绍之必要。记者曾觅得该会各种材料，并曾到会旁听，特作此篇以告本报读者，并盼本报读者特别注意于该会议之各种议案与宣言。

二　会议时期与政治环境

当大会开幕之日，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各方面的“人物”，段政府竭力网罗，从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新官僚“社会党”领袖，都被召应试，与此会议之各地人民代表纷纷到京，遥相对应。北京城于安福派统治之下，早已在恐怖的状态之中；人民不仅集会不得自由，而且言论也遭政府罗织。但在当初，孙中山先生尚存一息于病榻之上，段祺瑞还不敢马上撕破面具，人民的活动还勉强自由。及至孙先生去世，骨尚未寒，而孙先生主义庇护下的《民国日报》被封，嗣后连续压迫各报馆与通信社，无端逮捕新闻记者，无数侦探鹰犬，大形活动。中山灵柩之停放，政府最初不允在中央公园，而指定远离民众之城外荒坛。中山遗体之移往西山，也是政府所欣愿的。北京城日堕于恐怖，反动势力日益增长，民众不能抗争。

军阀角逐而要造成的未来大战，自张作霖来京忽而离去之日，其局面已经开始。从而以后段张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多。然而执政府谋臣甚多，能奔走者尤众；善后会议或连续或间断，日以金钱与交换条件贿买，务期成功。自中山逝世，分裂国民党的计划便自执政府而出；政府的机关报与附属于政府的各党系报纸，都扶掖国民党右派，宣传国民党之分裂。

但在这个时期的全国民众，反对善后会议之声遍于各地，哀悼中山，誓愿继续革命的表示，来自大小城市与村庄。然而政府对此，充耳不闻，只图应付军阀，手忙脚乱，急谋成功。

三　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工作

各地民众代表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集会，自然感觉到人民自身责任之所在。因此，大会决定否认段祺瑞所提出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又以为趁人民代表聚集的机会，应该详细讨论中国衰弱祸乱之真因，并提出具体的救济方案，以宣告于民众；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因此大会决定讨论各种国际与国内的问题，而定出下列的范围：（一）国际问题，其中包含：（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2）不平等条约及特权；（3）租界地与租借问题；（4）关税问题；（5）外人在华驻兵问题；（6）外人在华航行权问题；（7）外人

在华传教及教育问题；（8）外资与其势力问题；（9）华盛顿会议；（10）临城案件；（11）金佛郎案；（12）鸦片会议；（13）无线电问题；（14）外国银行团；（15）上海租界焚书问题；（16）沪西日本纱厂罢工问题。（二）国内问题，其中包含：（1）军阀军队与内乱；（2）联省自治问题；（3）人民自由问题；（4）实业问题；（5）教育问题；（6）商业问题；（7）工人问题；（8）农民问题；（9）妇女问题。（三）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内外债各问题；并详细审查中国的财政与提出救济方法。（四）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其中包含：（1）批评并否认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2）国民会议组织大纲；（3）促成国民会议与厉行民众组织。

大会的责任既是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而此国民会议之产生，非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不足为功，所以该会议开会后于发行会刊时便宣言说：

"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其使命乃为客观情势所确定无疑；质言之，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群众运动。今日之一粒种子，他日必结为最大果实。我们必须努力栽培灌溉，扫除其周围之蔓草荆棘。此工作最初虽不免于艰难困苦，牺牲流血，然吾人之责实无旁贷"。

四　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之决议

大会自决定讨论各项问题后经过半月余的工作，便整理出各种问题之报告与其决议方案。报告的内容是十分繁多的，这绝不是豢养的善后会议议员甚至国会议员所能作的事，而惟有革命的民众代表才能做到。各种内容该会将另出专册印行，下面所述乃简略指出决议案中之重要者：

（甲）国际问题之决议——最初说明欲谋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须将已经为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攘夺以去的国家权力完全收在集体的人民手里。其次说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经过，历述自最初的商业政策以至为鸦片贸易扩张道路的英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民族史的第一页。马关条约为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一新时代，割地赔款保护外货的关税制度，由此而生。马关条约外，辛丑条约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酷烈者之一，这个条约是对中国民族的反抗外力的惩罚，把中国军事，经济的国防完全打破，将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尊严蹂躏无余。鸦片战后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入史。中国自从堕入这个历史里，就变为国际的殖民地。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依国民会议产生国民革命政府，宣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大会决议案中曾一一指明：（1）领事裁判权；（2）租借地租

界及中国境内其他的外国行政权；（3）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规定；（4）外正管理财政权；（5）庚子赔款；（6）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7）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教育设施。此外又指明帝国主义列强于近数年对中国之进攻有下列诸事实：（1）华盛顿会议；（2）临城案件；（3）鸦片会议；（4）金佛郎案；（5）无线电问题；（6）上海租界焚书问题；（7）上海日本纱厂华工罢工问题。对于以上诸问题都分析其内容，而提出严重之抗议。本决议案之结论是：恢复国家权力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就是恢复国家权力的机关，故大会决以全力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

五 “打倒军阀！”“排斥联治！”

（乙）国内问题之决议——在国内问题中，包括九个重要问题已如上述。决议文中一再申述打倒军阀的口号，在军阀军队与内乱之决议里，说明全国民众在打倒军阀的旗帜之下，应当勇猛的以人民要求民治为前提，对于一切军阀实行总攻击，尤其要反对的是军阀的武力主义，因为它是军阀否认人民力量的标语，与人民所期望的和平与统一，绝对背道而驰。同时又说明广大的士兵群众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在国民革命中，兵士应该为国家利益战，不要为军阀官僚战，应该为国家利益做捍卫，准备为国家幸福而牺牲。此次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大会决议痛斥联省自治论者之误国，其理论

即幼稚，其所根据事实更错误。大会以为在此封建残局之下，决不能由制宪而获得自治。真正的自治必待国民革命成功，中国民族获得独立与自由之后，始能实现。

关于人民之自由，大会要求废除一切警治与军治。人民应有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警察不得任意逮捕、羁押或搜索人民住宅，非军人绝不受军治。工人应有罢工的自由。惩治盗匪法，陆军审判条例等，均当废除。复次，对于实业、商业、教育诸问题，均各有确切之决议。最后关于工人、农人、妇女三问题，更一面分析在被压迫各阶级中此三大群众的痛苦，一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大会尤注意广大的工农群众与妇女界，应速起急谋团结，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成功。

在各项国内问题中，且提出各自的切实主张或要求；大会为注重国家财政问题起见，又单独讨论财政问题。

六 “十年的外债停付！”

大会特别讨论财政问题，为求详细探索财政紊乱之情形，与国家财政破产之根源。据财政委员会讨论报告之结果，其结论就是：“十年的外债停付，留待国民会议解决其用途！”这种主张是关系严重的，帝国主义的列强一定畏惧，因为这种主张之结果，绝对有利于中国国民，而无利于列强，列强听到这种主张，一定要惊惶失措，指我们人民为“过激”。殊不知这种“过激”的办法，在列强各自的国家里，

在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上，早就实行。法兰西曾要求过外债停付，比利时也要求过外债停付。停付（或缓付）这个名词，这个办法，是他们自己当初想出的。论到“过激”的办法，并不这样。“过激”——假使指的是布尔塞维克，在布尔塞维克的俄罗斯，自从革命以后，并不是停付，而是不付了。

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不困难，难在帝国主义之继续侵略。一国的财政破产并不是稀奇的事，所奇在无救济的办法。中国的财政家梦昧终日，只学算帐，不知清帐；即有清帐的办法，又都是有利于列强的，如主张再借外债以救财政的，便是一例。

——

大会同时感觉借债之危险，故发出公开宣言两种，一给外国银行团，一给国内各银行，警告不得再借债与政府。

七　宪法是人民收回政权的证书

大会于各种问题之外，又特别注意宪法问题。

“中国国家的权力，现在不在国民手中，而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使者——军阀手中；一切不平等条约，即是保障此等权力的明文。

所以吾中国全民众，应集中其精力以求于最近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真正国民会议。目前中国国民所要求于此国民会议的职任，不在制定一部空文无力的宪法，而在为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斗的人民机关。”

这是国际问题决议案中评宪法问题之一段。在国内问题

决议案里，也有同样的说明：

“宪法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国国民保持主权的一部证书。这部证书，必须国民自己得了政权以后，才能产生出来。向统治的军阀要宪法，与奴隶要求主人严订管理法一样，结果反让统治阶级强奸民意，任意造作。政权的取得是由于革命的力量；必须国民革命成功，才有国民自己的宪法可言。……真正的国民会议之目的，就是要求政权收归人民以解决一切外患与内忧。”

八 “敌人软化不了工人阶级！”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两种政治的遗嘱：一为国内的；一为国际的（即致苏俄之遗书），笔记而出，为全国民众所普知。在这两种遗嘱传授之时，中山先生警告其同志说：“你们不怕敌人之软化吗？”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现在这一句话，全国的民众还没有公开的答复，惟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团早就答复了：“敌人软化不了工农阶级！”

工农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人数虽少，且偏于南方，但在大会中仍产出良好的工作。大会会刊中，我们看到农民代表某君的论文，充分表示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使命。大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工作，关切于大多数被压迫工农阶级最深。此次各种的决议，一方面证实民众代表工作之良好结果，一方面也可断言将受全国民众有力的拥护。

九　第二安福国会与人民的国民会议运动

当大会闭会之时，安福部的善后会议也闭会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是要召集预备会议；善后会议闭会之后，是要召集第二安福国会。后者也许是可能的，可能则必是较快的，因为“政权”在段祺瑞之手。

然而大会指示了人民以国民会议之性质，指示了人民以奋斗的方法，并指示了人民对于各种问题之确切方案。素来藐视民众无组织的，将由这次人民代表的实际工作中证明其为恶势力所迷，现在促成真正国民会议的民众代表大会闭幕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也闭幕了；我们需要一个第二安福国会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会议呢？

全国革命的民众应当答复这个问题！

原载《响导周报》第113期，
1925年5月3日。
署名：罗敬

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北京通讯）

今年北京的“五七”怒潮与六年前的“五四”怒潮一样，同是反帝国主义的觉醒，与攻击卖国的安福系之群众运动。章士钊托庇于安福系权力之下，极为摧毁人民之自由，以致撄犯众怒，真正是“内伤燕廷知隗之明，外增七国诛错之号，钊有百身，亦何能赎！”（见章士钊原辞职呈文）。

这次“五七”事件，表示在极反动的政局下群众为争自由而奋斗，颇值得记述。普通报纸的记载，多离去群众的利益，尤不了解群众运动之目标。并且有许多事情，都让段政府与其鹰犬警察厅几个通电遁辞隐节把真相湮没了。

五七纪念的北京集会，本是由北京的“国民追悼孙中山大会”召集的。当初的意义，一为追悼中山（因北京追悼会

从未正式举行），一为纪念五七。段政府明知北京市民于是日将有反帝国主义之表示，有伤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感情，所以预作防范，于是日在集会所定地点天安门前令警察会操，并安置水龙，以备射击群众。章士钊于前一日用教育部令，禁止学生开会纪念与游行。七日晨，群众集于天安门者五六千人，皆被冲散；旋因干部机关早有预备，临时派自行车队传布口号，移地至景山前，意欲与国民军另开纪念会。但群众或被警队截断，或因路线不熟，至景山者不及千人。甫开会而国民军守卫者开北上门，迎众入内，于是集合市民兵士开会，演说历二小时，通过对内对外之决议案。当群众在天安门被冲散时，一时怒恨集中于章士钊，故开会演说，即有提议赴章宅质问者，顷刻之间，全体响应，竟成决议。群众于会毕严整队伍，齐赴章宅，至则因章不在，遂与章宅家人及警察冲突，互相格斗。是时因有人先将电话折去，警察征调不及，众怒之下，遂将章宅什物捣毁；但因门警紧闭大门，而群众前后凡三次扑入，援救失陷于内者，历半小时后，大队武装大刀与马队警察蜂至，群众犹抵抗格斗，以至重伤者数人，并捕去十余人。前后暴动的景象，实是六年前“五四”打曹章陆同样的一幕。所不同者惟章不在宅而群众亦未放火耳。反动的压力愈大，反抗的回应也大，半年来段政府超过直系当国反动成绩之总合，有此一次回声，本是必然的事。

在一般的看来，只以为是学潮又从新激荡了。北京近百万的市民，还未认识这是公共的争人民自由的问题，所以五四怒潮以后的发展，也只是学生群众运动的发展。两日以后，

学生又举行大示威运动，集者万余人，但以领导运动者之错误，竟将示威运动变为向段祺瑞的请愿。请愿本是不会有结果的，而当日竟将口号缩小为罢免章士钊与朱深，及释放被捕者数种；同时，在教会学校的队伍中，英美的教徒教授随学生游行，仿佛表示对于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都是可注意的现象。但在当日群众运动的结束，卒因段政府的巧妙政策，反激出示威运动的好结果了。

当"九五"群众聚集于段宅时，段宅的警卫有两重防线：一是他的警察与卫队；一是段祺瑞预备下的便衣打手，袖藏短棍，目的在不用刀枪而于冲突时可以木棍向群众痛击，取得胜利。但当警备司令部兵队（国民军之一部，为鹿钟麟所领）到时，段氏的警卫都退后了，有意使国民军与群众冲突，而警卫乐观其成。此时群众亦情势汹汹，欲拥入段宅，冲突将不可免；国民军某军官突向兵士演说："今天学生来此为纪念国耻，为争自由；他们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只有他们打我们，我们今天万不可打他们！"学生群众一闻此语，全体感动，有流涕者，大呼"国民军万岁！"国民军闻之，亦十分感动，相与对泣！翌时而群众觉悟，撤退请愿，整严队伍，游行示威，扩大口号，沿途高呼：

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国民军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段祺瑞反动的权威，亦知民众势力的不可侮，在两日后将被捕者释放了。章士钊在民众怒潮中，也递了一张卑污苟贱，丑态毕露的辞职呈文。在这次事件中，尤有两种现象可以注意：（一）段祺瑞故意要使国民军与民众冲突，而国民军

颇具爱国知识，处置得当，颇合于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之口号；（二）据传闻张作霖以学潮高涨为词，请兵入京“拱卫”，显见奉天军阀对于政局及民众运动之压迫与野心。处在高压下的北方民众是应当提防的！

原载《响导周报》第116期，
1925年5月24日。
署名：罗敬

奉军入京以前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北京通信）

制造河南战争的是段祺瑞，制造四川战争的是段祺瑞，再制造快要爆发的奉军与国民军战争的也是段祺瑞。这并不是记者的私言，有事实可以证明呵。

段祺瑞上台后，形势上是处于两大（奉天与国民军）之间，若有人设想他将长久维持两大之间的均势以自存，这将是一种错误。现在事实业已证明段祺瑞必然的要使这个北方的大战争赶快爆发；他预计的结果，一定是奉天的胜利。他在将来，虽不免要向奉天低头，但其政策不能不如此。因为可以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段祺瑞与张作霖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谁也认识得清楚。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很希望战争从速爆发，因为他看清了国民军内部团结之不力

与实力之不充足，若不趁此时机一战了事，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北方军阀之局面便不会稳固。金佛郎案之解决，是段祺瑞为张作霖筹战费；西原借款之整理，是段祺瑞为张作霖筹第二笔战费，并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基础。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并不是什么“增高奉方政治上之发言权”而确是“凡事易促中央实行”，因为奉方的发言权已经再高不过，只是“凡事不易实行”，所以段祺瑞招之便来，用以“拱卫京师”，斩断国民军间的交通，威迫解决陕西问题，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军若屈服隐忍则已，不屈服则战争立刻可以爆发！

奉军与国民军之战本不可免，本报于数日前已言之。记者并曾说，张作霖出京之日，即这个战争局面之开始。然而最近局面之发展，则是段祺瑞作成的，因为段氏明明白白派人告诉奉天，中央事之办不动，要借重奉天威力；他们同是日本帝国主义之工具，当然声气相求，力谋建立并稳固北方反动军阀政治，消灭异派军阀势力，镇压民众革命运动。所以未来的战争不爆发则已，爆发以后屠杀人民，祸害人民的责任，直接应由段张两军阀担负，间接应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担负。奉天军阀的优势，现在是很明白的。镇威上将军，最近攫得直隶山东，连接京奉与津浦线，又占据京汉北部，日法帝国主义者供给军械十分充足，在交通运输上，也已预备妥当了。

在这个紧张的时局中，又有北方买办阶级的崛起。这般买办阶级的活动，不特与战争有关系，并且引起军阀政局经济财政之重要变化，是日法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灵魂。这般买

办阶级就是新旧交通系，梁士诒曹汝霖是其首领，其最近奔走段张之间，为段张讲通，为未来战争筹划，普通报纸已经记载，尽人皆知。本来买办阶级在半殖民地中国与军阀之勾结，为军阀所役使，特别要在内乱时表现出来。张作霖是满州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者，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势力，所以买办阶级的交通系，必须托庇于其下，以图施展卖国的手腕。中国的最大买办阶级——交通系——在北方勾结胜利的军阀（张段），形成胜利的帝国主义（日法）之发展局面，是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国民革命的运动者对此形势应当认清，劳动阶级尤其要识破这个局面。

张学良于日前入关，便是秉承父命与祖(日本帝国主义)命而实行对于未来战争之检阅。同时，这又是军阀对于民众的示威。军阀连年制造战争，民众不能反抗，特别是在北方，国民革命运动方在萌芽时期，又要遭受摧残了。最受痛苦的还是工农群众；奉军入关之后，弄得交通停滞，人民不安，乡野农民奔走相告大祸之将至；京汉铁路北段各地仅得数月的舒宁，最近奉军侵入，竟将石家庄等地的工会会所占据；军阀利用军事行动的招牌，压迫人民的事件从此愈多了。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集中势力对付奉天与安福军阀之进攻！

原载《响导周报》第116期，
1925年5月24日。
署名：罗敬

奉系军阀压迫开滦煤矿工人

自从五卅运动发生后，媚外的奉系军阀，帮同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青岛与天津，是奉系军阀屠杀案之最大者。最近又有伟大群众之开滦煤矿工人，因反对英人虐待，要求工会组织，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又受奉系军阀李景林之压迫。本月十四日，李景林派重兵至赵各庄矿，先与英人矿主商量，得其贿赂（闻有二十万），遂用军队押解工人上工，并捕去工人领袖十数人，处以极刑。北方奉系军阀势力下的一切民众运动都受摧残，青岛、济南、天津、奉天的牢狱里，囚满了革命的工人和学生！

奉系军阀将要横行到几时呢？中国工人阶级是这样相信的：奉系军阀在现在尽量的反动，反激出革命工农与学生培

养的实力；奉系军阀之死，也必死在革命的工农与学生群众手里！

原载《政治生活》第52期《时事短评》栏，1925年9月23日。

署名：乐

汉冶萍煤矿工人突遭压迫

帝国主义者屠杀惨案未了，军阀与资产阶级对于工人之压迫与屠杀事件，在两月以来，又层见叠出；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孤军战斗，一方面又辛苦万状愈受痛苦——这诚然是一个新的时期，快要决定中国工人运动之厄运，同时亦将决定中国民族革命之命运。广州事件之严重，要看把反革命的势力，能否完全肃清为转移。全国工人之厄运，也要看劳动阶级能否更加严密的团结，森严壁垒以作战斗。这两者的关键，都关系于目前新的历史时期，从五卅运动发展到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前途。

开滦煤矿的大罢工才过去一星期，汉冶萍的安源煤矿工人又遭压迫了。一星期前开滦赵各庄煤矿罢工事件的结果是：

奉军强迫工人屈服于英人矿主之下，无条件的上工，并捕去工人领袖十余人，施以毒打，又占据工会会所，声称“奉段大总统与张上将军令，工会不得设立”。这次汉冶萍安源煤矿事件，则起于：（一）工人要求发给四月的欠薪，公司不给，反诬工人怠工；（二）公司方面疾恨工人俱乐部如死敌，屡欲加以压迫而不得逞。最近公司总经理盛思颐至安源，携有款项，工人要求发给所欠工资，结果只发一月，而盛氏以矿警、赣军及湘军三方合同之武力，突然占据工人俱乐部，抢去俱乐部之什物文件，捕去俱乐部职员数十人，又枪杀拥护俱乐部之工人八名。同时，又开除工人一千余名，不与发薪，武装强迫离矿。此外工人受伤与逃亡者不知其数。但此次萍矿事件，并未经过罢工；资产阶级与军阀纯全用的是政治压力，与天津纱厂主联合会及开滦之英比矿务局，雇用李景林（纱厂主送李五千元，英矿主送四万元）的事件，前后一辙。

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本是全国工人的模范组织；举凡工人子弟教育与消费协作等事，都办理得十分完整。同时也因为有这个事实；故当全国工人被攻之时，安源的组织也不免一毁。我们记得在郑州天津罢工事发生时，有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方诧异于为何工人要“对内”罢工，因而在一些报纸上，发了些什么“爱国运动与劳动运动”的牢骚，而认为：“惑疑”。现在萍矿的事又发生了。劳苦的工人阶级一定要向那般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论者说：“请你们来看看我们的实况，并仔细考查罢工的原因。工人只有阶级，没有‘对内’‘对外’。罢工诚然是一件不得已

的事啊！”

公司经理盛氏到安源后，日与铁路局长打麻雀，以一千元为底，随身带中法英日秘书及翻译女奴多至百余人，一举一动皆有数十婢女为之殷勤；但对于工人的欠薪则不发，并调重兵自卫，日与路局谋所以对付工人，卒以用武力压迫。这是“举国一致对外”之时的资本家的行动啊！

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此时自己决定其命运，决定其经济的战斗，同时亦决定其政治的战斗！

原载《政治生活》第53期，
1925年9月30日。
署名：炎

沪日纱厂又开枪杀人

上海日纱厂的罢工问题，在中国工人一方面，本是含苦忍痛而解决；当纱厂工人复工之时，上海总工会所发表的宣言，已经说明。不料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肯守条约之信义，公然破坏成约，无故开除工人。工人激于义愤，遂又罢工，提出质问。乃日人受此质问，无辞可答，开枪威吓，结果男女工人受弹负伤者十一人。日本资本家之野蛮横暴，可谓至极了。

日本资本家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与国内军阀之态度是有关的。在奉系军阀殖民地的上海戒严区域中，张作霖的旧恩人老灵魂之日本帝国主义者，当然敢于为所欲为。这是必然的事。

日纱厂问题之解决，并不是上海工人的妥协，而是受迫而成，但在资本家一方面，却一步一步逼紧了。凡是革命的民众应在此看看：是中国工人之软弱呢？还是帝国主义的险恶无耻？

但在此事发生之后，却有一件有趣的事。日本的机关通信社说是由奉军开枪的，他们做了贼，却不肯承认曾做贼，不肯负责。他们又将贼的名义，推在他们所雇用的贼身上。日本人于此并不是故意嫁祸于人，而是在奉军方面，本负有这个任务。谁能说奉天的兵与日本人的卫兵，还是两样呢？而且从邢士廉到上海戒严以后，上海的工人都已认识：大英帝国与大日本帝国的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连邢士廉在内）都是一家人。

原载《政治生活》第53期《时事短评》栏，

1925年9月30日。

署名：言

张作霖对帝国主义者之宣言

最近各报所载张作霖与美国联合通信社董事长侯乌特之谈话，便是张作霖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一篇宣言，由美国人为之记录起稿发出，又由中国人自己的报纸为之辗转郑重登载，以广宣传。据该通信社自己说，这篇宣言已经寄与美国三十余家报馆，但我们相信，遍欧美的帝国主义机关报纸都将与以登载；因为张作霖有这样露骨的一篇宣言，各帝国主义者得之，将如获至宝。

张作霖对美国通信社记者莞尔而笑曰（录原文）："治外法权与关税两问题实为无关重要，据外人眼光观之，或据华人眼光观之，此两事均非根本重要问题。……"这几句话是奉天大军阀正当全国力争关税自主与取消领事裁判权之时

说出的。全国人民所认为重要的问题，在张作霖偏认为并不重要。而且张军阀这几句话的意思，为能取媚于帝国主义者起见，连中国资产阶级所应赞成的关税自主之利益也抛弃了。奉天军阀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由此可以证明。但毕竟张氏所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些什么呢？

"目下最使外人注意之事项，则为如何设法应付中国时局之问题，因中国时局益趋恶劣，日益紧张，——过激主义之火星，虽已潜入中国各地，而尚未到燎原之时，如能从速设法，加以防范，不难制止。……"对于这个重要问题（过激主义之火星）张作霖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呢？有的！张氏说："如遇必要时，吾人之军队亦可抵御全国过激之害。"这种解决方法对于帝国主义者有所要求没有呢？也是有的！）张氏说："但吾人须得有关系各国之援助，此援助为何，即为最有力道德上之援助，与经济上之援助是也。"又说："外国对华所持之油滑政策，应即变为统一而与中国强有力之领袖合作之政策。"最后，张氏害怕帝国主义者不相信或不注意，所以又郑重的说："所关系各国是否赞成此强有力之人物一节，实较关税与治外法权问题，尤为重要！"

强有力的人物张作霖，对帝国主义各国作了这一番强有力的表示，几句话轻轻的抹杀了全民族的利益，同时亦抹了中国资产的利益，就用爱国或救国主义来说说吧，张作霖已经不是中国人啊！我们曾屡次说过：军阀之所以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便因其纯粹代表帝国主义之利益，供帝国主义之驱使。张作霖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已经尽其所能，使其部下继续屠杀中国民众，行使帝国主义者的屠杀策略。而这全篇谈

话发表之目的，正是要向帝国主义表现其数月的功绩，求得完全的信用，从早建立完全帝国主义工具之军阀政府，在这个希望中，张作霖当然也猜透了，北京段政府已为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所不满意，所以巩固北京段政府之关税会议，并不重要，而“赞成强有力之人物一节，尤为重要。”其实，关税会议开幕之日，即段祺瑞大总统小产之时，段政府固然因此光利不少，而段政府以关税会议之所得，对强有力的最大军阀之报效，当然也是不少的。不过张作霖仍然宁愿帝国主义者相信强有力领袖之重要，赶快从道德（即军械）及经济上扶助他统治中国，惟有这样才是合法的与合理的，所以“列强对中国合法的欲望，如不能为合理的应付，即为不智。”而且“进行事宜，总以无停顿为要”；“停顿发生，则过激派即得宣传之好材料，一般主张采用革命手段之人，亦得良好之机会”。关于这个计划，在张作霖的意见是：“华人对此固为重要，外人对此尤为重要”。这种媚外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了！

由最近的军阀分化所表现的政治状况，国内再一次的战争似乎是不可免的。革命的民众应当知道，反帝国主义运动之结局本免不掉一场的内战。因为这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关系之枢纽所在；而这个枢纽又不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之外患内忧区别问题，仍然是为民族利益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战争问题。所以革命的民族只希望未来的战争成为革命与反革命之战争，而不成为又一次的军阀之内乱。在现在的国内政治形势看起来，这种战争的形势尚未完成，而混杂的军阀战争已有爆发之势。谁主使这个战争呢？这又是帝国主义者（目

下主要的是英日两国）“强有力”的大军阀策略。我们可以简单明了指出这个策略主要点之所在：在最近的时期中（即所谓关税会议以前），内乱确有爆发的可能，然而帝国主义与大军阀的策略，定将使战争零碎的、混杂的爆发起来，而竭力避免成为整齐的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线。这种策略之目的，至少的结果是打消五卅以来的民众运动，而在帝国主义者所盼望的结果，则是恢复五卅以前的奴隶中国状态，使中国的殖民地地位，更加根深蒂固，翻不转身来！

革命的民众应当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合谋奴隶中国之战争！同样的，革命的民众也并不认为关税会议是怎样重要。因为这明是军阀邀请帝国主义者对华宰割的会议，何从有所希望？民众所认为不重要的理由，与张作霖所说的理由却绝不相同。张作霖的意见是：只要能使他治中国，能镇压工人学生，能防制革命，何必要关税会议？民众的意见则是：请强盗到家里来会议，哪里还会有好结果？所以从张作霖对帝国主义者宣言的一篇谈话里，民众固然不相信关税会议真是重要问题，甚至段祺瑞说得好的所谓修改条约，也不是真的重要问题。中国重要问题的目前切实方案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奉系军阀，毁灭段政府并毁灭一切军阀与其余烬之国民革命。正是在这个行动的方案之民众表现里，张作霖已经认识得清楚而且恐惧，所以对于帝国主义者能够那样披肝沥胆言所欲言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53期，

1925年9月30日。

署名：士炎

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

九月十八日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两方面都有了新的企图；这种企图对于中国被压迫民族，尤其是新兴的工人阶级，进攻将愈更利害。由五卅运动发展到现在的民族运动，结果是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由青岛天津的屠杀，上海的戒严与工学商联合会遭压迫时而酝酿，直到现在上海总工会之被封而完成。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将为所欲为；在现在可以予知的大事件便是：沪案重查，关税会议，以及段祺瑞的所谓国民会议。

五卅运动如果不发展成为民族革命运动，自然只会有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反动的胜利，而没有民众的胜利。民众胜利

的条件要建筑在：一方面占大多数的工农阶级为战斗之先锋与领导；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爱国群众（学生与商人）极力拥护战斗的基础且以实力参加。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最简易的形式。所以在这种战斗形式最初兴起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非常的恐怖，军阀也不得不有所畏惧。

张作霖正当入关至天津欲改组政府预备战争之时而五卅事件爆发，只得以扩充地盘为结局而归。这时候爱国与对外的空气也笼罩了军阀，所以张学良公然赠送上海受伤的工人与学生二千元，嗣后段祺瑞以政府名义，也汇款接济罢工工人。在这时候，上海民众团体林立，不闻受压迫；上海总工会的权力伟大，军阀不敢干涉，亦不敢否认。

现在上海总工会被封了。这个被封的原因自然有许多政治的主要压力，关系于帝国主义应付中国民族运动的策略，亦关系于军阀压迫民众之实际趋势。但是溃散在民众行列里的破绽，因民族运动而起之阶级分化，在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前，就表现得很多了。上海总商会一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二不照工商学联的十七条件而自提抛弃民族利益及工人利益的十三条，三不履行排货与接济罢工的宣言。在上海方面，自从日纱厂谈判开始后，工人阶级已经是孤军独战了。北京学生群众，本可依据历史地位与团结实力而为有力的政治发言，但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因畏惧革命性的政治主张而将学生群众分裂起来，北京的学生运动至今还没统一，为段祺瑞、朱深所轻视，为章士钊、刘伯昭所讥笑，上海及各地派来求援的代表均无结果而归，工商学大联合的组

织亦不得成立。这仅是两个主要的例证。上海工人之孤军独战以至现时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并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一些积渐的事实，总合外部的压迫，内部的溃散以至阶级之分化的必然结果。几月以来，媚外军阀直接屠杀或压迫工人（如青岛、天津纱厂，上海全部，开滦煤矿及最近之汉冶萍煤矿）；工业资产阶级破坏工人组织，利用工贼杀害工人，捣毁工会（如河南郑州与上海）；商业资产阶级妥协而奸滑（如上海总商会），一般奸商私运偷买，甚至以罢市要挟（如山西太原）；学生群众亦溃散团结不力（如北京）。这许多事实便是自五卅惨案后的积渐事实，其中包含的主要动因是阶级之分化，而同时即埋伏了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之进攻策略，与他们现在的反动胜利局面。

但是革命的工人及一切革命民众应当知道，这个胜利局面关系中国革命问题固是十分重要的，但其最重要之点还在革命的工人阶级及一切革命民众如何认识这个局面，从严重的压迫形式里找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的趋势，从革命的战斗经验与实际政治里找出此后的策略。中国工人阶级与革命的民众现在也有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就受胎于反动势力扩张，白色反革命恐怖弥漫之时。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使全国工人阶级一面愈更觉悟，一面回忆几个月来的经验，而准备新的奋斗。新的奋斗之战线，将进到壁垒森严的阶级战线上来。必须如此，工人阶级才能更进一步领导民族革命运动。必须如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才不致为反动所震慑，为妥协派所背叛，而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小资产阶级的商人群众与革命的学生群众，也必须在这个新奋斗旗帜

下，共同努力于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从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所得的经验不是别的，就是觉悟到国民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本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在国民革命之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阶级争斗，也是必须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五卅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所忍受的是：屠杀、逮捕、饥饿，及一切虐待。所以工人要求各种被压迫民众一同反抗帝国主义，要求军阀不要媚外屠杀工人，要求各界人民救济罢工，要求工会之法律的承认。但这些要求都不遂，军阀之压迫只有变本加厉，工人阶级到最后只有尽力之所能，对于这些要求用自力夺取了。我们相信工人阶级举行经济争斗及猛烈的为政治利益而战之时，即革命成熟之日。现在正是这个新时代的开始，全国工人阶级由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觉悟起来。中国工人愈经战斗，力量亦愈雄厚；从香港海员罢工事件及京汉铁路工人“二七”之役，以至现在之五卅运动，从局部的发展以至于全部的，压迫愈大，政治的变更愈猛，阶级的分化愈速，都是促成工人运动愈发展之客观条件。因此而全国工人阶级不仅认上海总工会之被封为一单纯事件，其历史的意义与实际的环境，很迫切的号召出广大的劳动群众，立刻走新的奋斗局面，而在壁垒森严的阶级战线上团结，而且战斗！

上海总工会被封后的两星期以来，只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与各地工会提出抗议，及革命的学生团体向段祺瑞严重质问与要求。别的人，都不闻声息。上海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虞和德说：“封闭上海总工会不合时机”，这句话并不是圆滑，而是表现出资产阶级对于军阀执行帝国主

义命令之行为，一面表示满意，一面又表示对于革命的工人阶级之恐怖。工业的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自然是欢天喜地，要歌颂段祺瑞与张作霖之功德了。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到此时只有叹惜，不敢发言，似乎还想徘徊歧路。然而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从此后正是得所趋向，愈更反动，正式受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雇用了。

中国社会阶级表现之清晰如此，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之侵略与压迫正未已，象这样的客观政治与社会条件，怎样能够不使中国工人阶级从八小时工作制的经济要求，立刻过渡到撤退外国军队的政治要求，又从组织工会的团结，立刻过渡到对压迫工会团结的统治者之阶级争斗？英日帝国主义者，奉天军阀、北京段政府，现在联合起来催促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催促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之发展，这是很可乐观的事！

原载《政治生活》第53期，

1925年9月30日。

署名：士炎

"五卅"纪念与双十节纪念

辛亥革命而后，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中断了十余年。在今年双十节前五月之"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潮流突然高涨的表现。拿"五卅"运动之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看起来，辛亥革命之完成，将是最近时间内的事。

忘却了今年"五卅"运动的纪念，便不能纪念今年的双十节。今年双十节有些什么可纪念呢？追忆辛亥革命之未成功，固然是要紧的，但尤其要紧的是，要仔细思索目前足以为革命条件的各项政治与社会问题：

（一）各地惨案久不解决，帝国主义者各种侵略政策（如关税会议）已复活；

（二）军阀之遗留而强大者，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民众；

（三）反动的政府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剥削人民的一切自由；

（四）工人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孤军战斗，反动的军阀与政府加以极大的压迫，工会法不得建立，工人的自由丝毫没有；

（五）农民在乡中既受苛税的横征暴敛，又遇军阀的征兵遣役，流离颠沛，充满了经济生活变动之痛苦。

革命的民众所当讨论的，是如上列的各项政治与社会问题。目前反动的政府，与军阀官僚等对于双十节之感想及其恐怖，是恐惧战争（内乱）之爆发，及彼等地位之不稳固。但是我们应当让军阀官僚恐怖于革命民众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实际政治问题，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与统治中国的军阀官僚提出，在今年双十节纪念日，高撑民族革命的大旗。辛亥革命虽是未成功的，但"五卅"运动在今年的双十节纪念之前，已提起革命的成功先兆。

双十节不是别的，不过是辛亥革命尚未成功之警告节。在今年警告民众的，便是各种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如上所述。因此而革命民众在今日所当奋斗的，便是对于这些问题应采取的革命行动。

自从"五卅"运动以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又表现出几种特质。这些特质由历史的实际变化而来，在今年双十节纪念日，是值得特别提出记忆的。在民族运动中，帝国主义者应付的策略，已由武力干涉而变为协同侵略，如最近的关税会议之预备，便是帝国主义协调的政策的实施，这是可注意的头一点。其次，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经过各种时期的进步与

蜕化，到现在已渐次表现阶级之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的结果表示，真能够领导革命进展之代表者，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复次，中国民族革命已进入世界革命联合之境地。自“五卅”后，各国劳动阶级，特别是苏维埃联邦的工农群众，所给与中国民众之同情与援助，为空前所未有。这种革命意义之世界的发展，实由“五卅”而起，因此而今年双十节纪念之新的意义，乃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的时期之完成。

在今年双十节纪念前，有伟大的五卅运动之发展。在双十节纪念后，世界与中国的政治与革命问题，依照现状说起来，又正是一个紧张局面。这些紧张问题在中国政治上的表现甚多，为中国革命民众日常所应奋斗。切实的说起来，便是：中国民众现应当在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者军阀分赃的关税会议；主张关税之税则绝对自由与管理自主；反对政府与军阀对民众运动之压迫；速定工会法律，保护工人的经济奋斗；主张人民的无限制的政治自由！

原载《政治生活》第54期，
1925年10月7日。
署名：乐生

沪案解决与段祺瑞政府

段祺瑞敢于封闭上海总工会，敢于压迫各地的民众运动，自然也敢于违背民族利益解决沪案。自从奉系军阀在各地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民众，自从段祺瑞下令镇压爱国运动，丧权卖国损害民族利益的沪案解决办法，早已由段政府与其外交部预备好了。现在列强所提的对沪案之意见，段政府的外交部之答复态度是欣然承诺，“可表赞同”。列强所提意见既然可以表示赞同，所谓沪案重查的驳复。当然不过是一桩官样文章，段政府现在欲求得帝国主义之欢心，并求己身政府地位之巩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作，对于沪案之解决，当然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举国力争的沪案，现在看看快要被段政府卖去，用以换

得他的政府地位之长久。段政府经营这一桩买卖，与他经营的金佛郎案一样：在金佛郎案解决之前，段祺瑞用方法买得各方面钳口不言；在现在沪案快要解决以前，段政府与奉系军阀先压迫了各种的民众运动。段政府的机智巧妙，置全国人民于掌握之上，任意玩弄。目下沪案之解决看看成熟了，列强对沪案重查悍然举行，外交部对未重查前之列强照会已欣然承诺，赞同一切办法。国内舆论在此时只知道悲呼外交的失败，还没有看出沪案实已解决，民族利益已受损害，还没有看出这种解决是段政府的计划，还没有看出英日帝国主义胜利的可怖，更没有看出美国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

为什么现在沪案之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之胜利，又算为"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呢？自五卅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的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干涉；一是华盛顿会议的政策。使用前一种方式的，自然是英国。现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政策，也并未有完全抛弃，尚积极的采用于对付广东革命政府。主张华盛顿会议政策的，自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都明明表现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沪案的重查是美国帝国主义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协调行为，美国委员为重查的委员长，为此种协调行为之领袖。关税会议是日本所反对的，因为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最为密切，出入口税受影响最大，尤以棉纱产业最受打击，本不是日人所愿意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关税自主问题特别注意，派出侵略中国之老将日置益为关税会议代表，日本的资产阶级与举国的报纸，纷纷起而讨论日本帝

国主义对于关税会议应持之态度。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中，特别是在欧美帝国主义对东方的策略中，英国是受美国所牵制，在共同的利害上，英国不能不赞同美国的政策。同时，在太平洋上利害的关系上，日本又不能不牵连英国以制美国。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受打击的时机，慨然而出，以关税会议为号召，英国起而首先赞成，日本亦不得不以赞成的态度，急起应付。这便是"华盛顿会议政策"复活的前因与后果。

段祺瑞政府现在的地位，自然适宜于"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政策之下生存。借关税会议以巩固政府地位乃至取得未来的大总统资格，这自然是段祺瑞惟一的可走之路。重查沪案以至毫无损失的解决沪案，这自然是帝国主义者与段政府已有的契约。中国的民众决不要幻想段祺瑞最初对于沪案之激昂表示，就忘却现政府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能以钱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亦能授意军阀邢士廉封闭上海总工会。所以损害民族利益之沪案解决办法，在已将民众运动压迫平静之时，段氏可以悍然执行。沪案之解决与段氏政府之存在相连，没有依照帝国主义提议之沪案解决办法，便没有可以继续存在的段氏政府。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之关连如此，没有革命的民众政权之胜利与取得，自然说不上外交之胜利与不胜利。现在的舆论只是外交失败了，其实中国还有外交可言么？对于这样现状还不能认识么？代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的心理，实未免太不革命，太懦弱啊！

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大多数的革命群众，实不承认沪案之失败，尤不承认民族革命运动潮流之低落。中国的工人阶级

现在只发现阶级之分化，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之投降，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溃散。但是这种分化与投降或溃散，并不足以丝毫动摇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国民族仍然是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阀与资产阶级之违反民族利益的一切行为，只是促成大多数民众革命的条件。解决沪案与向中国民众进攻，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必然策略。但是沪案解决现状之悲愤可恨，正是中国民族运动怒潮不致低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的兴起由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自己促成，段祺瑞政府的倒塌亦由段祺瑞政府自身的行为所驱使。

原载《政治生活》第54期，
1925年10月7日。
署名：士炎

军阀战争之序幕

江浙的战争开始，军阀又一次的战争已经开幕了。最近江浙动兵的形势，绝不只是江浙问题，而决然的是全国的内乱之序幕。

帝国主义之工具，反动军阀的势力，现在还统治中国，内乱形式的战争本不可免，而且必要的。在革命的民众方面的问题只是：是不是能使战争成为革命与反革命之战，是不是能使许多次的内乱，到了现在变成革命性的内乱——最后一次的内乱？

但这个时机还没成熟。这一次的内乱在形势上主要的仍然是军阀之战争。这一次内战所异于前内乱的，只在于：（一）前几次的内乱由于帝国主义者各自扶助一派的军阀，

举行为帝国主义统治利益的战争；而这一次的内乱，将是许多派别的军阀势力联合对于目前最大的帝国主义工具——奉系军阀之攻击；（二）前几次的内乱，民众行动完全受战争的束缚，而这一次的战争，因为最近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有一部分的武力倾向与民众之结合，将表现民众的力量。所以在结局上看来，目前战争的局面，比较前几次的内容为复杂。这种复杂的内容，在革命的进程上看来，是进步的。这种进步，是民众运动发展的效果。

民众运动发展的效果，在扰乱的时局中，在军阀统治的政局之下，可以促成军阀政局之崩溃，可以使军阀战争的形式虽复杂而目标能集中。民众运动的本身，也必须要经过各种战争的磨练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能力。所以这次内乱的性质，在形势上主要的虽仍然是军阀之战争，但实质上包含了民众的势力。这一次战争的结局，无论是哪一方的胜利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革命的主要问题乃是，在这一次战争后，民众是否能有所得？民众革命的势力，是不是愈以发展，愈以进步？

"五卅"以来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仅没有消沉，而且表现有组织的群众（工人阶级）之勇于战斗，国民革命运动已有了基础，有了中心，有了领导的群众。"五卅"以来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其结局早就可以料定是一场内乱，一次的战争，并不是中国对任何国宣战的问题，而是民众蓄积力量，先扑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打倒帝国主义势力的问题。现在这个战争已经来了，开始了！

站在奉系军阀与反动的北京政府之后面的目前自然是英

日帝国主义者。英日帝国主义已成为四个月来中国民众合力攻击的目标，奉系军阀也同样的在最近儿月来为遍于全国的民众所痛恨。在战争开幕之时，目前在江浙发难的直系残余之军阀，其背面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亦若隐若现。但是民众并不畏惧这个。民众并不是怎样参加军阀战争，而是在战争中要采取民众自身的积极行动。对于任何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行动，都当严防，如防大盗。革命的民众在目前所奋斗的，是为民众政权的奋斗！

上海的工人应该立刻起来要求恢复工会，全国人民应该立刻起来要求各种的自由。民众监督军阀的战争，要以民众的力量来确定这次战争的性质，使战争目标的集中，准对着帝国主义工具残暴恶毒的奉系军阀。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应当是目前为中国民族争自由独立战争的切实工作。

民众政权的争斗，要从此更激烈，更勇猛！

准备着未来的政府，让他成为人民的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给与人民的一切自由！

原载《政治生活》第55期，

1925年10月21日。

署名：士炎

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

国内军阀的战争既已开始，关税会议在现在成为段祺瑞政府唯一的续命汤。同时，这也是段政府要想献媚于帝国主义，要想卖国，要想延长自己的寿命，唯一的只有这条可走之路。

民众要反对关税会议么？段政府现在已经预备，无论怎样本月二十六日的开会，非求能实行不可。段政府现在对于战争，本来害怕而表面露出沉静态度的原故可就为的是希望关税会议可以开成。段祺瑞也诚然知道目前内战的开始，是关税会议的打击。但是段政府只要在北京城内能够存在一日，就可以多进行一点。将近一年以来，段祺瑞在北京城内，已经替各国帝国主义者办了许多事：金佛郎案其一；西原借款

其二；无线电问题其三；沪案解决其四；中日文化事案问题其五……此外，还有许多许多。民众对于这许多要案都表示反对，而结果段政府都在民众高呼反对之下，取得胜利了。用着同样的态度与方法，无论在怎样的反对空气下，段政府目前对于关税会议，当然要悍然不顾，用全力使之成立。

在民众一方面，实际上现在反对关税会议的并不是全国各阶级有一致的态度。真正明了关税会议的用意，知道关税会议应该被彻底反对的，只有正在战斗中，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商人群众，现在还想到关税会议里争一个关税自主，同时也便是他们还相信段政府是能替中国人民争关税自主的政府。但工人阶级及各种革命的群众意见则以为：要想真能得到关税自主，只有民众以自己力量，实行革命以后，自己宣布关税自主。希望段政府能办到关税自主，与希望段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同样的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赞助了关税会议，反是助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恶的延长，与赞助段祺瑞的反动政府继续其生命。所以关税会议与段政府一样现在应当同时被反对。而且段政府与关税会议是分不开的，现在北京城内的这两件东西，是一而二，二而一。段政府已经不存在，但关税会议尚未开，所以表现段政府尚表面存在。段祺瑞现在实在只想从帝国主义者要这件东西——关税会议，而帝国主义者也曾想组成这个会议，好建立在中国的事实政府，布置宰割中国之局面。

关税会议与内战还有更深的关系，更密切姻缘。目下美国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政策”正得势的时候，中国的内乱爆发了，但这个内乱并不是中国军阀自己爆发的，反之正

是帝国主义的政策所驱使；我们绝不能说：帝国主义者现在只要关税会议而不需要中国的内乱。在现在国内战争的局势中，如若说奉系军阀肯退让，这是笑话，英日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绝不许可奉系之退让；倘若退让，则是自"五卅"运动以来，英日帝国主义所指挥奉系军阀压迫民众运动的成绩，都将化为乌有了。目下英日帝国主义者，正积极扶助奉系军阀，参加中国的内战。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此时也绝不会懊丧"华盛顿会议政策"之不能实行，因为"华盛顿会议的议决案"，本来不是必须要实行的东西，只不过在中国民众运动高潮掀起时，骗一骗中国人罢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同样眉飞色舞，在内战声中活跃，因为一方面有这一个关税会议，另一方面旧日鹰犬的直系奉军，伤痕已平，看看快要恢复原状呢！剩下在眼前的关税会议这件东西，虽然是将开而未开，事实上只不过是各国帝国主义，有一番协调之后，拿出一个骗段祺瑞政府与骗中国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摆一摆样子罢了！

关税自主的运动是中国民众所需要的。但是现在北京城内的关税会议，成为中国人民之仇敌，这个仇敌之可怕，不因其是否成功而判断，只在政府召集此会议；与各帝国主义者应允开会的合同企图里，就埋伏下中国民众敌对行为。正当内战开始时，又当帝国主义与段政府合同的企图时，革命的民众应当猛烈起来表示自己的意见，对于帝国主义及段政府下攻击！

关税会议将开幕了，手写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认的日本帝国主义凶恶之代表日置益已经来华。这位日本代表不只是

袁世凯时代的凶徒，同时亦是段祺瑞的恩人。捧着“华盛顿会议议决案”的美帝国主义代表也来华了，他们正当内战开始之时，经过上海，马上就要发出不满意中国内政的假面具的话。这些圈套都是帝国主义者与段政府合同做出的，中国民众立刻可以揭穿这个局面。

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欺骗，在开始欺骗时就会失败。华盛顿会议的骗局，除开直系政府与向不觉悟的中国资产阶级外，大多数的民众从早就鉴别清楚。这一次关税会议骗局之构成更启发了中国民众更快的觉悟。目下的段政府好比风前烛。关税会议与段政府自然同生死。在帝国主义者方面，关税会议算是给段政府的赙仪奠礼罢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55期，

1925年10月21日。

署名：乐生

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之崛起

中国劳动运动与民众运动促进一步，军阀的战争，在民众面前又展开一幕，这是近五年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迫得中国愈成为革命的中国！

我们已经说过：近来由直系军阀发难的战争，决然的是又一次全国的战争之开始。我们又说：这次战争与前几次的战争性质不同。结果将以民众力量的伸涨，为战争胜利后之正确的判断。这两种理论将是没有错误的。虽然战争在最近一星期中，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国的；但同时民众运动的力量，也尚未奠定基础，布置完备。摆在目前的为大多数民众所惑疑，且急求解决的问题，便是：

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为甚么公然崛起？

民众对于这个问题惑疑了。吴佩孚的声势一天一天的浩大了。旧直系的一切势力都恢复，连一般贿选议员也活动起来。吴佩孚的宣传机关，其报纸，其通信社，其旧仆从，在目前所做的政治与宣传工作，比起应当运用时机，负有领导民众责任之国民党，从长江流域乃至北七省看来，要胜过十倍。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民众为甚么不因此惑疑呢？

我们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责任。

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之崛起，是军阀内部一种不可免的现象，同时亦是吴佩孚及直系军阀自身必经的阶段。对于吴佩孚崛起负直接责任的，并不是章太炎蒋方震等几个疯子与政客，亦不是奉天的红胡子张作霖，更不是毫无用处的段祺瑞政府，而是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之自身。这话是怎样说的？原来吴佩孚及直系军阀并不能无形消灭；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吴及直系势力虽然占一部分的重要作用，但其结局只有再暴露一次自己的面目，而由其它各部分的反奉力量，来决定其运命。具有这种力量的第一是民众，其次是倘与民众结合的国民军。国民军到现在虽尚未决定对于战争的态度，但当此时各地直系军阀之崛起，与国民军之徘徊踌躇互相映照，实甚有意义。然而迫促这种意义之进步的仍然是民众。反奉的战争不应免避，吴及直系之崛起并不成为怎样的危险。

直系军阀势力之并未消灭，亦犹如自辛亥革命以迄现在，一切军阀势力之未能消灭一样。去年政变的结果，将政权交与段祺瑞及张作霖，自然有今日的现象，其结果张作霖成为众矢之的，段祺瑞亦成为人人欲驱之去的人物。但是暴露张作霖与北京政府罪恶的，是一年以来，尤其是五卅以来的民

众运动。同时，民众亦未忘却过去直系当权时压迫人民之经验，与现在直系军阀势力下受摧残之痛苦。但民众不能拒绝直系于反奉战争的战线之外；民众对于直系，只有：严防他们，莫使他们解散或利用反奉联盟，以建立武力专政。因为这是实际的政治工作。

民众的政治活动愈合于实际，民众政权争斗的时期就愈迫切了。中国愈成为革命的中国。

我们但看目下吴佩孚及直系军阀的内部势力，在一开始恢复时，就表现各种团结的破绽与解体的趋势。我们但看目前战争发展之形势，因为民众尚无积极的行动，国民军尚未正式参加，反奉的全国战线尚未构成，所以直系反奉的行动，表现孤寂与不稳。吴佩孚与直系军阀之崛起，将不成为前政治与军事之主要问题。安排目前政治与军事的主要力量，且决定此次战争之结局者，仍是革命民众的自身。

原载《政治生活》第56期，

1925年11月1日。

署名：士炎

怎样分别国民党的左右派

从来有一个误会，普通一般人以为国民党中有左右派之分，而左派便是共产党员。这种误会虽经多次的解释，但因有一般人成见太深，而结果国民党中的左右派，总是分不清楚。国民党自己既然分不清楚，只把共产党员当作左派，当然会叫反对国民党的人乘间谰言，说国民党赤化，说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了。

这种误会的最大毛病是：（一）明明是左派的分子，因为怕负共产党之名，故不敢以左派自居；甚至有时连左倾的政策也不敢赞同，因为赞成了就怕被称为共产党。（二）一般明明是右派的分子，固然他们也不敢自命为左派，但他们毕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结果以所谓中派自居，欲在国民党

中建设另一种理论，于中山主义外创造另一种主义。（三）旧时（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之前后）所称的右派，现在实际已离开国民党，完全属于反动派了；但他们反比左派分子有勇气，占据着国民党的名义，自居于右派地位而不辞。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分，至今闹不清白，一方面固由于历史关系的复杂，一方面也由于右派及反动派行为之狡黠。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强有力的左派，尚未正式形成。

在追悼廖仲恺君的文中，我们得读×××君的几句话：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往右边去；不要说什么国民党赤化不赤化（大意如此，原文不能记忆。）！这是两年以来谈左右问题时，我们仅能听到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公开宣言。

左派领袖如×君等既然有这样勇敢的态度，所以在最近左派的政绩，表现了好几件有利于革命的事：训练党军克取东江打破惠州城是其一；援助港粤工人罢工是其二；联络并宣传教育北方的国民军是其三；遵守中山遗言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国民号召是其四；应付廖案勇于肃清党中反革命势力是其五。国民党左派之正式形成，已为期不远了。强有力的左派之建立，不特有益于国民党之本身，亦且必须如此，才能合于现在的革命新时期，能实现中山先生之遗言，能担负在革命高潮中国民党自身的责任。

在国民党中，有一个共产派，这是无容隐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不能自认为左派，亦犹国民党左派党员不必自视为共产派一样。国民党中不能不容纳无产阶级与农人分子，因此不能不有共产派的党员与尊重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策。

左派与共产派是绝对应当分别的，但在目前的行动上，乃至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长时期中，左派与共产派应有亲密的联接。这不但是在理论上工农阶级目前应与城市中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分子为民族革命而合作，在事实上亦必须如此，始能战胜一切反革命势力，合于世界革命之趋向。

自从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阶级之分化，就开始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而逐渐显明了。中山先生逝世后，党内所有的官僚买办阶级分子，正式另立组织，在北京便是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上海便是辛亥同志俱乐部。北京的俱乐部以彭养光冯自由为领袖，其宗旨在和军阀与政府谋妥协，在北京发展势力，北京有一部分的青年曾为所引诱，民治主义同志会当初及现在均为之服务。上海的俱乐部以章太炎唐绍仪为领袖，宗旨在结合联治派军阀，于西南发展势力，最近于内乱开始时，复与直系军阀勾结。这两个俱乐部对于军阀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左派，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以破坏广州政府则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是希图发展自己的军队势力，推翻广东政府，并且希图发展自己的党部的势力，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对抗。

这两个俱乐部的分子，以前多被称为右派，实际他们现在并不是右派，而是反动派。

国民党的真正右派，是新发生的。这个新右派的发生，亦是阶级分化之结果。“五卅”以来的革命高潮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势力，显明了工人阶级的任务，因此而一方面在国民党革命潮流中工人阶级之地位提高，而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中

就发生了小资产阶级的右派。为现在国民党右派之领袖，做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之领袖者，不是别人，就是戴季陶君，季陶于“五卅”事起时，在上海并不曾参加民众运动。使国民党能引导群众，而住在家写出几本小册子之结果，造成了国民党右派之新的理论：同时，右派的结合亦渐渐形成。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国民党中已有右派，亦已有左派，在左右两派之外，还有一个反动派。但各派的分子俱不是固定的，全视其一时的行为而定。为分别清晰起见，我们可作下表以示真相，我们盼望每一个国民党员或每一个民族革命的分子，于明了这个真相后，必须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左　派	右　派	反动派
（一）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勾结帝国主义
（二）	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	主张劳资妥协	摧残工农运动
（三）	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	为保育政治而反对军阀	勾结军阀
（四）	联络苏俄与共产党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
（五）	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联络反动势力以抵抗左派	自身即反动势力

原载《政治生活》第56期，
1925年11月1日。

署名：乐生

国民军与反奉战争

国民军对于反奉战争的态度，因为直系武力在反奉战争中的崛起，所以表现一时的迟疑。这个，在我们认为便是国民军尚未真能与民众接近，真能成为为民众利益而战的武力之证。对于吴佩孚及直系军阀之崛起，我们已说明其意义与预测其结局了。在同时，我们便以为国民军若因直系问题而徘徊于参加反奉的战争，便是不当。这种不当的策略所包含之政治意义甚大，为客观的政治环境所付与国民军之责任所不许。果然，直系武力在东南因为利用人民愤恨奉系的心理，而逐渐得军事上的胜利，使奉军屡次失利弃地而走；而在此时国民军始表现不能不参加战争，有所行动。

奉系武力早已预备与国民军为仇，所以在北方对国民军

之布防，与调兵御直，是同时并举的计划。最近一周内报纸所重视的奉军与国民军合同查防而求妥协的问题，在一般人民早已看出这是骗人的伎俩，换言之，即是战争的预兆。人民明知战争不可幸免，但是见着国民军所提恢复去年原有地盘的妥协条件，则不能不警异国民军之政治的企图的错误。

直系军阀在东南所利用的人民仇奉的心理，是一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故现在东南人民之厌恶直系，随日俱增。直系军阀不肯给与民众以自由，防害民众运动的发展，所以虽有政客绅士等之捧场犒军，奉迎其前；但一般民众厌恨与不安的心理，与直系在军事上之发展，同一伸涨。直系将走一年前为所胜而现在又为所败的奉系军阀所走之旧路。所以我们便要由此判断直系的命运，而一方面又盼望国民军不至蹈此复辙！

国民军目前之职责是：立刻宣布自己的政治目标，充分的尊重民众的愿望与自由；在反奉战争期中，并须对民众谨守这种政治的与社会的信约。北方的战争之爆发便在目前了，民众将以此判断国民军的行动，而决定民众自己对于国民军的态度。

原载《政治生活》第57期，
1925年11月7日。
署名：士炎

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

军阀势力之瓦解

正当军阀武力酣斗的时候，从军阀的内部，发生了内哄，自行瓦解起来。这一次奉系军阀的内部，因郭松龄倒戈反抗张作霖，很浅易的引出了政治状况的变化。我们首先应当认识的，便是这种时局变化尚不稳定；换言之，即是：反奉的战争尚未能达到目的，得到完全的胜利。由郭松龄之反戈，及国民第二军进兵保定两件军事上的现象，所能引出的政治变化，只是：（一）奉系军阀势力已弱，从此易于消灭；（二）为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其人物已鸟兽散，易于推倒；（三）数月来民众为争自由，为争民众政权的奋斗，现在得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但是军阀势力瓦解之原因，并非如一般不以民众运动为

出发点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家所解释。许多的新闻记者说：张作霖为模范之军阀，张作霖之失败为军阀之大教训。说这样话的人，既错于相信军阀肯以张作霖之失败为教训，又错于不了解张作霖之失败，乃民众运动所促成，而民众正应当继续奋斗，以完成消灭奉系军阀及一切军阀之胜利；这种教训应当为民众所有，并非为军阀所得。郭松龄之倒戈并非一件单纯的军阀内讧的事实，其中包含有许多社会的，亦即民众势力的原因与意义。

在军阀自身的利益冲突与行为矛盾，本是一件必然的事。尤以在强大的军阀之内部，这种冲突与矛盾埋伏最多，爆发最易。但是促起这些埋伏的火线至于爆发的，是社会的原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势力。尤以军阀用武力相搏之时，民众运动的势力，更易加以影响。郭松龄反戈所发的通电与其种种自白，便是郭松龄向社会民众陈诉他们军阀内部冲突矛盾之所在。郭松龄绝不至于是有所觉悟，有所谓良心之表现，因主张和平而反戈。凡是由郭松龄电报函件中之所谓反对战争攻击张作霖杨宇霆，其骨子里全是怎样利益冲突之自白。奉天军阀是全国的不安和仇恨之中心，全国人民仇恨奉天军阀的心理，促成反奉胜利之社会的局面。这种局面亦能影响及于军阀。目前郭松龄以此影响而造成新的奉系军阀势力。国民军，尤其是第一军，得到这种影响之便利，故能不血一刃不费一弹，而获对于于反奉战争之胜利。

军阀势力之瓦解是一个必然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工作之一——反军阀的运动，明白地表示着一步一步的有了结果，将至于最后的胜利。

三角政局犹在目前

三角式的政局，犹暂时存在于民众之目前。但是此时的三角局式，不同于昔。旧时三角关系的三角势力——国民军，直系，奉系——相互的每个势力都有两个仇敌。现在的三角关系，则是：国民军、直系与新奉系，在消灭张作霖的军事上，暂时不成为仇敌，而在政治上，仍互为仇敌；同时，新奉系与直系，在政治上又较为接近。军阀自身之变化，是以其利益为转移的。无论怎样复杂的内容，但在革命的民众面前只有一个问题：不利于民众运动，不合于民众之要求者，皆民众之仇，中国的民族之仇！

这种三角式的武力所操纵的政局，已迫成为解决北京政权问题之中心。因为左右政权的势力，尚操之于军阀的武力之手，故组织尚未完备的北京革命民众，在十一月二十八九两日，欲立刻推倒段政府，要求人民政府实现之企图，没有得到结果。那两日的国民大会与示威运动，若只认为是北京的工人学生与市民之一时的政治运动之表现，算是一种错误；北京的民众在当时所提的政治要求，实是全国被压迫人民之要求。政治问题的中心，本已聚集到北京政权的问题来了。把军阀官僚的政府，易为人民的政府，这是过分的要求么？这不是全国人民之一致的要求么？不过从客观的情势，及从结果上看来：一因革命时机之不成熟（即三角形武力之尚操纵政局）；二因民众组织尚不完备（工人组织较整齐但乏训

练，又遭右派收买流氓与工贼之捣乱；学生组织既欠严密，又遭右派之分裂；市民则更无组织，只临时参加）；三因国民党右派对于群众行动之背叛且告密（其详见后），故结局只成为民众革命运动一次的雏形，而未能表示出革命时期中民众运动的积极责任。但是北京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夺取政权的试探，已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表示极大的进步的变化了。

北京的民众与全国的民众，应当乘此政权争斗之时，努力于自己的团结，以争自由的实际工作与军阀争斗，给各派武力以是否容纳民众要求之试探。民众自己的团结与一致在此时机是比任何事件还重要些的。民众必须时时保持对于争取人民政权要求人民政府的联合战线之一致，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革命的成功，及对于军阀之战胜——从军阀战争的局面里，得出民众的胜利。

政权属谁——军阀？抑民众？

从“五卅”以来的国民运动，并不只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亦是反军阀的运动，综言之，即争民众政权运动。所以“五卅”惨案之结局，我们曾屡次说过，不会是与任何国宣战的问题，亦不会是什么外交之胜利，而是需要一场内乱来解决，让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扶助的势力自己崩坏最后得民众政权之胜利，亦即战胜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

但是战争的局面已到了现在，北京的民众已起而代表全国民众意志，作争取政权的试探；全国的民众，亦积极起而

作政治的及为人民自由的争斗。此后的政权将属于谁呢？——仍属于军阀官僚么？抑属于民众？

或者在这两者——一种是旧的，反民众利益的；一种是新的，革命的——之外，还有第三种形式？抑或即是军阀分配的同时又有民众势力参杂的——混合的政府？

但是民众之立刻的奋斗，是为民众的政权而奋斗。

在段祺瑞政府尚喘息于北京城内时，政权之所归，有三种的倾向的可能：第一，维持段政府抑或以内阁的形式变相的等于维持段政府——这种倾向在许多的政客工作之中，虽有实现的可能，但因实现这个计划之主谋者必为国民军首领冯玉祥。而结果即将使民众判他对于冯玉祥的政治认识，及对于国民军的决然态度。简言之，这种政权形式将为民众所坚决反对，因为这仍然是继续军阀官僚政权，继续段政府政权，与民众革命之目的背道而驰。第二，所谓恢复法统与护宪，乃至再把政权当作戏法变，与耍木偶（黎元洪）一般的娱乐之企图，也一时的表现出这种主张有军阀官僚为之拥护。这种倾向是军阀欲再蹂躏人民，操演循环政治之私愿，更绝对的为人民所反对，决然拒绝，不容使之实现。因此，这第二种倾向虽有表现，成为政权战斗中之一面，但缺乏实现的可能。第三种乃是民众的政权。民众的政权虽亦有种种的形式；或有左右之别，或为混合的但为目前的目的——从军阀官僚政府变为国民政府，从军阀官僚专政变为民主政治，是最基础的一致的要求。人民的自由得有保障，帝国主义之侵略能有抵抗——在这些基础的要求上，没有两样。

这第三种政权是民众自己的——自己需要实现的！

从长期的运动之结果，民众已正式走入政权争斗之紧急工作中。

民众之目前的立刻的争斗，是为政权而争斗。如若民众政权之得实现，即国民革命之完成；如不实现，即尚须继续为国民革命之奋斗；如有变相的假伪人民政府之冒替的产生，则民众仍须继续其争自由求解放的运动，揭破一切虚假者面目，同时，在这样高涨的革命潮流与人民政治觉悟之进步中，任何虚假巧妙的面目均易于为之揭破。

政治的实际工作

革命的民众既然不愿意再要段祺瑞政府或任何内阁，更痛恶黎元洪重作木偶以恢复所谓法统，便须有自己的实际政治工作。在目前三角的武力形式之下，民众第一件政治工作，便是要逼迫这些武力，以争言论结社出版及一切的自由，对于各派武力由试探而决定争斗或结合之策略。在民众的自身，必须更加团结，有集中的组织，鲜明的聚集在革命旗帜之下，时时标示自己政治的主张，提出具体的政治要求。

从长期的革命运动之结束已表现在壮烈的中国民族运动历史上：在国际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已霆慑于中国民众之威，屡次变更其欺骗策略，表示手忙脚乱；同时，各国被压迫的阶级与各弱小民族，已直接表示对我国民众运动之同情；在国内一方面，军阀武力之崩溃，已成为显然的事实，民众运动能影响武力，使反动的武力至于瓦解，使较进步的武力向

于民众（"五卅"以来民众运动结果之一，即是使一部分的武力，因反帝国主义而倾向于民众），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仅有的今日的局面。历史紧靠着革命的进程，中国革命运动之怒潮里，飘荡着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垂死之残命。

在目前的最切近的工作中，民众犹不当忘却，奉系军阀之势力尚未完全扑灭。集中一切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以先扑灭奉系军阀，是有绝对必要的。民众扑灭奉系军阀之必要，在于：（一）奉系军阀的自身，是国内最黑暗的最凶暴的势力；（二）扑灭奉系军阀，即为扑灭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势力及其在全国的势力之伸长。因此，我们对于新的奉系军阀的态度，不在于其为反张作霖即判定其政治作用，而在于考查这个新的奉系势力是否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所役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东三省及全国之外，是目前反帝国主义切实工作之一。自从郭松龄反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公布其必维持张作霖个人之计划了。这便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最会看风使船，急急欲欲换新工具；同时，亦无异于公开向郭松龄表示可以维持扶助之意。日本的外务省，又公然宣称所谓对于满洲事件，暂时无容处置！中国的满洲疆域之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自由谈论所谓处置与不处置，这明明表现日本不肯舍弃东三省权利之意，露骨的显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但是革命的中国民众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刻收回其对满洲之野心——"中国属于中国人"！

第二件切实的目前政治工作，便是民众应当逼迫国民军表现其政治性质，公布其政治目标。国民军始终不表示其明确的政治目标或表示太奸滑均是最难令民众满意的一件事。

同时对于民众争自由的接触又时加阻碍，更足令民众惑疑。在国民军自身，应当懂得一个军队便是一个政治的团体。革命的武力与军阀武力之异点在此；国民军首领现在不能表示其政治意见，便是算不得革命的武力之证。本来自始至今，我们并不曾错认国民军已是革命的武力，然而民众运动所给与国民军之影响，国民军应知接受。反奉的战争是全国民众所号召的，但结果在反奉战争中，亦不见国民军之积极作用；奉天军阀之倒台，却是几个月来民众自己苦战奋斗所造成全国反奉战斗，以致其内部瓦解之结果。国民军的领袖若不觉悟于这些事实，而仍蹈袭取巧谋智之军阀旧辙，则民众将易于揭破这些虚伪，而对于国民军失望。国民军目前之出路，不与人民结合，便会反对人民，绝无中立之余地。

复次，国民军自身若没有统一的联合的行动，不仅表示这不是赞助国民革命的军队，亦且表现绝大的危险，易为敌派军阀所乘，亦易为民众所弃。革命民众与国民军之联合战线，本来即在反奉的战斗上；反奉战争后国民军是否真能捍卫革命，赞助人民之自由，实行与人民之联合，在革命的民众一方面，正是谨慎看守着的。

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以这许多工作完成后，才能判断国民革命之胜利。在目前的政治目标上具体的几件需要便是：国民的政府，人民的一切自由，真正的国民会议，立刻的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工农阶级的地位与要求

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奉张未败以前的势力，为破坏反奉的联合战线，为恫吓并要挟中国之军阀与官僚起见，曾屡次提出共产政府的口号，以为北方反奉战争后将有共产政府出现，如他们说惯了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是共产政府一样——一样的无赖！在这次北京民众革命运动中，群众欲取直接行动向段祺瑞，令之辞职，预先婉告鹿钟麟不必以军队保护执政府本已得其许可，但突然有右派领袖邹鲁林森之“告密”，亲谒鹿氏，谓共产党将组织共产政府，结果鹿钟麟以重兵保护了段祺瑞，其兵士并曾以枪柄大刀阻拦群众，引起群众对国民军之恶感，又致执政府卫队乘间得以杠棒石子与群众斗殴，卒之深夜无结果而散。群众革命的一次直接行动，因右派的告密以致于破坏，而破坏的诉词，不是别的，又是共产政府！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对付民众之策略是一致的啊！

当帝国主义者与右派及一般无识的新闻报纸，在各地宣传广州政府乃共产政府，以及北京将组织共产政府之时，中国（各国亦然）的工人群众在工厂里，农人群众在村庄里，都不禁呵呵大笑！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工农阶级现在并未要求工农政府；工农政府的时期还没有到；现在并不要求立刻施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建立为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而奋斗之政权；没有，并没有，时机还没到。中国的工农阶级现在正依据科学的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者而奋斗，

举行民族革命运动，求摆脱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侵略与压迫；为国民革命之先躯，以期完成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数年来，尤其是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已完全证明工农阶级之地位与其奋斗成绩。中国共产党自来不曾号召立刻组织共产政府，但只说主张国民政府并愿赞助国民革命政府。偏是共产政府的口号由帝国主义与右派共同连署提出，岂是共产政府为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么？抑或是中国的军阀与资产阶级等自己之要求呢！？这是一个笑话！

这件笑话证明的是：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合同破坏中国的国民运动，破坏中国的国民革命。

然而中国的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自有其特殊要求；占国民大多数的工农阶级，自然有提出其应有的要求之权利。同时，这些要求也在革命群众与革命阶级要求的范围之中。第一，绝对的言论结社、出版及一切的（罢工在内）自由，这是民主政治下人人所必需的，工农阶级不能例外。其次，工人阶级要求立刻颁布劳动法，使工人的工会合法存在，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与童工；限制中外资本家对于工人之剥削与压迫；限制危险劳动；讲求工厂卫生。农民群众要求同样的许可结立团体，为法律所承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严禁贪官污吏之勒索与地主及劣绅之敲榨；除国家课税外，不得苛征杂税，军人更绝对不得征收田地捐税。工农群众于政治经济利益外，还欲得各种的便利，普及教育，求知识的进步。只有这些算是工农群众之特殊要求，这些要求并不为奢。复次，国民会议的召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同样的也是工农阶级的要求；并且工农阶级在前线上，抵死的为

这些目的与一般革命群众合同奋斗。

总结的说起来，工农阶级在总体上也就是要求一个国民政府，要求革命民众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在工农阶级之外还有主张。因此我们并不曾听见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工农政府，或共产政府，而号召的是国民政府且提出这种具体切实的革命口号于最先。不过即使国民政府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大商人（买办阶级）所不要求，甚至深恶痛绝不齿于口，而工农阶级终于要求奋斗到底。这正是数年来，尤其是"五卅"后，工农群众联合革命的知识界，学生群众，小商人群众，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苦战酣斗的。这亦正是中国共产党过去迄现在的政策之主旨。

原载《政治生活》第59期，

1925年12月1日。

署名：士炎

为民众政权而战

从奉系军阀内部之瓦解，我们已可以预测反奉战争之胜利了。在反奉战争胜利的局面中，我们高呼要争取民众的自由，革命的民众必须为民众政权而战斗。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士，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前锋）绝不隐避自己的政见，绝不是故意的“卑之无甚高论”，在此时要求革命民众的政权，要求国民革命的政府，正是切合于事实的。我们但看：从北京民众推倒段政府的呼声而波及于全国的各地运动，全都是为民众政权而战！

在北京民众推倒段政府运动之第二日，上海亦有同样的运动发生，以争人民自由，宣布关税自主，推倒段政府，及拥护北京“国民行政委员会”为要求。我们亦曾记得，在北

京的国民大会中，曾有组织国民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什么革命的“国民委员会”这个观念，成为上海北京等地苦战奋斗民众之共同呼声呢？同时，一般新闻记者与政论者为什么现在突然讨论所谓“委员制”呢？又在同时，为什么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者代表致恫吓于中国官僚谓委员制即为赤化呢？

正是那般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所恐怖而不要的，偏是革命的民众所主张而需要的。自辛亥革命未成之局以来，自“五卅”运动民众革命潮流高涨以来，一切革命势力的奋斗，俱为争取民众政权。反奉战争的结局，绝不会如前几次内战之结局一样，客观的这次的局面是：一方面表示军阀之末运，使恶劣的军阀，殡送喋血牺牲的革命战士入于坟墓；而在另一方面，就开始民众对于各派武力为政权之争斗。

一个军队或一派武力，同时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在中国的现状里，这是一件事实，我们早已指明了。但是正当各派武力暗中经营布置政局之时，他们却口说军人不干政，或谓军事尚未结果，政治一以民意为归。这个骗局在目前革命民众监视之下，万难掩饰，亦万难成就。长江流域的武力目下已因政客谋士的影响而表示其政治主张了，北方的国民第一军现在以北京政府为空城，把军事问题置诸政治问题之前，表面隐藏自己的政治意见，民众在此时应当了解这种政治现象的原因。反奉战争的武力本不是纯然的革命武力，至多亦只受民众的影响而迫于战斗。革命的权能尚不在有组织的民众之手，革命的政权自然一时不能为民众所得。

民众此时的责任是要更加紧自己的团结，举行更广大的

运动，时时提出政治的目标，不断的为争自由，争民众政权，争民族解放而战斗。

原载《政治生活》第60期，
1925年12月10日。
署名：士炎

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

这一次反奉的政治工作，完全由革命的民众自己作成。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势力外，没有革命的势力；广东的革命军队是依据民众的意志而组织；北方及中原的国民军是因民众势力而得有影响；长江流域的军阀因民众集中对于奉系的怨恨，而得反奉胜利的便利。在国内，除民众自己的呼声外，亦没有所谓的“舆论”；当奉系军阀暴戾恣睢之时，除最少数外，社会的报纸没有共同的认识，只当奉系垂败之际，各种报纸以时间以地域而改变其态度；张作霖、张宗昌及李景林平日之暴政残民，是不见有翔实之记载的，而当张作霖既败之后，象自称为社会的报纸之《北京晨报》，才公然敢大书“中国第一恶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之所以为恶军阀，在“执笔为舆论者”有共同的

认识么？连带的问题便是：打倒奉系军阀之目的何在？革命的民众现在只有从行动上来表示与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因为组织尚不集中之故，不得集中的意见无从表露，还让普通的政治议论隐晦了革命群众自己的政治目标。现在，除民众团体自己的传单与报纸外，我们不曾见"执笔为舆论者"自动写出的：推倒段政府，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

反奉战争的工作将抵于成，但反奉战争之目的，反加隐晦起来；因此而致于在同时帝国主义者之宣传与恫吓得有所乘。尤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善于应变，在此时，他们努力应付转变革命民众反对奉系军阀之目的。

革命民众欲歼灭奉系军阀之目的有二：（一）歼灭奉系军阀之本身，促成军阀之末运，以至于完全消灭军阀政治；（二）同时即为驱逐奉系军阀所赖以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于东三省之外。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五卅惨案之肇祸者。在满洲经济势力之深入与利权厚大，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扶掖张作霖为恶原因之所在。但是目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惶恐于满洲经济利益之丧失了。他们开始说并不拘执成见，无论是张作霖也好，郭松龄也好，纯以"帝国在满洲之利益"为依归。他们一面与张作霖杨宇霆王永江订立更甚于二十一条的条约；一面公开的发布对于东三省事件的八项处置大纲；一面又派舰队由旅顺出动，出兵至满洲者已有万人，易中国军服，称为东三省的宪兵；又一面由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机关报纸顺天时报宣传说："日人中因与张氏之交谊及其它诸种之关系，固亦有奔走划策维持其地位者，然因此即谓日本国民援张云云，亦为谬误……"

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公然承认的。

中国国民并不曾说“日本国民援张”，并深知这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为日本国民所反对，且为日本亦须革命之根源。但中国国民不能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策略，更不能放弃只歼灭奉系军阀，而忘却此军阀所赖以扶掖长成的日本帝国主义。顺天时报又说：“惟所希望者，不过日本年来根据公理而获得之既得现存之权利及地位，不可因此次郭张争斗之余波而殃及池鱼也”！这正是发抖的话！又说：“且此不仅仅存诸希望，亦正在严正注意之中也”！这样的话虽是恐吓，却亦是自白的谵语。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不幸的，正因为这种事件亦在中国革命的民众所严正注意之中。

在目前的紧急政治工作里，革命的民众认识奉系军阀尚未完全歼灭，故必集中一切力量以完成此种工作。依赖奉系军阀为工具之日本帝国主义，不出于强硬态度的阴谋扶助奉系，即将奸滑的转向别方而冀得达到所谓“维持满洲利权”之目的。但是反奉战争并不只于是反军阀的战争，同时亦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奉战争以后的问题，全部的是国民革命的进一步的问题。召集真正国民会议之呼声，不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同时么？日本帝国主义者亦尝盗窃革命的标语，谓中国军阀不过自掘墓穴以葬其身，但当帝国主义者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又可怜他们尚不进一步了解：当军阀灭亡时，帝国主义者也是殉葬人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0期，

1925年12月10日。

署名：乐生

从广州到满洲里

反奉战争之结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时期之意义上，是“从广州到满洲里”的形式的、同时也是实质的、民众革命统一战线之组成。

广州被称为赤化，但是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均不能否认以广州为民族革命大本营之种种革命的政治设施的成功。从满洲里以南，大块的东三省版图，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奉系军系蹂躏至于不堪，再由直鲁到江浙，暴厉恣睢的军阀虐政，逐处可见，民众运动受帝国主义者的破坏，受军阀的摧残，喋血牺牲，由许多次的、以至于最大最后一次的“五卅”运动。但当军阀正高唱凯歌，向帝国主义献俘虏之时，民众反对军阀的全国战线就组成了，在反奉战争里，大

多数的民众都有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于消灭奉系以至于消灭一切军阀。只有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有意的或无意的，同时也看不出民众的意志，只拿军阀循环战争之说，成为死的公式，错认民众号召的反奉战争，为信赖于军阀攻军阀。现在的结局告诉的是这样：军阀欺骗不了民众，反奉胜利是一件事实，民众现在的需要，是“从广州到满洲里”的更广大的革命运动。

中国国民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将是这样：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势力已经崩溃，帝国主义者或军阀的前线已经破坏；而另一方面，国民革命的统一的集中的广大的战线已组成。

现在离这个时期是不远了。

从广州到满洲里，全国的民众都要立刻起来，争自由，争政治主张，把每一个政治意见，表示到一件政治的行动上；把铁一般的组织建立起来；把革命的势力发展到广大无穷；拥护一切革命的政党；集中所有的势力到革命行动上去。从广州到满洲里，纵横网罗的把革命势力布置起来。

赶走帝国主义者，不要军阀与官僚，政府是人民的。

原载《政治生活》第61期，

1925年12月17日。

署名：士炎

短　言

《晨报》的梦呓——《晨报》本月十二日有一段杂感，那种杂感是一种梦呓。做杂感的渊泉说："共产党赞成我的思想革命说，尤觉吾道不孤。"共产党的理论根本以为没有可以单独存在的"思想革命"这件东西；而思想不过是物质生活之反映。革命完全要表现在行为上。

所以《晨报》尽管唱"思想革命"之说，而同时该报的记载与鼓吹，都直接表示的是反革命，与援助反革命。似此"思想"从何处革命起？又从何处表现？渊泉因为有人以本刊寄与该报，就利用作宣传，可谓聪明。假使真有寄本刊写的信那人，我们断言那不是共产党之严秘组织与铁的纪律下的党员，但必是一个同情者；他写与晨报信中观念之不明了

与措辞错误，我们亦是原谅的；在晨报自己，亦不过说“似是共产党中人”。我们对于《晨报》被毁事件的意见，已表明于本刊前两期中了。在晨报对于自身被毁的事，只应该回想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也不是“一二人私意”所能作到的。

*　　　*　　　*

病理学家与生理学家——右派近来又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欲以此名目引诱学生青年，但是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作标语。有之惟有去找现在已经悔懊不已自知失言失行的戴季陶。季陶说：“马克思是社会的病理学家，孙中山是社会的生理学家。”右派的标语中于是就添上这两句话了。错了！季陶简直对不起孙先生，是中山主义的叛徒，怪不得邵元冲说他是考茨基。一个病理学家没有不懂得生理学的，然而一个生理学家却未必懂得病理学。孙先生只懂得生理学么？孙先生如只是生理学家，那里还有革命的主义？我劝季陶从此后不要乱造理论，并劝右派赶紧取消这个标语，免使群众失去对中山主义之同情！

*　　　*　　　*

怎样做国民党的左派？——近来最可乐观的事，便是国民党左派的形成。但是怎样做国民党的左派党员呢？“关上门来做”是不行的，近来仿佛左派分子大有自己是左派，对于任何人都怀疑或恨忿的状况是不好的，是群众革命工作的障碍，应当速改。我们应当有良好的态度与坚忍的毅力——容纳各种的实际工作之提议，以求影响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便是右派分子也当希望影响他们觉悟过来，千万不要以为“除

自己外没有左派”。

* * *

共产党的真敌人——有一位刘治熙君写信给“中山主义实践社”，说该社的出版物“才是共产党的真敌人。”该社记者的答复还正确，说：“我们实在不愿意做任何从事革命的党的真正敌人。”老实说：共产党的真敌人，除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官僚及其使用人外，有些时候右派还不一定是敌人，何况实践中山主义的同志呢！刘君又主张积极竞争，意思是说要与“非中山主义者”竞争，所指“非中山主义者”又似乎指共产党。刘君这种错误观念，便算是“关上门来做左派。”这种“中山主义者是共产党的真敌人”，与“共产党员是非中山主义者”的错误观念，使刘君不主张国民革命工作的积极竞争，而主张内部的积极竞争。这是国民党左派新形成时之流行幼稚病，应该请病理学家马克思来医治！：“最后，就是共产党到处尽力为万国的民治党谋统一及团结”（是共产党宣言末页。）

* * *

西山会议的重大意义——右派的《民生周刊》说明西山会议的重大意义，唯一的结论是“解决了国民党员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又算是“解决了根本问题”。原来西山会议的重大意义，便是解决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已！国民党里仲恺与汉民之争，精卫与季陶之争，北方左派与民治主义同志会之争，乃至于沈定一姜维藩之争，吴稚晖邓家彦之争，都是“共产与非共产”之争么？这何尝是根本问题？我们深知西山会议，我们深知西山会议喜剧之内幕。我们以为西山会议的真

正重大意义乃在于：右派的问题，正式告一段落，而逼起左派之形成与发展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1期，
1925年12月17日。
署名：乐生

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破坏阴谋

（十二月十日北京通信）

自从关税会议开幕日，北京民众示威在新华门与警察冲突之后，一般人民十分愤慨。至十一月十日遂由全国学生总会（正值开完大会以后），广州外交代表团等数团体发起一个“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即于是日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北京总工会亦于是日举行升旗礼。自是之后，“筹备会”屡次集议，决定以后进行方针，议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革命民众要与革命的武力结合并致哀的美敦书于段祺瑞政府，令其即日下野出京……。

但加入此“筹备会”之国民党右派团体，见革命空气太浓于己不利，遂开始阴谋破坏，结果终于联合少数团体退出“筹备会”。退出之后不久，政局突生变化，郭松龄倒戈及

曾毓隽被捕表示段张势力已如日西落了；于是右派团体遂突然改变其态度，复又加入“筹备会”，并且主张比左派更激烈，提议当晚即去焚毁朱深等家室并驱逐段祺瑞。大众当时只决定于二十八日举行示威运动。国民党之政治委员会亦于当日决定：（一）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二）迫段祺瑞辞职；（三）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

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所有群众即齐集于神武门前。到者以学生工人为最多。北京总工会领导多数工人臂缠红布参加此会，当时有少数流氓打出“北京工界联合会”旗帜亦来参加，结果被群众扯毁旗帜驱逐而散。主席宣布开会后，群众即整齐队伍向执政府进行，当时执政府已停止办公，群众遂转赴段氏私宅。至时，有国民军驻守宅外不能进内，直等至日落后，遂由总指挥朱家骅等宣布将段交与鹿钟麟看守，候明日国民大会中宣布段之死刑，当时并于段宅前通过建国大纲及其他决议案。群众自此出发即齐奔章士钊宅大打，李思浩、朱深、梁鸿志、曾毓隽等宅各光顾一次而散（但各宅早知风远飏空无一物）。

二十八日的运动，民众原定计划并未能达到。其原因乃国民军于段氏保护周至，出之于群众意料之外。国民军何以取这种态度呢？我们知道有二个原因：第一，国民党右派的告密，当日早晨邹鲁林森等亲至鹿钟麟处造谣，说此次运动纯系共产党指挥，说共产党即刻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第二，国民军首领的犹豫，冯玉祥到那时尚没有决心驱除奉系军阀的傀儡——段政府。

国民党右派破坏此次运动的阴谋是很明显的。除他们的

首领林森邹鲁等向鹿钟麟造谣告密之外，他们并且在运动中施行种种破坏手段。他们故意惹起国民军和群众的冲突，他们故意说这次运动是共产党包办的，他们故意出力打毁安福阁员住宅，而于次日勾通各报说是共产党的暴动行为。

北京民众既然有二十八日的教训，故到二十九日的大会时，都已认识驱逐段祺瑞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等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在这日的示威中，右派又雇佣许多流氓撕破北京总工会的旗帜。焚烧晨报馆时，左派群众并未参加，完全是右派的把戏；他们当晚送登的新闻反诬是共产党所为。

总而言之，北京这次的反段示威中，革命的民众虽然未曾得着积极的胜利，但已知道一个教训，即自称为纯粹三民主义信徒的国民党右派有意的无意的已成了民众 敌 人 的 工具，破坏民众运动了。

原载《响导周报》第140期，

1925年12月30日。

署名：罗敬

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

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派兵侵占南满，并公然移其所谓关东司令部至沈阳，直接援助张作霖，使得到对于郭松龄的战争胜利，使垂败的军阀为死灰复燃。日本的政府公然如此以兵力与枪械及策略，在中国的内地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竟至于此极！

反对万恶军阀张作霖的，并不是孙传芳冯玉祥郭松龄等几个人，而是全中国争自由争民族独立之民众。日本帝国主义者进兵至南满，扶植张作霖作恶，便算是对中国的国民宣战。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自身历史看来，这要算最严重最狂暴的一次。从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压迫的历史看来，这也算是最严重最狂暴的一次。日本进兵南满与合

同张作霖打郭松龄的事件，比起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有过无不及，因为这是正当国民革命运动高涨时，在举国民众一致反奉的眼前，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挺身而出有此动作！日本帝国主义者好狂暴啊！

郭松龄之战败或死，在中国革命的民众面前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与答复：我们愿望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侵略，应当因郭松龄之反戈而至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至少在东三省应当比郭松龄早死！但近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电信机关，已眉飞色舞的传播郭松龄的死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好狂暴啊！

目下天津的战事已告结束，这种结束在革命民众的观察并未乐观。从天津战争里，民众已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援助李景林的事实。天津战争结束的迟缓，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祟。在同时，日本政府便布置好了东三省内的军事局面。李景林虽败，国民军虽得占有天津，但是奉天军事变化的结果，便是天津战事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者延长了中国的战争，直接的，公开的，扶助了全国民众所一致反对攻击的恶军阀张作霖。五卅惨案闯下了大祸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经过一次广大的全国的民众运动，还这样穷凶恶极，在中国的境内狂暴横行！全国的民众应在此时此刻起来，一致的猛力的攻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者从满洲滚开去！”

全国的民众在此时应当一致的动员，高呼这个口号；应当监视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切的行动，监视他们一切的机关；应当赞助能消灭张作霖，同时既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

省势力的任何军队；应当催促反奉战争的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不仅为维持恶军阀张作霖，并且为维持北京垂死的段政府。维持垂死的段政府之责任者本是现在的实力派，这种维持办法正投合了日本帝国主义之愿望。现在的实力派，反奉的各派武力，如果不以彻底反奉为目的，又干涉民众运动的自由，便投合了日本帝国主义之愿望。但因为有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在中国的革命民众面前，此时更可以鉴别一般实力派一切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是违反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抑或是拥护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又因为有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在革命的民众面前，此时更得判断日本帝国主义之命运；因为这种狂暴的表现，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死灭的预告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

1925年12月30日。

署名：罗敬

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

当国际帝国主义者压迫一次中国的民族运动（如“五卅”事件），与国内军阀举行一次内乱的战争（如反奉战争）以后，我们便要提到民族革命的时期成熟问题。我们提起这个问题，是根据于列宁主义，根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革命问题之理论与实际。具体的说，我们要讨论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我们怎样根据列宁主义呢？

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各种矛盾冲突的发展之结果，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某一国，不过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首先在一国破裂罢了，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首先在一国建筑起来罢了。

同样的理论与实际辩证到民族革命。所以我们以为，中

国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将是这样：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势力崩溃，其前线破裂；而另一方面，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能够统一的集中的建筑起来，组织完成。

我们现在要求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然后才敢相信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不远。

我们不应当惑疑现在政局之紊乱与迟缓；反之，这种紊乱的现象正表示旧政府的末运，而民族革命的新政治战线尚未建筑起来，正是迟缓的原因。革命是最大多数的、普遍的、统一的、集中的民众所组织之动作。民族主义的革命当然要从帝国主义锁链最脆弱的地方破围而出，从国内军阀官僚最弱的时期，开始爆发。但在这里要先有革命的雄厚群众势力之浩大集合。目前革命的实际问题，应当是追寻这条大道而工作。

京津战争时，国民军军力之不集中与迟缓，并不是一件奇异的现象，而重要的事实乃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尚扶持李景林，及结果国民军得农民之援助而获胜。郭松龄现在尚未能驱走张作霖亦不是不可解的事，日本之进兵满洲引起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却是有大意义的。吴佩孚与李景林、张宗昌之联络，及长江流域军阀之变化，就是无足怪的，在他们只表演些直奉两系的悲欢离合，在革命势力下愈入于末路。至于北京城内的组阁补阁或摄阁，更无关于大体；那只是所谓实力派在革命民众前表现其政治性质而已。

在革命民众之前，目击与身受的严重事实问题乃是：日本对于满洲的野心；列强对于沪案的混骗，与挟抗关税会议

的抵赖行为；上海总工会尚未恢复，孙传芳对江浙的民众格杀无论；萧耀南压迫武汉的市民；北 京 鹿 钟 麟依冯玉祥禁止民众运动——这是民众自己的事，这是关系于革命要讨论的每日的问题。民众的势力要从这些问题里发展出来，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要建筑在这些问题上。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到步法错乱的现象，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夕，这是列宁告诉我们的；依目前混乱的政局，我们就要振作预备于中国民族革命之前夕里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

1925年12月30日。

署名：士炎

没有亚洲，帝国主义便会死

▲九万万人类的殖民地

▲资本帝国主义的刑场

“五卅”事件之后，中国的问题震动了世界。但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现在方盼望资本主义之复兴。他们正坚持一种学说——所谓“资本主义之稳固”（The stabilization of capitalism）如此这般的幻想。这个幻想，实际又是他们的骗局。因为他们把一大块土地的亚洲，藏匿了不说，而满口欺骗的去高谈资本主义的“稳固”。那一般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求媚于资产阶级起见，把他们的“学说”，高卧在亚洲之上。

亚洲，诚然是帮助世界资本主义“进化”的一大块土。

它有十数万万人类的灵魂，它的人口之多，胜过五大洲的任何一洲。这十数万万灵魂大部分都受了殖民政策的“恩惠”。只有六千万人口的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西伯利亚与中亚细亚现在属于苏联了，与资本主义无关。土耳其因革命成功，政治上已得独立，正在战斗中。还剩下了九万万人民灵魂，都直接间接的受帝国主义列强之统治。无论有怎样古老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印度人、安南人、朝鲜人，现在被踏在“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铁蹄之下。

在亚洲这一大块殖民地里，有“无穷的财富”——那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谓的“资本主义稳固的无限可能性”的材料：煤、铁、煤油、森林、农产，……一切等等。因此，帝国主义者很可以“稳固”，很可以“扩大”，很可以“延长”，而无容其忧虑。

于是我们可以说：没有亚洲，帝国主义便会死！因为什么？因为有下列的许多证明给我们：

第一、我们先看英美日三国的输出输入口额（万为单位）

		年份	日本	中国	印度	锡兰印度	马来	总合
英（以磅计算）	输入	1913	3.8	2.9	36.4	3.4	15.9	62.1
		1922	7.5	6.6	38.2	8.9	8.0	69.2
		1923	6.8	12.3	—	—	10.7	—
		1924	7.5	13	79.0	12.1	10.6	123.0
	输出	1913	14.5	14.8	70.3	7.2	5.8	112.6
		1922	24.2	23.0	92.6	9.6	6.6	155.5
		1923	26.4	18.6	—	—	7.8	
		1924	26.9	20.4	90.6	8.0	8.3	154.2

美（以美元金元计算）	输入	1913	98.9	40.1	70.4	5.0	26.4	239.0
		1922	354.3	134.6	91.2	34.4	93.8	108.3
		1923	346.9	187.6	128.0	54.9	153.8	87.3
		1924	340.1	117.9	1033	57.5	148.1	766.9
	输出	1913	62.5	25.3	11.0	3.4	2.9	105.1
		1922	218.5	100.3	30.7	8.1	5.6	363.2
		1923	264.2	108.6	30.3	12.1	7.4	422.5
		1924	250.3	109.2	34.9	14.5	7.5	406.4
日（以日金元计算）	输入	1913	61.2	173.2	37.4	—	—	271.8
		1922	186.3	254.1	71.8	—	—	512.2
		1923	204.7	305.7	73.0	—	—	593.4
	输出	1913	154.7	29.9	5.1	—	—	289.7
		1922	133.5	97.2	47.4	—	—	478.1
		1923	272.2	99.6	40.6	—	—	412.4

上面的表证明的是：英美日三帝国主义者对亚洲之商务之发展进步。并且又是太平洋之旁两大强国——美国与日本——对亚洲商务更发展，英国的输出是不能与之竞争的。从1913年算起，美国输出增加了百分之三百（300%）而英国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40%）。

其次，我们再看亚洲各国的输出输入额（以千为单位）

		1910	1913	1919	1922	1923	1924
日本	输入	460	728	2,125	1,847	1,982	—
	输出	454	629	2,050	1,594	1,448	1,807
中国	输入	463	570	647	945	—	—
	输出	381	403	631	655	—	—
印度	输入	1,246	1,833	1,833	2,394	2,276	20,467
	输出	2,060	2,412	2,898	2,792	3,438	3,849

注：日本以元为单位，中国以海关两为单位，印度以罗比为单位，然而列强的商业进步各都是很快。列强无日不伸长其商业于亚洲（垄断亚洲之贸易）。欧洲帝国主义有这样好的局面，怪不得欧洲的经济学者得意忘形而叹资本主义之稳固！

复次，我们再去察一番各大国与亚洲各国互市的情形，尤须注意美国与日本（按百分比例计算）。

		输入		输出	
		1913	1922	1913	1922
（一）日本	美国	16.8	31.5	29.2	44.7
	英国	16.8	12.3	5.2	3.3
	法国	0.8	1.0	9.5	4.8
	德国	9.4	5.9	2.2	0.2
	意国	0.3	0.2	4.6	9.3
	印度	23.7	13.4	4.7	5.9
	中国	8.4	9.9	24.4	20.4
（二）中国	美国	6.0	17.3	9.0	15.0
	英国	16.5	14.9	4.0	5.9
	法国	0.9	0.5	9.7	6.1
	德国	4.8	2.5	4.1	1.5
	意国	0.1	0.2	2.1	0.9
	日本	20.4	23.7	15.9	24.1
	印度	8.3	4.4	1.5	1.5
（三）印度	美国	2.7	6.1	8.9	11.1
	英国	64.2	60.3	33.5	21.2
	法国	1.5	0.8	7.2	5.0
	德国	6.9	4.7	10.8	7.6
	意国	1.2	0.9	3.2	3.1
	日本	2.6	5.5	9.3	13.1
	中国	0.9	1.2	2.3	4.4

上表看完了，我们还当知道在商业贸易，亚洲自然受列强帝国主义之资本的进攻与包围。讲到资本的雄厚，自然又以美国与日本为戎首。英国在近时是稍逊的，因为他的称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于是我们要从看完这些数目字以后，作一个结论。这个

结论有两方面：一方面便是解释清楚了那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什么聪明而实糊涂的说出资本主义稳固的话，那样的话之不真实，是因为他们瞎了眼——高卧在被压迫的亚洲之上。另一方面，则是更有意义的；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亚洲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已登峰造极，成为帝国主义，是无容说了。中国与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近代亦有可惊的进步。这便是这个原因。所以中国与印度，但有了中国自己的，与印度自己的，一个本国的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与一个本国的工业无产阶级（Industriel Proleteriat）。因为有这样的经济形式，所以表现了现在的政治生活。中国与印度人民目前表现的政治生活就是民族革命运动，而参加最激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为本国资产阶级依托外国而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是世界的），所以民族革命中包括了阶级斗争，所以戴季陶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孤军"主义者，在中国均不必反对阶级斗争，因为你们并不懂得！何况你们根本误会；以为阶级斗争是可以随意主张或反对的。那有那回事！？

然而亚洲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刑场，离了亚洲，帝国主义便会死！我们让帝国主义在亚洲死了罢！根据阶级斗争意义的亚洲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之民族革命，便是对于帝国主义宣告其死刑啊！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63期，
1925年12月30日——1926年1月6日。

署名：士炎

注：本篇所用统计材料，是从瓦尔加同志所作中国问题一文中摘取的。

京津战争与农民

中国的农民运动方在萌芽时代，但已表现在国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广东国民革命军东江讨贼之役，开始得到农民群众援助而获成功。这一次京津战争，十余万国民军在京津道上鏖兵二十余日，对奉系军阀李景林作战，迟缓疲乏，久无结果。但一经农民之援助，几次得免于危险，并得克胜敌人，一鼓而下北仓，直捣天津。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从此又证明一次；武力须得民众之援助始能战胜敌人，从此又证明一次。

当农民正在前线援助国民军之时，国民军自己亦略有觉悟，但并没有真切认识结合农民之重要；所以前敌交通虽然隔绝，而从少数人口头里，露出些风声来，使城市的人民知

道战区里农民帮助国民军了。这些少数人大概都异口同声的说："得民者兴，失民者亡"，故国民军心胜。说这种话的人，很有一点"王者气概"。他们以为这是国民军"得民"，而不求知道这些人民为什么帮助国民军的原因；他们只以为冯玉祥将军个人的威与德，而不曾知道乡村农民之反对奉军，是全国革命民众已经组成的反奉联合战线。所以他们只把农民向兵士送茶水的事，认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了最后，北仓攻下，天津亦克，而冯玉祥给鹿锺麟等的贺电，说："此次剧战，乃皇天后士之灵，我将士之奋不顾身，……"。这次京津战争与农民的援助国民军，遂成为一件过去的事实了。

到底这些过去的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虽然一般新闻记者及其战地通讯员，不懂得农民的生活，不知道农民的要求，因而亦不知道农民在此次战争中情形的重大意义，但是下列的几件事实是不可湮没的：

（一）杨村的铁道桥之两端，杨村的河中，及其附近，埋有许多地雷，是国民军开铁甲车直冲时所不能预知的。这些地雷，正是李景林役使农民所掩埋。农民痛李景林之横征暴敛与兵士之奸淫抢劫，所以聚众齐来拦阻国民军的铁甲车，而报告地雷掩埋之所在。结果国民军得以避免此次的重大损失与牺牲。

（二）由日本人指导李景林军这次所掘的战壕，经营了几月，毫无代价的强迫农民充夫役，才筑了那样所谓"欧洲文明的"最新式战壕的"盖沟"。只有农民才知道这些消息，来告其内容强弱之点，说明内部可以用汽车交通，从农

民家中抢了许多破烂衣裤垫了沟里，可以昼夜寝伏；最后，农民建议了用水决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国民军踌躇不肯采用时，农民却已自动的四出决水去了。最后国民军得以破胜盖沟，是得了农民的直接援助。

（三）国民军进占杨村，重要的指挥机关与粮台，均设于一处，但敌人从后侧张庄袭击，欲拆毁铁道，陷国民军指挥机关于核心，使进退之路俱绝。农民援助国民军，探得了国民军探兵所不能探得的消息，立刻前来告知，使国民军先派手枪队至张庄防守，击退了袭兵而得免于祸。

（四）李景林军受日本人之指导，曾屡次巧装农兵，他们将农民的衣裤剥去，自己穿上，身藏手枪，在农村中潜伏，或作侦探，或竟聚而向国民军袭击。这也是由农民向国民军告知的，结果使国民军入乡村时，得以免掉被敌人侦探袭击的危险。象这样巧装农民作侦探的事，曾发现在许多村庄里。

这以上不过是几件关于军事上的重要事实，此外农民直接援助国民军，使得军事便利的事，据亲眼见者所述还有许多。奉军在乡村中之骚扰，已迫得农民逃散，或用石与砖，把门户封闭起来。当奉军到乡村时，任意的直闯入农民家中去，强迫供奉，据农民自己说，好比供奉祖宗一样。吃的需要献出最好的；睡的地方须得让出屋里的坑；而且女人须得陪睡供淫乐啊！三两日后，到临走时，横蛮的兵士还要挑选一家的衣物择取最好的，携了去！

农民归来了，当国民军占领了一个乡村之后，他们当初不肯归来，经国民党所派的宣传员解说以后，才欣欣然而

归。他们呼那些宣传员为“老爷”。他们赞美冯玉祥，称冯玉祥为“冯爷”，或呼“佛爷”！但他们说，要看“冯爷”来了之后，能不能免除他们的苛税，并允许他们的团结。他们亦了解帝国主义之罪恶，因为曾亲见日本人之援助李景林。

在战区里的农民，每天清晨有十人至数十人的队伍，出来打听战事消息的，那便是农民自己的一种组织。这样的队伍，无形之中为国民党宣传员之讲演而成了组织。他们齐来探听战事的消息，愿意知道国民军的宗旨与战争的目的，他们发问国民军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每当讲演员说话未完时，他们的问题已纷纷的发出了。每一个问题，表示了农民对于政治的不满与自己经济利益危害之所在。他们对于讲演员表示十分的亲暱，愿意迎迓到家里去“供奉”，好慢慢诉说一切的痛苦。他们代散传单；他们每人要多得几份传单，好转送与别人看；传单对于他们好比“官厅的告示”，也好比新年时农民赴市集买回的历书一样——极可宝贵的，必须要看的。他们最欢喜能领得小册子。如若有“不识字怎样读小册子与传单”的问题，他们的答复便是：可以家去找识字的念来听。农村的识字者在此时也成为尊贵的人，与讲演员一般了。

北方农民这样欢迎革命宣传员与援助国民军的情形，在这一次京津战争里，热烈的表示出来；同时，也就表示出农民的性质，与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之作用。国民党的左派分子，现在已承认共产主义者根据事实并根据列宁主义的理论，承认了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了这种现象之重要。但是国民军自身还没有认识这个重要现象，所以他们

暂时只有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观念，而卒之结论到“赖皇天后土之灵”上面去。国民军如若表示能懂得这件重要现象，且肯同情于农民便当立刻证明在两件事实上：

（1）免除一切重租，苛捐，高利债与钱粮预征，严禁贪官劣绅鱼肉乡民；

（2）许可农民协会合法的存在，绝对不得加以干涉。

农民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有极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叛徒陈炯明却知道的非常清楚。陈炯明解散广东海丰农会时，曾对人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乡民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响导周报》第七十期海丰通信）。果然，到后来陈炯明的命运结果于农民之手。东江之役，农民直接援助党军，所以党军才能直捣陈炯明的巢穴，使负固三年的反革命武力，至于大败而瓦解。

当国内战争时，农民的田园，成了军阀武力肉搏之地。但若军阀虐待农民，则农民群众一面忍受，一面也想出方法，破坏军阀的武力，甚至出而解除兵士的武装。东江之役，国民党党军中一个前敌上的战士，写信给《响导周报》说：

“……从前联军打东江的时候，一半由于不爱打，一半由于吃老百姓的亏；因为假若是时常抢他的，他撞着你正在作战时，便出来捣鬼。这次对我们真是顶好了。我们正在行军的时候，数百人一推一推的拥着看，有些弟兄拉不起东西了，便有愿意帮助拉的；前面是否有敌人，或敌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一一指点引路；我们能于黑夜中将五华城围得好

好的，也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帮忙。沿路都有挑茶送水的，我们打仗饿了，有烧稀饭送来吃的。至于海丰（陈炯明的家乡）一带农民，原有农民协会，被陈逆解散了，现在都完全恢复。当我们到时，有好几村的农民都树起'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子来欢迎的。偏辟乡村的农民，欢迎丘八如此热烈诚恳，怕是在中国从未看见过的了！"（见《响导周报》第百十期）

在这次京津战争中，北方农民表现的现况，与广东的农民一样。北京的国民军，虽不如广东革命军，在革命的意义上有相等的位置，但是南北农民群众的要求与地位，则没有两样。北方农民于这次战争结束后其与国民军的关系，便要看国民军是否肯给农民以团结的自由，及免除苛捐杂税惩罚贪官劣绅等。国民军如若不能适应农民的要求，不仅维持不了"冯爷""佛爷"的信仰，也许会至于"吃老百姓的亏"，——这都是极明显的理论与事实了。这些理论与事实，正是乡村里广大的农民群众，判断对国民军的关系之关键；同时，亦是国民军自己表现其政治性质时一件要素。国民军既不能组织或促成甚而至于表示赞助一个国民政府，而必须在北京城内组织各种形式的内阁；这许多许多的内阁，在目前的农民阶级还可以稍为放任与容忍，但是农民的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与经济利益（废除苛捐杂税等），却不能放任和容忍了。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

1925年12月30日。

署名：乐生

短　言

铁　　锤

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现在知道的人已多了。英美日法意是帝国主义国家，更是都知道了。但曾琦、李横等所唱的国家主义是什么？当然要问曾、李等自己。曾琦说："法人现拥有八十万之常备军与三倍于英之飞机，犹复振军经武，日夜精制大炮。……英……亟亟精制火器，大整海军，增设军港，扩充飞机；凡此种种，均足以表示其国家主义之色彩，鲜明而浓厚。言乎美，则大张备军，以求英美海军势力之平衡，并为日美战争之预备，太平洋中，时有龃龉，是非国家主义潮流荡激，有以使之然欤？更观日本之扩充师团，添设海舰，用意所在，昭然可见。……至于意大利虽为次强之国，而自黑衣党（即法西斯党）人得势以来。亦复时图向外发展。

英、日、法、美、意此天下所称五大强国也，其服膺国家主义之狂热何如！”又说：“夫强国之图扩国权也既如彼，……廿世纪之世界为国家主义极盛时代。”由此说来，国家主义原来就是帝国主义！

共产党与中俄两大专制国

所谓国家主义者的左舜生说：“在我们眼中，共产党是历史上中俄两大专制国余毒的结晶，是辛亥革命以来唯一的反动派。”这话如若加以解释，可以反证出中俄两国的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党。历史的中俄两国，诚然都是专制国，辛亥革命至今尚未成功，也是事实。中俄两国专制的毒，都产生了共产党，而俄国的共产党是革命成功了。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及法西斯（即国家主义）横行，所以产生了现政治与现社会的“反动派”（?!），实即革命派的共产党。由此看来，共产党所号召之民族革命，最近将来辛亥革命之得完成是无可疑的！

大家都赞成国民革命

北京《晨报》自被毁后曾一两次谈国民革命了。北京的《孤军周报》近来也赞成国民革命了。《孤军周报》近来更认识：“在中国的革命努力与帝国主义搏斗中，学生的实力

远不如工人，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最能制帝国主义死命的，还是工人。”大家既然都肯赞成国民革命，已算是进步，又更进而认识工人阶级，这种进步更不小。在目前革命的联合战线上，我们认为这是可喜的事。因为工人阶级并不害怕一般知识界分子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只要他们懂得在革命中工人的实力与地位，又懂得目下国民革命运动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派，——这就够了。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孤军周报》既是赞成国民革命的，但又反对阶级斗争，好象戴季陶主义者，好象国民党的右派，更不用说也象所谓国家主义派了。但“孤军”里“许多”人，应当看看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阶级的战争……然而事实不然，中国的革命运动，乃以学生、工人为主力军，资本家有时还占在革命军的对面。这也自然容易明白，因为中国的所谓资本家不过是外人肘腋下的买办阶级，他们依俯着帝国主义才能生存，叫他们如何去革帝国主义的命呢。”哈！哈！你们既然懂得资本家是买办阶级，依俯于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又是革命主力军，资本家站在革命对面，阶级斗争已然是事实，又为何在嘴里与纸上反对！

原载《政治生活》第62期，

1925年12月30日。

署名：乐生

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

在1926年的第一天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会重行恢复。两地都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集会，会员及来宾极为拥挤。他们通过了重要的决议和宣言，接受了各界的欢颂与劝勉。两地的总工会都是从万难中挣扎、奋斗出来，到现在才得到自由集会的结果的，真是痛定思痛，益发感觉到工会组织的必要和可贵了。

北京总工会筹备了好久，但是因为资本家的多方摧残和段祺瑞的极端压迫，以及工贼反动派的破坏，挑拨，总工会的分子只有在重重包围之中，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以与敌人死斗。凡属民众示威的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军

阀官僚的卖国的，总工会的分子都参与其列，而且是在群众的最前线。经过一次争斗，资本家，军阀政府，反动派工贼就发抖一次，他们就联合起来摧残这种新兴的势力，开除活动的工友哪，严禁工友聚会哪，散布工友受人利用的谣言哪，都一齐向工人群众进攻；但是从每一次争斗中，北京工人对于政治的认识与要求，对于团结的必要和发展都得着极显著的进步，在数月来苦战奋斗的历程中，他们终于得到了自由，终于将自己团结起来，做自身利益的奋斗，为国民革命努力的工作。北京工人团结起来了！

天津总工会是富于革命历史的意义的。五卅而后他更是天津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心。资本家，尤其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以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自然是对他深恶痛绝，要得之而甘心。果然在去年秋间天津裕大纱厂日人首先向工人开枪，次之李景林杀死工人数十，最后中国纱厂资本家大赏杀人军警，总工会封闭了，爱国运动团体及民众组织一齐封闭干净了。但是不到几十天工夫，因"五卅"以来民气高涨的缘故，孙传芳乘势起而驱逐人民公敌的奉系军阀于江南，国民军继起，因工农的拥护与帮助攻倒李景林，天津总工会在本年元旦遂正式恢复，重做北方工人运动的中心。

北京天津两总工会在今年的元旦出现于社会了，我们谨以十二分的敬意，供献庆祝的热忱！

工人阶级在中国民族运动中所占的地位一天高似一天；从1920年香港海员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开始，继之以1922年京汉路工人争自由的斗争，而遭吴佩孚的惨杀；但是民众已深受影响，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潮流日益普遍，积久以成

“五卅”之役，发难的起因为工人问题，抵抗帝国主义的中坚亦为全国工人，参加反奉战争的也是工人最为出力（这次讨李景林，京汉路工人对于国民第二军，京绥路工人对于第一军皆与以莫大的帮助），可以说是要求国民革命最急切的是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奋斗最勇的也是工人阶级。这次京津总工会的成立和恢复，表面上固然是因为反动势力的失败，工会得自由的发展，但是若没有全国工人阶级及民众的苦战奋斗，反动势力是不会失败的，所以工人阶级所得的自由，不是由于外界的施与，而是全凭工人阶级自己的努力。

京、津总工会的成立与恢复，很明显的指出工人阶级要谋本身的利益及为民族的解放，应该先从政治的斗争下手。因为政治的环境不变，压迫阶级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种种优越的政治势力摧残工人阶级，或是将已许给工人阶级的条件一概不肯实行。所以工人阶级的所得完全依赖他在政治方面努力的程度为断。“五卅”而后，中国工人阶级为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与广州有大规模的罢工，但是上海的战线第一次被奉系军阀摧残，封闭总工会；第二次为直系孙传芳摧残，杀害总工会职员刘华同志；广州的呢：因为在工农群众拥护的国民政府之下，现在英帝国主义向罢工群众屈伏了。所以工人阶级在今日要解放自己和解放别人都得时时加入政治的斗争，领导民众为解放而战斗！

北京、天津两总工会惟一的任务在坚固、发展自己的组织；教育群众；时时刻刻领导会员从事政治与经济的斗争，而且将自己的主张影响群众，赶快完成国民革命！

北京、天津总工会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原载《政治生活》第63期，

1926年1月6日。

署名：记者

政治现状与新的战斗之预备

自从天津战事结束与倒戈反奉的郭松龄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之后，全国的政治局面起了一番剧烈的，同时自然也是很混乱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从“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以来，因民众革命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政治段落，另一方面又开始一个新的时期，革命的民众要立刻预备紧接着的下一次的战斗。

军阀政治的总危机

军阀及官僚政治的总危机是已经来到了。此时全国的政

治局面，完全依民众势力发展之结果而变化。许多人或者都浅易的说：现在中国已陷于无政府状况。但是这个"无政府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军阀与官僚自身所演成，没有民众的革命势力么？我们岂敢相信：帝国主义者不竭力企图重建军阀的政治么？在帝国主义者所恐怖的，却并不是这种"无政府状况"，而是恐怖军阀政治现在的混乱现象，乃由于民众势力之发展。但是无论如何，目前奉、直与国民军——三派武力之各自内部，与其相互的对外关系，所表现出的各种破绽、混乱与不一致，完完全全证明军阀政治的总危机，无可逃避，无可遁饰。

张作霖虽能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邀请日本的兵队，在中国内地作战，把他的敌人郭松龄打败了，但是奉系军阀内部之危机仍在。郭松龄虽死，而与郭松龄之反戈有同样性质的势力的可能性，仍然埋伏在奉系内部，丝毫不曾减轻。张作相、吴俊升、阚朝玺等几个余留的势力，有服从张作霖的必然性，亦有乘时反张的必然性。这些必然性要由东三省内部的及全国的政治变化之推进，而后表现或变动。这是奉系军阀势力之内幕。直系军阀的内部从早就破裂了，而现在新的危机亦时时显露。吴佩孚失去其原来作用的原因，便是直系内部变化的结果。吴与孙传芳及肖耀南之冲突，绝对没有避免的可能，所以演成直系内部的长期分裂性，而吴佩孚的活动与作用全失。每一个从吴佩孚所发出之政治提议，甚至得不到直系自己一致的拥护。而在最近以及将来，更进一步的，以至最后的，直系武力的政治生命，却大半要依直系军阀，在其势力区域内，压迫民众运动的结果，反应出来，至于灭

亡。

被冯玉祥通电取消名义，而事实上仍存在的“国民军”，是目前中国三角形武力之一，现当政治问题的责任加重于国民军之时，因为国民军原来的政治性之模糊，不能担负这个政治局面，所以也表现许多内部的破绽了。冯玉祥之“下野”，算是完全证明这位“国民军领袖”——中国军阀政局末运中武力领袖之一，不能有政治上的积极作用，是其一。在山东对张宗昌李景林的战事，国民军虽然表面合作，但亦缺乏一致的积极作用，致使奉系军阀的反动势力，还暂时存留在关内重要的区域，是其二。对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处理，在人民方面绝找不出什么是国民军的一致主张，是其三。人民以国民军易受民众运动的影响，不受任何帝国主义之勾结与指挥，所以屡次表示对于国民军的希望；但是在军阀政治的总危机里，国民军亦不能逃避这种同样的现象，从此愈足证明一切旧有武力的破产。

段政府的死灭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应当从早死灭。但在最近的时期内，段政府之所以存在北京的原故，并不是段政府自身的势力，亦不是别种实力真能为之保障，而是由于：（一）民众的势力虽发展而尚未能走到权力的地位；（二）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安福党徒维持段政府；（三）在军阀官僚政客一方面，拿不出共同的政治方案来，可以立刻替代段政府；于是

段政府就在这种政治的与社会的条件下喘息了许久。自从去年十一月底北京的民众迫段祺瑞"下野"，接着全国各大地方都举行大示威运动，一致高呼赶走段祺瑞。国民军实力派受民众呼声的压迫，虽欲维持段政府，以便利自己所幻想的含糊的政治步骤，亦不可能。全国各派军阀，对于段政府之或存或留，因为自身危机之各种问题的反应，不仅不能有一致的意见，亦且拿不出具体的主张来。同时一个段祺瑞，去年各派军阀拥护或利用段氏的情形，在今年便不同了。这种不同的情形，是一个进步；但这种进步又绝不是军阀自身的，而是民众势力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所以事实上段政府死灭于革命民众之手。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维持张作霖的地位，同时亦在北京维持段祺瑞的地位；在北京执行日本意旨者便是那般安福系的党徒——汤漪、屈映光、陈宧、龚心湛、朱深、章士钊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能够蹂躏民众势力非常弱小的东三省，而不能操纵在山海关以内自北而南广大的民众运动所影响的政治局面。汤漪、章士钊等在吉兆胡同段宅内，秘密的鬼混经营，其结果不过在民众面前，证明军阀政治总危机时，段政府死灭的命运也随着，而且判定此后段政府或相同的政府之难以再见。所以象另一种恢复法统之说，在民众面前，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在军阀末运时，难道法统就可作续命汤么？

法统与国民革命

统治阶级的军阀与政客，当他们在政治末运时，常想出一些奇异的策略，又常用甘言巧语把那些策略发表到民众面前来。当段政府开始倒坍时，实力派急呼维持段政府，而结果在民众方面，从去年十一月底起，直到最近，由北京而上海而开封而汉口而广州，在各省各地齐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致提出立刻推倒段政府的口号。又当许世英在北京奔走经营组织内阁，从补阁组阁直到摄阁之时，全国的民众却一致高呼的是组织国民政府。又当段祺瑞恋栈不去之时，恢复法统的旧调，从军阀政客咀里重吐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这个骗局；在军阀官僚辈愿意重新叫出黎元洪或曹锟，复活旧国会与日猪仔，而在革命前线上的民众都哈哈大笑，正要迎头痛击这般鬼与怪。

政权终于是人民的；这般鬼怪的这些提议，全是幻想！

现在是国民革命的时代。国民革命无需乎法统，因为"法"是由国民产生，只有继续辛亥革命才是国民惟一的法统。现在的法统论调，不过是军阀官僚欲攫取政权欺骗民众的术语。即使是"临时约法"，现在也谈不到，非国民革命成功无从提到约法问题，因为约法所赋与人民的一切自由，早已被军阀官僚蹂躏无余了。

集中的政治主张与革命力量

现在全国民众的责任，便是要拥护一个集中的革命的政治主张。统治阶级所恐怖的就是国民革命；官僚与政客的本身便是反革命的势力。他们在现政局里，还处处压迫人民的自由。他们想借压迫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示威等自由的力量，阻止革命势力的发展，同时就可以得到他们自身政治生命的支持，重建统治压迫民众的局面，恢复帝国主义侵略与奴隶中国之旧观。但自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后，国民革命的潮流达于高度，这种企图的可能性已逐渐消灭了。从各城市到各乡村，革命民众的势力现在满布于全国。在目前所需要的，便是全国集中的革命力量与其继续发展。用集中的革命力量，来拥护集中的革命政治主张，这便是国民革命群众，外对帝国主义内对军阀余孽的总战术。

北京的政局现在形式上是残破的旧政治之表现，而实质里便包藏受民众势力压迫的影响；这是实际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变化之结果，为北京政府各机关支持场面的几个阁员，不仅不能逃避这种影响，而且必须依照这种影响继续变化，直到国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建立。以驱逐段祺瑞为职志的几个政府阁员，若不能依照民众在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要求，便是表示其政治立场，仍然是依附于军阀或与军阀妥协的。但是这个依附与妥协局面的成立，又将增加民众更团结与更奋斗的力量了。

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

共产主义者时时预先说明其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时时得到全国民众运动的拥护；每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在最短时期中便于全国各处听见。工农阶级是革命群众的最大多数，在过去的一切政治战斗里，拥护了自己的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无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及反革命派怎样的造谣与毁谤，但是工农阶级了解自己的党，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也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反革命派以“实行共产”的口号恫吓帝国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但是无论那一阶级的人，在过去所闻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与政见，每次能发现的，全是列宁主义的原理，与在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切实战略。任凭各种反革命派怎样狡猾的宣传，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愈得群众的拥护，而国民革命的潮流也愈加高涨了。

中国共产主义者此时的政治主张，要号召全国工农群众与一切被压迫民众，从事目前的各项紧急政治工作。在反奉战争中与段政府苟延残喘的内幕里，日本帝国主义的狂暴行为与各种阴谋，应当继续不断的用各种方法加以攻击。日本帝国主义于杀害郭松龄后，更欲进一步变反奉战争为反国民军及国民党的战线。当北京几个“国民党阁员”欲逼段祺瑞“下野”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安福党徒捣乱，并且欲变“段祺瑞下野”为“许世英下野”。日本帝国主义的盗贼政策与

偷盗行为，单是国民军幕府里几个人与国民党几个阁员是不能应付的；能应付，能答复日本人盗贼行为的，只有民众的革命运动。

民众在目前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人民的一切自由之取得（废除治安警察法等）；劳动法与农民法的颁布；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的召集，关税会议的停止与宣布关税自主；——民众的势力要从这些要求一直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之建立。

新的战斗之预备

军阀政局既表现其总危机，帝国主义之新的企图又日益显露，这便是民众运动一个新的战斗局面之开始了。我们要立刻加紧预备这个新的战斗。

民众革命的战斗本来继续不竭。但是每一个政治情形的变化——在此时即军阀政治之崩坏，便有一个新的局面，一片新的战场，革命民众在许多旧的与新的口号之下奋斗，才能使革命的目标日益接近，而民众自身的势力亦愈以发展。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恐怖的是民众的势力，所以他们用尽办法来破坏；到破坏的阴谋败露时，他们更明目张胆的与民众宣战。日本帝国主义，奉系军阀与段政府，这个“三位一体”的民众之敌，从五卅运动及反奉战争以来，便是如此表现。但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及反动政府与民众宣战，正是民众又一次的战斗的时机来到了，亦是革命的工作更推进一步了。

全国的民众此时毫无疑义的要继续革命的工作。从组织上的意义说起来民众的革命工作要更扩大、更集中，使革命的观念与行动愈民众化、普遍化，这便是最重要的预备工作。惟有最严密的民众的组织，与最切实的政治要求，才能使革命工作日有成效。五卅运动是中国被压迫民众最近时期内的第一次大战斗；反奉战争的号召是第二次；推倒段政府的运动是第三次。在目前新的战斗里，应当要把这三次未完成的工作一齐完成，——必须这些工作目的达到以后，才算展开了国民革命之幕。

原载《政治生活》第64期，
1926年1月13日。
署名：士炎

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际

列宁主义的时代

现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便是列宁主义的时代。什么是列宁主义的时代呢？列宁主义时代便是当帝国主义横行与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举行革命的时代；更切实的说，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虽只实现于苏维埃联邦，但其意义是全世界的。什么又是列宁主义呢？列宁主义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内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再解释起来说，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执行世界革命，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集中汇合，找出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谁又是列宁呢？列宁便是“十月革命”——世界革命之开始——的著作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与导师。现在，列宁——

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旗帜；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全世界革命——是我们的任务。

理论与实际

要说明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应当从列宁一生的著作中，从“十月革命”的事实去找。迄现在止，从所有的列宁主义的论文与书籍里，我们只能得较好的，但还没有绝对完备的对于列宁主义理论与实际之全部无漏的解释。共产主义者除根据所知的列宁主义，而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外，在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还说不出，写不出完全的列宁主义来。但是列宁主义的理论，早已供给我们十分丰富的知识，列宁主义的实际更指示我们许多奋斗的榜样与战略。而且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没有方法能够分开。在理论方面，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在实际方面，列宁主义包有世界一切革命问题之全部。所以，在我们的职务上，要求能了解列宁主义，要求对于列宁主义没有违背或误解，最切实的便是认识目前革命问题，且为革命工作。列宁主义，本来生长成熟于帝国主义的现代——绝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于任何时要求知道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最要的便是能知道此一时的革命问题的理论与实际。

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

自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从此以后便是我们革命时代。第一件，在这个时期里的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列强帝国主义者封锁俄罗斯，看苏维埃俄罗斯象瘟疫发源地一样，企图使之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那般矜夸自己的组织是德谟克拉西的人，却盲昧于其对苏俄的仇恨而至于不自觉自己是很可笑的。……然而惹起资本家中间的龃龉，因而无形中帮助我们的，不仅是他们对苏维埃的一目的仇愤，而兼是他们中间可鄙的冲突。”这是列宁于一九一九年论《第三国际》时说的。果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帝国主义者除痛恨苏俄外，便是自己相互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构成的客观条件，帮助了许多地方的革命运动之发展，——帮助了匈牙利的革命，德国的革命，保加利亚的革命，土耳其波斯的革命，以及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后的许多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于苏联，故帝国主义者痛恨苏联，认苏联是“革命罪恶”的渊薮。故列宁主义的著作——十月革命——证实了确实是世界革命之发端。“指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运动之政党的国际的联合，现在找到了一个空前的巩固基础：许多苏维埃共和国——

这许多共和国在国际上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资本主义胜利的生命。”这亦是列宁说的，即是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苏联的责任和性质。

可是又有人疑惑，为什么共产主义的革命，能先在俄国实现？于是便有人说：俄国“强行共产”，“现已失败”。这是第二件，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后，是否可以期望成功的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制度内、各种矛盾冲突发展之结果；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某一国，不过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破裂罢了，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线，首先在这一国建筑起来罢了。”而列宁自己亦曾说：“第一个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为甚么是欧洲之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呢？我们不至于错误，如果我们说俄国跳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到民主主义最高形式，到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这一个‘突变’，与俄国的落后地位，成了一种矛盾；然而这矛盾，恰好正是西欧人所以特别难于了解苏维埃意义的原因之一。……全世界工人群众从本能上就认识了苏维埃的意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实现，首先表现俄国落后的地位，和它跳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这一个‘突变’中间之‘矛盾’，这是奇怪么？如果德谟克拉西新的形式之实现，不给我们以一些矛盾，那才是奇怪哩？……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按同等的步骤，或和谐的比例么？答复这个问题将无疑义地是否

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没有同等的步骤，从没有和谐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够有。……全世界历史是定准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去的；但所走的决不是平坦的，单纯的，一直的道路。”这个解释可谓明了了。所以最后列宁说：

“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已产生在俄国。如果拿它比较巴黎公社，就看出它跨过世界历史上的第二步了。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新的国家模型是死不了的。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独的了。”

遍于世界的列宁主义的基础

总括列宁主义的内容，举其最重要者，便是：（一）无产阶级革命论；（二）无产阶级专政论；（三）无产阶级国家论；（四）无产阶级政党论；（五）农民问题；（六）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七）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八）职工运动与工会之机能。此外还有：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协作社问题等，……都含有丰富理论，与实际的方略。这些理论，管辖了世界问题之全部；历史的永久的劳动解放史，要以列宁主义为中心。因此而遍于现世界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现象，全是列宁主义的基础。

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前的理论——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

大纲。列宁主义便是正当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更从历史的根据说：马克思主义，是"英国的工业"，"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革命"三者之汇合；而列宁主义则是"资本与劳动之冲突"，"帝国主义列强资产阶级之冲突"，与"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弱小民族之间的冲突"三者之汇合。列宁主义有些地方确实比马克思主义更发展了，因为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已经变动而发展了。所以列宁是历史的中心，亦是现世界的中心。

现世界是什么？第一，从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及资本最雄厚的美国，到奴隶劳动役使苦力的亚洲和非洲，布满了劳动与资本家的冲突，罢工次数日以百千计，人数日以千万计，除列宁主义的革命外，无第二条路可走。其次，资本主义最高峰的帝国主义，因扩张市场，互争廉价劳动，互争殖民地而冲突，除帝国主义的战争外，无第二条路可走。走入战争，便会走入列宁主义的革命。复次，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及一切弱小民族，因帝国主义侵略之结果，于是也发现无产阶级（工厂工人）与现代的知识界群众，发现通商大埠与工业区域；与这些发现同时的，便是民族的自觉，因自觉而爆发民族革命运动；运动的爆发，因为得无产阶级为之领导，亦必然的走入列宁主义的革命。

所以现世界是列宁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已经建立而巩固；欧美及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革命运动，爆发不已；帝国主义的新战争日益酝酿成熟；被压迫民族反殖民地之革命进展，更是高涨，令帝国主义者惊骇了。列宁主义得

有全世界，对劳动解放及民族解放的革命指导，没有遗漏。

工农群众因列宁主义而抬起头来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忘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从阶级争斗中逐渐得来。列宁引导了俄罗斯的工农群众，由斗争而夺取了政权；又指挥了全世界无产者之国际联合——组织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第三国际。全世界的工人与贫农，齐举目认识列宁主义，而一致奋然兴起了。无产阶级与贫农群众，是唯一的革命阶级，亦即是最后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从“是自己”的状态，变为“为自己”的状态；而这个“为自己”的状态，即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自从有列宁主义以后，工农阶级“为自己”的觉悟已深，已入行动之域。工农群众已抬起头来，执列宁主义之旗。

> “我们都还记得或听得我们的父亲说：几十年前工人初进工厂做工时候，总以为工厂养活工人，厂主是工人的恩人。那时工人不明白资本家剥削他们。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初时都是这样想。从原始无知的不觉悟的状态过渡到认识自己地位的状态。此时罢工就开始了。工人开始感觉自己有力量。劳动运动跟着罢工的增多而起来，晓得抵抗敌人，已经是向前的大进步。劳动运动初期，工人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上面。工人再不超过这种倾向的观念了。可

是又到了一个时候，工人这个第二期的阶级觉悟已不够用。大工厂主，因自己的帝国主义倾向和银行家联合起来，并以瓜分地球为目的而开始战争。这个战争杀死了一千万人，残废了三千万人，结果缔结了“白列斯特”和约和“凡尔赛”和约，然后工人更进一层觉悟，明白是受欺骗了，战争是资本家为自己利益才鼓动出来的。这一层道理，工人明白了，于是乎发生工人革命，完成‘十月革命’的暴动！”列宁，一九二〇年在全俄纺织工人大会上演说俄国工人的觉悟。

“农民要想从资本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只有倾向于工人运动，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没收土地及其它生产机关——工厂、矿山、铁路等归于公有而奋斗。”（一九〇一）

“农民的革命运动已开始了，各省俱听到农民焚毁地主的房屋和没收地主的谷类及家畜的消息。——城市的工人运动已于革命的农民中得到新同盟者。”（一九〇五）

“……在农民面前只有两条路：保留许多地主的经济，使他逐渐地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或用革命的方法以破坏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一九〇六）

这是列宁所说的关于工农群众的几个段片。列宁主义随时教训无产阶级与贫农以怎样革命，怎样胜利；工农群众在任何地域，任何时期，全没有逃出列宁主义的范围。于是在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只有工农阶级是革命的；而在被压迫民族的国家里，只有工农阶级勇敢奋斗，站在前锋，

领导国民革命的运动了。

帝国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战

但是列宁主义所建设的苏维埃联邦，现在只占有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五的土地，还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统治。我们生存在列宁时代，但帝国主义还有庞大的势力。我们需要战争——革命的战争。

现代的战争，一切战争的总形式，便是列宁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战。在这个战争里，我们若不相信列宁主义的胜利，便会是帝国主义的胜利，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列宁逝世已两周年了，我们只有寻找列宁生前的教训，以继续走入列宁自己所辟的战场里：

"西欧帝国主义的列强，一部分是有意的，一部分是无意的，为要使我们倒转后退，为要利用俄国的国内战争，以破坏俄国内的一切，不惜用尽了种种方法。他们以为虽然不能将俄国的革命制推翻，也要使她难走入社会主义之路。……

"现在国际情状形成如此了：德国为列强所征服，一切其它旧欧洲国家，因为他们能够利用这个胜利，而对于自己被压迫的阶级，略表示让步——这个让步却使革命运动迟缓下去，而造成若干相似的'社会和平'。

"同时，许多东方的国家——印度、中国……因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更变了自己经济的状况。他们的发展完

全变为普通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步骤。他们已旋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此种发展不得不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

“……东方因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已漫溢了革命运动的潮流，已陷入全世界革命的旋涡里。

“我们对于此，到底用什么策略？很明显地要这样：用最大的力量，很谨慎地保护我们的劳动政权。全世界正在转入极激烈的运动——这种运动一定要产生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无所用其畏惧。但是在我们一方面又有一点弱点，就是帝国主义者能将全世界劈为两个营寨，他们极力压迫文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国——德国，使她不能重兴起来。而在别一方面，全东方被帝国主义的列强置于艰难困苦之下，其物质的或军事的势力，无论如何，不能与任何一个欧洲小国的物质或军事力量相比较。

“我们在将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时，能不能保得安全，我们能不能希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东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第二次给我们以缓冲的机会，如第一次西欧反革命，帮助俄国反革命，而卒因东西反革命势力的冲突——日本与美国的冲突——遂告中辍。

“对于这个问题，应如此回答：这个问题之解决，要以许多环境为转移。资本主义自会得地球上之最大多数人口训练到奋斗的方面走，我们在此也就预备这种奋斗的出路。

“中国、印度、俄罗斯占全球之最大多数，奋斗的出路当然要以此等国为转移。在最近许多年中，这一部分大多数的人民很快地旋入为争自己解放的运动，我们由此可以断定社会主义的胜利可以完全保证了！”（列宁，一九二三年三

月，论《帝国主义反苏俄》）

中国革命问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

列宁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战，在我们相信的既是列宁主义的最后胜利；而列宁自已亦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可以完全保证”。更因为帝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冲突之结果，将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口训练到战场，对资本主义作战；而作战的形式，因“中国、印度、俄罗斯占全球之最大多数，奋斗的出路当然要以此等国为转移”。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谈世界革命问题，亦谈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的问题，当然是列宁主义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主义者**（或称过激派，或称赤化分子）**早已确定这个观念，而且已在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原理下，奋斗到了现在的成绩**。因此，在要说什么是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之先，应当明确的阐明几种不清楚的错误的观念。第一、“**反对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那明明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表面上说的是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只许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戴季陶的“民族国际”或“纵断国际”是组织不起的东西；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最可宝贵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虽不十分充实，但中山先生终身为民族解放的革命行动则是正确的；中山的民族主义，只能根据大多数人民的、革命的、阶级的利益来观察与解释。季陶见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势力之发展，

因而引起小资产阶级性的幻想，欲提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结果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事势所不许可。这种为事势所不许可的形式，在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原理下，便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世界的，无产阶级是国际的，被压迫民族的奋斗，必须联合与其受同压迫的无产阶级，——那个阶级，正是日日在阶级争斗中。

第二，"国家主义"！？"全民革命"？！不知是从那里来的那些东西！反革命的假词调"国家主义"与"全民革命"，那明明是披上黑衣带上黑帽，在资本主义被无产阶级震慑时，情急了而变成的凶恶的状态，用以专门残害工人的"法西斯蒂"。"国家主义"如果不是民族主义，那就可以直称为"狭义的爱国主义"；不，简直称"法西主义"才恰切。一国之中，利益若是有全民的，而无阶级的，便没有革命。不，实际上"国家主义"者所呼号的"全民革命"，不过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要革命罢了。"国家主义"与戴季陶主义，"殊途而同归"！

但在事实上没有多大妨碍。中国革命的问题，可以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来解决。帝国主义者自身间已有许多失败，又在中国的革命运动里着着失败。那些高呼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的，只不过因帝国主义者失败时情急的授意；无产阶级专政时，不必自称为"德谟克拉西"，而直称为"专政"；但资产阶级被人呼为帝国主义时，却将原名词加诸无产阶级，在原本是赤色的无产阶级头上，盖上帝国主义的帽子——这明明是帝国主义尚未死灭时的现象。

在这种情形之下，列宁指示出下列各点：

（一）“帝国主义时代之特点，在现在的时候，在于把全世界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被压迫的民族，一小部分压迫的民族——占有巨大的财富与武力。差不多全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民族屈服于压迫之下，波斯、土耳其及中国虽然非完全殖民地，但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征服，遂成依赖的国家。”——这是民族问题的来源。

（二）“……帝国主义战争后的世界状况之下，各民族间的关系，国际间的情势，是以一小部分与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国家的奋斗而规定的。倘若我们把这个忘却了，则我们将不能认清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无论我们怎样把话说得很远很大。只有把此点认清之后，共产党才能解决一切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问题。”——这是共产主义者解决民族问题的标准。

（三）“……在压迫与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已经表现出亲近的现象；或者在多数的情形之下，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虽然帮助民族运动，而同时却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妥协，共同压迫革命运动与革命阶级。”——这是说明在民族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之态度与行动。（是活活的为五卅运动中，中国资产阶级之写照！）

（四）“……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当这种运动真正是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者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这是我们参加国民革命的态度。

（五）“在落后的国家中，应极力免除非真正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放运动，应染着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要帮助

殖民地与落后的国家之革命运动，是欲使落后的国家之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在自己特别职任的意识上，团结而训练；这一种特别职任是在本民族中与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假面具奋斗。”——因此，我们绝不当以为国民革命，即是共产革命；更不当忘却在国民革命中的特别职任。

（六）“在一切殖民地与落后的国家之中，我们不仅要组织先锋队的中心，党的团体，不仅宣传农民苏维埃组织的思想，趋向将它适用于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要规定一理论的原则——落后的国家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能转入苏维埃的制度，经过一定的发展的阶段到共产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时痛苦的阶段。”——这一点指示我们如何达到共产主义之路。

（七）“世界政治的环境现在将无产阶级专政放在议事日程上面，一切世界政治的状况都集中于中央的一点：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俄，而苏俄应当将全世界先进的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及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深信非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不可之解放运动，统都拉在身边而指挥之。”——这便是敌人所狂叫的“赤色帝国主义”，实际只是如此！

（八）“……要使各国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个联合，才能保障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若不推翻资本主义，则一切民族的平等与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

这是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总原则。①

原载《政治生活》第65期，

1926年1月21日。

署名：士炎

① 最后所引八段，都是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中演说，及所起草的决议案中之语。

本报出版祝贺工友

今天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工友见面。《工人小报》是天津总工会出的报，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一张小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各处工友看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共有的报。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识字的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并没有替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

谋大伙的团结，一面也要尽力供给工友们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起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息，反动的军阀没倒，外国帝国主义还侵略中国，可是中国的平民都抬起头来了！

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人民革命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团结；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人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不能叫人干涉，不能受人侵犯。上海的工人，现在军阀压迫下，几十万人团结似铁。香港的工人齐心对付英国人，已把那个黄金似的香港弄成荒岛了！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本报以后的职务，没别的，只有拥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

（本文系世炎同志为1926年1月25日出版的天津《工人小报》所写的发刊词——编者）

一个中山主义者

国民党右派现在几个城市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又由所谓西山会议组织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自称为“真正的”中山主义者，他们现有的报纸《民生周刊》自称国民党“正统派”。这些问题全不说了，我现在要给读者介绍一位“中山主义者”。

他是号房

中山主义者是可以没有社会地位之分别的，而且越是所谓“下层阶级”的人，反越能感觉中国不解放的痛苦，才能

成为真正的中山主义者。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位中山主义者，便是一位做“号房”的人，在职业上仿佛为人服役作“听差”，但他确实笃信中山主义。他在天津某高等专门学校作“号房”，曾熟读三民主义，受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教育，痛恨老党员的堕落与青年党员中右派反革命行动的可耻。他曾单独上书与中山发表政治意见。中山北上过津时，他执国民党旗热烈地欢迎，在万千群众中高呼“中山主义万岁”。中山逝世，他痛哭，用一元钱的邮票寄到北京，嘱朋友交丧礼处作奠礼。

他的“铺盖卷”

因为每次必参加群众运动，所以他受学校当局的干涉了。但是他为革命工作不顾职业生活，每日早起便把“铺盖卷”收卷起来，在他的意思是：一旦学校干涉他便离开，但是本日无干涉时本晚开会后归校仍打开铺卷睡了。翌早铺卷又重卷起，又往开会或参加示威运动或贴广告或发传单去。他自己又曾说：“三民主义若不成功，我永远作‘号房’。他介绍全家——妻与子——齐入国民党，他的妻子又加入天津妇女协会。他的名字是天津许多人都知道的，因为每次群众呼口号最热烈便是他。他的名字也可以介绍出来，名叫宋朝义。”

他的儿子的名字

但实际上宋朝义是他的儿子——一个铁工厂的工人——的名字，被他借用。其原因是学校当局不准他出外活动，所以他对“主人”说：“我不用自名，用儿子的名。”但现在人人知道他是宋朝义了。宋朝义被天津每次各界代表的会议，群众的大会，示威的运动所知晓，因为他很诚实的为群众工作，时时不离中山的主张，每一次的建议都根据他所知的中山主义。他痛恶反革命的右派。他能知道那些右派与杨以德、李景林是一样的人物，一样的行事。他激烈的反对右派冒革命招牌，并十分懂得右派嘴里所说与行为之不一致。

“三民主义大得全胜”

这是宋朝义在今年一月一日天津各界在南开开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与出狱工人学生代表，并反对日本进兵南满，举行示威运动时，他手里拿着的自写的旗帜上面所写的。这面旗帜是灰白色的布，上面贴以纸，纸上书字。我虽亲眼见但可惜不曾细问过，但我猜想那块灰白色的布，或竟是他工作时的围裙，或竟是桌布等类，他旗上所书的意义，很明了的是，在他以为，被捕者出狱，国民军入津后许可人民自由，国民党旗飞扬在城市里，所以“中山主义大得全胜”

了。这种认识是可敬的，因为国民军能如此便应当要服从中山主义。

宋朝义要算一个模范的中山主义者，要算一个“真正的”中山主义者。——国民党右派应当要承认。

原载《政治生活》第66期，
1926年1月27日。
署名：乐生

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

（四月十日天津通信）

自从国民军退却之后，统治“天津卫”，同时也统治直隶省全境的有三种势力：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山东土匪与俄国白党；第三才是李景林与其部下在城市中号召的流氓军队。这三种势力当然以第一种占最高统治权，而后两种因为利益不能调协之故，时时冲突起来。天津民众的不幸的各样事实，就由此而产生了。

国民军在政治上是处处失败的，其原因不仅由于国民军不懂得政治，且因民众有政治主张而国民军不能服从履行。国民军既不能依民众的主张为依归，又没有自己的特殊立足点，就以单就最近三个月中的事实说，“国奉和议”与“国直和议”都是国民军自己没有政治立场的证明。没有政治上失败而军事上可得完全胜利的，所以塘沽的战役，津南战事的顺利，开滦险要的扼守，在军事上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政

治上毕竟失败。总退却是军事的退却，在事实的经过上说来，便是几番小成功以后的大退却；但在政治上说来，却不止于是一个退却，而是不可自讳的失败了。国民军的将领，天津的当局以至于国民军幕府里诸策士应当记着：当大沽事件与八国通牒发生以后，北方与全国民众齐起为国民军之后援，换言之，即为国民军在政治上作主宰；然而国民军毫不以民意为依归，一面在民众所反对的辛丑条约之下屈伏，一面在军事上自行总退却的计划，所以天津与直隶全省民众至于重遭不幸，而国民军亦不得又从"国奉议和"到"国直议和"，从几番的小成功到大退却，从"拥护冯公"到"为吴子玉将军之马首是瞻了"。

这是天津民众对于国民军的批评和判断。这种判断在一般民众里成为普遍的论调，甚至于商民，亦大变从前的观念，而表示若干的进步。天津有组织的民众都能记忆：当"五卅"事件发生后，天津商人未尝有所动作；八月屠杀（即天津去年八月裕大纱厂罢工事件）后，天津商人更无丝毫的同情；然而这次遭受直鲁土匪联队（这应当是所谓直鲁联军的别名啊！）与俄国白党之蹂躏，天津的商民竟举行了空前的总罢市：前七日的总罢市是同盟且有组织的；以后因拒用军用票而继续无形罢市一直到了现在。天津的商民算是有了进步啊！不过同在此时，京津商民的态度是一样的。北京的商民，对"三一八"惨案无丝毫的同情心，但自奉军用飞机抛了几次炸弹，就立刻开会而通电呼吁了。他们这种呼吁的真意与论调，和天津商民是一样的；京津的商民在此时都有这样的论调，说："学生与工人与你们（指奉鲁直军言）有仇，商人

与你们有何仇呢？”——这种论调虽然谬误但毕竟在事实上是一种觉悟，因为至少的限度，京津的商民已感觉奉军等是商人之仇了。

天津商民虽因事实的教训，懂得了奉军等是民众的仇敌，但是天津的商民不是天津民众的主要势力。民众的主要势力必须是有组织而集中的，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时代里，又必须是经过战斗的。天津商人这一次的总罢市，不幸又只是消极抵抗的形式，而不是积极的反抗运动。当直鲁联匪军用票强迫行使之时，商人们不是闭户不纳，就是宁以货物赠送；当总商会大开欢迎会，一般土著富商代表俯首贴耳静听反赤化之演说，而反赤化的结论，是要行使军用票。

反赤化的演说者，又宣告说：军用票在三月后可以兑现；代表们公然应允军用票之推行，但实际上小商人们却说："三个月内反赤化不能成功，而联军诸大帅却将现款吸收去了；既然如此，我们商人宁可不必反对赤化哟！"

现在天津的事实，算是一件证明。国民军本不是赤化军，不仅不是，而且够不上称为赤化军，因为赤化军至少的限度，不至于如此不懂得政治。但是奉直鲁的军阀却一致，对国民军作战是为讨伐赤化。奉直鲁联军未入津以前，李书风（李景林的侄儿）从日本租界里临时雇用三百便衣土匪，每人给十五元，号称别动队，无故开枪在街市打死行人与警察，叫三五人佩带臂章站立在督署门前，于是乎这就算是"潜伏日本租界之别动队突起占领天津了"（北京《晨报》用头号大字的记载）！这些便衣是谁呢？除有少数李书风烟馆的朋友外，大多数是三不管（街市名）与日法租界内妓馆的差

们，及日人代雇的流氓。他们立刻在城市里，用小白纸条自书布告，说："晚六点后有在街上行走者，打死无论！"（实际则是到晚六点后便到处敲门击户肆行抢劫）于是亦有些小纸条写着："晚六点在街上行走者，以赤化党论！"没有三天的工夫，所谓的别动队，便从三百增加到二、三千了。这三千人在最初数日内，真做了不少的"赤化"（据他们的宣传与解释来说）事业。前三日中，因为受警察的干涉，竟杀死了六个警察，以至于全城警察总罢岗。此时正当商人总罢市，警察又总罢岗，"天津卫"几乎是赤化革命的状态了！（警察总罢岗与商人总罢市事件，各报纸俱未见登载，北京的《晨报》更未肯用头号字大标题。）及至奉直鲁联军抵津以后，始见所谓安民的布告。李景林的安民布告说："照得本军宗旨，原在讨伐赤化"；赤化党的罪恶是什么呢？布告里说："纲常礼教废弛"，"任意勒捐抢劫，又复骚扰奸淫"。纲常礼教的废弛尚是不可捉摸的事，民众颇难懂得，就让一般老学究看见，也只有摇摇头。然而勒捐抢劫与骚扰奸淫却有事实问题了。这种事实问题，经过这一次安民布告的指示，全天津的民众，无论工人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小官僚等，原来都不懂得什么是赤化的，现在得了关于赤化的反证。于是甚至一般不倾向革命的商人们都说："原来讨伐赤化的行为是如此，而被称为赤化的是如彼；我们宁可欢迎赤化了！"

天津的商民宁可欢迎赤化。本来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赤运动，就是反国民革命的运动。因此，天津民众此时所得的总教训，便是对于反赤的教训，亦即国民革命的教训。

所可惜的是，除广大的工人群众，与数千的革命党员有组织外，商人与自由职业者尚是一盘散沙。天津的政治状况现在尚不稳定，亦无稳定之可能的，目下的情形，确切的只是受“梁山泊群盗之统治”，逐日受“打家劫寨”的骚扰。张李的冲突，便够使天津市民忍受；因为张李冲突的原因乃是如张宗昌骂李景林所说的：“李芳辰真对不起人，山东儿郎们到了此地，既无地居住，又无粮供给，钱票又不能花用！”似此，李景林愈不得不竭力搜刮，以供奉“邻寨大王”，酬谢借兵之惠。但是日前，“邻寨大王”又受反戈，不能搬兵回寨，对借兵者之所求又不遂，十分怨愤。假使天津民众肯一致起而奋斗，这两寨的草寇大王将死于天津城里。

未来的天津统治者现在自然难以测定。然而自从“奉直和议”以后，吴爷（即吴佩孚）在原来尚崇拜的少数天津人心理里，已经一落千丈。又自“国直议和”以后，吴佩孚在天津的各种大小机关报纸，一时转不过笔锋来，民众更恍然大悟了。未来的天津统治者问题，只是军阀的分配地盘问题，对于民众，任何的统治权都是相同的：因为统治权的翻云复雨，证明了军阀的行为，而民众只愈将认识国民革命。这是在这次天津变动的总教训里的主要教训。

（附记）——因为通信须受检查的困难，本篇所述十分简略。另有搜罗各种事实的记载，在天津印行，将来择要寄本刊发表。

原载《政治生活》73、74期合刊，

1926年4月16日。

署名：知因

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由日英两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的白色恐怖的反动政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自奉军与直鲁联军乘国民军之撤退，进了北京城以后，这个恐怖政治就开始。在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只是张吴两派武力，胜过了国民军一派的武力；而实际上则有进一步的意义为我们应当深刻觉悟的，这本是从"五卅"惨案而后，日英两系帝国主义运用中国军阀以图消灭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大计划——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经过长期惨淡经营的大计划，而现在才是这个计划的开始成功。

要求真正国民会议的高潮，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这三个大事件，全是以民众为主体，为在去

年以内的浩大革命工作。所以整个的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而现在则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扑杀压迫国民革命运动的时期。北方现在的政局，就是表现这个时期开始的总现象。所以国民军之撤退，并不是国民军受压迫的简单问题；奉直军之占领北京，也不是很简单的奉直军阀胜利的问题。现在问题之所以严重者，就在国民革命运动所受的打击。换言之，即是西北国民军在目前的存亡问题与广州国民政府此时的地位——这些是目前国民革命运动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很明显的事。

北方的国民军在政治上诚然是着着失败。失败一开始，要算从去年年底民众倒段运动时起，那时候的国民军既不能服从民众的政治主张，而仍然只是自成一派武力，以孤独的力量，与有帝国主义作后援的异派多种武力作战，焉得不致于失败？所以最近的一个政变（即四月九日的逐段释曹）成了一个大笑话，而国民军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就到了最后一步。四月九日的政变，一方面表现国民军在政治上的大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直系军阀在政治上的聪明险诈，因为政变只不过是国民军对"国直合作"的一个贽见礼，而直系军阀即利用之以断絶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并以开现在直奉两系在政治上均衡之局。这次政变既然是比较有利于直系军阀的，所以在目前的北方局面，直系比奉系在军事上较弱，而在政治上则确占优势。国民军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到了失败之时，又受了直系的一个大骗。

国民军既然失败与自退，又不懂得在奉直军阀斗争的真象里，自己是一个目的物，或以为退守南口还可自保，殊不

知事实上是不然的。目前在总的现象上，为压迫中国的国民运动起见，帝国主义者固然逼迫奉直军阀对西北继续作军事行动；即在奉系军阀一方面，现在也正要借口对西北军事行动，取得挟制将来北京政府的便利，既厚集兵力，又满布爪牙。张学良偕张宗昌李景林入北京时，各帝国主义报纸称赞张学良为张作霖最直接的代表，“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大可以代表他的父亲，在北京先实行建设恐怖的政治。同时，张宗昌、李景林、褚玉朴纵兵抢劫屠杀奸掳，大逞其欲。北方的民众在此时固然愤恨奉军之暴行，回念国民一军纪律的良好，而寄以同情；但同时就有深厚的政治觉悟，认为国民军将领在政治上的措施失当，不能完全站在革命一方面，以拥护民众的利益。现在北方的一般批评中，有谓国民一军的军队甚好，但领袖不好的，——这句话若正确的解释起来，亦是不错的。固然军队之好，是由于训练与纪律的严明，但有训练纪律的军队易得，有政治知识的军队却不易得。国民一军虽有训练纪律而缺乏政治知识，其原因是由于其将领没有政治知识，所以虽有军事上的成功，卒政治上的失败。

但现在因为国民军自身在政治上受教训之结果，也引起了国民军内部的分化。这种内部分化由其将领开始，而影响到一般部下，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目前国民军之内部，很显然的有两部分倾向，由其将领分别表现出来。其中一部分表现仍是进步的武力，愿继续对奉直军阀作战，接近于民众；而另一部分则仍如军阀夺地盘，希图与奉直军阀妥协的心理。现在鹿钟麟等几个将领代表前者，而张之江等另几个将

领代表后者，张之江从早就派代表，打电报，分向张吴两方求和投降，已是尽人皆知的事；虽吴佩孚复电叫他解除武装，缴械投诚，他亦忍受。“整顿学风”的电报，明是张之江向民众借题示威，而三月十八日之惨案，李鸣钟（与张之江是同类的）之行动，完全表现国民军右倾而背叛民众利益的行为。四月九日的政变，鹿钟麟固然受了吴佩孚的驱使，但鹿钟麟的行动，始终还不敢做出背叛民众利益的事，推倒段政府未尝不是民众所欢迎的，不过推非其时，而且大称“总统曹公”太不应该，且推倒段政府的原因，为保自己的生存，作为向吴佩孚的贽礼，则完全表现政治上的幼稚行为。不过鹿钟麟既通电拥戴“总统曹公”又“欢迎玉帅北上主政”，而吴佩孚仍然非逼鹿钟麟离京不可，且始终未曾直接答复过鹿钟麟的投诚策略，同时，张之江向吴佩孚的表示，吴就答复了；这固然是吴佩孚的聪明，但也正是国民军在失败时，内部分化的激剧作用。

现在国民军退西北后，所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还能否存在的问题，同时这亦是国民革命里目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国民军自然不应当忘却现在的情形之重要，并且忘却与放弃自反奉战争以来国民军所应得的教训。依目前情形看来，国民军要自保的条件，如象张之江那样分电张吴投降是无效果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者所绝不能许可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事实上也未尝不想便利的成功，如北京《顺天时报》便向奉军劝告说：对西北若是“真正”作战，便算不智，但求能将西北军取得，才算是美满结果。日本人可真极聪明，张之江等便应该从此了解向奉直虚意投降是不可能的事，而惟有自己

振作才能自救。

但在实际上，国民军的问题——即帝国主义与军阀反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问题——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此时北方反动舞台上，张吴的离合，乃日英两系帝国主义所惨淡经营的事。但这种经营的结果，至多亦不过以能维持张吴较长期的所谓合作为度。这种经营自然是难有成功的，因为不仅奉直两系军阀要争地盘，争位置爪牙，争护法护宪，即在日英两系帝国主义本自身利益，亦难调和。所以日英帝国主义者将来经营之结果，不是弄成张吴长期的合作，而是各自扶持一方面，看看到将来到底是谁强谁弱。论实际说：日本是比较的更要求张吴合作的，因为合作的目的，是不使吴佩孚变为太强；另一方面，在当初，英国亦曾赞成“国直合作”，在现在则注意内阁问题，其目的是要使吴佩孚逐渐强大起来。为“反赤”起见，英日帝国主义与直奉军阀不得不“同床”，但为各自的将来起见，两方面又不得不“异梦”了。

依现在的结果，在革命民众一方面，张吴是否较长期合作的问题遂无关乎重要，而可以预测，——直而言之，便是可以予作直奉再和的结论。惟有一层最切要最直接的，在民众方面所忍受的，便是目前的白色恐怖的政治。除西北一隅外，此时北方全部的民众组织，在压迫之下，生命无日不在危险之中，转徙流离，饱受抢劫奸淫骚扰之苦。北京与天津的商人，各自实行了一次总罢市，天津的警察，且实行了一次总罢岗，但都是陷于无办法而出于一种消极抵抗的行为，结果仍然是忍受一切的痛苦。直鲁联军的军用票与奉票充斥

京津之市场，张宗昌李景林笑嘻嘻的看着人民受苦，中心大快。张学良因为是“他的父亲的儿子”之故，在北京威风慓慓的检举赤化，搜查学校，箝制舆论。张宗昌的旧俄门党的军队聚在街市里游行示威，散而醺酒大醉，强奸妇女。便是日本人的《顺天时报》，亦不能不承认奉联军的暴行，有甚于庚子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行为。

奉系军阀这样的行为，自然使人民愤怒深厚，从此，能接受革命的主张起而革命，尤其能觉悟了解的，是奉直军阀的行为所标榜的，乃一面“反赤”的大旗；而“反赤”即反民族运动，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残杀抢劫人民，乃成为明确的教训，用不着再有宣传与教育，而民众已得实际的教育和领受活动的宣传了。全部的北方民众对奉系军阀愤恨入骨，而奉直之联合，又增加了对于直系军阀行为的认识。所以在客观的结果看来，我们当然可以说：目前白色恐怖的局面，由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自己建立的，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在民众自然不必害怕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如何有计划的反动，而只当追求自身应如何有计划有组织的继续国民革命的浩大工作。

原载《响导周报》第152期，
1926年4月8日。

署名：罗敬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

（五月十三日广州通信）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自“五一”节起至十二日止，开会于广州。这个集合全国工人阶级之领袖与战士的大会议，现在已经闭幕了。这次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如若只当作普通的例会看待，便会失去大会的重要意义，而只能从议事日程里，找得出一些报告和决议案来。实际上，这次劳动大会不只于是个例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自“五卅”以来一次长期大战斗后的会议；亦是“五卅”运动的长期潮流，即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为“五卅”运动最后砥柱时之会议；亦是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等联合战线成立，向革命势力进攻时之会议。所以这次大会的成绩，实际是数十万参加战斗的工人阶级，根据经验，结算成绩之总合。中国自有劳动

运动以来，这次劳动大会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里，要算最重要有意义了。

大会到会代表共五百零二人，代表有组织的可统计的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工人，共四百余工会，其中会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者有两个工会，在一百以下者两个工会，在一千至三千者九十四个工会，在五千至一万者三十七个工会，在一万至五万者十六个工会。代表职业以运输业为最多，次为食品、纺纱、织造、建筑、煤矿、印刷、手工业等。在组织上，这次大会与第一、二两次大会比较起来（第一次大会有组织工人二十万，第二次大会有组织工人五十四万），是进步而有成功的。即以罢工运动而论，一年中上海与省港两大罢工运动，固是十分伟烈，充分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力量，他如青岛、天津、济南、郑州、焦作、汉口诸地，均有浩大的罢工运动，总次数在二百次以上，时间最短者一周，长者至数月，由南而北，参加罢工者过八十余万人。这都是这次大会工作的结晶，这都是这次大会旗帜下的战斗员啊！

什么是大会的本身成绩呢？这不能离开中国工人阶级目前政治的与经济的要求以外。所以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案是下列诸件：一、职工运动之总策略；二、组织问题及其运用之方法；三、经济斗争之最近目标及其步骤；四、罢工的战术；五、工农关系；六、宣传教育问题；七、女工童工问题；八、劳动法大纲（附工会条例）；九、失业问题；十、合作社问题。作这些议决案的材料，指示中国工人阶级之正确的政治、经济、社会与职工运动的观念和策略的，有下列各种

报告：一、一年来职工运动之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的地位；二、全国政治与社会状况；三、国民政府现状；四、世界革命状况；五、世界职工运动；六、苏俄状况；七、全国总工会报告；八、上海总工会报告；九、省港罢工报告；十、各地各代表团的报告；十一、工农兵大联合的报告；十二、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报告。这些报告包有中国工人应具知识之全部。担任报告者，有国民政府委员，苏俄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职工运动诸领袖。大会中对于各报告具有讨论与决议。有几种报告是劳动大会与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合同开会的，所采取的是共同的决议。总计大会通过正式决议案九件，报告后决议案十件，提案与其决议四十七件。决议案中最重要的，要算总策略的规定、组织的方法、经济斗争的目标及罢工战术诸项。在总策略里，大会指明"五卅"后与"五卅"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同的地位，提出工人阶级最近之目的在求经济改善与自由，而责任则在促成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死亡。又指明工人阶级之组织形式，一为政党，一为工会；政党乃阶级的最高组织，工会须从原始的简单的形式，进而作严密的团结。又确定与农民的亲密携手及与城市中各阶级革命民众建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大会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另一方面亦警告惟有广大的组织与革命的联合战斗才能达到目的。在组织方法决议案里，详细说明下层组织、工厂支部、支部干事会、工厂委员会、产业联合会议、秘密组织等的规律和实际。在经济斗争问题里，提出最低限度工资与最高限度工时，劳动保护，改良待遇，优待女童工等目标与进行步骤及斗争的指导和经验的交换。罢

工战术在本届大会中是一个新的问题，引起到会代表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决议案中分析罢工的性质，决定的条件，准备的步骤，注意的问题，敌人的破坏之估计等等。这些决议性质之重要，绝不至于是白纸黑字的，乃是从经验与实际里产生出来。全国劳动大会是全国各工会的最高会议组织，所以每次大会的决议案，成为最切近的政治与经济的战斗纲领。

正当大会开幕之前一日，增加全国工人代表一个世界的教训，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厄运再度表演，大英帝国之总罢工爆发了。大会闻此消息后，立拍电表示深厚的同情与援助；在战斗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接着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同情援助之声，应当愈加愤发罢工。广东与香港的工人，又联合大会请代表举行援助英国罢工周，实行号召物质的援助。尤其是粤港的工人，他们将近一年来站在英国帝国主义之对垒里，困苦艰难，到目前当然意外的感觉欣幸，愿祝英国无产阶级之成功。大会又特别致电英国工人，请援助省港工人，督促英政府承认罢工条件。这种事实，不仅证明国际工人之联合，而更证明中国工人确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里一支有力的军队。在英国矿工罢工以后，各国的无产阶级，都纷纷起而援助，但在此罢工前，远东一支有力的军队，已经七八月长期在战线上冲锋陷阵，应当为世界无产阶级所赞许且敬重的。

在组织的意义上，此次大会固然是进步而有成功的。同时，在政治意义上，姑无论全国此时大部分境域怎样的陷入恐怖之窟，然而准对此黑暗的恐怖之窟下攻击，对于全国反

动政局作有力的抗议者，便是此次的大会。所以大会全体代表，一面亲身请愿国民政府速行北伐，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工农与一切革命民众，自珠江流域以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直至东北，应为北伐军布胜利的战线，期国民革命之早日完成。本月（五月）十一日，黄浦政治军事学校欢迎劳、农、教育三大会代表，国民革命军代表即席提出各界民众合作镇压反革命为北伐条件，而劳农代表即以此为答词。扫荡反革命的北伐工作，现在已不是宣传而是实际了，因此在广州开会的劳动与农民两大会代表，严重地提出拥护革命军北伐与拥护国民政府两口号，又在广州城内连次举行工农兵、工农学、工农学商的联欢大会，在各联欢大会里，充分表现各界革命民众在国民革命里之合作与拥护国民政府的精神。尤其切实的是工农学商之联欢大会，提出有关商人利益，拥护省港罢工，巩固革命基础的决议案。由这次联欢大会所产生的各界全权代表之联合委员会组织，将成为有力的团体，不仅使反革命派的阴谋不得逞，且可以使香港帝国主义之阴谋（离间工商感情，挑拨工学冲突，贿买反革命军阀与土匪作乱）失败，而令国民政府的根基更加巩固。这亦是本届大会期间内的革命策略之成功。

虽然全国大部分境域在反动势力之下，但是工农阶级仍然保有其力量，各阶级民众，仍保有其革命势力于社会各种组织里。在这次大会里，从各种社会团体对于大会的拥护声，可以看得出来。大会接到拥护的函电，多至六七百种。尤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亲切地表示出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希望和责任。大会亦议决致书国民党与共产党，表示明确的

态度。这种信件不应只当作普通的文件看待，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示，较其他决议还觉重要。此外自“五卅”运动以来，尤其是在省港罢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其政治的与社会的治理实验，所以此次大会中各种组织，亦远较以前的组织为进步。从各地来的代表，都惊叹省港罢工组织之发展，与武装纠察队之有训练。这都是在大会以外有益的实际教训。

我们难以在一篇说明里，将大会的内容包含详尽，这以上所述，自然只不过是指出其重要者。最后，我们总括大会的结果，应总合的有下列几点：

（一）自“五卅”后长期大战斗自身力量的总检核；

（二）最近政治状况与革命联合战线及职工运动总策略；

（三）组织上的进步与此后更大的团结。

所以大会的结论，在政治的与组织的意义上已十分明显。这样的结果成绩，并不只是大会本身的成绩，而是全中国工人阶级之成绩，因为大会的经验就是全国工人阶级的经验。

录自《响导周报》第155期“五卅”特刊，
1926年5月30日。

署名：乐生

“五卅”纪念运动之教训与上海民众之责任

一周年的“五卅”纪念运动，上海民众得了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要从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敌人得来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

兹先略述如下：

（甲）敌人方面：

（一）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据报载事前曾训令租界巡捕不准开枪；这个“不准开枪”的训令，不能不说是八十年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民众武装退让；固然，中国民众对于这种退让是没有感谢的，但因此而明白了自己的力量。

（二）军阀一方面在事前多端恐吓与禁阻，却是结果终不能屈服而让步；初允开会，不准游行，且限制人数不准太多，但民众即开会且游行亦未敢公然压迫。

（三）"高等华人"也是民众的敌人之一种，在事前，他们奉帝国主义者之命，从事防范，且用了些特别的方法（如组织各大学同志会及多次帝国主义的宴会），而结果也未能如愿。

（乙）自己方面：

（一）民众自己的首要教训，便是团结尚未一致，运动尚不广大。

（二）第二个教训则是并未能完全估计敌人的势力，在事前稍有畏缩的状态，尤其因为商会领袖、学校当局有这种心理而加以阻止，所以至于一部分商民群众与学生群众有这种表现。

（三）第三个教训则是组织尚不广大，宣传工作尚不深入群众，虽过百万的上海民众，而是日参加大会者，不过数万人；纪念的口号虽然正确，但未能普遍表示一致；尤其是一部分违反民众倾向的反动派之另自号召（如是日斜桥的假会），在民众自身殊有未能加以制裁之憾。

以上这两种教训俱是很显然的，但是今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毕竟是一个表示上海民众力量的运动。这个运动，表示出经过战斗的上海民众，自去年"五卅"以来，至于今日，痛定思痛，仍有积极的革命的要求。"五卅"事件发难于上海，在目前全国大部分入于反动势力的时局之下，上海民众若无一番热烈的表示，便无异于向帝国主义者宣布中国民

族之屈服。所以此次示威大会参加的数万人，罢工罢市罢学的数十万民众，各马路对外国巡捕激战的工人、学生和商人，实在是“五卅”精神之承继者，中国民族利益之拥护者。由此可以证明：“五卅”运动并未失败，“五卅”烈士之精神仍然存在，经过一次大战斗之上海民众的力量，仍然存在。

帝国主义者常说，上海的中国人是不驯良的，所以去年“五卅”日，他们开始屠杀的政策；嗣后中国人起而反抗，他们便利用军阀来压迫，利用“高等华人”安抚，利用反动派来分裂民众的战线。中国的军阀也常说，历来叛乱，起于上海，所以他们屡次施行高压的政策，越是民众意志激昂之时，军阀越要借口戒严，厉行禁阻。但是奋斗的上海民众，不能因此而屈服的。这次“五卅”周年纪念时，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当局，一面是派了得力的中西干捕，各处把守，一面是加岗镇压，添队巡逻；然而南京路与各马路的演讲，民众毕竟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防线；西门的大集会与继以游行示威，民众毕竟冲破了军阀的防线。这是很实际的群众力量之证明。这亦是群众运动的一番经验。上海的民众应当把这个经验看得宝贵，因为“五卅”事件尚未了，“五卅”运动之目的尚未达到，中国民族革命之工作尚未完成，上海民众尚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从积极一方面看来，我们可认为今年“五卅”的上海，比起去年“五卅”更为壮烈。因为去年的“五卅”日，我们的战士，在南京路被敌人杀戮，而今年之同日，我们就在南京路与敌人开始巷战了。我们应当说，当日市民手中的石子，抵抗那般凶手的武器，是可宝贵的东西；从楼上掷下凳

子打破西扑头的商人的行为，是可赞扬的行为。当日民众命令电车停驶，立刻就贴上“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在讲演中攻击“高等华人”的妥协，就一致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尝赐的三华董”。这样鲜明的示威行动，足够使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胆战心惊。上海民众这样积极的勇敢的革命的精神，是应当从此永远继续的。上海民众这次的行动，应当立刻影响到全国，而一到开始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在南京路之旁，有一位青年的女工，被英国巡捕用棒打破头部，这位英勇的青年战士高声抗议说：“今朝侬还打我么？”这是一个积极的战斗的抗议！这个抗议的意思，在这位青年英勇的女工人，是以为：“今天是我们打你们的日子，因为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了，你们还敢来打我们中国人么？”这并不是自夸的话，而是我们中国民族自“五卅”以来向帝国主义的压迫者应有的表示，这位青年女工的抗议的一句话，确实代表了这种精神。只是我们中国的民众，还应当更加团结，更加一致地站到联合的战线上来。

上海民众此后的责任是什么呢？“继续‘五卅’精神”一个标语，可以概括上海民众责任之全部；然而继续这次“五卅”纪念运动的工作，尤其是切实的口号。无论是激烈者或和平者都应当承认，只有一致的联合的力量，才可以战胜敌人，因此而各界民众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团结，更是实行继续“五卅”精神口号的首要工作。上海的工人应当更加严密地团结起来，以自己的工会与政党为营寨，时时准备作战。上海的学生应当立刻统一自己的运动，首先推翻反动教育家的阴谋，以求恢复在群众中的先驱地位。上海的商人与自由职

业者，此后要看清全民族的需要，亦要认清如何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爱国正是自己的责任，帝国主义者的欺骗和引诱是亡国之源；此时全国各阶级联合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一致参加，如若退缩或反对，便无异投降于帝国主义者。只有这样各阶级民众一致的重新的工作，努力建造上海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新纪元，才能继续“五卅”精神，才不致于辜负了这次“五卅”纪念运动的教训。

原载《响导周报》第156期《上海市民纪念五卅运动特刊》，1926年6月3日。

署名：施英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

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当此全国反动势力压迫民众，革命问题十分紧张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此会议，在事前殊引起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与盼望，因为在形式上国民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大党，自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甚为民众所瞩望。所以在此次会议中，民众至少所盼望的是国民党最高干部对于目前政局，是如何的意见，有如何的分析，具如何的策略，提出如何的口号，使民众如何的奋斗。这并没有一点苛责或奢望，只是一种常识，民众对于一个政党，当然只有如此认识：譬如每当政变之时，连辛亥俱乐部，新社会民主党，上海总商会还有些意见发表，何况国民党？所以在开会

以前，广州的平民群众也如此瞩望的。

但是等到开会的那天，广州城内忽然满城风雨的“共产”谣言，甚至于有阴谋反革命分子去运动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挤兑起来，当时各种各式奇怪的谣言发生，或者说五月十五日民党中央将宣布共产，或者说会后将没收商人财产；运动罢市的人便说非胡汉民当权不能保财产田宅，煽惑挤兑中央银行的人便说非杀尽共产党，蒋介石始终受包围，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这种谣言，街头巷口，时常可以听见。三月二十日之役后，反动派的阴谋未告成功，香港帝国主义者也高兴了很少的时间。民党右派分子仍旧有些郁郁不快；五月十五之前便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是民党本无左右派，完全是共产党挑拨，这次会议左派即占多数，共派想必又要利用他们打击右派，实行赤化国民党。这种谣言和议论风转后，广州忽然宣布戒严，空气紧张到万分，银行挤兑，军警梭巡，于是社会上对于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感想，便弄得恍惚模糊，莫明其妙：也不知道这次会议究竟是共产党讨论实行共产呢，还是反革命预备杀共产党？

等到该会宣布开会，政治报告以后，关于现时革命策略，北伐问题等固然没有讨论，关于实行共产，更是一字也没有提起，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但是殷殷瞩望的民众，等待正确明显详尽的革命方针的议决案对于颜内阁的态度，关于护宪问题的表示……等，待到该会开完还是没有！一般广州民众，明白的革命的一般人民，都明知道中国现时没有什么实行共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同样的明了：现时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吴张之反革命；他们

并且要求知道广州的革命力量究竟怎样，革命势力内部的纠纷，是否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而毁灭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民党中央会议对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亦许只有对于最后一问题的，即广州革命力量的情形。

是的！民党中央这次会议，表示了些该党内部的各派实力的关系。民党之中向来有许多派别，民元以来国会中许多小政团，自称为民党者甚多，确系民党分化出来，堕落下去的也不少，就广东护法以来的历次政府之中，也有好几派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之后，许多十分腐败堕落的分子固然大半刷除了，但是余留下来的这种成分也还有些；同时第一次大会之前，已有共产主义者加入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第一次大会之后共产派当然因民党政纲之明确规定而更加增多。第一次大会后政纲即确定，又受民众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动，新生的和旧有的左派日益团结巩固起来。民党中之有派别，在中国各阶级联合革命的过程里，当然是无足怪的很自然的现象。第一次大会明白确定赞助工农并且更加明确地恢复了民元以来为妥协派(黄宋)所抹杀，为一般党员所遗忘的平均地权主张，再加之以新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代表买办土豪阶级之冯自由派，便首先发难，反对国民党的赤化，以一切"罪名"，如反帝国主义等，加之于共产派，要求开除。嗣后谢持等又从而附和之。第一届中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便讨论这一反共的纠纷问题。当时正是商团（买办阶级）反革命暴动之时，买办阶级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气焰受一次挫折，冯自由也就被开除，而谢持等反共运动，便亦暂告停顿。民党内这种反动派从北京政变之后，

历次受大大打击而消沉，尤其是廖案之后。“五卅”以还，中国无产阶级势力大增，国民党左派得其政治上的赞助，而得形成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便因恐惧而退缩，国民党中也有所谓戴季陶主义发现。随后帝国主义由守而攻，联合主张实行反革命战争，自然而然，民党中买办土豪阶级的反动派及机会主义的右派应命而联合于假借戴季陶主义名义下，召集西山会议，开除×××及共产派。随后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现充分的左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共产派虽减少，而左派势力大增。西山会议派因亦召集自己的大会于上海。不过，在这时候北京三月十八日屠杀，国民军败，民众革命运动亦受摧残；广州又有三月二十日反动派之阴谋捣乱，诬陷共产派之事；并且×××也因“病”离粤。——因此，机会主义派中便有些不公开的参加上海大会，这是五月十五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之内部纠纷的情形，亦就是民党革命力量之消长分合的情形。

这次民党中央会议之前即有党内各派斗争这种历史关系，又有开会前反动派的捣乱造谣威胁，于是这次会议不期然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党务整理案”。开会之前，西山会议派之预留回粤地步者，纷纷都到了广州，甚至于曾经出席于西山会议又出席上海大会被选为右派中央委员之邵元冲等亦去活动。……会外空气之紧张和会议运筹帷幄之努力，都使主持民党中央者专注意于“党务”。这次会议便全被“整理党务案”所占据。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围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进展。其中颇有愤愤不平的，有说：“向来反对共派党团作用的人，如今却自己在背后执行党团

作用了！向来以捣乱秩序诬陷共派的人，如今更自己指挥造谣捣乱！难道应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党务整理案”究竟是甚么呢？蒋介石对于三月二十日事件自请处分（中央议决免议），同时，提出其“党务整理案”。其中重要之点即限制共派在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派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籍报告；推举代表邀请共党设联席会议，请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民党主席保存。并议决选举中央主席。这些议决比在前两天的原提案还要复杂些，字句还要严重些，提案后经历次修改才改到现在公布的条文。可是此地报纸不得中央委员会许可，早已将草案原文公布，此等底稿，究系何人取出公布，现尚未调查明白。

这一议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用不着多所解释；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可是，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

此次会议中，亦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可以一述。右派在国民党中仍然存在，是一件事实，本不是可以否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左派之胜利，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勇于团结的好现象，此时右派无地自容，所以又有右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全中国的国民，都知道这个右派，右派的行动和消息，京沪各地的报纸，都大书右派，加

以分别，这并不是别人可以捏造的。但在这次会议中，偏有一位孙科要提出一个议决案，要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结果遭了否决。所以左派与共产派具在会议中，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共产派除从理论上解释左右派的原因外并从历史上事实上加以说明；左派则痛责俱乐部的组织与另立一党的右派行为之荒谬。此案之结果虽被否决，但在事实上又一次证明反动派之行为的表现。

至于左派，当然受四围种种束缚，如共产谣言，军事暴动的谣言等，可是，左派与共产派的联盟很巩固，一般民众，如最近农工学商联合会议，都赞助左派政策。可见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最近（二十六日）民党中央已有对时局宣言发表，大半只是偏重于该党内部解释纠纷意义的说明，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议决案，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所以虽然“党务整理案”本文之中，很明显的有机会主义之渗入，而民党革命力量之前途，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不革命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之胜负，至少在南方很和民党中央里左派及机会主义派势力之消长，有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派是否能对于打击反动派的事不多所牵掣呢？

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议决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ion），在开会时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如委员人数分配及担任部务之

义务等，毫没有甚么争执，并且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亦有宣言发表，说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及与民党合作之意义。至于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

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当然他们留给会后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变更的问题，乃是民党中央是否决然打击反动派，巩固革命战线，以实行不幸现在竟不能实行的国民党的天职——做中国民众的先锋，反抗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战争和统治，集中全国一切革命力量以达到召集国民会议，打倒贿选国会系统的北京现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民族的经济政治于帝国主义之下。

原载《响导周报》第157期，
1926年6月9日。
署名：乐生

北方政局新变化之征兆

（五月二十八日北京通信）

国民军退出联军占北京的一天，是反赤军势力达于极点的一天，亦就是革命势力和与民众接近的武力重复抬头的一天。从那一天起反动势力的联合战线，逐渐的瓦解：汉吴逐段，奉张反颜，不但把一个北京的政治舞台弄成了两大相持谁亦不许谁下口的肉骨头，并且影响于军事方面。汉吴只天天在黄鹤楼头，弯弓盘马，说些讨伐南赤北赤的大话，而一夫当关的南面要塞之前，从不见田靳的一卒一骑，有与关东红胡山东白孽连鏖并辔北逼长城者；而且居庸以南天险人防，万难飞度，直鲁联军曾经尝试，已三次受了莫大的损失。南口不啻虎口，以奉方之聪明狡狯，岂能徒为汉吴夸大狂的迷梦牺牲？又以汉吴在政治上与奉斗争，丝毫不肯让

步，如果奉方以全力消耗于险地劲敌，则异日之乘其敝者，大有人在。故奉方于此，在军事上对于南口的进攻，不能不毅然临崖勒马，将直鲁联军陆续撤退返鲁，一面则以奉军屯集于唐山丰台间，严重的监视汉吴一系的行动，而南口方面，遂成休战之局。

奉张的主力军，近集于津榆道上，似颇不愿轻于一掷的牺牲于对国战争。窥其用意，殆欲留此势力，进可与汉吴苏孙相对峙，退可以自保其关东王的基本地盘，而以直鲁的联军应付南口，以吴大舌头的铁骑，远往多伦，胜则孤家将士之功，败则只是嫁出的或待嫁的女儿蒙其损失，此真计之巧者。直李之卷土重来，实靠张宗昌之力居多。其本人之势力已一落千丈。入津京以来，既不见信于奉，而且常受张褚之压迫，汉吴虽曾敷衍过他，此次燕京卫戍，又会向隅，故怨吴甚深。现在蛰居天津日界，态度极其消极。最奇者，他日前忽然向国民党表示好意；彼并表示对联俄不反对，惟对日彼个人以历史的关系尚不能遽断。于此可见其最近态度之一斑。

鲁军回鲁的原因，据日人方面秘讯，纯系预防苏孙之侵入。日讯且谓靳田亦与是谋，届时靳田亦将出兵津鲁，助苏孙攻鲁张。社会日报林白水警告张吴小心火烛，小心靳田在苏孙与国一之间，接起一个桥梁。顺天时报公然说汉吴北来，系因屡电靳田援鲁，而靳田皆梗命不动。以吾人所知，靳田确与国一有密切的交往。另一说，鲁军“归欤”于苏孙外，尚有二个目的：一监视庶澄，因毕对张不满，张甚疑之；一镇压红枪会黑枪会等农民武装暴动。惟直系方面消息，则谓

田的态度，确如上述，但靳殊未与田一致，此或为直系一方乐观的观察。因靳与田均为未曾获尺土以为之地盘，其情形相等。他们曾对人言，我等对于护宪，拥颜，乃至反赤等问题，毫无半点的兴味；我等只欲求得一托足之所，足恃为饷源，以为兵士觅食而已。吴之再起，靳田实劳苦功高，而河南地盘已为寇得，京师卫戍并且吝不之与，故惟有自缔新缘，以与反奉的势力相结，向直鲁发展，这是必然的情势。

国一退到南口后，吴张声言尚欲穷追，其时国一所处的境势，岌岌乎四面楚歌。谁知不多几时，共同讨伐的敌人，忽变为竞与求婚的处女！但实际言之，国一军对吴，无和议之可言；门致中到汉晤吴时，吴一见面，便说你是前来缴械的总代表吧？吴之骄妄，一至于此，国一安肯与彼言和？对奉虽有张树声金鼎勋之互换使节，而奉之对国亦无言和诚意，不过借此以牵制汉吴而已。对国言和最干脆的，莫如张宗昌。张临出京时，曾派代表往六国饭店晤国一军驻京要人，表示即将撤队回鲁，以后的战争，是奉军或是李景林的对国战争，与我老张无干了。尔后老张的兵果然以次撤退，但这是因防孙而撤退，老张乐得对国表示一个空慷慨。此外实有默契者，厥为田靳，尤以田为最坚确。田现在长辛店赶造枪弹，备战甚急。传闻吴此来，既要逼田靳进攻南口，否则调之他往，以期巩固直系与奉系的反赤联线，又闻田军将入雁门关，名为援阎，实则助国。但阎闻此不速之客将来，急电汉吴，求其令田靳等在南口方面相助，不劳税驾雁门，是盖婉拒之辞令也。

国军乘南口方面入于休战状态之机会，忽然大举攻晋，

二十日下总攻击令，二十二日即攻下大同，现在激战于雁门附近，太原大震。南口奉联军为敷衍晋阎，进攻南口，顷闻已败退沙河。预料时局之新变动，专待山西战争之结果，如果十数日内外，霹雳一声，国军长驱以下太原，则娘子关外，必然要闪一新局面。尔时南方之革命军，如已攻入长岳，则大局当有新发展也。

山西即下，西北根本已巩固无忧，然后徐徐肃清陕豫，期与革命军会师武汉。即不然，守南口娘子关与潼关以观变中原，亦能形成一个由察哈尔经绥甘陕川黔桂迄广东包括全国革命势力的弧线阵式。

汉吴对于苏孙，亦在暗在拆台：在北方扬言以魏益三军队俾齐燮元，南下讨赤，实则助齐恢复势力，以为在苏皖浙卷土重来之计；齐复暗中勾结苏皖旧部，自不消说。在南方，则以江西之郑如琢与福建之周荫人结成攻守同盟，以破苏孙之五省联盟。最近郑周之间，吴周之间，秘使往还不绝于途，其衔有重要使令，不问可知。前传周之代表到汉，兹悉此人为何元弼，系周之参谋长，与吴之秘使沈某同行赴汉，吴接济周械弹很多。浙之夏超，亦与吴暗通消息，似此情形，苏孙的高枕石头，尚不能安眠自在，卧榻之旁，尚有汉吴挠其清梦，其势不能别图结合，以防不测也。

现在陕有“硬肚”白枪会等，豫有红枪会绿枪会等，鲁有红枪会黑枪会等，是皆农民自卫的团结。黑枪会有快枪机关枪大炮等新式武器，为最进步的武装农民自卫团。是等团体几普遍于北方兵祸最厉之各省，这是农民阶级奋起消散军阀军队的征兆。河南红枪会之击败国二军；河南本省兵士之不

为岳维峻作战；山东张宗昌部下之下级军官有许多人回兖州去，回泰安去，回他们的家乡去，回到家乡加入红枪会黑枪会去。这些事实，足以征验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打破军队；在军队中的农民，尚未与其阶级断绝关系，尚知拥护其阶级的利益。农民的乡土，即是他们阶级的营盘；红枪会黑枪会等，即是他们武装自卫的队伍。

1926年6月9日。

署名：罗敬

上海最近的罢工潮

"五卅"周年纪念后，在最近二十天之内，上海发生了四十次的罢工，参加罢工者三万人以上，其详情如下表：

企业	罢工次数或厂数	参加罢工人数	原因	结果
纱厂	七加二加五	1，5000	资本家的反攻	胜利
丝厂	七加三	8，000	经济要求	七厂胜利 三厂失败
烟草	四	1，500	经济要求	失败
成衣	一	1，000	经济要求	胜利
毛巾	一	250	经济要求	未决
电车	一	250	与水兵冲突	胜利
麻袋	一	2，200	经济要求	失败

印刷	三	120	资本家反攻	胜利
金银业	一	35	资本家反攻	未决
药业	一	未详	资本家反攻	未决
外作漆业	一	未详	经济要求	胜利
板箱	一	未详	经济要求	未决
洋服	一	未详	经济要求	未决
合计	四〇	28，355		

在以上四十次罢工之中，有六种属于大企业，即：纱厂、丝厂、烟草、电车、麻袋、印刷；七种属于手工业，即成衣、毛巾、金银业、药业、外作漆业、板箱、洋服。罢工的原因，属于经济的要求者，占十分之六七；属于资本家反攻者，占十分之三四；此外如电车的罢工，系与水兵冲突，则属于特别的原因。罢工的结果，除未决者外，大半是胜利的；尤其是丝厂的女工，其中七厂得到几年来未有的胜利。

为什么上海最近有这样高涨的罢工潮呢？什么是这些罢工的主要的总原因呢？上海的无产阶级与手工业者在近来罢工潮里表现一些什么特点呢？在所有的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应当得着一些什么教训呢？这都是我们应当研究与说明的问题。上海的松沪督办、警察厅长，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巡捕房、包打听，都不配解决这些问题。上海丝厂资本家所收买的女工贼穆志英，组织了一个什么“女工研究处”，更不配研究或解决这些问题。唯一配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上海工人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总司令部——上海总工会。最近二十日内四十次三万人以上的罢工，无一不得到上海总工会的援

助。所以，在最近上海工人罢工之总现象里，表示上海工人之能继续“五卅”精神而团结奋斗；同时证明上海总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能够拥护工人的利益。

为什么上海最近有这些高涨的罢工潮呢？因为一方面是工人受不住生活上的痛苦；而另一方面，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已经渡过恐怖的五月，又向工人进攻，所以迫得工人不得不出此一途。上海的工人正当“五卅”周年纪念之后，又值军阀反革命势力嚣张之时，革命的空气十分紧张，所以紧谋团结，向资本家宣战，并谋生活的改良。上海所以有这样的工潮，是目前混乱的中国时局，使工人感受生活的困苦，而一般资本家又向工人反攻所造成的。

最近工潮发生的主要原因，详细说来就是由于：

一、上海的米价高涨（现每石已涨至十七元五角，不久可能涨至二十元以上），别种日用品亦日见腾贵，直接使工人的生活入于更困难之境。所以各企业各手工业工人之罢工要求，以经济的要求（即增加工资）为最多。

二、资本家向工人的反攻，更是使工潮直接爆发的原因。近来日人内外棉纱厂甚至组织“法西斯”谋打工人领袖，各手工业主趁端午节时开除工人；又如印刷业主竟因工人纪念“五卅”停工而罚工人的工资至二元之多；烟草公司借口出货不销而减少工作时间，希图少给工钱。

三、“五卅”纪念运动的影响，亦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资本家方面固忌恨工人的势力，忌恨工人在“五卅”周年纪念中所表现的伟大力量，而在工人方面却正由于“五卅”纪念运动的影响，深信自己的团结力量，又适逢帝国主义者

与一般资本家之反攻，所以发生最近多种的斗争。

四、组织上的力量与团结运动，在目前工潮中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海有组织的工人方谋更坚固的团结，无组织的手工业工人亦纷纷起而作团结运动。但在同时，帝国主义者、资本家、租界的巡捕房、中国的警察厅，都深深忌恨工人的团结而加紧压迫，所以工人之斗争愈加猛烈了。

以上这四种都算是主要的原因。这些原因，在女工贼穆志英的"研究处"里是研究不出来的。然而上海的工人，已在这些实际条件之下，开始为自己利益而斗争了。并且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这种斗争将继续延长下去。江苏省长公署所谓"取缔罢工"的训令，说什么"效尤成风，实堪痛恨"，"任意要挟，不服调解，亟应严加取缔"，都是"放屁"之谈，丝毫不足以解决现在上海的工潮，他们不过是为保护资本家压迫工人罢了。

上海的无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在近来罢工潮里表现一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闸北各丝厂女工之兴起，算是在上海的无产阶级运动里，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自来各丝厂女工，受资本家和官厅双方的压迫，又受工贼穆志英等的欺骗，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困苦万状，在去年五卅运动时亦未能积极参加，而这一次才勇敢奋起，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了。她们战斗的英勇，秩序的良好，尤可称赞。

第二、各业工人对于上海总工会的拥护和信赖，表示上海工人团结的一致和革命的精神，于此次各种罢工里都表现出来。同时，官厅亦不得不服从工人的意见，又明知自己不

足以解决工潮，所以只有请邀总工会的代表去解决。丝厂罢工的女工说："我们没有代表，只有总工会才能代表我们。"丝厂工潮解决后，官厅用巡警和马队来强迫工人上工而工人不理，只等到总工会的代表来演说宣布之后，工人才欣然纷纷回到工厂去。后来资本家与官厅两方面都改变策略，拒见总工会的代表，然而事实上不经总工会之参加者，凡罢工都难以解决。上海的工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团结力量，看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在五卅大运动中是一次证明，这又是一次证明。

第三、对于经济要求的条件。关于增加工资一项，各业工人都有各自的要求（此次四十次罢工中，惟电车、金银业、药业未提出经济条件）。同时，关于工作时间一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此次有一种共同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都只限于要求每日早六时上工，晚六时下工，合计还是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有一部分才要求午膳休息一小时。凡是明了上海劳动状况的，都知道上海工人不仅是工资少与待遇不良，就是工作时间之长，已经可怕煞人。但现在上海的丝业女工与毛巾工人等还只能作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在这次罢工运动，固然是一个小进步，也算是一个特点。然而上海工人还需要奋斗，以求实现"八小时的工作制"。又如这一次丝厂女工胜利条件之一，有"产前产后须休息一月，工资照发"的规定，也算是历来所未有的，但资本家是否真正履行，还要看工人努力团结来监督。

上海工人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既然是继续不断的，在近来的罢工运动各自结束以后，上海的工人应取得些什么教训

呢？这更是我们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前面所述上海工人在近来运动中的特点表现，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应得的教训。但是在这些教训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几点：

一、上海工人此时应当明了“罢工的战术”，要知道若不“知己知彼”，便不能“百战百胜”。工人阶级为拥护自己的利益起见，应当了解自己阶级的战术。譬如此次纱厂的罢工，没有总同盟的罢工的需要，而一般工友们，徒凭一时的勇气，反有这种倾向，便算是不懂得罢工的战术。又如麻袋厂的罢工，暴动太多，且无组织；我们应当知道无组织的暴动是最危险的，毁坏生产机器，更是不必要而且有害的行动。又如日本资本家之应付工人，他们开除了工人不敢自认，在租界内推托于巡捕房，在华界又推诿于警察署，——这算是资本家懂得战术，巧于用策略应付工人，我们工人安可不讲求战术，服从工会的指导，以求胜利早得么？

二、对于资本家走狗及工贼的应付策略，也是要讲求的。现在丝厂有个工贼穆志英；以前上海大骗子组织“男女劳工反共产同盟会”的孙宗昉，现由北京来上海，又要组织什么“工商协会”的分会；在各纱厂里，资本家更直接收买走狗殴打工人；在各手工业里，工贼机关的工团联合假总会，又常常欺骗工人，诈骗银钱。这些工贼都是上海工人之敌，必须将他们扫除以后，上海的工人才能使自己的阶级壁垒更加森严坚固。

三、上海的工人已经有组织者虽占多数，但是组织还不严密，换言之就是还不适合于战斗。上海总工会固然已经是全上海工人唯一信赖的总部；但是各产业总工会（如丝厂总

工会、码头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等），各业工会（如邮务公会等）、各厂工会，以及工厂委员会、纠察队、工人自卫团等，还应该更严密的组织起来。上海的工友们应当认识，现在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我们要使工人尽量加入工会，每一个会员，能成为工会的有力拥护者。

在上述的许多罢工运动及其教训之外，我们还应当指出的，就是怠工的运动。最近各业怠工运动的次数，略少于罢工，但都得了胜利的结果。这事是工人群众要求利益，表示力量的有效方法之一种。有些工厂的怠工，是因同情于别厂之罢工而起的。怠工亦是“罢工战术”之一种，此后各业工友应聪明的运用。最近浦东烟草公司的工友们，因为同情于罢工运动，在老厂的工友，用香烟摆成一个“义”字，新厂的工友们听说了，立刻就用香烟摆成一个“气”字。这个表示是好的！“义气”就是我们的阶级觉悟和团结的表示。但工人阶级只有“义气”是不够的，还须懂得阶级斗争的战术呀！

工人的痛苦只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工人的利益，只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和工人自己的政党来拥护。工人的政党就是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等所反对严拿的“赤化”党——即共产党。惟有共产党员才是工人群众的先锋队，始终拥护工人的利益。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及其走狗工贼等，始终是工人的敌人。还有一般投机改良派，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则是十分可笑的。譬如在最近上海之工潮里，大多数的报纸，没有同情于工人的言论；更有一般人，如近来上海《民国日

报》的时评和“觉悟”栏的言论，有什么“要晓得商人的将本求利，其立足点在仁义上”，又有什么“只有希望厂主看看四围的形势，自己先来改良”……等等的话，那虽是他们一点什么“戴季陶主义”的观念，但叫在痛苦里的上海无产阶级听来，不免要哈哈大笑了！

为帝国主义与军阀所恐怖的“红色的五月”已经过去。但中国的工人，就因为从“红色的五月”里所得的经历，而走入一个新的时期了。最近罢工的潮流，不仅在上海，即上海附近的无锡，最近有十九家丝厂、二十三家堆栈的大罢工运动。同时，就在这最近时期内，还有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大罢工，大连丝厂的大罢工，以及天津邮差罢工。这都是中国工人受苦不过的争斗之表示。上海工人是全国工人的运动领导者，上海工人的团结和组织力量可以作全国工人之模范。上海的工友应当莫忘却自己的责任！

1926年6月19日

原载《响导周报》第159期，

1926年6月23日。

署名：施英

再论上海的罢工潮

我们已经详论自“五卅”周年纪念后的二十天内上海有四十次罢工发生之原因及其意义。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罢工发生的原因有四个：一、工人生活的困苦；二、资本家的反攻；三、“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影响；四、工人因团结组织而受压迫。同时，我们预先说明：在最近时间内，上海的罢工潮将是继续不断的。果然，在近一星期内，罢工运动更加猛烈了。前二十天内不过是四十个罢工，而近一星期内，除未解决者外，还增加了六十个罢工，人数约略计之，当在六万以上。其统计如下：

罢工厂名	罢工次数或厂数	人数约计
内外棉第五、七、八、九、十二、		

十五厂	六	15，000
内外棉第四厂	一	800
内外棉第三厂	一	1，000
虹口丝厂（十五家）	一五	7，500
申新纱厂	一	1，400
南北市皮件	一	未　详
闸北丝厂（三十五家）	三五	32，000
合　计	六〇	57，700

此外尚有：金银业工人、日商洋服工人、三星毛巾厂工人等的罢工，都是在这一星期内才解决的。还有一个未爆发的工部局电气厂的工潮，包含有十分严重的意义，虽未罢工，但亦是这一星期中的重大事件。

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之所以如此蓬勃，其原因正如前面所述，此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原故。但是在这样的原因之下，上海工人的罢工，一天比一天的猛烈起来。这种现象不特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必然的。正因为有这样现象，所以造成了目前的"动的上海"——革命的上海。但是造成这样现象的，也不只是工人。近来浦东贫民的暴动，小西门贫妇的请愿，各种的抗税与抗捐，如宅地税问题、房租捐问题、冰鲜税问题、卷烟税问题、亩捐问题、小菜场捐问题、保卫团捐问题，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越界收捐问题，已经把这个亡国的上海闹"动"了，变成"动的上海"了。这个"动的上海"，就是革命的上海之开始现象。造成"动的上海"，自然是大多数的上海市民，而不只是工人，因为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人口，产业工人不过占三、四十万。上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固然是市民运动之先锋，在"动的上海"是最活动的一员。然而目前上海工人罢工的现象，却不是因自己是最活动的一员，而致于

"故意嚣张""肆行滋扰"；乃是确确实实的因为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军阀官厅与劣绅的勒索所造成之上海现状，迫得所有的平民都起来反抗；上海的工人亦是要穿衣、吃饭、住房、纳捐、纳税的，不能够不起来为自己的生活奋斗。同时，又因为工人是较有组织的，所以表现的力量较大。又在同时，确确实实的，没有一个甚至半个外国或中国的资本家，肯实行"戴季陶主义"，讲一点"仁爱"，肯自动的给工人加一点工资，减少一些工作时间，改良少许待遇。所以罢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了。

上海的市民都知道么？据本月十八日上海各报登载工部局公报："五月份税收总数，据代理捐务处长报告，共为八十六万九千零四两三钱七分，而自一月份起之总收入，为三百三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二两六钱一分，预计本年能收九百九十万零八十五两。"我们看一看租界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收入，是何等肥壮！这些税捐是何处来的？不是中国商人与平民的么？中国商人与平民在自己的土地里，向帝国主义者缴了许多税和捐，而工部局华董之额，只肯赏赐三名；在纳税华人会中，还有许多的限制。象这样的问题，本不是工人的问题，更不是直接关系于罢工潮的问题；然而这问题证明"亡国的上海"的实际状况，证明现在要摆脱"亡国的上海"的奴隶状况是必要的。因此，同时就证明了：在租界内的华人要求参政，与在租界内的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以维持生活，是同样有理由的事。其次，我们与帝国主义者算了帐，同时也要和中国的军阀和官厅算算帐。只可恨大半是秘密的，我们不得全知道：第一，孙传芳已经报效吴佩孚去了多少钱？（这些

钱都是江浙人民的血汗啊！）第二、请问一问淞沪总办丁文江、警察厅长严春阳及上海县危知事，到底上海市民的税和捐共缴了多少，其用途是如何？为什么孙传芳应当将江浙人的钱报效于吴佩孚，而丁博士严厅长危知事等只求报效于孙传芳，弄得捐税繁兴，苛政弊民，而市民起来要求免税捐，工人起来要求加工资以求吃一碗饭，反不许可呢？

上海的工人已坚决的答复了这些问题，因此在全上海市民各样反抗的行动之下，上海工人也自己行动起来。这些行动的目的，也不过为要得到一点衣食住的满足。这些行动对于外国的资本家固是无所姑息的；便是对于中国的资本家，所谓“提倡实业者”也不能有所客气。工人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的要求，是一样的。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应当多剥削一点，而外国资本家只能少剥削一点，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更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可以多向官厅报效，甚而至于贿赂公行，而对于工人则应拒纳条件，并借官厅威力压迫，这个道理更是说不通！因此，最近工潮蓬勃的原因，除资本家之反攻与工人自己为组织团结的奋斗之原因而外，最重要最明显的就是如上述的这些理由。但是中外的资本家偏偏都不肯承认这些理由，尤其是警察厅长严春阳不肯也不敢承认这些理由。上海总工会曾写公函与严春阳，详详细细说明工潮发生的原因，指出三点：（一）米价飞腾，工人生活困苦；（二）资本家滥罚工资，开除工人，引起反抗；（三）保护工人之真正团体。但这些办法哪里是严春阳所能同意的呢？因为孙传芳所给与严春阳的职责，只在保护资本家，并没有什么消弭工潮的责任。所以上海总工会与警察厅公函去后之第二日，严春阳

奉帝国主义者与中国"提倡实业者"之命，就以"煽动罢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总工会封闭了。

上海总工会已经在形式上封闭了，但上海的罢工并不因此而停止。正当上海总工会被封之日，上海的工人在罢工中者还有数万。帝国主义者、中国提倡实业者、警察厅压迫者，并不能因封闭上海总工会而消弭得了任何的罢工潮。严春阳自己亦颇懂得在形式上封闭了上海总工会，而在实质上上海总工会仍是存在。但是严春阳虽懂得这一点，却还没有上海几十万工人自己懂得清楚。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的几十万工人，都十分明白：他们自己的总工会，不仅目前实质上是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上海总工会光荣的历史，坚固的基础，不仅不是严春阳所可动摇，便是任何强暴的帝国主义者与凶恶的军阀亦不能动摇。因为这里已有了几十万的卫士，并且有过百万有组织的全国同阶级战士，都是保卫和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在任何的时期里，上海的工人都可以为保卫他们的总机关而行动。因此上海总工会被封之后，全上海的工人都起来作热烈的表示，他们直接向严春阳告以总工会不可且不能封闭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各工会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自己说出来，是最切实最明了的表示，严春阳、"提倡实业者"，以及帝国主义者等，听闻以后，至少也应当得了一个好的教训！

我们由此得知，在形式上上海总工会之被封，不仅没有受到组织上的打击与团结上的损失，亦没有在最近上海工人经济斗争中受到重大损失；因为上海总工会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实际上仍指导并援助上海工人的政治与经济争斗。关于

这种事实，在最近几日的罢工事件里，便可证明。譬如向来无组织的丝厂女工，一星期前因生活所迫而罢工，得了上海总工会之援助，既得胜利，又完成组织；最近一次的丝厂女工三十五厂总罢工，在各种要求的口号之外，特别提出“启封上海总工会”与“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口号。闸北丝厂的女工，以三十五厂三万余人的群众力量，直接表示出打倒资本家和工贼合办的工会（即穆志英工会，专以骗钱为事，每日由资本家扣除工人工资×分，供少数工贼工会人员之享用！）为罢工发动的最要目的。这数万女工在当初是毫无组织的，亦缺少上海总工会之影响。然而她们一开始行动，便站到总工会旗帜之下来。由这样的事实又向敌人证明了一件事，即是：上海总工会不仅有其坚固的基础，而且时时有新的力量。

新的力量所给与上海总工会的便是越更证明其存在。同时，新的运动或新的罢工事件之发生，又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多次的经验，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在战斗的联合战线上与上海各界民众合作，制造革命的上海！

1926年6月27日

原载《响导周报》第160期，

1926年6月30日。

署名：施英

三论上海的罢工潮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但上海的罢工潮并未止息。帝国主义者、中外的资本家、孙传芳、丁文江、严春阳等都很失望的。这一种失望证明他们是太蠢了。他们蠢到什么程度呢？蠢得还及不上现在各工厂里资本家的走狗和爪牙。近来各工厂的走狗和爪牙们也知道说："上海总工会是封闭不了的。封闭上海总工会有什么用处呢？他在事实上还不是存在么？"这样的话，点醒了他们不少。所以近来"丁总办"又有启封上海总工会的消息。但这个消息是不值得重视的，上海总工会惟有上海的工人自己才有资格去启封。即使"丁总办"有启封的意思，也不过是受了封闭后的诸般教训。这些教训之重要者有三：一、全上海工人拥护上海总工会之存在，每日

几次向督办署与警察厅请愿，据理抗争，并下警告；二、上海的罢工潮继续发展，并未止息；三、上海米价与物价腾贵问题并未解决，贫民暴动的风潮事实上难以防御。

假使孙传芳、丁文江、严春阳等并不太蠢，而且还更聪明些呢，那便应当要觉悟：第一、为听外人的命令而封闭上海总工会，是一个失策；第二、为要想试一试看封闭了上海总工会以后，上海工人的表现如何，更是一件苦恼。

为什么以上两点需要特别觉悟呢？

三、四日前，某工厂代表团至淞沪督办公署请愿。

“为什么要封闭上海总工会呢？”工人代表发问。

“这件事，……”某科长代丁文江接见代表团答复，“……实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还要查一查。”

“但是……”科长继续说，“你们要晓得外国人告了你们啊！”

“什么罪状呢？”工人代表问，“为什么不出布告宣布呢？”

“……罪状不明，”科长答，“法律上还缺少根据，所以布告也还要商量商量。”

“但是……，”科长继续说，“我总替你们查一查，再定办法。你们且回去，回去，好好的替外国人作工啊！”

以上在督办署；以下在警察厅。

“你们来为何事？”警察厅科长问女工代表。

“我们来请愿，请愿启封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是我们全上海工人的总会，个个爱戴，个个拥护。它没有一点罪，就被你们先生们封禁了。我们工人为什么不能有工会呢？商

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各洋行各公司各店铺先生们都有公会……”

“弗要说那样多罢！”青年勇敢女工代表的话，被这位科长先生打断了，“你们的总工会，近来调停工潮不得力，所以要封闭呀！”

“只有总工会负调停工潮之责么？你们警察厅不是也任调人么？工潮时时发生，你们的调停，还不是不得力？为什么不可以封闭你们的警察厅呢？！”

这样的辩论使警察厅科长先生面红耳热，并无答复。但是有点激怒，反过来问工人了：

“你们为什么要总工会？总工会并不给你们饭吃。给你们饭吃的是资本家。你们只要好好作工，便是你们的本分！”

女工代表立刻抗争说：“这话是不对的！总工会好比我们家里一样。你们由谁给饭吃？不是警察厅吗？但若警察厅长封闭了你们家，你愿意么！”

这样无结果的辩论，最近每日在十次以上，各工会各工厂的代表们，只算是走到督办署与警察厅下一番警告回去了。依大概的统计，近一星期来，各工厂代表团到督办署与警察厅者在五千人以上。

码头工人与丝厂女工对于上海总工会之拥护，更表示其忠诚；他们各自买了香，烧着香“跪香请愿”。

象这些事实，我们是以为应当引起丁博士和严厅长之觉悟而得到教训的。这种教训之更严重的意义，是证明全上海工人因总工会之受摧残，而立刻可以一致行动。

但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上海的罢工潮并未止息，而

且亦不会从此便止息。这里的原因甚多，我们已一再说过。只是到了现在，因为上海总工会的被封，反添了一个新的原因。

六月份已经过去了。我们应将六月一月内的罢工潮，有一个总的论断。

六月中上海罢工统计

（一）总统计表

同盟与单独之罢工次数	三五
罢工中参加之企业总数	一〇七
参加人数	六九，五五六
罢工时间总计（以钟点计算）	三，三六四，六二二
罢工所提条件	一一七
胜利条件次数	四九

（二）罢工企业与厂数

纱业	一九
丝业	六二
手工业	九
印刷	二
邮电	一
金银业	二
烟业	二
其它	一一
总计	一〇七

（三）罢工时间

不到半天的	二五次
一天以上的	一八次
三天以上的	五六次
一星期以上的	八次
总计	一〇七次

（四）罢工条件分析

政治的	一
经济的	五六
待遇的	五八
工会的	二
总计	一一七

（五）罢工胜利条件

政治的	一
经济的	二三
待遇的	二四
工会的	一
总计	四九

（六）罢工失败条件

政治的	无
经济的	三三
待遇的	三四
工会的	一
总计	六八

从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对于最近一月内上海罢工的运动，有下列几个结论：一、由罢工的条件，可知原因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经济与待遇的；这足以证明罢工并不是上海

总工会的煽动，而是资本家自己逼迫。二、罢工一百零七厂，综合条件内容不过一百一十七个，而结果工人得胜利者仅四十九，资本家还保留下了六十八；这六十八个未允工人之条件，便是继续煽动上海工人罢工原因之一，资本家和官厅都应当不要否认。明白了以上两点，便还有第三个结论：三、上海的罢工运动必然的还要继续下去，以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由；封闭上海总工会是没有用处的，布告严禁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武装压迫也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除客观的经济与政治压迫条件而外，亦必须有其主观的条件。这个主观的条件便是上海工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什么是上海工人的力量呢？经过“五卅”的大运动以后，又经过一年来的组织和训练，下列的统计是可以指出的：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内外棉	三厂	1，400	上海二厂	2，000
	四厂	2，100	上海三厂	4，000
	东五厂	1，829	同兴二厂	3，000
	西五厂	1，950	裕丰二厂	2，800
	七厂	1，100	申新五厂	1，100
	八厂	800	永安厂	3，000
	九厂	3，000	日华二厂	4，325
	十二厂	600	码头工人	50，000
	十三厂	1，300	商务印刷工会	3，200
	十四厂	1，300	彩印工会	2，000
	十五厂	1，500	墨色石印工会	1，000
日华	三、四厂	3，900	上海印刷工会联合会	300
同兴	厂	2，200	华商铅印工会	2，000
溥益	一、二厂	2，000	中华书局工会	700

大　丰	厂	1，000	商务职工会	450
统　益	厂	3，000	工部局电汽工会	1，000
鸿　裕	厂	2，500	虹口电汽工会	1，000
鸿　章	厂	1，000	英界公共汽车工会	500
申　新	一厂	3，000	华商电车工会	1，000
申　新	二厂	2，000	茶箱工会	145
嘉　和	一厂	2，000	信封工人联合会	1，300
嘉　和	二厂	1，000	固本肥皂工会	200
公　益	厂	2，000	洋服业工会	4，500
崇　德	厂	3，450	黄包车修理工会	100
振　泰	厂	1，991	乌木业工会	500
丰　田	一厂	3，000	菜业友谊会	3，700
丰　田	二厂	3，500	洋布职员工会	114
绢　丝	二厂	2，300	海员工会	5，000
老怡和	厂	5，000	金银业工会	1，500
新怡和	厂	3，000	邮务工会	1，550
东　方	厂	2，500	丝厂工会	20，000
公　大	厂	1，000	香烟厂工会	11，000
恒　丰	厂	3，500	铁厂工会	2，000
厚　生	厂	2，200	木行工会	1，000
上　海	一厂	1，800	总　计	211，704

狠毒的统治阶级见着这个统计或者不免惊骇，但是在上海各界民众里只有工人阶级才保有这样的力量。上海工人的力量若不充足，便没有那样大的“五卅”运动，亦没有现在的上海。上海的繁华和兴盛既是劳动者之血汗所造成，在二百万人口筑成二十余万人的坚垒，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件很自然的事。

然而现在上海工人所要求的仅仅是：

一、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最低限度生活费的工资（每日多不过五、六角啊！）；

三、十二小时或十小时的工作时间；

四、洋人、洋奴、资本家、工头的莫杀、莫打、莫骂！

这样最低限度的要求还不能取得；一面帝国主义者，另一面军阀，又另一面资本家及其走狗，一齐向工人压迫；帝国主义者还要杀人；军阀还要制造战争；生活程度高，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为什么不罢工呢？”

1926年7月5日

原载《响导周报》第161期，

1926年7月7日。

署名：施英

四论上海的罢工潮

上海最近的罢工运动，自“五卅”周年纪念时开始。六月一月中，据我们的统计，罢工次数一百零七次，人数近七万（见本报一百六十一期）①。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近日也发表了一个统计，据他们说是罢工总数四十次，人数总计也有五万。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和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大概并没有自己的统计，即以工部局之统计为统计，因为工部局就是他们公共的上司机关，就是他们公共的帐房。而且工部局的统计包括“华洋两界”，这又是一件证明，证明租界里的工部局统治租界且统治“华界”。总而言之，上海最近的罢工

① 即本书中之《三论上海的罢工潮》。——编者注

风潮很大，次数很多，人数很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这缘故，外国帝国主义者很焦心发愁，中国的军阀官僚孙传芳、严春阳、丁文江等遂封闭上海总工会以泄愤，这是已经成为事实的。

什么是近来罢工的原因呢？我们已经一再说过了（见本报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诸期）①。我们的意见是：米价高涨仅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原因。罢工的重要原因有三：一、工人工资太少，近来米价高涨，物价亦贵，工人生活太苦，不能支持；二、工厂的待遇太不好，中外各厂时有打骂工人，滥罚工人，甚至打死工人之事；三、工人的政治自由丝毫没有，工人的集会结社和言论，时时受资本家及官厅与捕房的干涉，甚至逮捕监禁。上海的工人是有组织的，有力量的，经过一番长期的政治和社会训练的，所以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不能不起来罢工。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曾经说明了（见本报一百六十一期）②。

但帝国主义者自己如何说明罢工的原因呢？工部局公报说："……考其原因，大概系托词薪工太薄，或同业中人有罢工者，因欲与其表示同情，故一致罢工，又或系冲突所致。"以上这几句话，由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报纸说出，虽然上海各中国报纸毫不知耻地毫未加以批判地登载出来，但是已证明了三件事情。第一、所谓"托词薪薄"，不过是他们故意加上"托词"两字，而薪工太薄是罢工的第一原因已经证明。第二、"同业中人有罢工者，因欲与其表示同情，故

① 即本书中之《上海最近的罢工潮》、《再论上海的罢工潮》。——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一致罢工。”——这几句话证明上海工人之“同情”和“一致”，即上海工人之团结力量，能够“一致罢工”，这件事也是他们所不敢否认的。第三、“又或冲突所致”一句话，更加证明许多的事实，而最重要证明的是工厂待遇之不良，所以有资本家与工人的冲突，工头与工人的冲突等等。以上都是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招供。

中国的官厅又怎样呢？六月末，警察厅长严春阳，曾邀各业各厂主开会，讨论抑平工潮方法。他们怎样讨论法？讨论结果是什么东西？我们无从知道，亦未见他们公布；但至少必有各业主各厂主诸位大腹贾先生，在茶点会宴席上，再三叮咛严春阳以后多派武装警察压迫工人——这一层是必有的。严春阳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一件事，别的事，他配做什么呢？他又能懂得什么呢？他不过是孙传芳派来的一条狗，替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资本家守卫的一条哈叭狗。所以工人表表去请启封上海总工会时，他的科长清清白白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告诉工人代表：“外国人告发了你们啊！”我们想想这是怎样一回事？上海的警察厅，除开勒收苛捐杂税，重剥市民，直接为孙传芳、间接为吴佩孚筹取军饷祸国殃民外，还有什么用处？淞沪的盗匪充斥，不见缉获，人民并未受其保护，而每一次罢工发生，警察厅便首先捕去大批工人的领袖，囚之牢狱，待若盗匪！这位严春阳，不是外国人和中国资本家守卫的哈叭狗，还算是什么？

至于新科学家、新官僚丁文江博士，对于工潮也没有什么高见。本月（七月）十七日上海各报载：“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以连日来署请愿之工人代表络绎不绝，对于工潮思欲

得一持平办法，昨日丁氏语人云："一方面将米价切实限制高涨，以维工人生计；一方面召集厂主会议，改良工人待遇方法；至启封总工会，则已电请孙总司令，俟得复电后，再行斟酌办理云。"这段谈话证明丁文江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见。限制米价高涨和改良工人待遇两件事，老早就是上海工人自己提出来的办法；只是官厅和资本家都拒绝不理。上海总工会当初很看得起严春阳，曾写信与严春阳，痛论米价之不可不限制，工人待遇之不可不改良；但是信发出在各报披露后之第二日，上海总工会就被封。现在丁文江还不过是这一老调，说一说有什么用处?而且说出来反是激动奸商与资本家之怒，因为限制米价妨害了奸商的操纵专利，改良待遇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尊严。可以启封上海总工会的话，对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尤其算是大逆不道！所以上面一段谈话，到第二天就用新闻更正了。十八日《时事新报》载：

"……昨日本记者曾晤及丁总办，叩以对于各工会要求启封总工会之态度，并询其有无电宁请示？据称："总工会之成立，未经立案，在法律上尚未认为正式团体。孙督办前既下令发封，一时暂无启封希望。外传余电宁请示一节，全属子虚，不足凭信云云。"这段谈话证明丁文江害怕说启封上海总工会，害怕得罪了外国人和中国资本家。这段谈话证明丁文江总办是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资本家的姨太太。什么立案不立案，法律不法律，我们工人和市民实在管不着。上海的工人拥戴上海总工会，如爱护慈母一样；我们的保护者被你们摧残了，还要听你们讲法律！你们的法律不过是保护资本家的法律，有半条保护工人的法律么？你们淞沪商埠督办自设

立于龙华以来，曾经替上海市民作些什么事呢？除开抽捐征税，加捐加税外，一无所有。丁文江仆仆于沪宁铁道上，只是往来替孙传芳刮地皮，报告收入情形。上海的市民早已认识透了。

总而言之，严春阳是哈叭狗，丁文江是姨太太！

姨太太和哈叭狗当然不能解决上海的工潮，所以上海的罢工运动，至今犹如风起云涌，继续未已。六月份的罢工运动，我们已经详细论述了。现在七月又将过去。试将七月前半月之罢工事件，与六月份比较起来，我们便可以看得出，工人的罢工运动更猛烈，范围更扩大。这种更猛烈与更扩大的原因，我们亦曾说过：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因而激怒工人群众乃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再就七月初起迄七月十八日为止，统计上海新的罢工事件，列如下表：

厂　名（或业名）	地　址	罢工厂数（或次数）	罢工人数	罢工原因	罢工结果	日期（七月）
久成丝厂	日晖桥	2	2,300	求加工资	胜	二日至四日
精益牛皮厂	顾家湾	2	150	同　前	胜	三——六
码头工人	虹口	1	260	同　前	允未实行	三——四
皮件工人	南北市	1	2,000	同　前	未决	六月——三十
英美烟公司	浦东	1	200（童工）	同　前	胜	六——七
固本皂厂	徐家汇	1	未　详	同　前	失败	七——九
茶箱工人	本埠	1	未　详	同　前	胜	一——七
南洋烟公司	浦东	1	1,500	同　前	胜	五——八
日华纱厂	浦东	1	300（粗纱间）	开除工人	胜	九——十
造木公司	闸北	1	250	求星期日休息	失败	八——十
瑞伦铁厂	虹口	1	1,300	剋扣工资	失败	十——十二
华顺码头	虹口	1	1,000	求加工资	失败	九——

瑞纶丝厂	虹口	1	600	同　　前	失败	十——十五
统益纱厂	沪西	1	3,000	开除工人	失败	十一——十五
内外棉三、四厂	沪西	2	3,200	打工人	未决	自六月二十八起
东兴印务局	北京路	1	500	求减时间求加工资	未决	十一——
荣华铁厂	曹家渡	1	100	求减时间	失败	十一——十六
益兴印务局	四川路	1	60	延发工资	未决	十二——
顺利印务局	四马路	1	60	求加工资	未决	十二——
祥生铁厂	浦东	1	1,000	求履行"五卅"条件	胜	十四——十六
同兴纱厂	引翔港	1	3,000	求加工资	失败	十六——十八
同兴纱厂	小沙渡	1	未　详	同　　前	未决	十七——
英美第二厂	浦东	1	未　详	同　　前	胜	十七——
燮昌火柴厂	浦东	1	300	同　　前	胜	十七——
大中国印局	本埠	1	未　详	同　　前	胜	十六——十七
装订业	本埠	1	3,000	同　　前	未决	十八——
码头工人	大坂码头	1	1,000	同　　前	未决	十六——
码头工人	黄浦码头	1	1,000	同　　前	未决	十六——
内外棉厂	小沙渡	10	8,000	同情怠工		十七——
邮务工人	本埠	1	3,000	求加米贴	失败	十七——
统　　计		41	37,080	(就可统计的算)		

依上表所列，又有四十一个厂与企业，三万七千余人将近四万人的罢工，仅仅在最近十八天之内。其区域是遍于全上海，包括浦西和浦东，全都在孙督办与丁总办的“大上海”范围之内。其企业性质，有重工业，有轻工业，有手工业，有市政工人，有码头苦力。其罢工性质，因生活困难而要求增加工资者占三十分之二十四；因开除同厂工人与打工人者占三十分之三；因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者占三十分之二；因同情而怠工者占三十分之一；但在要求增加工资的大多数

中，仍包含有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诸种条件。其罢工结果，工人得胜利者只不过占三分之一，失败者占三分之一，未决而预测多属失败者占三分之一。其罢工时间最长者不过一周，且只一、二厂，大多数不过一日，一部分只经过几小时的时间。

象这种现象，到底是"谁使为之？孰令致之？"是上海工人故意的"嚣张"么？还是为生活所压迫，受资本家残酷之待遇，迫而使上海工人不得不如此呢？又何况帝国主义者的巡捕房和中国的官厅，还要火上加油，一味横蛮的做出下列许多许多的事实：

一、内外棉三、四厂工潮，工人被捕者前后多至十四人；工人李小山子、王秀头被判罚拘西牢三年；又另几人判徒刑至七年。

二、精益牛皮厂的资本家，十年来盈余有七、八十万之多，还不肯为工人加一点工资；工人罢工后还叫大队警察来压迫。

三、总工会派代表陆庆、高雷两人，至精益调停工潮，为警察捕去，至今未释。

四、南北市皮件工人因罢工而被捕者六人；后来工人怕被捕，不敢入厂。

五、沪西日晖桥久成丝厂工潮，女工李兆熊、徐佩雄被捕。

六、闸北丝厂大罢工后，警察厅丝毫没有顾及米价和工人困苦的原因，但贴布告声明"保护"丝厂，"严密防范"非正式（？）工团之行止。

七、徐家汇五洲固本药皂厂工人董永夫、王锦生、王之荣出任调解工潮，至警察厅即被扣留拘押；又同厂工人张金根、曹法记因有在租界聚众开会嫌疑，被捕房捕去，各罚银五元。

八、内外棉四厂罢工工人唐某，因讲演被捕。

九、内外棉三、四厂工人开会，大队巡捕赶来驱散，捕去五人，复开枪，向工人林小三轰击，子弹穿过林之裤裆，击中年十三岁之一童工，足部受伤甚重。

十、沪西工人因开会，华捕开枪，一弹击中工人沈富仁腿部，受伤倒地，又捕去工人李锦国、戴学奎二人。

十一、浦东日华纱厂厂主，因禁止工人水浴，在江边竹笆上私装强有力的电流铅丝，既无文字布告，又无口头通知，以致工人郝霍卿触电身死！

十二、久成丝厂女童工戴小老海，被管车毒打殴毙，但工厂不敢承认，百口抵赖，诬为急痧而死！

1926年7月19日

原载《响导周报》第164期，

1926年7月21日。

署名：施英

五论上海的罢工潮

"五卅"周年纪念后兴起的上海工人的经济奋斗，足足已两月有余了。七月份的罢工运动比起六月份来，范围更广，人数更多，情形也更复杂。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对于罢工所发生的所谓舆论。那些舆论到了现在，又似乎渐渐对于工人的罢工运动，表示厌恶了。到底上海工人的经济要求是否合理呢？在两月来的罢工中，上海工人到底何所得呢？此后上海工人经济奋斗的趋势又是如何呢？在两月长期的工潮中，统治阶级到底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这都是我们免不掉要一而再，再而三……来说明的。因为，如不说明，大多数的人便不会懂得；稍微懂得的便要发怪论，以至于本是由经济压迫发生的罢工潮，又被上海社会的"舆论"视

为洪水猛兽一般。并且，像警察厅长严春阳先生，若把罢工的因果向他说明以后，假使他肯相信，也就不必费事派什么工厂调查员去调查了！

上海工人之总要求

七月十一日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上海工人之总要求十一条，并发布宣言。宣言的内容，既已说明上海最近罢工的现象和原因，又缕列上海工人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及其预算；最后复指出：一、打骂工人；二、开除工人；三、滥罚工资；四、侮辱女工；五、虐待童工；六、大小便不自由；七、工厂设备疏忽——乃一般的工人所受痛苦；还有集会、结社、言论之不自由，工会之受摧残，工人领袖之遭开除，逮捕，甚至枪杀，更是使罢工爆发的诸般直接原因。最后，上海总工会代表全上海有组织的工人，提出十一条最低的总要求：

一、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十五元；

二、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三、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

四、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

五、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六、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七、规定因工作而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八、工人在疾病时厂主须负责医治并须发给半数以上之

工资；

九、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十、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十一、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以上这十一条真可谓最低限度的要求了。依我们想来，中外的资本家与中外的官厅（淞沪督办公署、警察厅与工部局）对于上列十一条，半条也不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在他们连半条也不肯实行。一直到现在，中外资本家及其官厅的意见，都还以为设立工厂使工人作工得活便算恩惠，哪里容许有所要求？凡要求者便是“不驯良的工人”。这是资本家与官僚们死也不改的成见。

但是工人们不能永远在这个成见之下屈服。上海有组织的工人尤其不能屈服。两月来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便是为这十一条的要求而要求，而行动，此外并不曾有例外的要求。上海总工会所代表的工人意志，是真确的上海工人的意志，这十一条真是“不二价”的最低条件。假使中外的资本家们肯激发戴季陶所提倡的“仁慈”，将这十一条实行，那便上海最近的罢工风潮，至少也可以减去一些了。

工人的生计与资本家的剩余（略）

最近资本家的反攻与歇业恐吓

自七月以来，上海的资本家，尤其是外国厂主，对工人

的压迫变更其战略了。他们不特根本拒绝米贴的要求，不理会改良待遇的呼吁，而且向工人作种种的反攻；直至现在，已有将近一万的工人失业，数百人被工厂开除。这一反攻政策的主要手段，便是歇业的恐吓；当工人罢工时，厂主即将工厂停闭，给工人以失业的威胁。尤其是纱厂，在现时非纱业上市之重要时期，上海的日本与英国厂主，惯用这一手段，以抵制工人之一切要求，而在自己则无所损失。假使停业的日期稍长，工人的生活自然趋于恐慌，到那时便会向资本家屈服，无条件的恢复工作——这是各厂主所预想的。他们这种抵制手段，在现时乃施行最有利的时间，等到纱业上市生产品价涨时，工人已经帖服了。这是资本家的辣毒而甚自鸣得意的政策，在最近时期内，他们不仅要想借此政策消灭罢工，亦且欲求根本制服工人。讨论上海近时工潮问题的，往往只见工人的罢工运动，而对于资本家这一反攻行为却忽略了。

从最近两周的事实里看来，资本家对未参加罢工的工人，亦厉行各种的反攻。第一便是无故开除或责罚工人；第二是故意刻扣或缓发工资；第三是收买流氓专向工人故意挑衅，殴打工人的领袖；第四是在酷热的天气下，特别苛待工人。日本内外棉第九厂，扬树浦老怡和纱厂与浦东日华纱厂等现犹相持未决的工潮，便有这许多的事实。尤其是各日本厂主的行为，最近更肆意横暴，工人不堪其苦，各厂工人亦曾派代表至各团体呼号求救，而各界的人往往熟视无睹。最近万里丸日本水手秘杀小贩陈阿堂事件发生后，各方面都在纸上抗争，惟有各日厂的工人，因身受日本人的蹂躏，才更感

觉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切。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全上海日厂的工人，将逼得不能不有最后的行动，而上海的罢工运动，亦将由经济性的变为政治性的了。

但歇业的恐吓到底是否就算资本家的高妙政策呢？以停闭工厂抵抗罢工是否便有效呢？——这毕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以上两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字。在一般的评论家，见此现象，或者以所谓实业的衰歇为念，甚至归罪于工人的罢工，以为资本家乃被迫而致此。这样袒护资本家的论调，实际是受了资本家之骗。近来资本家的歇业恐吓仅是一部分的，而且仅不过是向工人反攻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在此时实行又是无大损失的，更何况即损失亦有利于将来；所以少数的资本家，尤其是在中国得利润已很多的外国资本家，断然采此手段而不惜。这还应受“关心实业者”之实业衰歇的忧虑么？但在同时，在工人一方面亦难承认这是怎样高妙有效的政策。这个政策当然不足消灭罢工的运动。反之，罢工运动只怕从此更要扩大起来。目前的事实便是例证：日、英各厂的罢工，有已超过三星期以上者，厂主虽闭厂而工人仍坚持；两周来罢工之增多，远过于两周前所表现的；日本各厂的工人六、七万，现已准备联合一致的行动。更从七月份的罢工统计看来，上海的罢工运动越更继长增高；假使资本家一致运用这一策略，只怕反是促成本月（八月）份更多更大罢工的条件了。

七月份罢工的统计

我们愿意再昭示社会以上海七月份罢工之统计。上海的官厅与报纸，往往只靠工部局的统计，现在该局的统计尚未出来，但我们对于该局之罢工统计是不信赖的，那个帝国主义的机关所分析的罢工原因，诋谤工人的话，尤其荒谬绝伦。近来上海“高等华人”的机关——“中国公论报”，亦根据本报的统计而作“工潮问题之研究”，其结论亦曾注意到“万不宜彼此狼狈，采用闭歇政策，以引起工人之报复”；他们主张的是“以温和方法，竭全力以从事，俾中国实业日进无疆，此诚扑灭共产主义之善策也！”这却并不是什么高见！果使“实业日进无疆”，则共产主义亦愈发达；但那是另一问题。虽有“温和方法”却不足以满工人之要求，因为现在工人生活的条件，与实际所需实相差太远了。

下列六表表明七月份罢工之情况。这六个表里我们看出重要的现象是：

一、七月份罢工总人数又超过七万；

二、七月份罢工企业仍为百余厂，但手工业的罢工，较六月份加多；

三、罢工的原因，属于广义的经济意义的（即包括工资、时间、待遇诸条件）占百分之八十；

四、罢工时间较长了，在一月以上者已有三个罢工，在一周以上者有十三个罢工，而三日以上，一日上下的罢工，

亦有多数；

五、一百八十个罢工条件中，工人结果占胜利者仅六十（六十二个工资要求条件中，工人结果仅得三十四）。

其详可观下表。从下表应得何种的结论，简直无需乎我们预言了！

（一）总统计表

项目	数
同盟与单独罢工之次数	五四
参加罢工之企业总数	三业又一〇五厂
参加之人数	七〇、四九四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	六、六一二、一九七
罢工所提之条件	一八〇
胜利的条件	六〇

（二）罢工企业别与总数

企业	数
手工业	三业
手工业	三五厂
印　刷	三七厂
纱　厂	一八厂
丝　厂	三厂
码　头	四
烟　厂	三厂
染　织	一厂
邮　务	一
船　业	一厂
铁　厂	二厂
总　计	三业又一〇五厂

（三）罢工原因分析

原因	数
工资的	一九
待遇的	四
工会的	五
时间的	五
援助的	七
经济与时间的	二
经济与待遇的	九
经济与援助的	二
反对厂方用人	一
总　计	五四

（四）罢工时间分析

时间	数
一月以上	三
七天以上	一三
三天以上	九
一天以上	一四
一天以下	一一
一小时怠工	四
总　计	五四

（五）罢工条件分析

条件	数
工资的	六二

（六）罢工胜利条件

条件	数
工资的	三四

时间的	一八
待遇的	四五
工会的	四五
反对用人	七
援助的	二
求开厂的	一
总　计	一八〇

待遇的	一七
时间的	八
反对用人	一
总　计	六〇

原载《响导周报》第167期，
1926年8月15日。

署名：施英

六论上海的罢工潮[①]

经过两月半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这一次由经济奋斗走入民族政治奋斗的罢工，本报已曾预言，并且预言正在发展的罢工运动将愈扩大，而形式亦愈严重！但在同时，我们亦指出依据上海劳动生活的实际状况，仍保有两种必然的性质和趋向，这便是：一、在民族政治性的罢工中，其主要原素亦包含有经济的斗争；二、工人阶级之政治自由完全没有，工厂的待遇又万般苛虐，工会组织之百折不回的奋斗乃罢工的原素之一。

从本月（八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

① 原题为《上海日厂工人反日罢工》，现在用的题目为原题的副题——编者注

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原素：一是最近发生的陈阿堂之被杀案；二是日本资本家最近对于工人之进攻。这一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有一万三千四百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实现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总之，这一次的形势，是对日的总同盟罢工；这一次罢工的性质，是上海工人的民族政治性兼经济性的奋斗。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次的罢工。凡是不堪忍受压迫的革命分子，主张中国民族解放者，无产阶级奋斗的战士，都应当了解与重视这一次罢工，并实行起而援助。上海日本工厂与日本各种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固然因为自身不堪忍受日人的压迫，然而爆发罢工乃民族的政治的原因。顾正红被杀案，是伟烈的“五卅”运动之导火线。最近陈阿堂被杀案，又成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仍继续施行屠杀的策略。“五卅”的伟大运动，因为有“中日亲善”者的斡旋，并没有给日本人以多大的惩戒，又何况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军阀势力，正当炙手可热之时。国民军被迫再退，联军进占南口与张垣，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又一次的如日之方中。姑无论表面在政治上，日人教训奉系军阀不宜激进；然而日本政府与日本的资产阶级，已准备进行完全取得东三省与南满的主权，并趁此时机夺取长江流域的英、美地位。这是我民族政治的目前主要问题之一，这亦是引起上海有组织有训练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击鼓呼战

的根本原因。

陈阿堂案发生已月余了。谁是陈案的有力抗争者？上海的新闻记者（举例说，如较进步的“商报”）以为空言无补于事实，渐渐讨厌宣言式的空谈。但是怎样才不算空谈？除开会发宣言而外，什么是有力的实际的行动？上海的一般“名流”又说，要讲法律。日本人在中国犯罪，杀死中国人，因为有领事裁判权，并不归中国法律办理，法律从何讲起？上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此时并不肯“提倡实业”，并不肯说对日经济绝交，而抵制日货的口号，仍然只由工人、学生与一般市民高呼。这次首先击鼓作战的，又是工人阶级。我们并不反对，假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此时肯提出“禁止日人在中国设工厂”的口号。然而这是“过激派的口吻！”中国的资产阶级断不肯说这句话。但是像各日本工厂对中国工人那样虐待与压迫的状况，在工人群众却无所姑息，甚至愿意实行驱逐日本资本家出中国境。日本资本家被逐的至少好处是：顾正红可以不被杀；现在的陈阿堂案，或者也可以不致于发生。不幸顾案以后又有陈案，空言又无补于事实，上海各日本工厂的工人，怎样才足以表示抵制日本的行动呢？米价这般高涨（最近竟达每石十九元六七角！）生活这般困苦，不作工何以生存？然而上海工人阶级，终于举行对日的总罢工了！

本月（八月）二十日上午六时，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罢工命令，原文如下：

> “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各厂工友们：东洋人横暴无理，在万里丸船上，竟秘密杀我同胞陈阿堂；

在日华厂中，又敢用电网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厂、四厂、九厂的全体工友，又备受日人无理停厂之压迫，饱尝拘捕毒打开除之苦；最近九厂工友石万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种种罪恶，擢发难数！我工人为争国权，为争工人生命安全与利益，决以最后手段对付。联络各界，一致抗争。我东西五、七、八、十二厂全体工友，着先于即日起，实行同盟罢工，听候工会命令！勿急！勿忽！切切！

此令。

上海纱厂总工会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实行罢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厂，计一万余人。日本内外棉厂在上海者共十一厂，前述五厂先发动，乃该五厂工会自向纱厂总工会所要求；但在发动后数日内，其余六厂亦经纱厂总工会继续发布，第二次、第三次……命令，先后加入罢工同盟。各厂发动时，多以陈案及各厂情形为准，加十三、十四两厂，于二十五日见报载陈案消息，日本总领事对陈案抵赖，及证人发表之口供，愤慨不已，即时宣布罢工。在罢工后，全上海各日厂（纱厂及纱厂以外各厂各业）工会，复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为争陈案及反抗工厂压迫谋自身利益起见，请求上海总工会发布全上海对日总罢工令。会议后，各处即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迄现在止，虽尚未全体发动，但已由沪西至沪东，由内外棉及于其他各纱厂，由纱业及于其他各业，上海总工会是全上海工人的总组织，且是一个革命的工会，在此时自然竭尽所能，指导群众行动。各厂各业工人，

在此次行动中，更表示出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现在仅仅是这一次运动的开始。或者这一次运动是胜利的，又或是胜利少而失败多的；但胜利与失败的条件并不单独建筑在工人自身上。因为这次罢工是民族政治性的，各阶级民众俱有责任。因为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陈案，对陈案应抗争者是各阶级的民众，亦不限于工人。在工人一方面，最初内外棉厂发动时，仅提出五个最简单的条件：

"一、解决陈阿堂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办理，抚恤被难家属，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发生，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装巡捕流氓入厂殴打工人及滥罚工资与蔑视工人人格（如打脚模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资十分之二。

四、释放各厂被捕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五、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三、四、九厂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须一律照发。"

这五个最低度的条件若能完全达到，便算是罢工的最高度胜利了，但这并不是很简易的事。上海各界人民的态度如何——最重要的是行动如何，才是罢工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假使罢工失败呢，工人的损失固然无从取偿，然而民族的损失更是不可挽回的。工人群众在此次运动中，不能负成败之责。工人目前的利益，亦并没有外于民族的利益。怎样才算

是不只在纸上空言，怎样才算是有效的行动，在工人群众里的唯一的答复，便是罢工。各界民众若不在纸上发空言，报上发宣言，如何才能作出一些有效的行动呢？对陈案讲法律是唯一的有效行动么？日本法律的某百某十某条，即使能与中国法律某百某十某条相同；上海日本总领事与长崎日本司法官，即使和丁文江、许沅与吴凯声大律师等的意见完全相同；然而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利害冲突的界限：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利益根本冲突的问题。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一万条法律也是没有用处。因此，所谓注意进行“法律解决”，并没有用处，并不是有效的行动。什么才是各界民众一致有力的有效行动呢？自罢工后，工人群众已经提出——姑无论那是历来的老调，但只要实行，便会是最低度的有效行动。那就是：对日经济绝交；或者缩小一点说：抵制（切实实行的）日货。如果抵制日货实行了，就等于援助了陈案，且援助了工人的罢工。这样，比发宣言固然有效得多，比讲几百几十几条法律更有效得多了。

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与在上海的日本资本家，当然是声息相通，态度相同的。他们的声息相通的先着，就在于借军警的势力先来压迫罢工；他们的态度相同，就在于等候中国人民冷淡以后，将陈案含糊了结。所以我们要求中国人的声息也要相通，态度也要相同！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以后，已将纱市的跌价扼住，日本资本家已渐起恐慌；这是工人罢工行动有效的一个小证明。从反面言之，这种现象是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但工人这一次罢工的目的，并不为了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只是直接的表示民族势力之反抗。所以更有效力

的行动，乃是各界人民实行经济绝交或抵制日货。上海总商会现在并不在亲日派之手，肯不肯议决一个抵制日货的议案呢？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是比较肯反抗帝国主义的，现在能不能继续“五卅”精神，与工人、学生合作，彻底反日呢？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里，上海的中小商人（各马路商总联是其代表）本是工人的朋友，然而这一次罢工事件发生后，商联会是中间调停人。当罢工开始时，工人派代表团至商联会报告，缕述日厂待遇工人之苛虐。十余代表，引证举例，指出事实，说明时，声泪俱下；说明后，一律膝跪，哀求援助！这是在中国社会里一幅很好的“全民合作”图。这是“下等社会工人”请求“高等人”的一幅活图画。然而这是无关重要的；所关乎重要的，乃是上海商人如何援助工人与如何进行陈案。这并不是我们故意假设的问题（请商联会的人不要心怀成见，以为这是“过激派”或“赤党”的言论，其实“过激派”与“赤党”目前所说所行的，无一不是民族的共同利害问题），而亦是帝国主义者所注意的问题，因为帝国主义者正要再试验一次中国民族的势力。在我们，对于陈案，对于日厂罢工，所有的结论是很简单的：凡是不注意陈案，不同情于对日罢工者，必是叛违民族利益的分子。大家看看：章太炎是反赤的“有力者”，每星期有三五次电报发出，但对于陈案曾说过半句话没有？国家主义派是反赤的宣传部，但对于陈案曾按照主张国家主义的诸大理由，有半点主张没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原不在乎“过激”不“过激”，而在乎是谁肯谋民族的解放。上海的民众是已有一次五卅运动之经验的，但这一次的陈案与反日罢工，要

再试验一次上海民众的能力。

假使上海民众的能力竟然不能复兴，那便如我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声息相通的先着，立刻就要实现了。自日厂罢工后，中外官厅已开始向工人群众压迫。罢工工人近来苦于缺少援助，对各处报告时，只有出于哀诉。然而哀诉到警察厅时，警厅人貌若虎狼，撕破工人代表所递呈文，呵叱怒骂，即欲将工人代表拘捕，拒绝请愿不理，斥代表“滚蛋”，骂代表为“动辄敢于反对外人，显系捣乱分子！”各厂工会，时被巡捕、警察、侦探之蹂躏。罢工工人被捕者，每日有数起。侦骑四出，工人的家庭一夕数惊。这样的现象，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人民所受军阀之待遇！这样的现象，比起英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印度人，日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人，有何分别？罢工工人在潭子口地方开会，警察时来干涉；各马路商联会与对日市民会在宁波会馆因陈案开会，亦受租界捕房之干涉。中国人到底是亡国奴呢？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

而且还有反动派要兴波助浪！孙传芳在上海的机关报纸——“新申报”，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当工人初罢工时，“新申报”即大胆造谣，谓罢工乃“某派”的阴谋，与时局有关；其用意在暗示中外官厅，速施压迫。最主要的造谣措词，在于诬蔑这次罢工，有意破坏“孙联帅”的实际欲夺取江西为自己的纯势力，而名为“援赣”与抵抗北伐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反动派的军阀走狗亦太可耻了！我们愿意正告那一班反动走狗：这样的造谣与诬蔑是毫无用处的！上海三月来为什么有许多罢工，其详情我们已屡次说

明。这一次反日罢工的原因和理由，本文亦已详述。这样人人皆知的罢工事件，何必有关于军事？我们愿意更进一步，严重指教这班造谣者，须知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责任，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明白。不用说无产阶级罢工有关军事的行动，现在还说不上；就是为目前北伐问题的罢工，亦说不上；因为并没有这一种必要。工人罢工与政权有关的正式时机，乃在工人阶级自己夺取政权时；到那时候，才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武装或暴动之必要。现在工人的行动，虽时时是经济性兼政治性的，但在军阀淫威势力底下，工人阶级亦无直接夺取政权之不合时机的思想。这一类谣言，在效果上不过是使工人更受压迫；但这种政治压迫在工人以为无须避免，只是促成工人的更多政治觉悟罢了！

反日的罢工已经实现，陈案尚拖延未决。果然，孙传芳要"保境安民"，而动员出兵，预备送死一大批江浙的人民了。丁文江在上海急急为孙传芳筹军饷、造子弹；严春阳急急在上海宣布戒严。但是工人并不畏惧这些事，一般民众也不畏惧这些事。因为这正是革命的工作之时机！

1926年8月26日晨五时

原载《响导周报》第169期，

1926年8月26日。

署名：施英

七论上海的罢工潮

谢谢资产阶级和官厅的压迫，上海的罢工运动竟继续发生而不休止！从六月起到八月止，上海工人罢工者，前后达二十万。于今九月中，犹有三万上下支持长期罢工的工人——其中已超过五十日者占八千余，超过一月者占一万七千余人。在资本家一方面，对付罢工的策略纵然愈更凶恶（例如英日各厂雇用流氓打手围打工人）；在官厅一方面，压迫工人的方法纵然愈更严厉（例如除搜索逮捕外，还借口军事戒严禁止罢工）；然而在工人一方面，罢工的势力却愈更雄厚，罢工的战略也愈更精良。上海罢工运动在八、九两月中之激荡，更甚于六、七两月。同时在工人运动的本身，有其一定的趋势，和必然进展的形式。作者曾六次论述上海的工潮，迄八

月中旬为止，现在先述八月罢工之总结。

八月份罢工的统计表

工厂名称	产业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	参加之人数	要求条件					胜利	失败	未决
				政治	经济	待遇	工会	共计			
日华一、二纱厂	纱业	648	4,325		1	4		5		5	
老怡和纱厂	纱业	744	4,000		3	3		6			6
恒丰永地毯厂	手工业	60	120		4	2		6	3	3	
大北地毯厂	手工业	60	150		4	2		6	3	3	
北方地毯厂	手工业	60	111		4	2		6	3	3	
公义成地毯厂	手工业	60	40		4	2		6	3	3	
义恒丰地毯厂	手工业	60	130		4	2		6	3	3	
永和成地毯厂	手工业	60	15		4	2		6	3	3	
海京地毯厂	手工业	216	240		4	2		6	1	5	
辛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11		4	2		6	3	3	
德盛永地毯厂	手工业	60	40		4	2		6	3	3	
义仁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13		4	2		6	3	3	
永大地毯厂	手工业	60	9		4	2		6	3	3	
恒记地毯厂	手工业	60	10		4	2		6	3	3	
华昌祥地毯厂	手工业	60	75		4	2		6	3	3	
同义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75		4	2		6	3	3	
同义昌地毯厂	手工业	6	15		4	2		6	3	3	
同义和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陈福祥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张德兴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交记丝厂	丝业	9	280		2	1		3	3		
花旗烟厂	烟业	72	750		3	3		6	1	5	
上海日报馆	印刷	12	5		1	1		2	2		
新怡和纱厂	纱业	10	1,500		1	1		2		2	
中华书局装订部	印刷	276	700		4	4	1	9	2	7	
义兴印书局	印刷	24	45		4	2		6	6		
美华书局	印刷	168	150		7	3		10	3	7	
中华书局总店	印刷	3	109		4	4	1	9		9	

工厂名称	产业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	参加之人数	要求条件					胜利	失败	未决
				政治	经济	待遇	工会	共计			
祥生铁厂	铁厂	60	300		1	1		2	2		
勤华布厂	布厂	36	210		2	1		3	3		
商务印书馆铁机匠	铁厂	24			1	1		2	2		
内外棉九厂	纱业	156	3,000		1	1		2		2	
内外棉东五厂	纱业	288	1,829	1	2	2		5			5
内外棉西五厂	纱业	288	1,950	1	2	2		5			5
内外棉七厂	纱业	288	1,700	1	2	2		5			5
内外棉八厂	纱业	288	8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二厂	纱业	288	6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五厂	纱业	288	1,5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三厂	纱业	144	1,3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四厂	纱业	144	1,300	1	2	2		5			5
内外棉三厂	纱业	120	1,400	1	2	2		5			5
内外棉四厂	纱业	120	2,100	1	2	2		5			5
同兴纱厂	纱业	96	2,200	1	2	2		5			5
南北市装订业	手工业	48	2,200		3	3		6			6
金银业十四家	手工业	48	1,000								
华商电厂	交通	24	450		3			3			3
总计		5,896	36,907								

附注：一、罢工之总数计有六十企业，共二十三次（以单独罢工与同盟罢工合算）。

二、罢工时间以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计算。

三、罢工工人总数，以可靠者列入，其未确实者暂不列入。

四、要求条件之总数，凡同盟者条件相同，只能合计（例如各日厂同盟罢工的政治条件共为一条）。

八月份罢工的说明

欲说明前列统计的内容，总括的应有下列之结论：一、产业的罢工已为含有政治性的，其表现为长期性的；二、手

工业的罢工特别加多，这证明在产业罢工已起之后，手工业者因生活压迫，亦表现其组织的新力量，参加经济的斗争生活（地毯工人在本月中之兴起，犹如六月中丝厂工人之兴起）；三、罢工条件，属于工资与待遇的，占百分之八十强，与前此两月相同；四、失败的条件，占最多数，亦与前此两月相同；五、本月份参加罢工人数，因手工业占企业多数单位，将近四万人，比前两月减半，但其中将近两万人于月底罢工犹未结束；六、月底华商电车之罢工，证明经济斗争推广到城市交通工人。这是八月罢工情形之概略。

但按照统计内容以说明，那仅是一个结论，仅能知道一般的现象，罢工事件的本身——其经过情形与其教训，却不是从统计可得而知的。在事实上，这些情形惟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其次，罢工的对方被反抗者（即资本家）仅知道片面；至于官厅则蠢若豕豚而淫威十足，毫不懂得。所以两星期前淞沪警察厅出了一张肉麻不通的禁止罢工布告，其口气大有“格杀勿论”之概，而其内容则处处自己打自己的嘴。这张布告曾被日厂工人的罢工日刊反驳个痛快。例如布告说罢工便没有饭吃，殊不知工人正因饭不够吃才罢工；又如布告公然说五卅惨案中工人罢工乃受人利用之轻举妄动，这样的话与“五卅”时英人的谣言“诚言”是一样论调。其余荒谬言词甚多，而日本纱厂恰好利用此布告翻印数万份，以二百元雇数十人到处散发。这个布告自然也是上海每个报纸所必须登载的；反之，罢工工人的实际情形各报却拒绝登载。因此，我们说工人的苦况与罢工的实情，只有工人自知之而已。从最近罢工的各种经过里，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悲壮

事迹的记录。这些事迹之最显著者，如：一、各日厂总同盟罢工的屡次集议；二、日华纱厂罢工一月后佯许复工，向厂主取一元后又继续罢工；三、总计一月中前后被厂主雇流氓打伤之纠察队、演讲队，童子团达二百余人；四、因散传单或演讲或秘密集会被警署及捕房拘捕者数十人，或判罚金或充苦力或判囚数月；五、“九七”辛丑条约纪念日在民国路与孙传芳的军队格斗，在南京路与英捕、印捕冲突；是日罢工工人之讲演，是在租界中为帝国主义唱挽歌，马路两旁充满了悲壮激昂的呼声，使巡捕侦探等张皇失措。

八月中罢工运动之最大者为日厂，作者曾一次详论（见本报一百六十九期）①；直到现在，这一罢工犹未结束（参看前表之日期人数与条件），这一次的罢工爆发于陈阿堂案，然陈案受日人之拖延敷衍，罢工运动至今已转入经济条件的谈判。但日本厂主始终持强硬态度，最初甚至拒绝谈判。在经济谈判中，工资与虐待问题是其焦点；开除工人领袖是工人所最不能忍受的事实；但日厂主一概拒绝谈判。此次罢工，遂致长久相持。

日厂罢工的趋势

迄现在止，日厂之罢工者尚有两万人。工人对罢工条件坚持之心，始终如一。但罢工均在纱业，以现在纱市之疲，纱价不佳，日厂主亦似乎有所恃而无恐。但这并不是真象。

① 见本书中的《六论上海的罢工潮》。——编者注

真象乃是厂主仍企图复工，但他们所用的复工方法，不是与工人讲条件，而是一方面嗾使警署与捕房压迫工人；另一方面花钱请流氓打手大吃大喝，出重赏使强迫工人上工。他们曾与捕房及警署约通，某日某时鸣汽笛开厂，到时候就一齐动员努力，武装押解工人入厂。日华纱厂工人被迫复工第一日，因未带饭篮，至午厂主购买大饼馒头，委弃满地，工人因饿取食，日人在旁鼓掌大乐！这是日本资本家对付中国工人的方法和态度！

日厂之一的同兴纱厂，因定货者多遂不得不派人与工会磋商条件，这足以证明厂主至不得已时也只好讲条件求工人复工。在上海以中国纱业霸王夸称者是内外棉纱厂，此次罢工中亦惟内外棉厂主顽强到底。他们的口实，一则曰日厂工资已比中国较高，再则曰工资自“五卅”以来已增加若干倍。其实这都是骗人的话！对于前者我们无容追究，因为在中国厂中，工人之要求增加工资也是一样的。惟对于后者则所说有种种黑幕，实不可不严重指出。自“五卅”罢工后至今，工资确有增加，这是事实，在工人亦并不否认。即使把物价昂贵要求再增加工资的理由不说，而旧日的工资虽加，但工作的繁重亦加；昔日数人胜任的工作，现在一人兼任；厂主此次裁减工人，其结果是所付工资少而所得工力多。这一笔刻薄账，在日厂主是以为可以朦混过去的。上海纱厂总工会曾作说明书一一列举，指出事实（其详见后），以证明工资虽加而工作亦加之结果，工人之苦愈甚。罢工的原动力，就是这些痛苦；复工的解决，惟有依条件减除这些痛苦。现在日厂主不喜欢讲条件，只喜欢用走狗——捕探、稽查、流氓、

打手。我们只好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有特别权利而有的特别策略了！

因此而日厂的罢工趋势未可乐观。这一罢工的前途仍不出于一般罢工之必然结果：胜利或失败。现在虞洽卿出作调人，有借政治状况取得日人妥协的形式；但这一妥协是不可靠的，其结果仍算是工人的失败。如果是失败呢，我们应当勇敢的承认这一失败，以图再举；因为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的环境过于恶劣。如果是胜利呢，亦绝少多量的胜利可言，日本资本家顽强且阴谋，有过去事实可证，我们只有时时提防着。

什么是日厂工人的痛苦？

日本资本家既以工资高于他厂自夸，又矜夸待遇之优良，仿佛在日资下的工人已大幸福，如警察厅长严春阳所谓："得作工就能生活算是万幸，罢了工何处去找饭吃？"我们如若空言日厂待遇不良工人痛苦，亦难有人相信。我们所重的是事实。理在有一批不知什么人的"工业调查委员会"，宜乎有些事实经他们调查而出，但我们只看见报纸上他们的宴会，还没有看见调查。其实真能调查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工人自己。日厂工潮发生后，上海纱厂总工会曾发表详细的报告，历述一切情形；上海报纸惟"商报"转载，但删改甚多，几失原意。下列各段由该报告中摘出，我们应当仔细寻读其内容：

第一、关于日厂之待遇，原报告说：

“日本纱厂待遇之恶劣，设备之不全，自为意中之事，而日人则口口声声以设备完美向社会宣传。其设备稍为完美者，如公大一厂，但洗澡等事，仍须纳费。至于内外棉各厂，则完全无有益于工人之设备。如饭间洗衣之设备，数千工人，仅有盆子数只，厕所中以前尚有窗户，现在亦已填塞；空气不通，臭味难闻。送饭之处，狭小不能容，遂有不许送饭之举。其他种种不平等待遇，举述于下：

（一） 日人殴打工人之事，时有所闻，且不分男女童工，稍有不遂，即以恶毒手段痛打。事实之可供参证者，最近如东五厂日人田路，因磅纱陈某嫌工资过少，要求略为增加，即打其耳光。七厂日人松下，因筒子间王小妹因生病欲打钟头请假，即拉住头发大打，并掷之于地。十二厂日人田中，因有一工人要请假回家，即捆绑痛打，抱伤卧病，扶病回家，生命为之断送。此皆事实之可据者。其他零星虐待，笔难尽述。

（二） 昔日日人皆直接殴打工人，自顾正红案而后，方法略为变更，即假手于华人，如稽查流氓工头等，事实之可据者，如九厂稽查董友贤，因工人陈真如请假过期两天，即挥拳大打，并用小刀刺伤其面部，打之不算，复停其生意。又如九厂包探及工头张阿二、黄桂勋、冯宝如、朱阿二等，毒打工人石万才，痛殴至死，复用冷水喷醒，送至捕房。又九厂买通流氓四十余人，分布厂门内，殴捕工人，新近在九厂，拘捕东五、八、十二等各厂工人送入捕房，任意判决。

（三） 厂中最为凶恶之手段，即为利用租界势力，雇

用巡捕进厂，不仅工厂内横行无忌，即在厂外，复时时伤及无辜，如三、四厂停工时，一华捕在厂门口殴毙小贩刘成民；及在劳勃生路三角场用手枪弹伤一行路童子。此种事实，凡留心社会治安者，其将作何感想乎？

（四） 厂中添人时，最近益加苛刻，无论何人，均须拍照验身，女工亦须脱去衣服，受日人男医生之玩弄。女工中之不甘侮辱者，遂不去做工。平时在车间稍有小过，即迫打手印，勒写保单，视我国人如牛马奴隶。

（五） 在厂中侮辱工人之事，不一而足。日人无好颜面，开口即骂，动手即打。对于童工，又复拉其耳朵，踢其腰部。对于女工，则调戏胁迫，如十四厂日人小川，往往调戏女工，稍有不遂，即借端寻事。

（六） 日人中之不良者，如七厂之登山，不论任何工工人，彼往往以筒管掷击之。又乌海氏不知工作，常与女工谑吵。十二厂田中之滥打工人，十四厂山枝之打骂小工。其他各厂，均有不良之日人逞势胡为，而日厂主不知禁阻，以致与工人间之恶感日深，遂为引起工潮之绝大暗潮。

（七） 日人稍有不遂，常对于工人滥施暴行，使工人受损失以为快。如摇纱女工，稍不如日人之意，即将其工簿撕毁，无论簿子上有多少工资，不予发给，而工人则无如之何也。

（八） 工人在工作时，偶有疾病请假，厂中往往不予准许，竟欲其死在车间中以为快。曾忆在某厂中，有一女工，在临产时欲打钟头出来，而不之许，竟产在车间中也。

（九） 日人薪水，每月至少八、九十元，每年有例假

数星期，每二年可回国一次；而对于我国工人，则往往不许请假，请假逾一月者，即遭开除。疾病时，停一小时即扣一小时工资。故工人不病则已，病则惟有待毙耳。

（十） 童工年龄，小者只九、十龄，大致以十三、四岁为多，须做大人生活，而工资则比大人少去数倍。

（十一） 工人向来如做工半年一工不停，有赏金四元，今已完全取消。又在日人方面，均有养老金，而对于华工则无之，且厂中不容老年工人，见工人年龄稍大，即停歇其生意，毫不顾其生计。

（十二） 当“五卅”签订复工条件时，有不准带武器进厂之规定，但现在并不实行，有某工头亲见日人藏手枪于抽屉中也。

（十三） 在厂中有试验日、当心日等之规定，天天有试验，而每月有当心日。在此日中，在工作之机上，须时清洁。工人又要顾到工作，又要顾到清洁，忙碌不堪言状，而生活则又因此做得甚少。但如生活不如平常之多，即谓工人在平时拆烂污，而加以粗制滥造之罪名。

（十四） 厂中罚工钱之规矩颇多，如皮辊稍有油花，花衣稍为堆积，在筒管上稍有坐下，即须罚钱，一罚辄在数角以上。”

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原报告中说：

“工人工资，依厂家统计，平均为五角九分，其实不满此数。盖日厂中工作十余年之老头目，正式工资，亦不出三十元，普通工人，每日工资约三、四角，最少每日仅有二角三分而已。兹将内外棉工人之工资数目，约举如下，此数乃为

工人实得之数，较为正确，与厂方工资表对照，大有出入。

一、拆包间，最多三角九分，最少三角一分。

二、钢丝车，头等三角八分，二等三角六分，最少三角三分。

三、条子车，每亨斯工价一分三厘二五。每日最少做三十亨斯，最少二十亨斯，平均为二十五亨斯，故每日平均工资为三角二分一二五也。

四、粗纱间，头号每亨斯五分三厘，平均每日做八个亨斯，可得工资四角二分四；二号每亨斯六分五厘，每日做七亨斯半，可得工资四角八分七厘五；三号七分三厘，每日做四亨斯，可得工资二角九分二厘。

五、细纱间，每一木棍一分一厘五，每日最少做二十六木棍，最多四十四木棍，平均为三十二木棍，可得工资三角六分八厘，换纱者每日约做三十木棍至三十六木棍。

六、酌水间，每日工资最多四角，最少者三角三分。

七、摇纱间，每元七十车，每日可摇三十车，少者仅二十五车，平均工资为四角二分八厘。

八、打包间，工作最吃力，以包工计算，除货品不缺，工作不停止，每日可做八、九角，但秤纱者每日工资，仅为二角八分。

九、磅纱间，工资最多三角六分，最少二角八、九分。此外加油扫地之长日工，每日平均工资为三角二、三分，头脑中之资格最老者，不过二十八元至三十元，黑簿子特选工，每月工资有低至十六、七元者。至写字间华人，则工资更小，打印子算账者之工资，每月不过七、八元。

第三、关于日本资本家自称工资已加的问题，我们试察内容如何，原报告说：

“日人在我国初设纱厂时，虽因生活较低，工价比现在为小，而所雇工人人数，则较现在为多，工作不如今日之繁忙；近年以来，工资虽略增，然生活程度亦日高，且各厂屡次裁减工人，增加工作，故实际上工资不但未增，反大为减少。兹将二、三年来各厂裁减之人数，列述如下：

一、拆包间，以前每一部清花车用六人，三部车十人，现在每部车四人，二部车八人；以前有长日工六人，现减为四人。

二、弹花间，车上人数照旧，但工作较前增加，车外减少揩车一人，扫地一人。

三、钢丝车，以前有扫地四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收花衣三人，现在减为一人，在开厂时三人做一部车，现在二人一部，且将揉条子者减去。

四、条子车，以前有拉条子四人，现已取消，由车上工人兼做，并减少扫地一人，收花衣一人，加油头脑一人。

五、拣花间，以前拣油花白花者共有一百八十余人，现在只有七、八十人至十余人。

六、粗纱间，头号、二号车以前二人做一部车，现在一人一部；三号车仍旧一人一部，但以前有四个小头脑，一人领六人，相帮换纱，现在一律取消，无人相带。以前前后弄有扫地八人，现在只有三人。以前有收花衣三人，现在减为一人。

七、细纱间，以前有收花衣四人，现只有一人；加油二

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童工头，现已取消。摇车头以前一人做四部车，现在一人做十三部车，摆筒管以前一人做四部车，现在一人做六部车。以前有揉烂纱四人，现已取消；以前有扫地六人，现减为三人；加油二人，现减为一人。摆粗纱以前一人管六部车，现在一人管十三部车；木棍皮棍罗拉，以前有六个人揩车，现已完全取消，由做车者兼做。

八、酌水间，以前有工人十八人，现只有十二人；以前有头脑，现已取消。

九、摇纱间，减去扫地一人，男头脑一人，女头脑二人，抄号头一人。

十、打包间，减去扫地一人；以前有磅纱三人，现已取消；以前有秤包三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收纱四人，现完全取消，其工作由酌水者兼做。

十一、织布间，（甲）布机间，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时，甲乙布机间六部份，每部有一上手头脑，二个下手，一上手机匠，二个下手，装布经二人，加油二人，每班有扫地一人，揩车一人，并有一男总管头脑，一扫地头脑。现在六部分头脑，只有一上手，一下手，一上手机匠，一下手装布经加油，每班只有一人，总管头脑及扫地头脑均已取消。以前布机间有扫地八人，现减为四人，织布女工以前一人管三部，现管二部，因之工资大为减少。（乙）筒子间，以前有三个小头脑，一总管头脑，一抄号头，现已取消。（丙）插纱间，以前有搬纱四人，现减为一人。（丁）浆纱间，以前做经常工作者有十四人，扫地一人，揩盘头二人，现做经常工作者十人，揩盘头者减为一人。（戊）筒子间，以

前有三个小头脑，一个总头脑，一个抄号头，现总头脑已取消。

此外挑纱揩盘头者，本有六人，现减为四人。布机间织布女工本有帮纱者三十人，现已一律取消，由织布女工自做，布机间揩车长日工本有二十四人，现减为十七人。

十二、长日工，以前纱间有四十五人，现只有二十人；细纱间揩车，以前有大、小两班，大揩车十二人，小揩车十人，现无小揩车，生活由接头者兼做；钢丝车以前有三十一人，现在只有二十人；弹花间以前十五人，现只有十人。

依照上述情形，可知近来上海日纱厂工人人数，减少在十分之二以上。人数既减，但对于工作，不但不稍为减轻，且日有增加之势。此虽工人技能进步，而未餍厂主之望，常令工人增加出货。有时工人或因天时关系，如自五月黄梅起至七月炎暑稍退时止，不及平时为多，有时或因调换纱支，如纺六支纱每日可出货百余包，改纺二十支纱，每日只能出七十余包，而诬工人为怠工，开除大批工人，厂主之用心可知矣！”

1926年9月14日晨

原载《响导周报》第172期，

1926年9月25日。

署名：施英

最近政治状况与工作

“北伐”的局面

近两星期的时局，简直谈不上许多政治，而是一些军事！国民革命军下武汉，军事的紧张局面，牵动到各方面：革命军如何保住武汉，江西军事的胜败是一个生死关头；孙传芳亲往南浔，势如螳螂，有意捕蝉，然而黄雀在后；奉系军阀不忘去年之仇，欲再下江南，山东的恶魔欲攫取河南；直系在北方之势力大挫，王怀庆出走，卫戍军投降，北京的吴系势力被逐，内阁动摇如鸟兽散；东南皖浙小军阀正望风使舵。所有这些局面之解决，都在江西军事有一个明确的表现之后。在这样的局面下，姑无论其趋向如何，我们的工作原则有两点：（一）帮助北伐军保住其胜利是有绝对必要的，同时毫不松懈的应发展民众运动，谋民众的利益，开始要求

民众的政权；（二）处处发展我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与指挥民众运动，如反英、排货、宣传国民会议、市民自治、省民自治要运用出最好的联合战线，牵引社会各阶级于政治运动，摆脱小团体的习惯，建立并集中（纵然是秘密的）我党的民众运动指挥权！

上海之变

"五卅"以后，阶级分化，我们在前线上苦斗，已逾一年！这一现象在上海最显著；但现在的上海，因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关系推移的结果，将有一个变动了。左派的资产阶级（虞治卿是其代表人物），现在秘谋反孙，有了各种的布置。中小商人（各马路商联总的多数人）十分左倾。素来反动的各大学同志会公然肯与革命派的学生建立反英联合战线。一般的民众，均震动于"北伐军下武汉"这一事实，表示同情，甚至表示希望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同时江浙各省俱同）的各社会阶级，可谓已在军阀统治之下与革命声势之前撼动。

但这并不是怎样可喜的。如果我们只助长民众盼望北伐军来江浙这一心理，便算是我们的错误。如果我们失去此机会，不引导民众作各种的奋动，便算是更大的错误，上海之变是可能且有必要的。但我们却不可不认清：资产阶级的投机性与虚伪性。

目前上海一般资产阶级的领袖，与高等知识分子之表现，正是在革命潮流里的一种投机行为。何况他们此时的情绪本

是不定的，假使目前北伐军军事方面有所变动，他们的态度，也就会马上改变起来。因此，我们在目前的策略，虽然是推进他们，却不能存过分的幻想，我们的目的只在能影响到大多数的群众，并不就是原有的革命派高扬旗帜之时；未来的变局，最高的只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比较合意局面；因此，目前的工作，就是一个民主派广泛的联合战线。

这一联合战线的外表就是市民运动。这一运动的政纲就是反英与反孙。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推动资产阶级与知识界，要波动及一切中小商人与一切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虽不能不从一般代表人物与领袖分子下手，然而最重要的是各社会阶级的群众，否则市民运动不能深入，亦不能持久。总而言之，我们又得一次机会来做联合战线工作，我们要当心来做这一工作：五卅运动给予我们不少的经验，同志们没有遗忘么？

历来沪区工作屡次提醒注意市民运动，但结果头绪茫然，与市民群众社会格不相入，我们同志只有在工人与学生群众里苦苦奔波。现在正是我们创造与建立市民工作的机会。各部委，各支部，要快快动员到市民群众中去。

支部工作

支部工作直到现在可谓还未建立！各方面同志已渐能了解支部工作之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工作于各方面的，始终是某一方面某一种工作的活动，而未看见支部的工作，这与中

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一切工作归支部”是恰好相违反的！这一现象反证明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支部，与支部工作重要的真正意思。我们现在要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先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除最少数的指导工作同志，与特殊委员会的活动外，一切工作要归宿到支部里来，一切的支部要活动起来！实行方法：（一）每一支部，经部委或区委参加，拟出最近的工作计划；（二）指导活动工作同志加入支部或为支部工作指导员；（三）按照支部性质，分划执行发展同志工作（在最近期内，须特别发展交通与城市工人同志及学生同志）；（四）到支部会，缴纳党费，推销书报，是每个同志最低限度的几件任务，违者应受警告甚至开除处分！

职运计划

职工运动在目前有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注意交通工人与城市工人；（二）已成立的工会工作之群众化；（三）相当的保存实力谨慎罢工运动；（四）励行群众的正确政治宣传与教育；（五）健全下级干部的工作人材。这五项工作，必须一一实行。执行这些工作的责任者，在今后是各部委，各工厂支部。职工运动的指导权，今后集中于党，集中于各阶级的党部。在各产业与各种工人中，除另有详细计划实行外，最主要的问题是各级负责工作的同志要切实执行所有的规划。

原载《教育杂志》第1期，

1926年10月5日。

署名：施英

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

——摘录施英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在上海活动工作同志大会上之报告——

各位同志：

此次中央扩大会议中，有很多新颖而又重要的决议案，组织问题，即为其中之一。

组织问题，是我们党很重大，很需要，又很可宝贵的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一问题看得太简易了。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还并未懂得组织问题。各国的党，对此问题向来不注意。俄国的党也是经过许多时间，从长期经验里才弄清楚，才有现在俄罗斯共产党那样有名的严密完善的组织。

到底组织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占什么地位呢？我们应当知道：一方面，组织的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另一方面，组织的形式乃群众的政治与社会的生活之关键；所

以组织问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间之一枢纽。此次中央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决议，即指出这一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党当注意组织

现在，我们的党，已经应当十分注意组织问题了。我们已经有讨论组织问题之实际的必要了。为什么呢？

第一、以党与群众的关系来看——

（一）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亦即领导中国工人与贫农及一切受压迫民众革命的最高参谋部。现在共产党的基础群众——工人阶级与农民之组织尚在开始的时代；不仅未完善，亦且未普遍；不仅未普遍，亦且很困难。但是革命的环境，是需要我们赶快发展工农之组织的。

（二） 现在受共产党领导与影响的，只有工农群众，其余各阶级社会群众，还难深入。

因此，在目前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就发生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群众属于谁来领导的问题。此后共产党如何组织这许多小资产阶级群众，于自己影响或领导之下，在组织观点上是件严重的问题。

（三） 共产党自身的组织，直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大多数同志还不懂得。共产党现在不过是聚集了一些革命分子，做革命的活动，还没做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之形式。

（四） 到底在目前革命进程中，共产党与各阶级群众有了怎样的关系呢？工业群众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组织力还差，一切工作都没群众化；其余大多数群众只受共产党思想上的影响，可未做到组织上的影响。由此证明共产党在中国于思想上确已领导了很多的群众，但应从思想的领导，做到组织的领导。

第二，以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来看，有两点我们是应当自己认识的：

（一） 中国的共产党已是中国革命政治的核心，而且是唯一的核心。

（二） 从许多实际的群众运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已渐渐站在一切革命群众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地位从何而来呢？是从工作与经验来的。

第三，以党的经验来看，扩大会议案指出了三点：

（一） 我们经过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所以得到党的发展与群众组织的发展。

（二） 因为注意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几处重要的地方有了基础。

（三） 因为开始注意支部工作，所以我们的社会成分较好。

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缺点亦太多太大了。甚至于我们的同志，还并不懂得什么叫组织工作。或者以为开会，开名单，造表册，做统计——那就叫做组织工作么？那只是组织工作中的技术问题。技术工作仅为组织工作之一，决不能占有组织工作的全部意义和范围。这次中央扩

大会议，指出了很实际的四个问题是我们的缺点：

（甲）尚不明了组织工作的意义；

（乙）没有支部工作；

（丙）党团的工作不好；

（丁）党的机关不健全。

组织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同志！我们已经说过开会做表册作统计不算得就是组织；那吗，我们急于要解决，那几件事是组织的基本责任了。第一，在观念上，我们要弄清楚，政治的现象和社会的情形，是不是能与组织问题无关呢？第二，组织的对象，能够离开群众么？第三，一个时期一种运动之发生，怎样才算有力量呢？怎样才能取得大多数的群众呢？——这并不都是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际都是组织的问题。革命的力量问题并不是别的，就是组织的力量。列宁说："无产阶级除以组织为武器而取得能力外，无第二方法。"

现在，我们的党尚是幼稚的。我们要想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想从思想团体变为行动团体，要想实现布尔塞维克化，只有在组织工作上下工夫。现在，就实际说起来，我们党在群众中的指导力量，还非常薄弱。往往革命的客观环境需要甚高，而我们的力量不够应付。有时候，甚至于群众的革命潮流高涨，而我们在后面追赶，这便是我们常说的，那真算一种尾巴主义，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应有的现象。什

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是群众的先锋，是群众的头脑。在群众的后面跑，还算共产党么？我们的党在组织上的责任，就是要时时推进革命的运动，抓住运动的重心，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指挥群众的行动。我们要指挥一个运动的基本群众，亦要注意这个运动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的工作，就是我们在组织上的力量的试验。我们要精密的计算自己的势力与敌人的势力，亦要随时求能扩充我们的势力至最大限度。布尔塞维克党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处处为了多数的利益，取得多数的行动。

总之，我们概括起来，组织工作的意义应有四点：一、政治的；二、群众的；三、行动的；四、技术的。

现在我们再讲到党的支部问题了。

支部的重要与工作方法

扩大会组织决议案关于支部问题说得最多，并指出工作的方法。那里面所说的方法有五点，但那是为全国的，亦仅是指出其大概的；我们还可以把决议案的内容更扩充一些，说得更详细一些。

对于党的支部的认识最重要之点，便是：支部是党的基础，是党在各种社会中之核心；没有社会中各种支部之存在，我们便可以说，我们的党就不算存在。在过去，我们的同志大多数缺乏这种认识，大多数同志在心理上与实际上的共同错误，就是把“支部”二字照中国字义观察，当着“分

部”的意义来解释，而不知“支部”这名词，不过是译语，在欧洲文字里原就是“核心”之意。

不仅是名词上的误解，我们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上亦错误；现在，就全党来看，我们的党的支部工作尚未建立起来，亦是一种危险。什么是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之错误呢？那就是不懂得支部是所在的社会群众的核心，而当作党的一个分部来看待，征集了一些革命的分子来，授以党的训练，报告以党务最多，亦只是要同志们在党的训令和通告下行动；至于支部自己在该社会区域人民群众里的活动工作，几乎是没有。其次为什么说没有建立支部工作就是党的危险呢？同志们！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党在内部组织问题上，直到现在的最大缺点，就是只有地方的工作，还没有支部的工作。我们的党在全国广大的境域里，已有了许多地方的工作，我们的组织遍于全国各行省以至边疆各省；我们的区委现在虽只有几个，但在各重要城市里，甚至有些小县里，亦有了地委。然而同时我们也只有这些区委或地委；可是遍于全国，我们现在还找不出一个好的与真正的支部。这种现象，是不合于共产党之组织的。这样现象，是尚未在群众中建立真正的基础，算不得共产党已在群众中建立。这岂不是一个危险么？我们的党仅有五年的历史，已征集了逾万数的党员；但这是因为有这样好的革命环境与地方工作之结果，而不是由支部工作得来。假使我们的支部工作较好，也许我们的同志更多。我们现在逾万数的党员，即使每一个都是革命的活动分子，但只不过是一种运动与一个地方领导的活动，并不是支部的作用。我们的所有同志，名义上都编入支部，但实际上竟少

有支部工作。

所以现在支部工作刻不容缓。我们要开始注重支部工作的方法。为表明支部的重要起见，在此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提出了一个口号。这口号就是：

“一切工作归支部！”

怎样叫做一切工作归支部呢？第一、党的基础是支部，支部要执行党的各项任务；第二、支部是党在各种社会中的核心，支部自身要于其所处环境中建立各种工作；第三、在支部中要分工，要有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工作，分配同志去担任；第四，每个支部有干事会，是全支部的指导机关，是社会核心中之核心，是该社会中一个革命干部，一个秘密的革命政府，在该社会中活动，管理该社会的各样破坏与建设工作；第五、支部中每一同志，应该是积极的活动的一员，担任有一种或数种工作，工作范围较大的或由同支部的几个同志共同担任，工作之改变由干事会调动。必须做到了以上五点，才算是一个支部，才算有支部的形式与工作，尽了支部的责任。

但有一个切实的问题，即是支部中的分工是如何办法呢？到底每一个支部里，有几种工作类别可以分配呢？这个问题是需要了解的。分工的内容，要以支部的性质而定。例如一个工厂支部，我们可以至少指出下列诸种工作，能由同志们分配担任：

工会运动、纠察队、自卫军、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交通、童子团、推销书报、介绍同志、调查、办墙报、体育游戏、平民学校、讲演。

这以上所举者不过大概．且有些是我们已有的工作，但在过去，很少在支部中执行。这以上所举的是工厂支部的工作形式：至如在学校支部，便可有学校环境的各种工作，农村支部有农村的，矿山支部有矿山的，街道支部有街道的；越是分工的种类多，工作便越切实。总之，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支部成为社会之核心；在支部中每一个同志所有的社会关系与工作，统统要聚集到支部里面来，由支部指挥之，这就叫做“一切工作归支部”。

现在我要讲到支部性质与发展问题了。在过去，我们对于支部既然只有一个“分部”的观念，于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支部的性质之分划。依照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支部的性质概括的可有两种：（一）产业或职业的支部（如工厂支部、铁路支部、矿山支部、轮船支部、农村支部、学校支部、商人支部、店员支部……）；（二）区域形式的或城市中按街道而划分的支部。前一种支部较容易分划，后一种亦是容易分划的，在性质上说来，前者固是必要，后者如街道支部在城市市民运动有扩大的作用，我们的工作在城市者甚多，对于街道支部之发展是极当注意的。

讲到支部的发展工作，正是支部工作的第一责任。同志的增多，必须经过支部得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然而我们同志往往忘却这一责任，不注意发展的工作。在心理上，有些同志还有一种毛病，自己加入支部以后，因为支部对社会是秘密的，遂连自己也秘密起来，不肯执行介绍同志的工作。一个工厂，一个社团，或一个区域里，我们同志在其中活动，其目的就在引导群众革命，而吸收革命觉悟的分子到我

们党里来。在整个的社会中，我们的党要逐日扩大，吸收所有的革命分子；我支部便是在各层社会里尽吸收革命分子之责。

去年底，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曾召集了一次组织的会议。这次会除有各重要国的党的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外，并特别召集了一些支部书记，专门考察各种性质支部的工作。有些支部书记曾作出极详细的书面报告，说明支部如何发生，如何工作，如何发展，以及其环状，我们细读起来，真是极有趣味的材料。其中有一件报告说：

“我们工厂（按此乃一汽车厂）工人总数不过八百，我们的同志最初不过七人。第一次支部会议我们决定发起组织工会，每人找五人，一星期后公然征集了四十人为工会会员。于是第二次我们决定，从会员中每人应介绍两人为同志，于是在第三星期时我们有了十八个同志。我们再决议每个同志要介绍十个工会会员，每一已入工会者（非同志）要介绍五个工会会员，第四星期时，工会会员已有三百了，我们的同志也将有五十人了。五个星期以后，八百人中加入工会的有三分之二，而六七百人的工会中，我们有一个五六十人的共产党大支部为之核心工作，工会会务自然很有可观，……这真是我们支部工作的成功呢！……”

这一报告真是具体的为我们指出支部发展工作之例证。象这样的支部可称为模范支部。这样的模范支部我们虽不易得，但我们每一个支部都应按照这一方向去作，却是无容讨论的。

（注）　此篇所记原报告甚长，以下尚有：党团问题、

机关问题、人才问题，及如何实际工作问题等段。因过长故摘取发表。

原载《教育杂志》第1期
1926年10月5日。

全国政治近况

自双十节武昌攻下以后，北伐军有下列的发展：（一）南昌的包围，孙传芳军一部陷于围城不能冲出；（二）九江的情形危急，孙军有立刻失败的可能；（三）第八军经黄梅武穴出安徽，企图夺取江苏；（四）福建的战事胜利，周荫人必败；（五）浙江夏超的独立运动，使孙传芳有后顾之忧；（六）上海民众的运动与暴动的准备，使江浙两省政局发生突变。这以上的形势总括起来有两个结论：（一）孙传芳之失败将是不可免的；（二）北伐军的进展将及于长江下游。

如若这种局面能实现，便是我们原来假设的政局将要实现：这个假设的政局形式就是：

赤粤，与

黑奉。

黑奉对付目前政局的策略非常巧妙的。他们一方面对于联军与革命军都有接洽，极力促成双方的大战，待至双方精疲力尽时，才从容南下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又不明白表示反吴，而只是注意实际取得北京与直隶全省（包括保天）实权，逼迫吴佩孚不得不让。吴虽不欲弃北方，然为奉所迫，已无法应付；对于时局只立在被解决地位，已无政策可言。浙江变化发生后，奉张对孙传芳表示同情（以夏超比郭松龄），而鲁军已六路出动（名义上是援吴入河南），欲乘机夺取江苏。但奉鲁之间，有极大的冲突，最近北京警权之移换，便是具体的表现。这个冲突，在目前是北伐军如何取得苏皖的关键，奉鲁两方对于苏皖问题若无妥协的办法（因杨宇霆不愿张宗昌得江苏而欲自取），则苏皖可为国民政府所有；在将来是“赤粤”讨伐“黑奉”的关键，因奉鲁的破裂能促成将来北伐的胜利。

从上面看来，这一政局的形势，比起北伐军初下阳夏时来，是较可乐观了。然而同时政局与军事的重心，渐渐的移动到了长江下游之皖、江、浙，这三省的问题突然表现重要。北伐军在此时，除努力于赣闽外，要用大部分的工作到皖江浙三省来。三省的民众，此时也当毫不迟疑的助成北伐军之胜利。但三省的民众目前不能幻想这一胜利可操左券，因为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的在我们之旁，他们早已向军阀提出警告，且竭力援助将败的孙传芳。

在民众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是目前最紧张最有兴趣的

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此时认清各社会阶级的力量。上海的左派资产阶级本有尝试政权的野心，然而在行动上畏缩躲避，时变态度，喜忧无常，并不能敢作敢为；若经推动，便稍稍前进，一有恫吓，便又退缩。小资产阶级在此时则几乎是普遍的一致的愤激心理，赞助北伐军，欲脱军阀的压迫，但群众的势力太散漫，毫无组织上的实力，故群众虽占多数而不能推动目前的局面。劳动阶级在此时则除努力推动各方面外，自己应时时谨慎观察事变，要利用每个机会催促各方面的行动。

劳动阶级在未得政权未得解放之前，自己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阶级的力量。阶级的力量尚未表现以前，先要有的，是劳动群众的“自信力”。长江下游的工人群众在全国劳动界里是较有组织雏形，经过若干奋斗的。我们负工作责任的同志此时应当竭力鼓动起工人自信力，立足在全般的政局与确当的时机上，参加这次的争斗。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此时要运用最好的秘密工作技术，在各层群众里组织与鼓动，勿失去这一个政治的时机！

原载《教育杂志》第2期，

1926年10月25日。

署名：施英

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

目前在军事上虽江西问题尚关重要，但江浙（实际是江、浙、皖）问题包有政治与军事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十月中旬，孙传芳的联军在江西有将败之势；那时候上海的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与杭州上海间的政客（如褚辅成等）在反孙的共同观念下还发生了一个疑问："是上海推动浙江呢？还是浙江推动上海呢？"结果，浙江先发动了，而上海的资产阶级反徘徊观望。及至夏超独立又败退后，孙传芳的部下以武装统治杭州；上海民众初次暴动未成后，丁文江又以恐怖政治镇压上海。但是江浙局面的变化仍在目前，孙传芳的势力如风前之烛，其在江浙的残余部属，是绝不能维持下去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下形式的假设：

“南京是奉鲁军的？抑是北伐军的？”

这一假设的方式关系于江浙两省的共同局面。只要江西军事一有结束，江浙问题便是最紧急的问题。在目前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即唐生智军）已急急欲取得安徽，进取江苏，有直到南京的企图。国民政府亦似乎已抛弃原来让江苏于奉鲁只要浙江的计划。因此，江浙问题又并不待江西军事之解决，夏超一次的独立运动，与上海民众暴动的初步尝试，便是这一变动的开端。

夏超独立一星期而败退，上海初次暴动尝试而未成，是一样的事——时机尚未成熟，主观与客观条件都未具备，还须要更切实的准备，更有力的工作，才能完成江浙的变动。

我们对以上的情形若未观察清楚，便不会了解目前的江浙问题。我们在杭州、宁波等地同志若因夏超败退有懊丧，在上海的同志若因二十四晨行动尝试未成而失望——这都是极大的错误。夏超若未败退，试问以马叙伦、许宝驹等极右派糊涂支配的杭州政局，有何用处？二十四晨之上海尝试，试问那样浅薄的准备，时机的错误，如何能成功？即成功亦如何可以支持？反之，我们从浙江与上海的两方变动局面里，却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这些变动局面，正开始发展；我们在江浙如此的政局里，正要加紧工作。

但我们的工作是在民众中——同志们要紧记着！

如果民众运动不能进展，江浙的变动便是不可靠的，只有民众的工作来推动政局，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变动。江浙民众要帮助北伐军的胜利。要求避免奉鲁军的蹂躏，全靠此时

自己的工作。进一步说，江浙民众要想在北伐军统治下得到许多的利益，真正的自由，亦要靠现时的工作。湖北民众的现状，比起湖南来，迥然不同。这就因为原来的基础相差太甚。

浙江独立之昙花一现，在我们是认为当然而无所谓失望的，上海二十四晨的一幕，我们亦得了严重的教训。总之，此时，江浙各地同志的责任，特别加紧了！

原载《教育杂志》第2期，
1926年10月25日。
署名：施英

论汉口之罢工潮

——并质上海商报记者——

自北阀军攻下武汉以后，继而又取得江西与福建；在同时，汉口发生了当地自来未有的连续罢工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适如北伐军取得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一样。这一件事，在帝国主义的英国议院里，引起了讨论；在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机关报里，提出了对于国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国北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营寨里，激起了生产协会的组织；在中国的中部及长江下游，资产阶级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责国民政府不当援助工人，疑惑国民政府赤化；在中国的南部之广东，国民政府甫迁未定，省政府的领袖已开始准备压迫广东的民众运动，传言要封闭广州工人代表会。

汉口罢工这一事件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呢？最近的汉口，何以会发生这许多连续的罢工呢？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对于罢工是何种态度呢？汉口及全国的工人对于自身的罢工运动是何意义呢？资产阶级何以忽起而团结，奔走相告利益之损失？广州何以突有压迫工会的传闻发生？——这些问题，全是我们现在要急于解答的问题。

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须先了解中国之政治状况，原来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有下列诸重要现象：

第一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已到了一个稳定的步骤，国民政府已正式占有了十个省区的领土。

第二是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已准备建立其最后形式的政权，例如张作霖拟组织的所谓安国军政府。

这以上两种势力在较短期后就要最后决战，而得完成国民革命之最后胜利。但在目前，还有第三种现象是革命军事势力之发展，得助于工农群众参加的力量，因此而工农的势力强大，遭了忌恨。所以第四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要急起直追，要在革命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开始参加到革命的队伍里来而取得其地位。

这便是汉口罢工事件发生重大影响的理由，这便是资产阶级起而团结奔走相告之原因；这样看来，本是极明了的问题，我们毫不以为可惊怪。

汉口何以会发生许多的罢工运动呢？这更是极易明了的事。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很明显的得知只因为汉口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多，待遇过于恶劣。我们但看最近汉口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没有不包含这以上所述诸

项的。但在资产阶级的人说，这些都不是原因，唯一的原因只是党军来帮助了工人；假使没有党军，在吴佩孚或其他军阀之下，虽一样的生活苦，工资少、工时多、待遇劣，却不致有这样多工潮发生。因此党军遂有了帮助工人的嫌疑，这亦即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所指为"赤化""共产"的嫌疑。资产阶级大商人这样意见，表示他们宁愿受军阀的统治，宁愿替军阀筹饷纳贡，不愿使工人生活改良。这种军阀奴隶的意见，我们以为无须辩论。我们的重要辩论还不在此，因为汉口的罢工运动只不过是经济的罢工，我们以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罢工全是一样的。自今年六月以来至现在犹未停止的上海罢工就是一例，要算是历来经济罢工最大最多最长久的。但是统治上海的孙传芳丁文江以及帝国主义者的租界工部局，总不致有帮助工人甚至"赤化"或"共产"的嫌疑！汉口工人是否应有罢工，只要看汉口工人的生活情形是怎样，不必管他是否有党军。在未有党军以前，汉口工人亦不是未有过罢工。在党军占领武汉之前数月，汉口烟草业及纱业等工人即已开始为改善生活的经济罢工。但汉口乃中国工业大城市之一，仅亚于上海；以上海半年来二十余万人七百余次的罢工比较起来，汉口目前的工潮并非广大；此后为经济改善的工人罢工，亦是必然的事。因此，我们知道只有为生活改善是罢工唯一的真正的原因；我们以为上海商报记者畏垒君所说"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于骄昂。"等语未免近于偏见，因为汉口工人罢工并非意气骄昂，且离解放之时尚远何能便说是乍遇解放？至于说"鄂省民情"如果是"狭隘强悍"，则不应仅指工

人，雇主亦必如此，亦非工人阶级单方之过失！

上海商报记者这几句语调，是写在他所作“九仞一篑中之危言”一篇长文中的；这一篇长文，便是记者畏垒君为汉口工潮而发的一篇大感慨。这一篇文字我们读了颇为赞赏，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与意识的高明著作。我们要讨论汉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评商报（见该报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所载）这一篇文字。我们与畏垒君各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言，旗帜自然要鲜明，观点自然要清晰，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我不能像畏垒君那样，明是一篇反对工农利益，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鼓吹资产阶级团结且速参加国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说来曲折婉婉，却是我所不能办到的。我只能以直率的无产阶级观点来批评，且述明我们之所见。畏垒君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军阀压迫下的上海，亦曾为上海的工人发言，时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运动。畏垒君个人亦不是资本阶级中的直接剥削者，但他的思想与言论，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之资产阶级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隐避而不答复。

畏垒君有些什么意见呢？

（一）“吾人所认为革新势力进展中第一层之隐忧者，即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

（二）“最近自上江来沪之商旅，仍有种种说词……大抵谓主佣关系，渐趋恶化，劳动（包含店员）斗争，日益剧烈，长此以往，势将无业可营，甚或无居可安。

（三）“目前所谓解除疾苦云者，只能视为解除所受于军阀非法侵掠转嫁剥削之疾苦，而不能遂希望全体民众各别

痛苦之顿然医疗。

（四）“今日中国问题，一大半起源于经济组织之衰竭与崩颓，北方诸省军阀之失败，实在不知经济界康宁之重要而任意摧残之。

（五）“此际若工农运动气势太张，则商界失望之结果，不免取消极抵抗之手段，消极抵抗之结果，则商市将不保其康宁，而社会秩序与政治亦将受其影响。

（六）应该注意下列三事：一、尽瘁于劳资仲裁之组织；二、政府对于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三、党部对于下层民众之宣传；不宜作超乎事实可能之允许，因工农意识，至为简单。”

以上这六段是从畏垒君论文中专论汉口工潮一段里所摘录。这六段话语，表明作者对于汉口工潮的六项意见：

（一）在国民革命中，工农势力太大，第一可忧。

（二）主佣关系恶化，劳动甚至店员都起来斗争，据商旅意见以为将至无业可营，无居可安。

（三）工人要求不要过甚了，目前只能解除军阀压迫侵掠的痛苦，别的还说不到。

（四）今日中国经济组织衰竭，北方军阀之失败，在于摧残了资产阶级。

（五）假使工农气势太张，商界只好消极抵抗——即罢市，这种罢市一样的会使社会秩序与政治受影响，直而言之就是资产阶级也许对国民政府革命。

（六）解决问题有三法：一、设劳资仲裁机关；二、工农团体与商人团体均等尊重；三、国民党不要许可工农太多

了，因为事实上办不到。

畏垒君之原文曲折婉婉，以上所述六点，仅就论汉口工潮一段摘述其真意；因为如不述明，在表面上看来，亦是“尽情合理”的论调，殊不知就在这许多“情”与“理”中，就表示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之“情”与“理”。但我们亦非根本反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发生和存在；我们的辩论与说明，在于辩论与说明这种思想发生和存在之同时的矛盾。

对于以上所述我们需要何种辩论？是否如上述六点我们具是同意的？第一，我们认为国民革命中工农势力之勃兴不仅不须隐忧，而且十分可喜；因为这不仅使革命有扩大的民众基础，且正是殖民地经济落后国家免除资本主义社会痛苦的必要条件。畏垒君赞助国民革命希望民族经济解脱之实现而反对工农势力勃兴便算是最大的矛盾。第二、主佣关系恶化不是受佣者一方所造成，既是“斗争”必是主佣双方；这种斗争的结果，正如商报记者另一论文鼓励“商人之自觉与组织”所谓“果使全国之生产主企业家大商人自觉地位解脱依傍独往独来……与他阶级平衡对抗，此乃进步的好现象也！”至如劳动斗争包含店员，当然无足怪，此不仅在汉口，最近上海店员之罢工是同样的现象，同是受剥削之劳动的反抗。真实的说起来，现在汉口以及全国的罢工问题，只不过是资产者雇主略略减少利润，稍稍减轻剥削与虐待程度的问题，何至于雇主无业可营，无居可安呢？第三，目前工农群众并不敢希望所有痛苦之“顿然医疗”，所要求的，诚然只是“所受于军阀非法侵掠转嫁剥削之痛苦”；汉口等地

应当是已经没有军阀了，那些“转嫁剥削与非法侵掠”的要由雇主对工人拿一点出来，所以此时汉口工人所要求者，只不过增加必需生活的工资，改良军阀时代的待遇，承认军阀时代所不承认的工会而已。第四，今日之中国问题，并不在于经济组织之衰竭崩颓，而在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欲正理经济者首宜参加扑灭军阀与抵抗帝国主义的革命；北方军阀并不失败于摧残经济康宁；而失败于与买办资产阶级之合同勾结，同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军阀政治根本无使经济康宁之可能，所以现在北方新兴的生产协会一个可赞赏的资产阶级大团结，殊足令人抱隐忧。第五，商界之消极抵抗已有其事，即如汉口商人大会已有罢市为代表后盾之决议，这一决议是中国资产阶级团结后的第一次行动决议案，自“五卅”以来不可多见，便是现在为反对奉鲁军军用票及孙传芳，上海的傅筱庵邬志豪等对上海罢市犹持异议；工农势力勃兴本无可忧，惟商人为抵抗工农而罢市，使“社会秩序与政治亦将受其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畏垒君能有同感。

最后，畏垒君所提的三个意见。我以为劳资仲裁机关在工人阶级此时是不十分反对的，但恐这个机关不能真正解决纠纷。商人团体当然需要尊重；目前在各大都会城市里，工人不仅愿与商人建筑极可靠的联合战线（如粤湘鄂赣闽之农工商学联合会，“五卅”时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现在之上海市民公会，杭州南京之各界联合会），且愿促成商民协会之组织（如粤湘鄂以及北方各地）。至于对工农群众之宣传，在国民党不仅没有超乎事实可能的允许，便是合于事实已经许可

的（如广东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和工人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还得不到。工农意识诚然简单，但合于事实的许可犹不肯与，则非简单之过："辛亥革命成功时，人民多误解满清既倒，不必再纳田粮"，其实不是误解，而是由于满清田粮赋税太重，所供养的政府反丧权辱国，新政府又没有积极的政策，故农民的简单观念亦可以至于反抗田粮。何况现在粤桂湘鄂的农民，已由简单意识进步到肯纳田粮，所求的乃是田粮之减少了。

这以上费词的驳辩，在我们的主旨只在于驳辩因汉口工潮而发生的所谓"产业界颓丧疑布"（其实无此事）的错误观念，与因此而主张放弃工农利益的错误企图。我们对畏垒君文字全部直干之言并不减少同情，所不同情的只是畏垒君放弃了革命的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畏垒君所有的陈述论辩与主张毫未言及工农民众大多数人痛苦与其必须解脱者，就是一个证据。革命的职责不在别的，在于追求何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并不恐惧与工农阶级对抗者之兴起，亦深知现在是将由革命势力发展，而过渡到阶级政权表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工人与贫农阶级能够接受敌对阶级之"自觉地位，独往独来，平衡相抗"，以求"进步的好现象"，另一方面却也绝不放弃保持革命的根基与维持革命已得的胜利。

中国阶级之分化，因革命运动之发展而愈明显了。即以汉口工潮而论，资产阶级的行动已不是过去的行动所可比拟。与北方生产协会同被称赞的汉口商民大会，据报载"到万余人，议决四案：（一）加薪；（二）时间沿习惯法；

（三）辞就雇主自由；（四）待遇平等，全市商民愿以最后手段（罢市）为代表后盾。”这诚然是资产阶级自身历史上极可喜的一件大事。中国资产阶级能有“万余人”的大会，只怕这是第一次；又有这样合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原则的决议案，这亦是第一次。汉口商民大会之四项决议，前后两项是迫不得已而承认的，第四项尚是笼统的承认，然而二、三两项却有最严重的意义了。时间沿习惯法的习惯法是什么？习惯何以成法？习惯法这一名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落后经济国家的习惯来作对雇用劳动的法律，一脚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找利润，一脚又留在宗法社会里用习惯来增加剥削。辞就雇主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发展实业，纾裕民生”的真实面目；这便是对劳动者说：“要你作工你就来，不要你，你就滚蛋！”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生产状况中，资产阶级对于雇用劳动的真正态度！

十二月十七夜一时刘华被杀正周年

原载《响导周报》第181期，
1927年1月6日。
署名：施英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①]

从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开始了历史的斗争，掀起了城市群众革命的怒潮，发动了民众政权的夺取。从这一日起，中国的革命历史翻了一个新的篇幅；同时亦是世界的工人阶级历史，添了一页伟大壮烈的记录。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各有其特质，各有其历史的与社会的根源。悲壮的“二七”事变，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最初的奋斗，便已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争政治自由的奋斗。伟大的激荡的“五卅”运动，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血潮中，工人阶级又表现其革命的毅力。由这

---

① 原题为《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编者注

两次运动发展到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同盟，便是政治的同盟；其行动的纲领，便是为革命而夺取民众政权的纲领。“北伐”的战争开始以后，革命的波纹震动于全国的城市与乡村。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的工人群众是全国工人阶级之领导者。历史的革命的斗争，赋与上海工人阶级以天然的责任，因此而爆发出自二月十九日起的总同盟罢工。

这一总同盟罢工，不只于是罢工，而即是革命。总同盟罢工的初期，仅仅有五日的记录；然而革命的行动继续高涨起来，尤其是在罢工五日复工后更高涨起来。我们现在作总同盟罢工的记录，即在于记录这一革命的初期的各种事实。

罢 工 以 前

二月十九日之前夕北伐战争的胜利，获得了上海邻省的浙江。军事的胜利距离尚远，但上海的军阀统治已经动摇起来；军阀统治的动摇，产生出民众革命行动的时机，于是立刻爆发了上海的罢工。这一罢工是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这一罢工的目的，即在推翻军阀孙传芳李宝章的统治，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工人须参加的）政权，响应北伐军，促进国民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因此，上海工人群众奋臂而起，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开始革命的斗争，总同盟罢工遂以实现。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群众之领导者——上海总工会，经代表大会议决之后，发布出下列的命令：

总同盟罢工令

全上海工友们！民众革命势力日强，北伐军战争胜利，军阀孙传芳抵抗失败，惟有由民众起而行动，以推翻军阀势力。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完全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势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切切此令！

罢工响应北伐军！

罢工打倒孙传芳！

民众政权万岁！

工人自由万岁！

工人团结万岁！

上海总工会　二月十九日

罢工宣言与总要求

罢工开始，总工会发布宣言与政治经济总要求十七条，其文如下：

总罢工宣言

国民革命的运动，自“五卅”运动以来，愈益高涨，统治东南的军阀孙传芳，现在已至于失败，这是革命军健儿奋勇战斗之力，尤其是我们革命民众不断的反抗之力。上海是上海市民的上海，我上海市民受军阀压迫之痛苦，历

数十年，帝国主义列强，以上海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今更欲以武力，威吓我国民运动。我上海市民人人欲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即勇往前驱，为国民之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现当军阀孙传芳势力溃败之时，又正是帝国主义者以枪炮威吓我屈服之时，黑暗与反动的势力若不推倒，我人民永无自由解放之日，欲推倒此黑暗与反动势力，惟有人民起而罢工、罢市、罢课以抗议。我工人阶级今为此抗议之前驱，革命民众必须表现其行动，以行动迫促军阀势力的消灭，帮助北伐军的胜利。本总工会特号召全上海工人，以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手段，即日宣告总同盟罢工，以为革命民众权力的抗议之开始。下列十七条，为全上海工人政治与经济的最低限度总要求。

一、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二、消灭军阀黑暗势力政治。

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

五、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六、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

七、增加工人工资，规定最低工资额。

八、限制物价高涨，保障工人生活。

九、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十、星期日、节日休息，工资照给，不休息工资加倍。

十一、恢复失业工人工作，雇主不得借罢工关厂，

抵制工人。

十二、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十三、不得任意开除工人，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

十四、规定因工作而死伤的抚恤金。

十五、工人在疾病时，厂主须负责医治，并须发给半数以上之工资。

十六、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给，童工不得做过重的工作。

十七、改良工厂之设备，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以上各条，为我全上海工人目前行动之目标。在消灭军阀残余势力之共同作战中，愿与社会各阶级民众协同奋斗，愿新政府容纳我工人之要求，谨此宣言。

上海总工会　二月十九日

广大的罢工群众

十九日晨六时起，奉到总工会命令而罢工者：在杨树浦方面有瑞鎔、锦鎔铁厂，黄浦码头及制盒厂　东方、老怡和、纬通、恒丰等纱厂，及电车公司车务、机务两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引翔港方面有电汽新厂、兰格木厂，及新申、振华、承安、厚生等纱厂全体工人。曹家渡方面有公

益、申新等厂及电车机务、车务两部全体工人。南市有华商电车，求新、远大铁厂等全体工人。小沙渡方面有同兴，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厂及福新内外厂，日华、喜和等十四厂。浦东方面有日华、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英租界各邮政局、公共电车，及南京路四大公司全体工人。法租界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全体工人。以各产业计，罢工者纱厂工人全体。市政工人有邮电工人全体。店员方面有商务职工会，及先施、永安、新新、丽华等。手工业方面有金银业、茶箱、洋服、篷业、香业、制茶、线毯、猪鬃等全体工人。金属业与机器工人，罢工者十余家。各轮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广西、山西、顺天、甘州、宁波五只，日清公司卢山丸、太吉丸、尚阳丸等四只，宁绍公司开兴一只，舟山公司舟山一只。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务、彩印、美华、华商、黑色、石印等全体工人。以上总计罢工人数约在十五万人以上。

罢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罢工人数激增至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多因受资本家之压制，或因未奉到罢工命令者，计如：闸北丝厂六万人，水木作四万人，南货业、酱园、米业、估衣业、药业、洋布业共计十万余人。公共汽车全体五百余人。小沙渡纱厂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万五千余人。黄浦及十六铺等码头合计一万人①。

罢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罢工人数复增至三十五万，其增加者，计如：甲、码头工人，招商局中栈、北栈，

① 此处各数总和连前超过二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数字恐有误，但无从查对改正，故仍保留原状。——编者注

日本邮船会社，黄浦码头、大阪码头、太古码头、汇山码头，均已罢工，共计有三万余人；乙、水作工人增加一万五千余人；丙、徐家汇百代公司全体；丁、印刷工人有中华书局全体工人；戊、手工业方面各小厂业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己、纱厂方面原来参加者外，昨又增加二十六厂；庚、金属业工人，增加二千人；辛、杨树浦又加天章纸厂、中华宝兴锡箔厂、亨司达及英美烟厂，共三千余人；壬、海员新北京一百人。

罢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罢工人数复增万余人。其中计：甲、江西路自来水工人全体；乙、虹口铁厂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丙、张罗铁厂一百五十人；丁、机器铁厂公所所属工友全体参加；戊、手工业各工会增加一万二千人；己、店员增加一千人；庚、菜馆工会增加六百人；辛、公共汽车一部分罢工。

总计以上四日罢工人数，在三十六万以上，不仅是上海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亦是全国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之进步，与组织发展的迅速，从这一次行动里表现了出来。然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报纸（如《大陆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偏偏记载说：上海罢工第一日六万五千人，第二日五万五千人，他们很大胆的将实际数目缩小到六倍以上。租界里的强盗这种计算的伎俩，与他们报告最近到上海武装恐吓的外国水兵数目，是同样的伎俩，故意以多报少。罢工之第二日，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即宣传工人已复工，而实际上罢工人数反增加起来。第三日确有一部分被迫复工之行动（例如电车开车工人被捕者七

人，由巡捕武装威迫，开车七辆，专门驶行南京路一段，以示工人复工）。但第四日仍有增加者。第五日总工会既下复工令，帝国主义者的报纸，亦却不得不一致记载说：“因为总工会正式颁布复工令，果然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了。”

白色的恐怖

罢工开始之第一日，孙传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在垂死的状况中，犹肆其淫威，立刻联合租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开始施行白色恐怖。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

受屠杀之第一线的战士，即散发传单的工人，与表同情于工人持传单阅读于道旁的市民。第一日第一次牺牲者，乃南市金属业机器工人蔡建勋、史阿荣，因发传单而被捕立遭斩决。罢工第二日，电车卖票十九号工人，因发传单被枪毙于西门。学生在曹家渡讲演被捕，立被斩决者二人。老西门有市民持传单阅读，被大刀队斩决，悬首于电杆者一人，暴尸于地者二人。浦东祥生铁厂及英美烟厂工人二人，路行过军警之前，触其怒，立执而枪毙。南货业工人王同文被枪毙，闸北被捕学生二人被枪毙。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工人方憩

息于俱乐部，突被围而遭逮捕，开枪伤二人，捕去十四人。公共租界铁厂工人被捕者十二人；虹口煤业工人被捕者五人；浦东工人被捕者九人；吴淞纱厂女工被捕者三人；引翔港工人被捕者十七人；杨树浦工人被捕者六人；南市工人被捕者七人；上海大学留校学生五十余人，全体被捕。此外或失踪，或遭惨杀，或受逮捕不可考查者甚多。总计死伤遭捕者在百人以上。

白色的恐怖越更激动上海的革命工人、学生与市民。因此而发生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群众夺取武装的争斗。当罢工之第一日，李宝章即公然布告“格杀勿论”。华界、租界军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尤以华界为更甚，随处均可见小排军队，背负大刀，手擎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顿现恐怖气象，南市、闸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之而停市。李宝章的兵士开始抢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杀。南市与浦东居民，过兵士前，不敢正目而视。浦东小贩口呼“卖饼”，而兵士诬之为呼“打败兵”，即执而痛殴，以刺刀乱刺，行人不敢侧目。入夜七时，华界即断绝交通，此时外国兵可布防于租界以外，中国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工会人员、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党员。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反动势力，完全合作，以实现此白色的恐怖。

军阀屠杀与右派国民党

但是谁是这次屠杀的主使者？谁是白色恐怖的划策者？

那便是：西山会议派的右派国民党。

上海法租界中环龙路四十四号的机关，便是那些右派的巢穴。现在初出版在上海狂吠的《江南晚报》，便是那般右派的机关报。主持那般右派的领袖人物，即是被孙中山斥责，被国民党开除的张继、邹鲁、谢持等。居正等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之后，向李宝章（《江南晚报》二千元的股东）说："你此刻的惟一办法，便是前面拒党军，后面杀工人！"因此残暴的军阀李宝章有了右派国民党保镖，有了应付罢工的恐怖策略。

右派国民党是这次屠杀的罪魁，这并不是我们的诬陷，而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江南晚报》每日的言论便是证据：罢工之前，该报预言民众将有牺牲；屠杀实现后，该报即故意大呼，说是共产党牺牲民众；因屠杀而引起市民愤怒后，该报公然劝李宝章改变"格杀勿论"策略，同时此项新闻即已发现于当时报纸。右派国民党毫无疑义的是此次屠杀的指使者。右派国民党即是反动派，即是反革命派，即是民众的敌人。

夺取武装的斗争

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这一状态在上海工人与市民群众中，自二十一日（罢工第三日）开始起来。

当革命时机成熟时，总同盟罢工可以直接渡到群众的暴

动。时机未成熟时，群众便会有不断的夺取武装的斗争。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门功课。上海工人阶级须练习这一课！

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惟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罢工第一日即开始白色恐怖，因此引起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决心。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区域即开始与军警的局部战斗。二十二号，海军士兵因反对军阀屠杀、同情于工人运动，未得长官命令而开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在二十二之夕，南市与闸北，俱有工人与市民对军警之激战，试行夺取武装。因为无全部动员，而敌人势力尚在挣扎之时，故二十二夕未得全部胜利。但海军的炮击已使敌人军官士卒，纷向租界逃避。二十二日各区域大队工人群众屡向军警防线与步哨袭击，亦曾夺过最少枪械，且回击警察巡长致死。这已开始用徒手夺取武装的伟壮行动。直至二十三日晚，闸北与南市，犹有数处工人袭击警署，互斗至数小时，相持不下，警察不敢追击，群众亦得安然而退。这可以表明武装的革命斗争在上海已开始了。

复工令下以后，夺取武装的斗争表面虽似停止，但“夺取武装”这一口号的观念与决心，已普遍于多数工人与市民。这一行动的继续，即是总同盟罢工行动的继续，这一行动的关键，亦是使革命成功的关键。

为政权而战

但是上海工人的总罢工与武装斗争，究竟为了什么？不明了革命情势，且畏惧工人势力的右倾分子，很易于疑惑上海工人要组织工人政府。这是错误的。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国民政府的市民政府。但是上海的工人，很确实的此次是为政权而战。

在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在被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市民革命，没有工人的战斗，即没有市民的战斗；没有工人的革命，即没有市民的革命；没有工人的政权，即没有市民的政权。因此而上海工人的口号是"建立市民代表政府"。因此而上海工人同盟罢工与武装斗争之目的，是直接为夺取政权，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市民，建立市民的民主主义政权。

当罢工之第四日，武装斗争已开始，突有海军炮击高昌庙的行动，这已表示革命的兵士与工人之联合，这都证明兵士与工人之必须且可能夺取政权。恰在同日，上海各社会阶级（商人、工人、学生）与各革命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代表已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这更足证明市民政权之可能且必须建立。二十二日夕，临时革命委员会已发布海陆军动员令，决解除军阀的武装。这一动员令至今犹在行动的时期里。这一革命委员会是过渡到"市民代表政府"

之革命的参谋部。这一革命委员会的历史的与革命的价值，由这次总同盟罢工与群众的革命行动中产生出来，将永垂于不朽！

上海工人阶级已走到为政权而战的战场上。敌人在前，光荣亦在前，上海工人的奋斗是全上海被压迫市民的奋斗，亦即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奋斗。

群众的革命裁判

从五日总罢工的战斗里，武装斗争与政权奋斗的开始，固是最可纪念的历史记录。而在群众行动中，还有值得纪念的，便是群众的革命裁判。

二十二日，上海杨树浦区的工人群众示威集合，全区群众到者近万人。适有走狗绰号“小滑头”者，素昔勾结包探巡捕，逮捕工人领袖，竟到场意欲侦查工人领袖行动。群众见“小滑头”到场，用众力执捕，交主席台前，付诸大众裁判。大多数人高呼“打死”，主席顺众意以付表决，全体举手通过，遂当场将“小滑头”处死。

这便是群众的革命裁判。这亦正是以恐怖答复恐怖，以革命答复反革命。处死一个工贼走狗的判决，经过群众的判决，这便是革命的法律。反动派，反革命派一定反对这种裁判，认为是群众的残忍行为，但这正是极有理的革命行为。即以此事本身而论，敌人杀死了我们数十人，我们现在才裁判敌人一人。在革命群众的权力之下，此次屠杀工人的主使

者李宝章，便应受同一的裁判。

为扩大斗争而复工

总同盟罢工的群众行动，已走入两个正确的路线了：第一路线是夺取武装以斗争，第二路线是为市民政权而战。

但是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革命的军事势力相距太远，浩大的群众，时受牺牲与损失；群众的政治力量尚在，群众的组织力量尚在；罢工之第五日，为准备更大的斗争很急遽的遂由全上海工人之领导者——上海总工会宣告于翌日（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一律复工。

二十四日晨发出复工命令：

复工命令

全上海工友们！

自本会命令总同盟罢工后，依令而行动者乃我四十万有组织之工人，不数小时，行动一致，军阀统治，立现动摇。繁华富丽之上海，立变为革命风云涨漫之区域。此次斗争，实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第一次光荣伟大的斗争。罢工五日，市民暴动迭起；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我工人力量，已为敌人所认识。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

此令！

上海工人伟大的罢工万岁！

准备更大的势力奋斗！

上海总工会万岁！

上海总工会　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总工会复工宣言

全上海市民们！

我们工人阶级此次因反抗暴政，因响应北伐军，而总同盟罢工。罢工坚持至五日，工人与市民均牺牲甚大。今因种种原因，而不能不暂时宣告复工。然罢工虽然暂时停止，而为反抗军阀暴政，为力争市民政权，为工人生活改善的奋斗，仍然继续进行。我们此次在罢工中，受了市民们诚恳的同情，兹因接受商界劝告，而忍痛宣告上工，对于表同情的市民，十分感慰。并希望全上海革命的市民，今后大家仍要携着手向恶势力奋斗，以达到彻底推翻暴政为止。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

上海总工会　二月二十四日

在继续斗争中

复工令既下，在二十四日午前，亦有已复工者，自午后翌晨，三十余万人一律俱复工。但五日的总同盟罢工，并未终结，亦不是作任何的结束。

全上海的工人、与全上海的被压迫市民，现在继续斗争中，亦即在胜利之前的不断的奋斗中。五日的总同盟罢工绝不是失败，更不是毫无结果。这五日的总罢工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五日来奋斗所得的出路，超过了自“五卅”以来所有经验与教训之总和。现在正是紧要的时期，正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历史的严重的时期。上海工人阶级必须完成这一责任。

下列的口号，是上海工人目前的紧急政治口号，亦即群众行动之大纲：

一、打倒李宝章！

二、驱逐直鲁军！

三、响应北伐军！

四、拥护国民政府！

五、群众暴动，夺取武装！

六、杀反动派！

七、为死者报仇！

八、建立市民代表政府！

九、撤退外国兵，收回租界！

这以上是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革命初期的记录。

——1927年2月27日晨六时

原载《响导周报》第189期，

1927年2月28日。

署名：施英

“三·一八”的一周年

“三·一八”民众流血纪念已一周年了。民众流血事件充满了近五年的中国革命史，而惟有“三·一八”有更多的更悲壮的纪念。

去年二三月间，北方国民军苦战于京津，抵御四面包围的军阀武力，但结果至于失败，“三·一八”事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自郭松龄反戈失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庆幸张作霖之未被推倒，更积极企图消灭国民革命，而有日舰炮轰大沽炮台事件。“三·一八”的流血，乃民众反对大沽案被军阀屠杀的流血。这次屠杀的指使者是段琪瑞、贾德耀和章士钊等。段琪瑞是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使用的工具；章士钊是最反动的官僚；贾德耀亦是反动的官僚，但在当时是国

民军系的阁员。“三·一八”事件发生之时，国民军将领之一，李鸣钟方坐镇于北京，亦竟有参与屠杀计划的嫌疑，至少也没有力阻此次惨杀。因此民众对于国民军之信任发生动摇，自身亦至于失败。自此以后，国民军在北京忽而驱逐段琪瑞，忽而拥戴曹锟，仓皇失措，退走南口。自此以后，反动势力在北方增涨起来，奉鲁军阀蹂躏京津，至于现在。

现在已到了“三·一八”的一周年。“三·一八”周年纪念时的北方情况是：国民军因受了严重的教训，退走西北，发展了更新的局面，将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北方的民众受尽了奉直鲁军阀的压迫，从城市到乡村埋伏了更革命的局面，将与北伐军共同解决军阀最后的势力。惟有屠杀民众的诸指使者，如段琪瑞现尚苟活于天津；章士钊尚继续反动，为奉鲁军阀供驱使；贾德耀则公然又以国民军系旧国务总理的资格，随黄郛、贺德霖之后，跑到南方活动。一周年以来，革命势力虽已发展胜利，而当屠杀“三·一八”民众凶手尚未缉获；“三·一八”死难烈士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志愿，亦尚未成功。

“三·一八”是中国民众极可悲痛的纪念；因为有“三·一八”纪念，所以使中国民众时时不能忘却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凶恶险毒，不能忘却轰击大沽炮台事件，不能忘却唆使段琪瑞对民众之屠杀；直至于现在全国反英运动高涨之时，亦不能忘却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妥协分子唱南北妥协之阴谋。因为有“三·一八”纪念，所以使中国民众有消灭军阀的决心，时时不能忘却军阀屠杀民众的悲剧，不能忘却官僚政客的反动，不能忘却动摇的武力的不可恃；直至现在北

伐军事胜利之时，尤不能忘却忽视官僚政客反动分子之活动，妨害消灭军阀的革命工作。因此而“三·一八”这个血染的纪念日，给了革命民众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教训。这些教训在此时尤其鲜明。我们应当说：这是“三·一八”诸烈士热血照耀的光明！

当“三·一八”案发生之后，最少数反动分子曾借此而攻击革命民众最直接的领导者，冲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党员。他们的反动宣传攻击最力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所说“三·一八”之役是共产党欺骗了民众，利用了民众，杀害了民众。他们作如此反动宣传的约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右派；二是国家主义狮子派，三是当时在北京办大同晚报现在南昌活动的龚德柏等类的反动新闻记者。但是共产党不仅未曾欺骗利用或杀害民众，却是时时领导民众奋斗为民众利益而牺牲，为革命的民众所见所闻。反倒是国民党的右派，在最近一月以前，有唆使军阀孙传芳李宝章，屠杀上海工人与市民的事实；在两月以前国家主义狮子派有身携孙传芳委任状，在上海暗杀小沙渡工人孙民臣、戴起甲等的事实。至于无耻下流的龚德柏，当时为吴佩孚办报，为张作霖、张宗昌颂扬，痛骂广东政府，痛骂北方国民军，而今则奔走于南昌求荣，适足以证明其当初与现在之反动与无耻行为，每一次的民众运动，正是革命的政党领导民众奋斗的机会，“三·一八”的死难者，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便足以证明革命政党是民众的先锋领导者。革命运动不能避免流血与牺牲，革命党员自然不能都躲避流血与牺牲；惟有反革命的分子才在牺牲流血之后狂吠着民众政党之利

用。在“三·一八”纪念中，革命的民众应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扫除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亦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工作之一部。

原载《响导周报》第192期，
1927年3月18日。
署名：施英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1]

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暴动，上海工人阶级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日的巷战中完成。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

全中国与全世界——现在都震动于上海的陷落。

---

① 原题为：《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编者注

但是上海为何而陷落？陷落于上海工人的两日一夜的暴动与巷战。

三月二十夕，国民革命军占领逼近上海之龙华，但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令避免与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武装之冲突，占领龙华后革命军的策略，尚欲纳降拥有雄厚兵力的毕庶澄率领下之直鲁联军。但毕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为革命军长之一，属于军阀之一的毕庶澄，降与不降皆民众之敌。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则有准备，夺取军阀的武装，为革命军占领上海。

自孙传芳失败于九江，狼狈逃归金陵，上海工人即有十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的暴动，暴动未起而失败，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为李宝章所杀。自革命军占领上海邻省的浙江，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三十六万人总同盟罢工，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暴动。暴动亦未成，工人被屠杀者数十人，引起海军士兵的革命同情，开炮轰击兵工厂，嗣以扩大斗争而复工，为继续暴动而准备。自此以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走入最正确的路线，既决然夺取武装以斗争，复决然为民众之政权而战。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由上海总工会颁布，依令而罢工者达八十万人。同日同时，上海工人最后胜利的第三次暴动开始。

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的暴动，尽量的使用了革命的技术，勇敢真诚的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练习出两日一夜巷战的经验。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各工厂、各作坊、各机关、各大商店、各手工业场、车站、轮埠、码头全体工人罢工，到了街市的中心来，纷纷向预定的集合处集合。最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刻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群众，一时内齐到了中国城市。最少数的武装在前，广大的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立刻震动于遍城各地。铁路截断了，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亦被占领，电灯线断，自来水断，完全肃静的空气笼罩了全城市，只有断续不已的枪声与群众的革命呼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军队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投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推出了枪械，并悬白旗，这是警察投降了。在顽强抵抗的敌人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小饭店与小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由袖带红巾的输送队，往来输送于前线的战士充饥作战。袖带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战线后方；死者与伤者，扛抬过市巷。历时不久，各取得指挥的中心地，各区域自己的作战指挥集中起来。至此状况，城市暴动巷战的局势，完全成立。

但因为敌人所在地的势力，强弱不尽同。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暴动突起，在当时的作战划分于下列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

沪西与闸北。七个区域中的行动，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惟解决与成功之迟速不同，尤以闸北一区，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后六时止，前后两日一夜始解决，统计激战至三十小时。

南市是包括上海县城的沪南区域。暴动未发前，南市全城的群众，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区的群众，陆续齐集于街市中。一时半武装动作开始，先进攻警厅，二时即占领警厅，同时，占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察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了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工厂，无激战而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车头往来运输，五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四小时内便全部解决。

虹口在租界区域夹间之中，三面接壤于租界，一面近市郊，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力、丝织与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夺得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的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占领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维持区域内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岗位。直到全部的胜利完成之后，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以武装管理全区域，扑灭反动派。

浦东在黄浦江东岸，黄浦江西之暴动起，浦东所有各厂的工人群众，均起而响应。全体工人罢工，先扑攻烂泥渡

第三区警察署，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素来压迫民众，残害工人的第三区警察署，首先被群众占领。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群众复继续占领三区一分所，及三区二分所。当时有由前线溃败的鲁军，包围保卫团，被群众围攻而缴械。保卫团对工人纠察队树白旗，纠察队队长遂召集纠察队与全体保卫团，暨参加战斗之数万群众，合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自此以后，工会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合同管理浦东全区，浦东区各业人民代表大会，立时成立。暴动前后经四小时，而区民政权成立。右派与反动派之投机分子，携带武装，伪造旗帜徽章委任状来接收公共机关者，尽被纠察队拒绝扑灭。

吴淞是炮台防守地，原有驻军。自前线溃败后，毕庶澄的军队之一部复乘车逃吴淞，欲经水路，夺得轮船，逃离淞沪。但吴淞的工人，与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时间内，起而罢工暴动。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立时围攻驻军，夺取其枪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车欲回上海，往沪宁线逃脱，至闸北、江湾路附近，铁轨已断，遂据守天通庵车站作战。吴淞工人胜利后，保卫团亦出而与工人合作。经过群众大会后，吴淞的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吴淞各工会联合会领导近十万的工人群众，实际管理临时区政权。

沪东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罢工开始后，群众即围攻虹镇警察署，缴警察枪械而占领。一时许，杨树浦与引翔港两地工人群众，分头在韬朋路底之马玉山路，召集群众大会，各处到会者逾五万人，会后整队出租界，齐赴

闸北。武装纠察队至胡家木桥及虹镇两处，打碎警察岗亭，占领五区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枪械，夺得武装。香烟桥警署纵火向群众围攻，群众扑灭火势而解决之。总计前后击毙巡官一人、警察三人，余则仅解除其武装。大队群众与武装纠察队向江湾路进发，欲至闸北。达天通庵路车站附近时，适由吴淞开来兵车一列，群众拆断路轨，兵车出轨倒地，以排枪及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甚重。纠察队猛勇抵抗，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助威。自此以后，即与闸北纠察队夹击倒车之溃兵，直至翌日始解放。

沪西亦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华界即浜北，接连于闸北，群众罢工行动后，先围攻曹家渡第六区警署，缴警察械，并占领之。武装纠察队护卫群众渡河往闸北，并与小沙渡纠察队会合，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而占领。率领纠察队冲锋之总指挥死难，警察亦有伤亡。同时，两处纠察队分队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巡队署，俱获占领。各警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武装纠察队集合围攻北火车站，直至翌日。

以上各区域的行动，都比较的顺利。最后的激战，乃集中于闸北境域内。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者，乃沪东、沪西两部及闸北境内的一部，其余以租界隔绝，均不能来援。各区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决，而闸北独相持激战至两日一夜。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军白崇禧总指挥方迟疑间，又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薛师至麦根路，适值北站鲁军溃败而退，最后的军阀残余，始告肃清。前后两日一夜中，闸北境内激战经过如下：

在闸北境内，除警岗不计外，敌人盘据的势力，多至二十余处。行动以后，群众的主要目标在下列六处：（一）北火车站；（二）湖州会馆；（三）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五区总署；（五）广东街分署；（六）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嗣后自吴淞开回兵车，在天通庵车站虽被沪东群众邀击，但因敌方人数甚多，武装极强，于是六个主要目标之外，又增加一处劲敌。闸北的巷战，遂遍于全境。自十二时起，罢工工人群众到街市中者，逾十余万。枪声突然四起，北站鲁军的大炮，对向市镇轰击。鲁军中白俄兵，且以铁甲车开炮射击；在炮声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乘机开炮射击，助鲁军对民众作战（以上两事，为纠察队指挥者所亲见，但事后帝国主义者默不敢承认，上海各报纸，亦不敢以此项消息登载）。至下午四时，群众已夺得各警署与湖州会馆，全境内各处警岗，悉被驱散。居民纷纷悬青天白日旗，不及备者或以手巾被单作白旗悬挂。自此以后，群众的武装，除布防保居民，免溃兵抢劫外，进攻目标，乃集中于（一）北火车站；（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天通庵火车站。三处在一直线上，工人纠察队夹于三处之间，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进攻势。

巷战逐渐激烈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敌人虽系少数，但拥有机关枪与多量炸弹，不断的向群众轰击，十分顽强。二

十一日午后四时，纠察队以纸作书，口呼停战。投书入，劝降并负责保护其生命。鲁军亦就纸之背面回书，请求停止攻击，但不肯降。嗣后纠察队即取包围战略，防守终宵。天通庵车站敌人，因铁路轨断车倒而惊慌不已，伏两旁沟中，防守终宵，以军械力弱，纠察队进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火势渐炽，烧民房数百间。难民纷纷向工人纠察队防线中逃来，纠察队分队护送往青云路空地。火势盛时，纠察队乃弃防线前进，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至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于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作战。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火势熄后，敌人不敢进攻，惟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我们射击。此时的工人纠察队，为保护居民，对军阀之残余作战，亦对帝国主义者防御作战。

通宵的激战轰动于淞、沪全境，各处皆知闸北的战争，称赞感叹工人纠察队的丰功伟绩。翌日（二十一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至于困乏，纠察队仍从各方猛勇进攻。当时居民咸传说革命军已至，实则革命军尚未自龙华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兵解决称降，俘虏三百余人，余人逃散广东街者，被纠察队缴械，至北四川路者则被日本水兵缴械。下午四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人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苦战一昼夜之地最后解决。纠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第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

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人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兵亦溃退，六时北站遂得克复占领。因避免与租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故，纠察队乃退至车站之后布防。溃兵大队逃散时，适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师长亲率猛队赶到，完全将溃兵俘虏。是时车站地雷爆发，但已无敌踪，最后薛师进驻北站。铁路工会下命令修复沪淞与沪宁铁路，铁路工人首先复工，依工会令组织交通队三百人修路，恢复交通。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居民燃鞭炮庆祝。暴动之功，至是完成。

原载《响导周报》第193期，
1927年4月6日。
署名：施英

上海总工会复工令

全上海的工友们：此次各业各厂工友，因纠察队被迫缴械事件，义勇奋发，一致罢工援助，忠勇奋斗，已有三日。现在本会纠察武装虽失，但广大群众之伟力尚在。兹经本会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着即命令已罢工各业各厂工友，自十五日起，于开追悼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听候各产业总工会及各区域工联会指挥。本会暂时命令，概由各产总、各工联转达。此后本会仍本初衷，领导全上海工友作政治与经济的奋斗。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全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是所切盼。此令。

（本文系由世炎同志起草，于1927年4月14日在世炎同志主持的江浙区委各部委和各产业总工会负责人会议上通过——编者）

附 录

初次读到四十年前的一封信

纪念敬爱的赵世炎同志

李 立 三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赵世炎同志在四十年前——一九二三年四月——写给我的一封信，其中对于我的性格的批评，真是忠言，真是良药。我当时没有能读到这封信（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做秘密工作，无法转给我，直到一九六二年赵世兰同志在搜集世炎同志的手稿时，才在档案中发现，我也才有机会读到），没有尝到这付良药，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可惋惜的损失。当然，我的毛病，不一定由于读了这封信而完全改掉，但这样对症的针砭，总会有多少帮助的。世炎同志信中对我的批评，有下列两段话：

“昨天才收到你回国后的第一封信，读阅之下，颇是欢喜。但只要看你的信，就可以知道你的情景：你还是那样乱

七八糟的样子，毛茸茸的象一条小‘大虫’；你走路一定还在常‘拌觔斗’；我很是为你耽心，你能不能稍稍改良，以慰朋友”。

“我希望你此后常不断的给我信，更希望你对于你粗暴夸大的性情加以改良，差不多朋友中间只有你我最不放心，你的行动尤望常常告诉我。你还是要找机会设法读书”。

我正是由于有世炎同志指出的这些毛病，因此在进行革命工作的道路上不只一次地“拌觔斗”，使革命事业也遭受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世炎同志信中说：“为你耽心”，实际上他也就是为革命事业耽心。何不幸而言中也！经过四十多年的党的教育，我原有的毛病，虽然有所改变，但还不敢说，已经完全“斩草除根”了。我愿意铭记于心，继续努力改进，以利于革命工作，并以此来纪念敬爱的赵世炎同志！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

赵世炎年谱

1901年4月	13日　世炎同志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
1904年	世炎同志入家馆读书。
1911年	世炎同志受到辛亥革命和他的二哥寄给他的进步书籍的影响，并剪掉辫子表示“不能再效满奴”。
1912年秋	世炎同志入龙潭镇高级小学堂读书，课外常读《天演论》、《民约论》和《进化论》，并受到地理教员王勃山（同盟会员）反帝倒袁的教育。
1914年	世炎同志于高级小学毕业，名列优等。
1915年春	世炎同志考上酉阳县联合中学。

8月　世炎同志与四哥世焜抵北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

1917年　世炎同志得识李大钊同志，开始投入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世炎同志和其他同学一起领导同班同学，为反对"试教生"无理罢教举行罢课斗争。

1919年5月　世炎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夕，被全校学生选为学生会的干事长，组织和领导附中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

7月　世炎同志毕业于附中。

世炎同志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9月　1日　世炎同志以毕业校友的身份，在附中一部分同学和毕业生中，发起组织少年学会。

世炎同志入北京法文专修馆，被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主编《平民周刊》。

10月　1日　世炎同志创刊并主编了《少年》（半月刊），作为少年学会的会刊。

16日　世炎同志针对着当时一些青少年的糊涂思想，在《少年》（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了《说少年》的论文，批判了当时一些封建"糊涂家庭"和衙门式的学校制度。

12月　1日　世炎同志针对着某些青年因不满黑暗社会而自杀的行为，在《少年》第五期上

发表了《论青年自杀》的论文。

16日　世炎同志和法文专修馆的四川同学一起创办并主编了《工读》(半月刊)。

世炎同志由北京到常德接他的亲属，路过武昌时，特拜访了恽代英同志。

世炎同志反驳胡适“反对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论点。

1920年春初　世炎同志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学习法文。

3月　世炎同志主办的《工读》被反动的北京政府警察厅勒令停刊。

4月　8日　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世炎同志抗议警察厅封闭《工读》的通信。

世炎同志结束了在法文专修馆的学习，动身去法国。他在上海等船的一个月中，曾多次访问了正在上海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

5月　9日　世炎同志和肖三、张天翼等一百多留法勤工俭学生，乘法轮阿芒贝尼克号启程赴法。

12日　世炎同志在船上写成《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在5月21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

6月底　世炎同志同一百多学生到达法国马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把他们接到巴黎。

世炎同志在未找到工作逗留巴黎期间，除

补习法文外，主要是到附近的华工中活动，帮助华法教育会搞些编辑出版工作。

8月　世炎同志进入巴黎西郊工业区赛克鲁一个铁工厂作杂工。这时，正是他的母亲在北京病故。

10月　世炎同志又转入三得建一个铁工厂作杂工。

1921年1月　世炎同志失业，闲住在巴黎。此时，勤工俭学运动遭到挫折，但他主张艰苦支持。

2月　世炎同志接到国内共产小组陈独秀的来信，便同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同志组成共产主义小组。

世炎同志与李立三、刘伯坚等八人在巴黎组成劳动学会，提出：要革命，第一步要把华工组织起来。"二·二八"事件后，劳动学会发表声明，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请愿学生。

3月　9日　世炎、李立三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信给已宣布同勤工俭学生断绝关系的华法教育会，呼吁"医治"勤工俭学运动。

3月　世炎和李立三同志发起组织新的勤工俭学学会，作为团结教育勤工俭学学生的组织。

世炎和蔡和森等同志在蒙达时一个树林里尽情交谈三天。最后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团结，共同宣传马克思主义。

4月　　世炎同志入克鲁梭施乃德铁工厂，和李立三等一百多勤工俭学生在这里作杂工。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

5月　　世炎同志写信给周太玄表示对华工的人身自由十分关切，经他和李立三等同志的联络交涉，争取了一部分华工脱离法国陆军部的合同获得自由。

世炎和李立三同志，在华工中组织华工组合书记部，作为团结教育华工的组织，又创办《华工旬刊》，展开对华工的宣传教育。

7月　　1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世炎同志和其他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便成为中共党员。

世炎同志被委派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经常传递国内党出版的《共产党人》给大家看。

世炎、李立三与蔡和森等同志商量筹组共产主义团体，但因郭春涛反对，未成。

世炎同志与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学运动。

9月　　19日　世炎同志作为克鲁梭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到达里昂。

21日　各地代表一百多人先后到达里昂，世炎被推选为总代表，开始与校方交涉。

22日　世炎同志和一百多名学生代表，被法国警察押解至兵营囚禁。

24日　学生代表在兵营开会“欢迎”刚由国内来法的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世炎同志质问吴稚晖：“为什么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修建的学校，却只收贵族子弟，而不管勤工俭学学生？”

10月　2日　代表们在兵营开会，公推世炎为代表，到巴黎同公使馆谈判，要求恢复自由，但陈篆拒不接见。

7日　世炎同志由巴黎回到里昂兵营。

12日　世炎和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商量，认为：既然反动派决心押送这批学生回国，那么回国参加革命也好；但决定留世炎同志在法国继续组织学生华工进行斗争。世炎同志利用岗警的疏忽混出兵营，留在法国。

14日　李立三、蔡和森、陈毅、吴明、周钦岳等104个学生代表被押往马赛。

11月　2日　世炎同志为蒲照魂自杀事由巴黎寄信给王凌汉等，表示“世炎还在努力”。

世炎同志由巴黎动身到法国北方，和华工一起在荒凉的冰天雪地中打扫战场：挖地雷、

掩埋尸体。

世炎同志向华工进行宣传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1922年春　世炎同志接陈独秀来信，催他回国工作。

4月　25日　世炎同志由法国北方寄信给李立三同志说："决计重整旗鼓干起来"。

26日　世炎同志写信给吴明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并索取团的章程。

世炎同志接周恩来、肖三、张申府、刘清扬等人从德国来信，建议于"五一"建成青年团。

30日　世炎同志又写信给吴明，要求他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已开始放弃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参加青年团。

5月　1日　世炎同志离开北方，回到巴黎。

6日　世炎同志由巴黎动身到蒙达时、里昂、准也儿等地，各处奔走，筹组青年团。

6月　世炎同志主持了在巴黎召开的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世炎同志被选为书记，周恩来同志任宣传，李维汉同志任组织。出版刊物《少年》。

秋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世炎同志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

世炎同志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

三等五同志，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参加法国共产党。

冬　　世炎同志经组织决定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3年1月　世炎和王若飞同志，出席了改组华工总会的会议。使华工总会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组织。

2月　　17日　世炎同志主持在巴黎西郊召开的“少共”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1人，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决议：将“少共”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委员会改选，周恩来同志继任书记。

3月　　18日　世炎同志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十二同志，由巴黎动身赴苏。周恩来同志陪送到柏林。

3月末　世炎等十二同志抵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世炎同志向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介绍同来十一同志的思想、工作情况。

4月　　28日　世炎同志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委员，并向支部大会报告了党在西欧的活动情况。

冬　　世炎同志写出《苏俄与美国》的论文，在1924年2月《响导》周刊上发表。

1924年3月　世炎同志又连续发表了《世界与列宁及列

宁主义》和《列宁》两篇文章，这是最早在中国报刊上系统介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之一。

夏　世炎同志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决定，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7月　世炎和任弼时等同志一起，离苏回国。

世炎同志任北京地委书记。

10月　世炎同志在《中国工人》上发表《工人与党》的论文，指出："工人、农人赶早就要组织起党来，训练自己的战士，做目前日常的争斗，做将来革命的争斗。"为了教育青年，扩大党的队伍，世炎同志常到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他的母校——"附中"作演讲，开座谈会，指导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参加政治活动。世炎和李大钊、仲夏等同志常到北京蒙藏学校，对蒙族青年进行阶级教育。

世炎同志到唐山等地检查党的工作，组织工人运动。

11月　30日　世炎同志针对着国民党内部的混乱情况，在《政治生活》第23期上发表了《国民党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使命》的论文，指出：国民党必须警惕右派阴谋，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只可战斗，不可和解"。

12月　4日　世炎同志在《向导》第94期上发表了《段祺瑞来京以后》的文章，揭穿段祺瑞和张作霖企图破坏孙中山和冯玉祥联合的新阴谋。

1925年1月　世炎同志代表北方党组织，到天津迎接孙中山。

11日　世炎同志针对段、张悍然召开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在《政治生活》第27期上发表了《民众对善后会议应持的态度》，批判了某些国民党人的所谓“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的错误态度。

3月　1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他是大会的党团书记，又是主席团的主席之一。

8日　世炎和李大钊同志，出席了在苏使馆举行的纪念世界妇女节大会，担任了苏、英、法等多种语言的翻译。

12日　世炎同志等率主席团和代表们，帮助料理中山丧事。

16日　世炎同志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上，报告了大会国际问题、国内政治问题、财政问题、国民会议运动等四个委员会的组成和任务。

18日　世炎同志在第四次大会上，针对李血泪代表提出大会应增设委员会的建议，作

补充报告，说明缩小委员会工作范围的用意。

世炎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上，根据大会国际委员会对不平等条约、租界问题等问题的讨论结果，作了长篇报告。

世炎同志在第六次大会上，作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长篇报告，报告中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只提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谬论；而提出“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4月　12日　世炎同志针对着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混乱情况，在《响导》110期上发表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警告国民党中间派，在当前形势下，不要徘徊不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要有个正确的选择。

25日　世炎同志写成《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的文章，在113期《响导》上发表，对大会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

6月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世炎同志任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世炎同志参加领导了北京数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支援上海工人反帝示威大会。

世炎同志代表区委，对天津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善后工作，作了布置，在天津义庆里40号（地委机关）和日租界“德义楼”旅馆，

主持召开了两次干部会。世炎同志和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领导了天津港七艘英轮的海员大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三个月之久。

9月初　世炎同志到唐山，和邓培等同志组织和指挥了开滦五矿大罢工。

世炎同志在赵各庄矿南白道子，召集工人积极分子连夜开会，筹备罢工。

13日　赵各庄全矿工人大罢工，世炎同志作全面指挥。

14日　世炎同志召集赵各庄工会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应付英帝资本家和反动军警的镇压，军警特务突然包围会场，世炎同志在工人掩护下，离开会场。

15日　世炎同志在工人刘承章的陪同下，步行六、七十里连夜回到唐山。

下午　特务军警跟踪包围了世炎同志在唐山落脚的罢工委员会联络处，企图逮捕工人代表和世炎同志，适值世炎不在。

23日　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第52期上发表了《奉系军阀压迫开滦煤矿工人》的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李景林的罪恶。

30日　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第53期上，发表了《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的文章，对“五卅”运动后中国各阶级的分化作了分析，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民族革命

运动。

10月　世炎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在张家口主持了内蒙地区工、农、兵大同盟代表大会，被选为工农兵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书记。

11月　10日　世炎同志主持了在天安门举行的、约五万人的反对关税会议的群众大会。

28日　世炎同志指挥了由北京数万学生、工人、农民参加的“首都革命”，意图迫使段祺瑞“还政于民”。

12月　1日　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第59期上发表了《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论文，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首都革命”失败的原因。

世炎同志经常到北京党校讲课。

1926年春　国民军赶走奉系军阀李景林后进驻天津，世炎同志代表北方区委，常住天津，领导天津的党与工运工作。

1月　21日　世炎同志在天津地委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了《列宁的生平与列宁主义》的报告。

25日　世炎同志在天津创办了《工人小报》。

3月　17日　世炎同志连夜赶回北京，向区委和李大钊同志汇报：奉系军阀反攻，天津形势有变。

18日　世炎和李大钊、陈乔年等同志领导并参加了北京人民的游行示威。反动派大屠杀，造成“三·一八”惨案。

3月末　世炎同志回天津，对国民军撤退后的天津工作，作了安排。

世炎同志到唐山检查工作。

5月　1日　世炎同志代表北方区工会组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

12日夜　世炎同志写成《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及其结果》的报导文章，在《响导》第115期上发表。

5月末　世炎同志由广州到上海，中央为了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委为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其后，又任军委书记。

30日　世炎和汪寿华同志，指挥了六万余人在南京路上举行的“五卅”周年游行示威。

6月　2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全体区委会议，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说：“党派世炎同志到上海来，是为了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

3日　世炎同志在第156期《响导》上发表了《五卅纪念运动之教训和上海民众之责任》的文章。

19日　世炎同志在第159期《响导》上，发表了《上海最近的罢工潮》的论文。全面地分析了上海工人在“五卅”周年后发动的经济大罢工的真实原因，揭露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恶。

30日　世炎同志在第160期《响导》上，发表了《再论上海的罢工潮》。

7月　2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全体区委会议。会议决定出版《教育杂志》，作为区委的机关报，世炎同志负责编辑。

7日　世炎同志在第161期《响导》上发表了《三论上海的罢工潮》，对淞沪警察厅封闭上海总工会的事件作了详细的评述，指指出：工人心目中的总工会是封闭不了的。

13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发言时指出：“总工会机关未正式整理，没有好的组织，基层人员太少”，“改组后要行点德谟克拉西”。

7月　世炎同志出席了中央扩大会议。

21日　世炎同志在《响导》第164期上发表了《四论上海的罢工潮》。

23日　世炎同志出席全体区委会议，发言时指出，上海工运工作“太偏于纱厂，以后要注意市政工人”。

26日　世炎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上，

作了《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的长篇报告。详细论述了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和活动中的重要性；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

8月　15日　世炎同志在第167期《响导》上，发表了《五论上海的罢工潮》，指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下，上海有组织的工人决不屈服。

26日　世炎同志在第169期《响导》上发表了《六论上海的罢工潮》。针对着资本家对工人罢工所采取的反攻手段，指出：“资本家如果一致运用这一策略，恐怕会促成八月份更大的罢工潮”，“上海的罢工运动，亦将由经济性的变为政治性的”。

9月　17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全体区委会议，在发言时，根据罢工斗争的情况，提议“把各方面罢工赶紧结束，来多作些党内工作，头脑要冷静一些”。

20日　世炎同志在区委召开的各部委书记和各工会负责人日纱厂工潮批评会上，作了《日纱厂罢工的经过与教训》的总结报告。针对着罢工失败的原因提出：今后工作中一定要整顿党与工会的组织；要尊重党的指导权。

25日　世炎同志在第172期《响导》上，发表了《七论上海的罢工潮》，指出，上海

工人连续四个月声势浩大的经济大罢工，基本上告一段落，并指出今后罢工斗争的趋向。

此后，世炎同志除负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外，以主要精力组织和准备武装起义，经常到工人中训练武装纠察队。

28日　世炎同志在《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最近政治状况与工作》，分析北伐军开始北伐以来的政治形势，强调必须建立并集中我党对民众运动的指挥权。

10月　15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全体区委会议，作组织工作报告。

19日　世炎同志主持区委主席团会议。他在发言时指出，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的时间，要看夏超进兵情况而定；但不能乐观，"要准备失败后的压迫"。

23日　因夏超溃败，武装起义于24日晨遭军警反击，被迫停止。

24日　世炎同志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上发言时，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指出："这次行动太幼稚"，并说"我们必作第二个暴动，究为何时，要天天观察"。

25日　世炎同志在《教育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江浙之变化与其前途》的论文，系统地分析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和积极意

义，指出这次暴动是“初步尝试”。

11月　16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为发动海军起义，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海军支部，由世炎任指导员。

同日　世炎出席全体区委会，会议决定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世炎任主任。

12月　7日　世炎同志出席全体区委会议，作组织工作报告时指出：“党的工作上第一个困难，最感人力之缺乏”。建议党的组织应逐步扩大。

17日　世炎同志出席全体区委会议，作长篇发言，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必须警惕国民党的叛变，否则“就预备受国民党的压迫”。对资产阶级“一方面要联合战线，一方面思想上的斗争不能放弃”。还指出：“江、浙问题最重要的为农民运动”。

28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发言时指出：“蒋介石要浙江，目的在扩大势力”，宣传时不要使群众对他太“有信赖心”。

1927年1月　4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负责同学会，发言中报告了北伐军进兵情况，指出：“有人主张欢迎党军，我们主张自治”；要准备总同盟罢工。

10日　世炎同志出席上海市党部党团会，

讨论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在发言时指出："上层党部为右派把持，下层群众组织不稳，因此右派可怕；但是，如果群众工作作好，右派无甚危险"。

2月 7日 在世炎同志指导下，经过多方努力和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巡捕房，释放了这一天在杨树浦开会时被捕的百多名工会干部。

9日 世炎同志出席全体区委会议，发言时指出：戴季陶、蒋介石"这批人将来必反革命，现在我们要先使左派团结起来，受我们影响，否则很危险"。

22日 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世炎和汪寿华同志在闸北青云路洪发里指挥战斗。世炎同志派人送信给兵舰上的党员同志，令他们配合行动。

28日 世炎同志在第189期《响导》上，发表了《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的文章，对第一次总同盟罢工和第二次武装起义作了总结，他指出：虽起义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这绝不是失败，更不是毫无结果；这五日总同盟罢工的经验教训，超过了'五卅'以来所有的经验教训之总和"。

3月初 世炎同志深入到工人中作宣传教育，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参加商务印刷所党小组会，动员党员同志打进"保卫团"，掌握敌

人武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　6日　世炎同志出席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讨论党参加市民代表会议的问题。世炎同志发言时指出："我们参加政权，不是派个代表就完事，而是要在政治思想上拿住群众，在政府中力争民众的利益"；并主张"党在组织上绝对不能公开"。

8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在市民政府中要组织党团，作为市民政府的"后台老板"，"要作到真实工人领导的形式"。

14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对浙江的工作做了长篇发言，建议把作好县民会议、市民会议及农民乡民协会，作为基本的工作；"农民运动要积极进行，将来必要阶段：（1）与土豪劣绅决斗；（2）进行暴动"。

19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晨八时召开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北伐军兵临江苏后的上海工作，世炎同志提议："今天先不罢工，等松江消息"。

下午两点半，世炎同志出席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罗亦农同志发布第三次起义的预备动员令。世炎同志指示各部委各产总要特别注意游行和起义的行动路线。

21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晨八时召开的各部委书记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全市工人上午十二点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军事行动。

上午，世炎和当时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在闸北宝山路福源里指挥战斗。

上午十二点，罢工开始了！战斗开始了！

下午两点，世炎同志亲自指挥沪东纠察队攻打江湾警察署。

下午四点，总指挥部移进第五区警察署。

黄昏，世炎同志派人到西南方向侦察敌情。

晚上，巷战激烈，在通宵激战中，世炎和周恩来同志轮换着到前线指挥战斗。

22日　纠察队攻克敌人最大据点——商务印书馆俱乐部。

下午六点，纠察队占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至此，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同志指挥的、轰动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23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在湖州会馆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作了报告。

25日　总工会假湖州会馆招待新闻界，世炎以纠察队指挥的名义，向中、日记者三十余人，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

26日　上午九点，世炎同志出席了区委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及下一步工作，提出要准备应付蒋介石的政变。世炎同志指出：纠察队员应进行审查，“靠不住的令其回去工作”。要“预备粮草，上总要在四周租民房布防”。

上午十一点，举行纠察队授旗典礼时，世炎同志全副武装站在指挥台上。

27日　上午八点，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世炎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

4月　1日　世炎同志出席区委主席团会议，发言时指出：要作反蒋宣传，揭发其反动事实。

7日　世炎和汪寿华同志主持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世炎同志作国内政治形势和外交问题报告。

11日　黄昏，汪寿华同志被大流氓杜月笙骗去，一去未回，世炎同志一夜不安。

12日　晨四时，蒋介石军队和流氓武装向各处纠察队进攻，强迫缴枪。世炎赶赴湖州会馆，多方奔走交涉。群众大游行，同声反抗。20万工人大罢工。

13日　世炎和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在闸北青云路举行的群众大会，会后大游行，反动军

警四处开枪射击，造成大惨案。

14日　晨，李立三、聂荣臻两同志由汉口抵上海，传达中央指示。世炎同志向他们报告了上海的情况，表示：要隐蔽力量，决心再干。

下午，世炎同志主持了各产业工会负责干部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复工令。动员工人们忍痛复工。

15日　世炎同志主持了各部委书记和各产业工会委员长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两个上午，世炎作长篇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下一步斗争任务。对干部作了新的调配。此后他便和新任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日夜奔忙，恢复和整顿组织。

世炎同志还分配一些干部去杭州、南京、无锡等地恢复整顿工作。

18日　世炎同志出席了区委全体会议，他在发言时指出："最近的工作有错误，暴动后及二月十九日以前的工作都有右倾软弱的倾向，当然不是区委应该负责"。

27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世炎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

6月　中旬　江苏省委在恒丰里140号召开省委成立大会。因叛徒告密，省委书记陈延年等三人被捕。世炎同志组织营救。

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

7月　2日　黄昏，大雨，世炎同志在自己的寓所——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被捕，拘于英租界临时法院，化名“夏仁章”。在王若飞同志主持下开始了紧张的营救工作。

4日　夜，世炎同志被押解到枫林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5日　上海反动报纸登出“共产党夏仁章被拘”和陈延年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

6日　由于两个叛徒的指证，敌人认定“夏仁章”即是施英。世炎同志见身份已经暴露，便乘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动罪恶，和反动派及叛徒展开公开的斗争。

世炎同志通过内部关系给党组织送信，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要争取”。

18日　夜，世炎同志写长篇遗书。

19日　晨，世炎同志慷慨就义于枫林桥畔。就义前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10月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一期第一页上，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悼词，悼词说，世炎同志和陈延年同志的牺牲，“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两个勇敢有力的领袖”和“忠实而努力的战士”。

赵世炎（1901—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笔名施英，四川酉阳人。1921年在法国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与周恩来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任总支部书记兼法国组书记。1923年去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以后又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7月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日英勇就义。

书号：10118·806

定价： 2.35 元